新编剑桥印度史

莫卧儿帝国

The Mughal Empire

［美］约翰·F. 理查兹　著

王立新　译

CAMBRID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新编剑桥印度史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莫卧儿帝国

The Mughal Empire

〔美〕约翰·F. 理查兹 著

王立新 译

CAMBRID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卧儿帝国 / (美) 理查兹著；王立新译.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1
（新编剑桥印度史）
ISBN 978-7-222-10518-8

Ⅰ.①莫… Ⅱ.①理… ②王… Ⅲ.①莫卧儿帝国（1526～1857）—历史
Ⅳ.①K35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8727号

The Mughal Empire，1993 (ISBN-13：978-0-521-56603-2) by John F. Richards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23-2013-003号
审图号：GS（2012）2277号

出品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郭木玉 张菊芬 赵 萍
装帧设计 王睿韬
责任校对 郭木玉 赵明珍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丛书名	**新编剑桥印度史**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书 名	**莫卧儿帝国**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作 者	〔美〕约翰·F. 理查兹 著	开 本	720×1010 1/16
	王立新 译	印 张	23.25
	尚劝余 译审	字 数	360千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印 数	0001—3000册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书 号	ISBN 978-7-222-10518-8
邮 编	650034	定 价	72.00元

新编剑桥印度史

项目负责人

刘大伟　赵石定

译审委员会

顾　问

林承节　孙培钧　孙士海　谭　中

主　任

任　佳　刘大伟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吕昭义　张光平　陈利君　赵石定　赵伯乐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文富德　王立新　王红生　王崇理　王　镛　邓俊秉
任　佳　刘大伟　刘　建　吕昭义　张　力　张光平
张　洁　张贵洪　张敏秋　李　桢　杜幼康　杨信彰
沈丁立　邱永辉　陈利君　陈继东　尚劝余　尚会鹏
金永丽　赵干城　赵石定　赵伯乐　殷永林　郭木玉
郭穗彦　葛维钧

出版说明

剑桥世界史系列图书，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学术声誉，是当今史学界的著名学术品牌。《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是其中之重要一种。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率先在国内推出的《剑桥东南亚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促进、推动了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在中印交往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深化对印度的研究十分重要。云南人民出版社再次携手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中文版，旨在为专家学者提供有益参考，拓展研究视野，提升国内研究印度的水平，推进中国的印度史及南亚史研究。它也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响应国家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的一项重要学术文化工程。

《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是剑桥大学南亚研究所在1922—1937年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系列基础上，汲取国际上关注印度特定领域的专家、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精华推陈出新的倾心之作。自1987年推出《葡萄牙人在印度》（*The Portuguese in India*）以来，到目前英文版已出版23种，其论述内容始自14世纪，终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丛书以一本本主题独立、时间重叠、内容互为补充的著作，涵盖了印度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艺术、社会生活等领域。丛书英文版面世以来，世界媒体及专家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其 “是真才实学的集大成者”，“不仅是现存史料的大汇聚，更有开拓性的研究、深刻的洞见和对某些个案富有见地的新的诠释”，“每一本都是引人入胜，叫人爱不释手的佳作”……

《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要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非易事。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组织了一支由既具有深厚语言功底、也具有相关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翻译、译校和审读队伍。专有名词的翻译参照了习惯译法，力求准确和统一；为了方便读者，书中所有译名首次出现时在其后标出了原文。

这里需特别说明的是，因该丛书原版各册出版时间跨度大，故编者身份及丛书内容介绍在各册中有所不同，为保持原貌，中译本未做统一。另为方便读者核查原著作内容，中译本标注出了原著页码。

为保证一定时限内出书，所有参加该项目的编校人员本着打造高质量学术精品的愿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未敢有追求一百分的完美奢望，如能得到读者朋友们九十分的认可，即已感到由衷的欣慰。书中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诚挚欢迎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望不吝赐予建设性意见，以便重印、再版时改进。

今天，呈献给大家的这套书，凝聚了所有参与者、关心者的心血，特别是出任本丛书翻译顾问的孙培钧先生（中国南亚学会原会长）、孙士海先生（现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林承节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谭中先生（印度德里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曾获印度政府二等莲花奖及中印友谊奖）以及担任译审委员会主任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任佳女士等对本丛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助，借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南亚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研究机构、高校及有关专家学者对该丛书的翻译、译校和审读工作给予了有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在此一并谨致谢意！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

新编剑桥印度史

总　编　戈登·约翰逊（Gordon Johnson）
剑桥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塞尔温学院研究员

副编辑　C. A. 贝利（C. A. Bayly）
剑桥大学现代印度史教授、圣凯瑟琳学院研究员

副编辑　约翰·F. 理查兹（John F. Richards）
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

尽管1922—1937年间出版的最初的《剑桥印度史》对印度编年史的编纂和对印度政府行政结构的描述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已经被过去50年里出版的大量新研究超越了。

为了完整呈现关于南亚历史发展的最新学术成果和不断变化的见解，《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将以一系列简短而自成一体的著作出版。在总的4部分中，每一本图书都针对一个独立的主题，由一个人单独完成。和以前一样，每本书的末尾都包括了一篇很长的文献述评，

以引导非专业人士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

4部分即：

Ⅰ 莫卧儿人及其同时代族群；

Ⅱ 印度邦国和向殖民体制的过渡；

Ⅲ 印度帝国和现代社会的开端；

Ⅳ 当代南亚的演进。

总编前言

《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内容涵盖了16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它标志着剑桥史风格的根本改变，在其他方面，编者们认为他们仍是在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学术传统进行工作。

1896年夏，F. W. 梅特兰（F. W. Maitland）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萌发了编撰一套综合性现代史的想法。至同年底，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事们已决定出版《剑桥现代史》。阿克顿勋爵被任命为负责人。出版工作预计从1899年开始，到1904年完成，但事实上，首卷在1902年才问世，末卷出版则迟至1910年，而附加的图表卷和地图卷是在1911年和1912年出版的。

《剑桥现代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又出版了一个完整的各具特色的剑桥史丛书系列，涵盖了英国文学、古代世界、印度史、英国外交政策、经济史、中世纪史、英帝国、非洲、中国和拉丁美洲等领域；甚至在现在，也还在筹备出版其他新的系列。的确，这些种类繁多的剑桥史丛书使本社在出版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般参考书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

剑桥史系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从来就不只是与词典和百科全书类似的著作。用H. A. L. 费歇尔（H. A. L. Fisher）的话来说，剑桥史一直都是“由那些关注专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专家写成”。不过，正像阿克顿勋爵和出版社理事们于1896年一致同意的那样，它们从不是现存材料的简单汇编，而是原创著作。毫无疑问，这

些书的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书很快就过时了，但它们的优点在于它们始终在创造而不是简单记述已有的知识：它们倾向于潜心研究，大大地推动了更深入的研究工作。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些出版物价值倍加凸显，从其他种类的参考书中脱颖而出。《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的编者们在他们的工作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最初的《剑桥印度史》是于1922—1937年间出版的。该丛书原计划出版6卷，但其中论述自公元1世纪起至穆斯林入侵印度止这段时期历史的第2卷一直没有出版面世。一些材料依旧具有价值，但很多方面目前看来已是过时了。过去50年对印度进行了大量新研究，而新研究成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传统印度史中十分武断的年代学和分期法的恰当性提出了质疑。

编者们认为，使用传统方式来编撰新的《印度史》在学术上是不合宜的。过去半个世纪人们对印度史研究的选择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整个印度史不可能以均衡、全面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结论是，最好的方案是把印度史划分成在时间上相互重叠的4部分，每一部分大致包含8卷本具有独立题目或主题的著作。尽管就篇幅而言，这套书相当于传统类别的大部头著作，但形式上，《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将成为一套包括了几个独立但互补的部分的鸿篇巨作。据此，各分本分列在以下4部分中：

Ⅰ　莫卧儿人及其同时代族群；

Ⅱ　印度邦国和向殖民体制的过渡；

Ⅲ　印度帝国和现代社会的开端；

Ⅳ　当代南亚的演进。

正像这些部分中的各本之间是互补的那样，它们确实既在主题上也在年代上相互交错。恰如它们所呈现的那样，它们旨在根据现在的研究来描述这一主题，以促进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期待《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成为这一领域的定论，而是成为有关这一主题持续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声音。

中文版总序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的中译本。这套著述是英、美、印度等国的一大批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内容以近现代为主，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科技、艺术等领域。著者中不少人是享有盛名的史学家，也有些是卓有成就的后起之秀。著述使用了包括实地考察成果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内容充实，立论严谨，分析深入，观点富有创意。丛书自问世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广受好评。此次中译本的出版对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印度的历史和现状，促进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一段时期以来中印间往来闭塞，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人心目中，印度依然是一个神秘国度。凭着少量记载和虚虚实实的传言，中国人得到的印度形象是零星的、片面的、过时的，有些甚至是扭曲的，恰像数十年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一样。随着中印两国改革开放和人员交往的增多，特别是两国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崛起，媒体的报道越来越频繁，去印度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迷雾渐渐被拨开，一个真实的印度鲜活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人们一方面看到了和中国相似因而非常眼熟的景象：贫穷、落后、奋发图强、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个新兴大国的悄然崛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现象觉得不能理解甚至有一种不可思议感。比如，印度社会为何如此五光十色，又怎样能实现多元统一？为什

么会不断爆发宗教骚乱，而且每次都有大批人狂热地跟随？为什么独立六十多年了，种姓影响还如此强烈，以致今日有一批低种姓政党在地区政治舞台上成了主角？最近十多年来，是什么原因使印度历届政府大都是多党联合执政，有的执政联盟甚至由二十多个党构成？这些疑问，从现实里是很难找到答案的。答案寓于历史中。只有了解印度历史，才能知道印度从古至今的复杂发展进程；了解其特点，才能对今日印度的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历史不但是现实的镜子，也是打开现实迷宫、认识真实印度的钥匙。

坦率地说，中国学者对印度历史的研究是很薄弱的。迄今，我们至多只是在若干点上有所探讨，面上的研究特别是宏观整体的把握是很欠缺的和肤浅的。《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使中国学者不仅有机会了解各有关专题的论证，而且能够领略到撰写者收集材料的细致，学风的踏实严谨，视野的开阔；了解到他们各具特色的史学观点、分析方法和编撰风格。这些都会给国内史学工作者以新的启示，而他们研究的丰硕成果更是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吸纳。当然，各国国情不同，中国学者在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和研究的重点上有自己的特色。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同时以敞开的胸怀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成果，我们才能得到真知。这也是研究印度历史、认识今日印度的正确道路。

不久前，在一次研讨会上，几位同事曾就推进国内印度史研究的问题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除了要在收集、整理资料上下大工夫外，还必须在宏观把握上更加努力。当前，要特别努力理顺印度史上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尤其是那些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些关键问题构成历史的基本骨架，是深入研究具体事件和过程的指针。我国史学界以往曾受到极“左”指导思想的影响，加之缺乏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对印度史的看法有不少不客观之处，应该纠正。如果把关键问题理顺了，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就有了坐标。借此《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中译本出版之机，我愿把自己这方面的一点浅见写出来，向学界求教，期望抛砖引玉，引起讨论，以共同的努力，促进印度史研究的深

入开展。

重大关键点很多，我初步想到了以下几点：

1.印度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印度社会是阶级—种姓复合型社会，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自雅利安人部落解体以来，阶级成了社会构成的细胞；这时种姓制度形成，成了社会构成的另一种细胞。两者是分别存在的，又有交叉重叠，都对社会的结构、功能、性质、人与人关系和社会意识等方面起着支配性影响。两套体系的内部梯级在成员构成上有一致的一面，但又不尽相同。前者可流动，后者则世代相传，固定不变。两者都是以维护少数特权上层的统治为根本目标的，起到相辅相成作用，但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正是种姓制度的存在，使阶级关系发展得不充分，造成了印度阶级社会某些独有的特点。习惯于用阶级观点观察历史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印度古代社会和中国一样都属东方型社会，其实印度和中国是有很大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印度社会构成的复合性质。因此，研究印度历史和社会如果低估种姓制度的作用而一味强调阶级分野，得出的结论就有脱离历史实际之虞。

今天，种姓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清晰可见。不仅种姓观念至今在农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依然是支配人们思想行动的强大因素，近年来北印度不止一个邦低级种姓政党的兴起和取得邦执政地位更是强劲地表明，低级种姓的影响力如今上升了，大有与高级种姓一争高低的气势。悲观论者认为这是种姓制度的复苏。其实，它不是复苏，而是种姓制度式微道路上的波澜，是新生力量对旧形式的利用。这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受压抑的低种姓随着经济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其精英需要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取得真正平等的权利。低种姓具有人数优势，竭力把选票变为武器，实现这个目标。低种姓政党的兴起和影响印度政治生态的平衡是必然趋势。要达到种姓制度最终淡化，这一段路是必定要走的，而且会是一段很长的路。

2.如何看待穆斯林进入印度和教派主义的出现

印度古代史上外族入侵接二连三，有两种性质，一是来掠夺财富，一是征服领土，建立统治，并伴随大规模的族群移居。穆斯林入侵这两种情况都有，像加兹尼国王马哈茂德1001年至1026年间入侵印度17次，掠走财物无数，就是纯粹的掠夺者；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建立与之不同，穆斯林此时大规模来印度定居，逐渐融入次大陆居民的大群体中。特别是大量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后，使穆斯林本土化趋势加强。因此，历史研究在论及穆斯林入侵时，应该把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穆斯林的进入印度和那种纯粹的掠夺入侵区别开来。前者固然也是作为入侵者来的，带来了屠杀、破坏、宗教压迫，但其后代（更不用说大量印度教改宗者）已成了印度次大陆居民的一部分，世代在这里生活，对次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点必须得到肯定。印巴分治后，选择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首先认同自己是印度人，这是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社会对他们不应再以外来侵略者看待，也不能再以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的理由排斥他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应和睦相处。这也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时就把世俗化和宗教平等定为基本国策的原因。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穆斯林统治印度后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宗教压迫，造成了宗教对立与仇恨。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殖民统治，也竭力利用宗教矛盾，制造分裂，结果导致了印巴分治。

也就是在英国统治时期，宗教与政治的密切结合产生了一个怪胎，这就是教派主义。教派主义者宣称，一个教派不仅信仰相同，而且有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应把维护本教派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印巴分治前，鼓吹教派主义的主要是穆斯林上层，印度教也有少数人鼓吹，不过是处于守势。分治后，尼赫鲁警告说，在独立后的印度，印度教教派主义将是威胁国家世俗化进程的主要危险。事实果然是如此。一再发生的宗教骚乱、旷日持久的寺—庙之争、关于“印度教特性”的鼓吹，在在都表明印度教教派主义是事端的主要挑起者

和幕后的罪魁祸首。

表面看来，似乎印度频发的宗教冲突是出自人们的宗教狂热，其实，真正狂热的是那些教派主义组织和教派主义者。他们常年蛊惑宣传，利用群众的宗教感情，煽动大众。所谓宗教冲突，其实质是政治利益之争。在选举政治下，这个利益之争的集中表现就是通过煽动群众的宗教感情，在大选中捞取选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近还说，教派主义是今日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有些人和组织为了否定印度多年实行的世俗化国策，编造种种理由。历史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非分明，揭露真相。

3.殖民统治的双重历史使命

马克思于1853年就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一精辟论断为学术界全面正确地认识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入门的钥匙。

英国统治印度近两个世纪，在印度实行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民族欺凌可谓罄竹难书。历史研究无论何时谈到殖民统治时，对侵略罪行绝不能回避或轻描淡写，更不能美化或为之辩解。

在充分揭露的同时，也必须冷静地观察和研究另一面，即殖民统治和剥削不自觉地起到的建设性作用。殖民剥削是为宗主国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无论哪个时期的殖民政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为了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就必须摧毁横亘在它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当地的自然经济结构，并对其上层建筑实行相应的改造。殖民统治者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掠夺目的；但只要这样做，不管愿意与否，就会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这是殖民统治固有的内在矛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下，到20世纪中期，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社会观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有的方面甚至是跳跃式的

前进。这一点只要追踪研究整个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不过，殖民统治者对破坏性和建设性两种使命都不会彻底完成，一般来说都是在进行一定阶段后半途止步。这同样是由其卑鄙私利决定的。

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正是呈现出这样鲜明的矛盾性。具体表现为：它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却人为地保持了部分分裂状态（土邦）；它摧毁了印度的自然经济和村社，却竭力维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它把印度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却剥夺印度自主贸易的权利；它把大工业移植到印度，却竭力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把政治民主制传到这个国度，却只是用作殖民高压统治的装饰物；它自诩是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者，却傲然高踞于印度人民头上，颐指气使；它为了庞大的殖民统治机器和商业机构的运转不得不兴办近代学校，却要通过奴化教育，摧毁印度民族自豪感的根基；它在行政管理上、教育体制上实行世俗主义，却为了对抗民族运动竭力挑动宗教冲突。凡此种种，都清楚地反映了上述殖民统治的内在矛盾如影随形，支配它的一举一动。

有的人讲起殖民统治的历史，对其建设性作用的一面不愿承认。从心情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感情代替不了理智的分析。历史研究是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认识就会出现偏差。比如，印度的大工业、近代教育和近代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是独立后突然冒出来的吗？1885年建立的国大党为什么一开始就以在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作为追求目标，那些先驱者的先进思想是哪里来的，是自己头脑里想出来的吗？今天，历史研究的任务已经不是要论证它的建设性使命是否存在，这已是很清楚的事了，而是要深入研究由于它蓄意阻挠破坏性和建设性使命的彻底完成，给印度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什么样的畸形，带来哪些危害，应当怎样纠正。这才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之正道。

4.印度争取独立的非暴力不合作道路

习惯于认为武装斗争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唯一道路的中国学者，要充分肯定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道路是需要在思想上转很大弯子的。但这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正视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印度通过这条道路确实取得了独立。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革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唯一的道路。印度的特殊国情使它走非暴力不合作道路有必要，也有可能。

以往，人们对非暴力不合作道路有微词，认为那算不上革命，原因之一是认为它是懦弱的表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确实有软弱性，但甘地提出这一策略并非由于软弱，而是出于不可动摇的坚持真理的信念和渗透着强烈宗教性的价值观。谁能说一生十多次绝食、十多次坐牢、自称“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的甘地是怯懦者？谁能说千千万万的群众不怕入狱，不怕没收财产，坚持以各种形式进行不合作斗争是软弱的表现？甘地非暴力思想表现的是大无畏精神。他的目的是鼓励每个人勇敢地坚持真理。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在这里。

以往，人们对非暴力不合作道路有微词，是认为它对广泛发动群众是严重的羁绊，对统治者缺乏打击力度。殊不知，不合作策略调动了全国千千万万群众在各个领域以不同形式开展斗争，汇合一起，成了雷霆万钧、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斗争风暴。就群众发动面之广和威力之大而言，印度的群众运动在现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是少见的。

以往，人们对非暴力不合作道路有微词，也是认为广大群众一旦行动起来，就不可能接受非暴力的禁锢，最终会摒弃它的领导。实际上，由于甘地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前就已明确表态，允诺不会因为发生个别暴力事件中止运动，结果参加人数之多、阶层之广泛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广大群众的确是不愿受非暴力信条禁锢的，控制不住时会自行其是。但是，他们对甘地的无比热爱使他们即便在越出非暴力的限制时，也仍然打着甘地旗号，认为是在执行甘地的教导。1942年8月

国大党决定开展“退出印度”运动，在还没有开始实施时就遭到当局扼杀。下层群众却闻风行动起来，而且发挥创造性，破坏交通线，攻击警察局，把甘地和国大党要求的非暴力不合作变成了暴力不合作，同时宣称，这是不合作的新形式，是按照甘地各自为战的要求实行的。可见，认为群众不接受非暴力就会离它而去并没有根据，群众不接受可以自行修正，成为群众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这次斗争风暴显示出，如果广大群众都把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按自己的想法修正和发挥，对英国统治者而言，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正是这场风暴带来的震撼，为战后英国决定退出印度埋下了最早的种子。

今天，我们强调要充分肯定非暴力不合作道路，不是要把它奉为典范，贬低武装斗争道路，只是要说明，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道路，不能生搬硬套，拿自己设定的标准苛求。

5.印度经济现代化的模式

1955年，作为政府总理的尼赫鲁为印度经济现代化规划了道路，其基本内容为：以增长、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为国家发展三目标，在混合经济体制下，实现以公营成分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和以合作制为基本结构的农业现代发展。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增长和社会公平并重，不能因追求增长而拉大贫富差距；在工商业领域大力发展国营成分，占领国民经济的制高点；私营成分只能在国家允许的框架内发展，要严加控制；实行进口替代方针，对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实行严格管制。结果，印度经济虽有发展，但在一段时期后成了半封闭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1991年拉奥执政起，印度开始全面经济改革。之后的政府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地深化改革内容，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这样就形成了现代化第二个模式。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在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方向下，用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带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全面发展。印度半管制的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了市场化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

这个转轨是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要求，是改变印度已经落后了的经济结构，为停滞不前的经济注入活力的要求，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要求，因而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使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增长速度进入快车道，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

面对日益显现的改革成效，改革初期那些质疑和反对改革的声音逐渐减弱了，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各政党的共识已越来越多。可是，另外一种声音却有抬头之势，这就是对尼赫鲁规划的发展道路持否定态度，认为当年强调公营成分为主导，对私营经济严加约束，强调自力更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都是做错了。有些政党和学者认为，印度从独立时起就应该实行像第二个模式那样的政策。这种“今日对就一定是昨天错”的思维是脱离历史实际的，是非历史主义的。

新模式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第一个模式的基础上重构的。没有第一个模式奠定的根基，就不可能有第二个模式。试想，如果没有公营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完整的工业体系能那么快地建立吗？如果没有公营工业的发展和对私营经济的控制，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吗？如果不实行进口替代，印度能真正实现经济自立吗？如果印度那时就完全敞开国门，印度国内市场还能是印度的市场吗？新模式是新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摈弃了第一个模式的要素。例如，增长、社会公平和自力更生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尽管现在在指导思想上是增长第一，兼顾公平，但这个兼顾被十分强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再如，混合经济体制今天依然存在。公营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虽然改变了，但只要还有大量公营成分存在，混合经济体制就不会消失。正因为有这些继承关系，所以第二个模式虽然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改革方向，但仍带有鲜明的印度特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

尼赫鲁规划的印度初期发展道路确实有一些不妥当之处，如对公营成分的作用期望太高、对私营成分管制过严、对农业合作化抱有不

切实际的幻想等。但整体上说，他规划的道路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是必需的，因而是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经济虽然快速增长了，但社会贫富分化也在加剧，普通下层群众的不满导致了不止一届政府下台。当后继的一个个政府吸取教训，都把缩小贫富差距的口号响亮地喊起时，人们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尼赫鲁当年定为国策的口号吗？这不就是他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实质吗？原来，尼赫鲁是有先见之明的。这样说来，要以今天的模式否定昨天的模式确实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说，没有昨天便没有今天，那些今天正确的政策未必昨天就能实行。印度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尼赫鲁道路错了，再正确的决策由于所依据的客观形势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也需要随时改变。后来的执政者没有及时改变，甚至有些方面还背道而驰，这是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回顾历史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千万不能脱离时空条件，主观臆断。

6.联合政府成了近二十多年印度政治格局的常态

从1989年起，印度人民院历届选举结果都是“悬浮议会”，即没有一个党取得过半数席位，只能几个党成立联合政府，或建立少数派政府，取得别的党外部支持。这样，联合政府就成了常态。

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同反应。有一些人认为，联合政府出现是偶然的，不会持续太久。更多人认为，联合政府一再出现，是印度民主政治倒退的表现，给经济发展前景蒙上浓厚阴影。提起联合政府，很多人就会感到不安。究竟应怎样评估这一现象？

联合政府在未来一段长时期内常态化是不可避免的。国大党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因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失去了原有的大批支持者，不再有能力在大选中取得过半数席位。新崛起的印度人民党由于其教派主义意识形态得不到穆斯林支持，印度教徒也有很多人不赞同，每次大选最多能得到三分之一强的席位。更应着重提出的是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精英在舞台上崭露头角；随着保留制的扩大，低种姓精英大批出现，他们都要在政治上发动本地区本

种姓的群众争取自身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地区政党和低种姓政党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大量政党在大选中都参与争夺选票和席位，就使选票严重分散化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党要独自达到过半数席位都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势短期内有没有可能改变？没有。所以，在未来一段长时期，除非发生了非常特别的变故，要改变联合政府的格局是很少有可能的。

联合政府成为常态不是民主政治的退步，相反是进步中出现的现象。印度是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议会民主制的活力就在于竞争。50—80年代，印度实际上是由国大党包揽执政权（1977—1979年除外），竞选变得有名无实。国大党由于是民族运动的旗手，在印度独立后又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者，政绩突出，受到广大群众拥戴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很难撼动的执政地位又使它缺乏严格自律，不能与时俱进，不免失去许多群众的信任。如今在多党竞争、轮番执政的大环境下，逼使每个想争取更多选票的党都不得不注意自律，努力靠近群众。例如，国大党为了重振雄风，在索尼娅领导下强调加强党员同群众的联系，从改进基层工作做起；为了夺回民心，对国大党以往的某些错误政策和举动公开道歉；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执政后，尊重邦的权利，再也没有发生以往一个党单独执政时那些侵害邦自主权的事件。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看，进入联合政府时期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大为改善。由于大量地区性政党参与中央执政，宪法规定的邦自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些都说明，民主政治进程并没有因为出现联合政府而逆转；相反，正是由于无论哪个执政党再也没有为所欲为的资本，所以对民主的尊重也普遍增加了一分。

联合政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是事实。例如政府决策时不同倾向的政党互相牵制，迁延时日，妨碍及时决断；政党间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工作缺乏效率；执政联盟内讧不断，外部支持的党动辄撤销支持，导致政局不稳，一再提前大选，政府更替频仍等等。这些对经济改革确实有消极影响，该实行的政策往往不能及时实行。但也应看

到，联合政府并没有阻止改革的开展和深入。事实上，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入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各执政党为了争取民心，都努力表现出对改革高度关心。这就使改革步步深入，保证了经济增长步入快车道。

多党联合执政开始时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很多，但实践出智慧，人们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摸索出了较成功的联合范式，包括在政策主张上求同存异、形成最低共同纲领、建立常规化的协调机制、规定必要的纪律约束等。事实证明这都是防止混乱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因如此，如果说，最初的联合政府大都中途夭折，1999年建立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和2004年建立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都胜利完成了任期。形势越来越趋稳定，人们对联合政府的信心也随之一步步得到增强。

以上所述，只是管窥之见，挂一漏万，且言不尽意。只盼引起学术同行对重大关键点的关注，共同探讨，共同把握，以期把印度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中译本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南亚学会、云南省南亚学会鼎力协助，承担了丛书翻译和审校的全部组织工作，并投入本单位多位专家参与译审。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庞大的文化工程，任务之繁重和艰巨可想而知。作为印度史的一名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我要在这里对所有参加这一建设性工作的热心的领导者和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忱。相信这套丛书中译本的出版会在我国史学界引起积极回响，并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相信随着国内外优秀著作的不断出版，我国印度史研究园地必将迎来百花竞放、枝繁叶茂的一天。

林承节

2011年9月16日于北京大学

致　谢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母亲

埃拉·希金森·理查兹（1908—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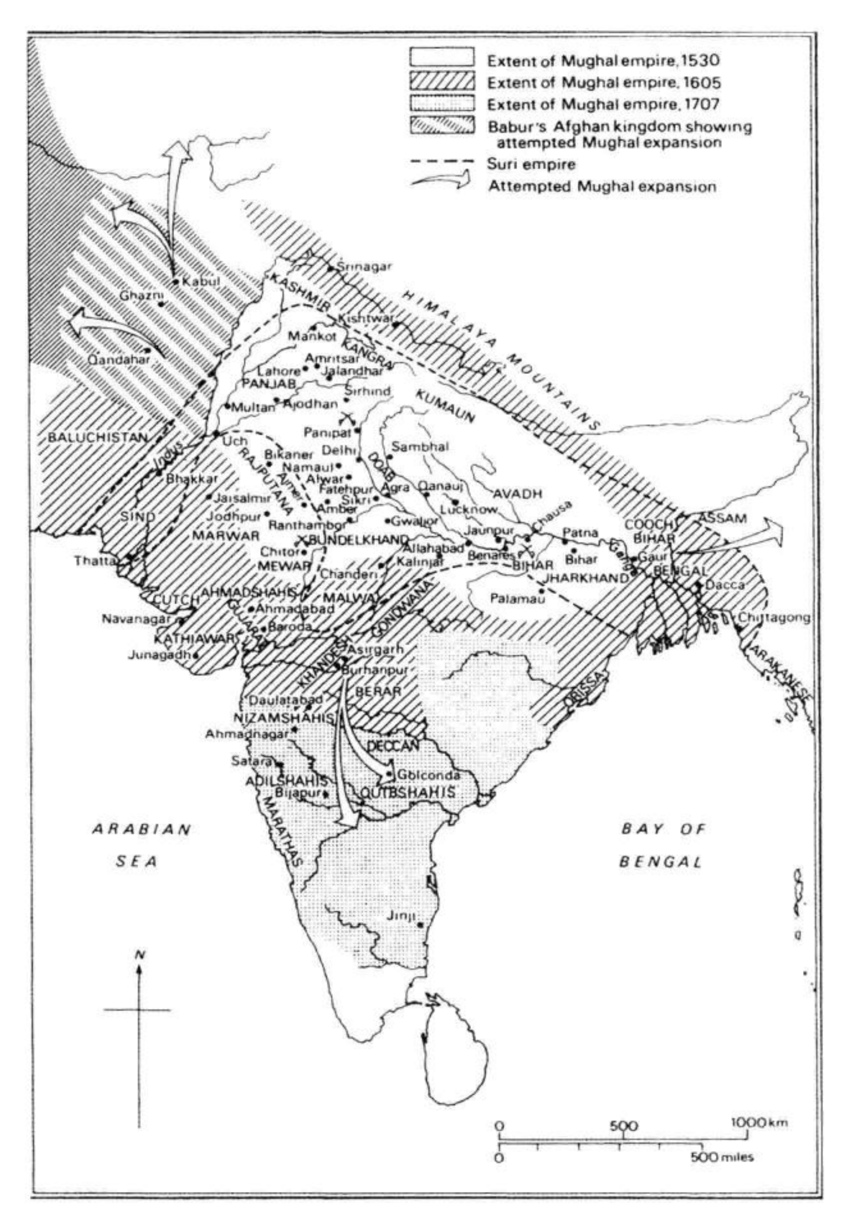
莫卧儿帝国

莫卧儿帝国是已知前现代世界史上最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一。它创建于16世纪早期，截至17世纪末，莫卧儿皇帝已统治着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其人口在1亿—1.5亿之间。除了军事上的成功，莫卧儿皇帝们生活奢华，帝国宫廷中的仪式、礼仪、音乐、诗歌以及精致的绘画和器物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贵族高尚文化。

在本书中，约翰·理查兹教授记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自1526年建立到1720年崩溃的历史。他着重于莫卧儿人领土扩张的动态，他们在田赋、货币和军事组织方面的制度革新，意识形态的嬗变，以及皇帝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此外理查兹教授还分析了莫卧儿帝国所特有的制度，如扎吉尔体系，并探究了莫卧儿印度同早期现代世界的联系。

《莫卧儿帝国》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历史上的这个辉煌时期提供了一部最新的简明综述。该书将受到学习和研究南亚历史和文明的学生和专家们的广泛阅读，也将引起那些希望对伟大的莫卧儿遗迹的背景有更多了解的旅行者们的兴趣。

约翰·F.理查兹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出版了大量有关莫卧儿时期印度的著作。他的著作包括《戈尔康达的莫卧儿政府》，还作为编者编辑了《莫卧儿印度的帝国货币体系》和《南亚的权威和王制》等书。



MAP 1. The Mughal Empire, 1526 to 1707

Source: F. Robinson, *Atlas of the Islamic World since 1500* (Oxford, 1982), p. 59.

地图1　1526—1707年的莫卧儿帝国[①]

---

①本书所有插图系原文原图。

Extent of Mughal empire, 1530　莫卧儿帝国疆域：1530年
Extent of Mughal empire, 1605　莫卧儿帝国疆域：1605年
Extent of Mughal empire, 1707　莫卧儿帝国疆域：1707年
Babur's Afghan Kingdom showing attempted Mughal expansion　巴布尔的阿富汗王国，表明莫卧儿尝试征服的地区
Suri empire　苏里帝国　Attempted Mughal expansion　莫卧儿帝国的扩张尝试

Srinagar	斯利那加	Kabul	喀布尔
Ghazni	加兹尼	Qandahar	坎大哈
KASHMIR	克什米尔	Mankot	曼科特
Kishtwar	基什瓦	HIMALAYA MOUNTAINS	喜马拉雅山
KANGRA	冈格拉	Amritsar	阿姆利则
Lahore	拉合尔	Jalandhar	贾朗达尔
PANJAB	旁遮普	Sirhind	锡尔欣德
KUMAUN	库毛恩	Ajodhan	阿焦罕
Multan	木尔坦	BALUCHISTAN	俾路支斯坦
Panipat	巴尼伯德	Uch	乌　赤
RAJPUTANA	拉杰普塔纳	Bikaner	比卡内尔
Ajmer	阿杰梅尔	Delhi	德　里
Namadul	纳玛杜尔	Alwar	阿尔瓦
Fatehpur Sikri	法塔赫布尔西格里	Amber	安　伯
Ranthambor	兰桑波尔	BUNDELKHAND	邦德尔坎得
Chitor	奇图尔	MEWAR	梅瓦尔
Sambhal	桑巴尔	DOAB	河间地
Agra	阿格拉	Qanauj	卡瑙季
Lucknow	勒克瑙	Gwalior	瓜廖尔
Jaunpur	江布尔	Allahabad	安拉阿巴德
Kalinjar	卡林加尔	Chanderi	昌德里
Benares	贝拿勒斯	BIHAR	比哈尔
AVADH	阿瓦德	Chausa	乔　萨
Patna	巴特那	Bihar	比哈尔
JHARKHAND	恰尔肯德	Palamau	帕拉茂
Ganga	甘　加	Gaur	高　尔
COOCH BIHAR	库奇比哈尔	ASSAM	阿萨姆
BENGAL	孟加拉	Dacca	达　卡
Chittagong	吉大港	ORISSA	奥里萨
Indus	印度河	Bhakkar	巴卡尔
Jaisalmir	杰伊瑟尔梅尔	Jodhpur	焦特布尔
MARWAR	马瓦尔	SIND	信德
Thatta	塔　塔	CUTCH	卡　奇
KATHIAWAR	卡提瓦尔	Junagadh	朱纳格特
AHMADSHAHIS	阿玛德沙王朝	Navanagar	纳瓦讷格尔
Ahmadabad	艾哈迈达巴德	Baroda	巴罗达
GUJARAT	古吉拉特	KHANDESH	康德什
GONDWANA	贡德瓦纳	Asirgarh	阿西尔格尔
Burhanpur	布尔汉布尔	BERAR	贝拉尔
Daulatabad	道拉塔巴德	NIZAMSHAHIS	尼扎姆沙王朝
Ahmadnagar	艾哈迈德讷格尔	Satara	萨达拉
DECCAN	德　干	ADILSHAHIS	阿迪尔沙王朝
Bijapur	比贾布尔	MARATHAS	马拉塔王朝
Golconda	戈尔康达	QUTBSHAHIS	库特卜沙王朝
Jinji	金　吉	ARABIAN SEA	阿拉伯海
BAY OF BENGAL	孟加拉湾		

目　录

地图和表格

地 图

表 格

前　言

本书叙述的起点是1526年，即巴布尔（Babur）在巴尼伯德（Panipat）取胜的那一年，终点是1720年，即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在德里（Delhi）即位的那一年。到后一日期，中央集权帝国的基本结构无可补救地分崩离析。我之所以选择1720年，而不是1739年，1761年，甚或1803年，是基于这一信念：莫卧儿帝国中央集权正式机构的崩溃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30年的研究使我确信，莫卧儿中央集权的政权是一个现实，它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这究竟是好是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1720年之后，莫卧儿帝国变成了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实体。

在这个时期内，我力图描述莫卧儿帝国的建立、它的运作和它的毁灭。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尽可能清楚地解释这个帝国体系的设计和运作。这不是一桩小事，因为数代学者辛勤劳作，就是要尝试着揭示这个机构（enterprise）的复杂结构。

另一个目标是写一部有关1526—1720年间历史的简明而连贯的叙事史。鉴于我记述了那些塑造了帝国历史的重大公共事件（主要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这部叙事史用了传统的叙述风格。这部分地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应该比我们当前的流行做法更加严肃地看待莫卧儿帝国的军事史。毕竟，战争是莫卧儿历代皇帝的首要事业，他们显然把他们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军事。不掌握莫卧儿帝国的领土与资源方面动态扩张和集聚的知识，就很难理解这个帝国的本质。

第三个目标是鼓励对莫卧儿时期做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我们的知识还完

全不够。关于莫卧儿人的二手文献很少，尽管它在南亚和世界史中很重要。xvi 大量详细的地方史研究工作还需要去做。许多有关各种姓和族群的学术专著和长篇文章正等待着历史学家去利用。不同类型和语言的新资料需要去确认、鉴别、整理以及出版原文和译文。例如，我们需要借由某个能阅读拉贾斯坦文、波斯文、法文和荷兰文的人来更好地整合印度和欧洲的资料。对于这样一种新工作，我们最好的希望寄托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轻历史学家的独创性。

最后，我的最重要目标是提供一部单卷本综合性著作，使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我希望这本书能使任何一个对这段极其迷人的历史时期感兴趣的人开卷有益。如果成功的话，本书将为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一个背景。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我受益于这一领域的同道。我特别感谢伊尔凡·哈比布（Irfan Habib）、阿辛·达斯·古普塔（Ashin Das Gupta）、萨提什·昌德拉（Satish Chandra）、塔潘·赖乔杜里（Tapan Raychaudhuri）和M. 阿萨尔·阿里（M. Athar Ali），感谢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在莫卧儿史领域做出的非凡成就和贡献。在这些年里，彼得·哈代（Peter Hardy）和西蒙·狄格拜（Simon Digby）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对我更直接的恩惠来自我的两位编辑同仁——戈登·约翰逊（Gordon Johnson）和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谢谢他们的耐心和批评。我特别希望感谢穆扎法尔·阿拉姆（Muzaffar Alam），他对该书的早期草稿做出了富有卓见的评论。我还受惠于同凯瑟琳·阿舍（Catherine Asher）、斯图尔特·戈登（Stewart Gordon）、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奥姆·普拉卡什（Om Prakash）、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和埃伦·斯玛特（Ellen Smart）的讨论。另外，一如既往，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对我持久不变的爱和理解。

导 言

1

莫卧儿帝国是已知前现代世界史上最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一。至17世纪晚期，莫卧儿皇帝对为数1亿—1.5亿的人口和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320万平方千米）行使着最高政治权威。帖木儿印度绝对在幅员和资源两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它的两个对手，即现代早期伊斯兰帝国——萨法维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能够与莫卧儿皇帝拥有的疆土和臣民相比肩的，唯有与其同时代的现代早期中国大明皇帝统治下的疆土和臣民。

“大莫卧儿皇帝”的财富和荣耀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金库收藏着从几十个被征服王朝掠夺来的财宝；他的王冠和宝座镶嵌着一些古往今来最光彩夺目的宝石。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惊叹于莫卧儿帝国的富有和高雅。帝国宫廷中的仪式、礼仪、音乐、诗歌、精致的绘画和器物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贵族高尚文化。莫卧儿宫廷文化即使在帝国本身已衰落得只剩下一个空壳后很久，依然保持了它的魅力和影响力。今天，体现在细密画或像泰姬陵（Taj Mahal）那样备受尊崇的建筑中的莫卧儿风格有着直接和强大的吸引力。

在儿近170年间（1556—1719年），莫卧儿帝国一直是一个富有活力的、中央集权的复杂组织。皇帝掌控着忠实可靠的军官和士兵中的骨干，他们在每一个省份执行他的命令。人员、金钱、信息和资源按照官方的需要在整个帝国有规则地、按部就班地流动。莫卧儿的成功是极其干练的统治者（他们充当他们自己的总行政官）施行强悍而积极的统治的产物。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和集中控制取决于皇帝及其顾问们的管理技能和战略眼光。

帝国并非只是一幅悬挂在每个地区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上的无关紧要的帷幕。它是一个把次大陆联合起来的无孔不入的中央集权体系。由帝国的军事力量维系的公共秩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其边界内的土地上，有组织暴力的规模和层级显著下降了。帝国对税收和贡赋的需要刺激了生产，鼓励了市场的成长。莫卧儿人的统一做法和无所不在，影响了次大陆上所有地方和地区的社会。鲜有个人和社区，如果有的话，未受到这个庞然大物的触动。

尽管最初的两个帖木儿皇帝及其许多贵族是新近迁入次大陆的移民，但王朝和帝国本身却无可争议地印度化了。所有受到关注的利益和前途都在印度，而不是在中东或中亚的老家。此外，莫卧儿帝国是从印度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它是印度次大陆上长达千年的穆斯林征服、殖民和国家建设的最终产物。

7世纪早期，穆斯林和印度教—佛教武士的首次冲突发生在位于伊朗和阿富汗交界的锡斯坦（Seistan）。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他们的后裔沿着逐渐东移的军事边境发生着摩擦、袭扰和血战。从阿富汗的西部边界到马克兰（Makran）和信德（Sind）海岸，穆斯林政治征服的地域在9世纪抵达喀布尔（Kabul），13世纪早期抵达德里，14世纪抵达德干（Deccan）和南印度的城市。在这条边境线的后面，穆斯林将军们建立了由突厥裔、波斯裔、阿富汗裔和其他外来穆斯林精英掌管的新国家。在14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德里苏丹们统治着一个囊括了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帝国，直至这个帝国崩溃。此后，印度穆斯林政治权力的核心就蜕化为一些地区王国。

在反对次大陆上崇拜偶像的印度教徒的"吉哈德"（即圣战）中，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经常求助于穆斯林的军国主义。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十分倚重于伊斯兰教团，以获得合法性和政治支持。作为回报，国家向有组织的伊斯兰教的主要机构提供金钱和行政支持。经常受雇于国家的神学家、传教士和法官积极寻求保持这个印度社群的正统纯洁性，反对印度婆罗门宗教的侵

蚀。苏菲派教长们（Sufi shaikhs）①——他们是穆斯林社群的富有影响力的领导，还接受皇室的赏赐——满足了俗家信徒的多种多样的宗教和社会需要。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之间的默契是伊斯兰征服和扩张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3

到1500年，次大陆上除了南端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的印度教社会都变得能够接受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的权威了——不管他们是外来的，还是印度本土的。一代又一代的印度教国王、武士和僧侣屡战屡败，直至最后接受在穆斯林的政治体制内任职。拉杰普特人、马拉塔人、泰卢固人以及其他武士种姓承认了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以换取允许他们继续统治乡村的保证。来自各文秘种姓（如卡亚斯特或卡特利种姓）的人通过学习波斯文和成为精通印度伊斯兰国家所需行政程序的专家而适应了新秩序。代复一代，政治社会化过程持续不断。当莫卧儿人开始构建他们庞大的帝国体系时，他们成为那个过程的受益者。

作为印度穆斯林政治传统的继承者，莫卧儿人发现了有利于政治集权的条件。在他们努力建立一个可靠而灵活的政治和行政体系时，他们可以求助于无数先例。所有早期的苏丹都招募和豢养了一群同他们自己密切相连而同狭隘的地方纽带相对疏远的贵族。如果得到反复强固，效忠纽带和个人忠诚会使得每个显贵承担无限的服役义务。以前的政体已经诱使地方印度教武士贵族在乡村维持秩序和协助征税，王室官员可以得到合约规定范围内的合作，这些是印度伊斯兰国家铰接结构中的两个关键接点。缺少一群可靠的帝国精英，没有一个统治者能施行统治。缺少合作的地方贵族，乡村就会不保。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强大的武装贵族能被转化为中央的王室官员，武装土豪能被转化为乡村的王室官员。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技术进步支持了印度穆斯林统治者。11世纪纸张的引进和广泛使用使得庞大而复杂的组织的集中化行政管理变得容易多了。利用纸质文件和记录，统治者能够对人民、土地、资源和货币实行更严厉的控

① shaikh（最常见的拼写形式为sheikh，有时也拼写为shaykh），在阿拉伯语中原意为“老人”或“长者”，常用来称呼阿拉伯的村长或酋长。在苏菲教团中，shaikh（教长）则是指有资格教授、招收和指导门徒的人。由于教长本人被认为已经历了神秘主义修行历程，他的指导在刚刚加入苏菲教团的门徒看来十分重要。教长们被视为精神导师，成为苏菲主义门徒效忠的对象。他们赋予门徒的修行以合法性，帮助门徒完成神秘主义修行历程。Shaikh也常用作人名，一般译为“谢赫”。——译者注

4 制；信息流变得更大和更可靠；实施标准化治理和调控变得更加可行。

次大陆经济对印度伊斯兰国家治下的新市场和新需求做出了有力反应。到16世纪，各地区经济被结合在一个密集的陆路和沿海贸易网络中。农业、工业和贸易可以轻而易举地支持一个正在兴起的帝国的经济需要。在西面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相对而言较不肥沃和人口稀疏的土地上，印度的富庶是众所周知的。

在次大陆的每个地区，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耕作者种植几十种谷物和专门作物，既用来维持生计，又用来在各级现金市场上出售。井水和河水灌溉有助于提高产量，部分弥补雨水不调的荒年。工业生产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组织复杂的纺织工业。织工、染工、漂白工和画工为地方、地区和国际市场生产种类繁多的棉布和丝绸。商品和劳动市场范围广大，运作高效。陆路、沿海和深海贸易路线把各个地方经济同更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古吉拉特（Gujarat）、北印度和南方的印度商人社群在技能纯熟和财力雄厚方面，世所罕有。印度人民已长期习惯于货币经济，使用金币、银币、铜币和银铜合铸的钱币。国内金银生产的不足，因印度贸易盈余造成的大量钱币流入而得到补充。[1]

次大陆的生产力保证了它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印度仅有的几项不能自足之需，除了贵金属之外，还有大量的马匹（主要用于军事）、非洲的黑奴和象牙，以及其他外来消费品。出口品除了香料、麻药和其他农产品，还包括输往东南亚、东非和中东的需求巨大的印度棉布。[2]

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西欧集聚起来的社会能量开始影响印度次大陆。5 新意识形态、技术、产品和市场强加到次大陆。这些力量穿越途经中东和地中海的陆上和海上的古老路线，到达印度北部和西部地区。另外，在伊比利亚人扩张的推动下，连接西欧的新海上路线成为直接前往印度而无需中转的通道。许多物产的交流源于欧洲在新世界的发现。这条新纽带刺激了次大陆经济的增长，并间接促进了莫卧儿帝国的成长和扩张。

直接的海上联系是由葡萄牙人建立的。他们绕过非洲海岸，于1498年

① 完整的描述可参见：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 Part I, c. 1200–1500, pp. 45–162.

② Simon Digby,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in Raychaudhuri and Habib, pp. 125–162.

首次进入印度洋贸易圈。葡萄牙人配备了大量轻型炮的圆形船远胜过本地船。[1] 1509年，首任总督德阿尔梅达（de Almeida）摧毁了埃及马穆鲁克统治者和古吉拉特苏丹派遣的联合舰队。在接下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葡萄牙人是印度洋上压倒性的海军力量。他们通过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指挥部管理着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实体：海上帝国。

1510年，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占领了曼多维（Mandovi）河口的果阿岛（Goa），以此为基地对抗比贾布尔（Bijapur）苏丹指挥的一支围困大军，而果阿曾是后者的主港。果阿成为这位总督和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任命的一个谘议会的驻地。在果阿和里斯本之间，一条新的正式海上路线建立起来。借助这条航线，一个欧洲国家对其东方属地实行直接控制。每年，由国王武装和装备的一支小船队从里斯本驶往果阿；每年，一支小船队又从印度返回。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奴隶、贵金属、订单和信件、官员，包括军火在内的装备以及其他商品一起驶出海港，前往印度。回程运送的是回国的葡萄牙人、香料、官方急件和信函以及其他商品。欧洲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早期现代国家掌管着印度和欧洲之间直接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①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 214–219.

第一章 征服和稳定

印度穆斯林边疆的遗产、中世纪的印度经济以及同欧洲的新关系，都帮助营造了有利于一个帝国在北印度兴起的条件。但这些条件绝不能保证这样一个国家的兴起，或这个国家将由帖木儿人来统治。莫卧儿帝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的产物，而这场政治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创建者和建设者的能力和幸运。莫卧儿帝国的两个创建者——巴布尔和继承了其王位的儿子胡马雍（Humayun），最终赢得了同阿富汗人争夺北印度主导权的艰苦斗争。在这场冲突中，莫卧儿诸君尽管是国王，却很少被视为皇帝。他们奋战，有时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以便能够在北印度富饶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创立一个莫卧儿国家。

他们的首要敌人是已经取代突厥人和波斯人成为北印度最强大和分布最广的外来穆斯林集团——阿富汗人。在洛迪（Lodi）王朝时期，数千阿富汗士兵和商人已经从阿富汗的山谷迁徙到北印度平原。许多人像洛迪王朝的创建者布鲁尔·洛迪（Buhlul Lodi）一样，能够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陆上马匹贸易。北印度对坐骑和战马的需求为中亚草原上的悍马创造了一个现成的市场。截至此时，这些阿富汗冒险者中的许多人已经作为控制着信奉印度教的农民的地方豪强定居在这块土地上。

巴布尔：1526—1530年

莫卧儿帝国是由一位察合台突厥统治者扎希尔-乌德-丁·穆罕默

德·巴布尔（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创建的。他从其在喀布尔的都城出发数度侵略洛迪统治下的旁遮普（Punjab），直至取得决定性胜利。巴布尔在印度舞台上的不期而至为业已拉开帷幕的阿富汗人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争斗添加了第三方。莫卧儿人的入侵使得本地信奉印度教的拉杰普特人和久已定居的阿富汗人被外来精英——中亚的突厥人和乌兹别克人取代。

1526年，在距德里仅有数英里之遥的巴尼伯德之战中，巴布尔精悍的 8 12 000人的军队击败了德里易卜拉欣·洛迪苏丹（Sultan Ibrahim Lodi）指挥的一支远为庞大的军队。在巴尼伯德，巴布尔配备着火绳枪手和野战炮。在同阿富汗骑兵作战时，他很好地运用了这些力量。像大多数印度统治者那样，洛迪王朝没有采用火器。易卜拉欣·洛迪连同另外数十位阿富汗酋长命丧疆场。在攻占德里后，这位胜利者派遣他的儿子胡马雍前往洛迪的都城阿格拉（Agra），夺取那里的王宫和财宝。稍后，巴布尔与他的儿子会合，把无数财宝中的一大部分分给了他的追随者，并将他的御座置于阿格拉，阿格拉成了他的都城。[1]

次年，在卡努阿（Kanua）之战中，巴布尔带领他的军队战胜了以拉贾斯坦（Rajasthan）梅瓦尔（Mewar）统治者桑伽拉纳（Rana Sanga）为首的拉杰普特诸王联盟。8万拉杰普特骑兵和500头装甲战象猛攻规模远逊的莫卧儿军队。巴布尔的火枪和他惯用的中亚骑兵的包抄战术，证明对拉杰普特人和对阿富汗人一样有效。那位梅瓦尔拉纳和其他许多拉杰普特首领在卡努阿的阵亡，粉碎了拉杰普特人在北方东山再起的梦想。1528年，巴布尔向宏伟的昌迪里（Chandiri）堡进发，那里是臣属于梅瓦尔拉纳的一个拉杰普特大首领的据点。莫卧儿军队洗劫了这座城堡，屠杀了那里的守军。

对上述主要武士联盟——它们自身也在争夺印度斯坦（Hindustan）的控制权——取得的这些辉煌胜利，为巴布尔在北印度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基地。他本可以把这些战役仅仅看作是一场对印度大规模的和高度成功的掠夺的顶点，而后就返回喀布尔。他的许多随从可能就期待着这种凯旋。当时，胡马雍已被派回喀布尔防守那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以防备乌兹别克人的进一步袭击。然而相反，巴布尔决定留下来并加强他对印度斯坦肥沃土地和富饶城

---

① 更多详情参见：Rushbrook Williams, *An Empire Build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Delhi: S. Chand, 1992.

市的控制。

1530年12月，巴布尔去世。他的王国包括中亚的领地、喀布尔、旁遮普、德里、东面比哈尔（Bihar）的部分地区和南面的瓜廖尔（Gwalior）。9 然而，此时它还是一个新征服的国家，还没来得及做什么事情巩固莫卧儿人在新的印度领土上的统治。

巴布尔留给其继承者的是一个既可以上溯至伟大的中亚征服者帖木儿（Timur），也可以经由察合台突厥人回溯至成吉思汗（Chingiz Khan）的高贵世系。通过帖木儿，莫卧儿王朝宣称完全有资格成为异常荣耀的统治者和征服者（因此，在本卷中“帖木儿人”一词和“莫卧儿人”同义）。此外，巴布尔的遗产还包括中亚骑兵和战术、在帐篷中生活的习惯和突厥语。他留下了经久不变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和同起源于中亚的正统的纳克什班底苏菲派教团的家族联系。他的遗产也包括受帖木儿资助而在撒马尔罕形成，后又在帖木儿后裔的中亚宫廷里得到提炼和升华的纯熟文化风格。最后，他的遗产中并非最不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自传。这部自传用突厥文写成，记述了他一生的冒险经历，从他在费尔干纳（Ferghana）谷地的早期青年时代到他征服印度。这部记述巴布尔不凡历程的手抄回忆录由杰出的书法家誊录和最好的画家绘制插图，成为莫卧儿或帖木儿王朝家族荣耀的最初来源。

胡马雍：1530—1556年

皇帝胡马雍（1530—1556年）在力图保持和扩大巴布尔在印度的征服成果时碰到了极大困难。他的主要问题之一来自巴布尔的另一份遗产。遵照帖木儿王朝的封地制度，胡马雍把各个行省分别封给他的四个兄弟去掌管。在西北部，米尔扎·苏莱曼（Mirza Sulaiman）获得了巴达赫尚（Badakhshan），卡姆兰（Kamran）则统治着喀布尔和坎大哈（Qandahar）。在印度，阿斯卡里（Askari）和辛达尔（Hindal）每人都获得了很大的管辖区域。一年之内，卡姆兰就在其兄弟阿斯卡里的支持下占领了旁遮普，强行驱逐了胡马雍的总督。然后，他强迫胡马雍同意他占领该行

省。[1] 这样，胡马雍就失去了旁遮普及莫卧儿王朝在中亚基地的资源。

胡马雍当下关注的是东面的阿富汗人，他们希望扶植一位嗣子重登洛迪王位。在对东方的阿富汗势力取得首次胜利后，胡马雍好像是由于日渐沉迷于饮食鸦片酒，在阿格拉陷入无所作为几近一年。在此时期，两个强大的敌人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10

在南方，繁荣的海洋国家古吉拉特的统治者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挑战胡马雍，夺取了对马尔瓦（Malwa）苏丹国的控制。巴哈杜尔·沙一直忙于争取东北部阿富汗人的支持，以努力把莫卧儿人从北印度清除出去。古吉拉特宫廷是众多洛迪逃亡者的避难所，他们急切地要求巴哈杜尔·沙采取行动。巴哈杜尔·沙已组建起一支装备了最先进大炮的极其庞大的军队，他雇用了一名奥斯曼突厥人机械师和一些葡萄牙炮手。[2]

1535年，胡马雍发动了一场对古吉拉特统治者的战役，后者其时正忙于入侵拉贾斯坦。莫卧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和击退了古吉拉特军队，攻占了古吉拉特的昌帕尼尔（Champanir）堡。但是，胡马雍的迟疑和犹豫不决（基本上是食用鸦片造成的）迫使他在没有废黜巴哈杜尔·沙或正式吞并该王国的情况下，就从古吉拉特撤兵。随着巴哈杜尔·沙过早地死于葡萄牙人之手，来自古吉拉特的进一步威胁方告解除。

在莫卧儿人征战海岸之际，一个极其能干的阿富汗贵族舍尔·汗·苏尔（Sher Khan Sur）悄悄地夺取了其父在比哈尔南部的军事采邑。在胡马雍征战南方的5年里，舍尔·汗成为阿富汗人抗击莫卧儿人的公认的领袖和无冕之王。1537年，舍尔·汗入侵孟加拉（Bengal），打败孟加拉统治者马哈茂德·沙（Mahmud Shah），然后将他围困在他的都城高尔（Gaur）。惧于舍尔·汗日益做大的势力，胡马雍向东挺进以解救孟加拉苏丹。不幸的是，胡马雍夺取楚纳尔（Chunar）要塞而非进逼高尔的鲁莽之举使得舍尔·汗夺取了高尔，控制了孟加拉。马哈茂德苏丹从他沦陷的王国逃走，到楚纳尔的胡马雍那里寻求并不可靠的避难。

攻陷楚纳尔之后长达数月的行军让舍尔·汗赢得了阿富汗人的强大支

---

① Ishwari Pras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Humayun*（Bombay：Orient Longmans, 1956）, pp. 44–45.

② Prasad, *Humayun,* p. 71.

持，从而使胡马雍在东方的处境岌岌可危。莫卧儿人和阿富汗人在恒河边上
11 的小镇乔萨（Chausa）再度遭遇。胡马雍和舍尔·汗之间长达三个月的没有结果的谈判以1539年6月阿富汗人的突袭而告终。这场战斗演变成一场大溃退，胡马雍本人也差一点命丧其中。舍尔·汗打败了公认的印度斯坦统治者，在战后举行的加冕礼上获得了舍尔·沙的头衔。

1540年5月，莫卧儿和阿富汗军队在卡瑙季（Kanauj）附近再次遭遇。士气低落的莫卧儿军队惊慌失措，豕突狼奔，惨遭屠戮。胡马雍仅带着几名随从逃往阿格拉，而后又前往拉合尔（Lahore）。在拉合尔，同卡姆兰和另外几位兄弟的糊涂会谈没有达成行动计划。卡姆兰拒绝允许他的兄弟避难喀布尔。帖木儿人在舍尔·沙兵临拉合尔时拔营离去，从而使得这位阿富汗人首领在1540年成为印度北部地区不可撼动的统治者。

在接下来的15年里，胡马雍成为一位流亡国王，一名寻求以某种方式恢复其印度王位的避难者。从拉合尔，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前往信德，然后返回拉贾斯坦，最后又折回信德。他们一路得到地方酋长和统治者不同程度的回应。1544年，他跨过边境前往赫拉特（Herat），向伊朗的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沙·塔赫马斯普（Shah Tahmasp）寻求避难。在萨法维宫廷，胡马雍在极端压力下接受了什叶派信仰，以便能保全他本人及数百名随从的性命。在这初次考验之后，沙·塔赫马斯普变得越来越友好，最终同意倾力支持胡马雍复位。在补充了军队和资金后，胡马雍带领一支莫卧儿—波斯联军攻占坎大哈，而后又占领喀布尔。在那里，胡马雍和卡姆兰之间进行了长达8年的争夺阿富汗主动权的战争。最终，在1553年，这位流亡国王收复了喀布尔，成为该城不可撼动的统治者。卡姆兰沦为其兄弟的阶下囚，被弄瞎双眼，以使其不能进行统治。

从喀布尔出发，胡马雍开始像他父亲那样征服北印度。舍尔·沙1545年去世，他在阿格拉的统治仅有5年时间。在那个短暂的时期，他的积极行政预示了税收评估和军事组织方面的许多集权措施，这些措施将在莫卧儿人那里得到完善。德里的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伊斯拉姆·沙·苏尔（Islam Shah Sur）。在8年执政期间，伊斯拉姆·沙·苏尔未能巩固其父亲的行政改革和他自己的集权统治。伊斯拉姆·沙1553年去世后，苏尔的版图依照约定被分为旁遮普、阿格拉和德里、比哈尔和东部地区以及孟加拉。每个地方皆由

舍尔·沙·苏尔的儿子或亲属统治。在每个地方，苏尔的行政体系都走向解体。前些年的干旱，到1555年初酿成了饥荒。随着饥馑和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的飙升，民众的困苦加剧了阿富汗人的消沉。 12

胡马雍，现在士气正盛，于1554年末带领他的军队从喀布尔出发，返回印度北部平原。直到旁遮普统治者希坎达尔·沙·苏尔（Sikandar Shah Sur）在锡尔欣德（Sirhind）集合了一支阿富汗大军前，莫卧儿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一场血战以莫卧儿人的胜利告终。希坎达尔·沙·苏尔逃离战场，组织阿富汗人继续抵抗的所有希望都随之破灭了。到1555年中，胡马雍进入德里，恢复了巴布尔的王国。

莫卧儿人的光复大业完成了。不过，胡马雍的时间已所剩无多。之后还不到7个月，1556年1月他在其德里城堡图书馆的阶梯上遭遇了一场致命的事故。胡马雍的贵族们隐瞒他的死讯长达17天之久，直到他们能够妥善安排继位事宜。达成的协议准许胡马雍的幼子、时年12岁的阿克巴（Akbar）承袭大统，称扎拉尔-乌德-丁· 穆罕默德·阿克巴（Jalal-ud-din Muhammad Akbar）。

阿克巴：1556—1605年

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阿克巴没有在情感或政治上束缚于一座永久性都城。他的宫廷、府邸、衙署、金库、马厩和军械库从一个城市据点移往另一个城市据点，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当需要的时候，这位帖木儿统治者能够欣然上路。白天行军后在帝国营地搭建的无数营帐，遵循了用石头建造的永久城市的那种宏伟而固定的空间结构。皇帝本人，而非一个自然地点，构成了这个帝国的都城。

阿克巴战略中心的变迁反映在下面四个前后相继的地点上——阿格拉、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拉合尔和阿格拉，它们依次被选为帝都。当这位年幼的帖木儿王子继承的脆弱的政权成长为一个多地域的帝国时，他的大战略的每个阶段也都反映了莫卧儿帝国权势、资源和领土的扩张。

13

巴伊拉姆·汗的摄政

巴伊拉姆·汗（Bairam Khan），胡马雍权贵中的首要人物，担任了年幼的阿克巴的保护人，即摄政王。阿克巴登基数月后，赫姆（Hemu）——伊斯拉姆·沙·苏尔（Islam Shah Sur）的一名假定继承人的大臣和将军——率领一支大军前来攻打德里。赫姆，一名信奉印度教的吠舍，即一个有文化的商人种姓的成员，崛起于草莽，直至成为苏尔政权的一名将领。他通过使用古老的梵语头衔"超日大王"（Raja Vikramaditya），宣称自己拥有国王身份。如果他成功了，这将成为对北印度梵语学家/婆罗门主张的王统的一次引人瞩目的回归。这种王统长期屈从于穆斯林统治者。巴伊拉姆·汗带领阿克巴召集的一支规模远逊的莫卧儿军队与赫姆的军队相遇于巴尼伯德，即30年前洛迪王朝和帖木儿人酣战的地方。要不是一支流矢伤到了赫姆，使他成为莫卧儿将领的虏囚，苏尔的军队差一点就战胜了莫卧儿人。巴伊拉姆·汗和他的幼主一起斩杀了这位无助的苏尔将军。这支失去首领的军队士气全消，仓皇逃离战场，把胜利拱手让给了莫卧儿人。

在接下去的6个月里，莫卧儿人又取得了对希坎达尔（Sikandar）（一位苏尔王子）的一次大胜，使后者向东逃往孟加拉。在巴伊拉姆·汗的指挥下，莫卧儿军队占领了旁遮普的拉合尔和木尔坦（Multan）。1558年，他们在其穆斯林统治者逃亡后，占据了通往拉贾斯坦的门户——阿杰梅尔（Ajmer）。同年晚些时候，一名帖木儿将领打败硕果仅存的苏尔王子易卜拉欣（Ibrahim），攻占了前江布尔苏丹国位于恒河河谷东部的都城——江布尔（Jaunpur）。到1557年初，一支莫卧儿军队包围了镇守瓜廖尔堡〔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以北最大的要塞〕的苏尔将军。在差不多两年后的1558年1月，被围困的阿富汗守军投降。

这场急风暴雨般的进攻行动把位于拉合尔、德里、阿格拉和江布尔之间人口稠密地区的最重要城市和要塞置于莫卧儿人控制之下。这就是印度斯坦、北印度穆斯林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古老的心脏地带。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莫卧儿人现在开始利用印度河—恒河平原中心地带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和

繁忙的贸易。拉合尔和德里这两座同时耸立于西方和东方的堡垒，构成了穆斯林在印度教的北印度胜利和统治的象征。

14

至其主政的第四年，巴伊拉姆·汗南征至拉贾斯坦和马尔瓦。在这个时刻，一场新的政治斗争暂时中止了扩张。其时年方17岁的阿克巴年轻气盛，奋起反击巴伊拉姆·汗的擅权。同摄政王的数次冲突导致这位青年君主同贵族中的反对派结成同盟。这个派系包括阿达姆·汗（Adham Khan）、阿克巴的图兰裔同奶兄弟（其奶妈之子）和他的一群亲戚。阿克巴的母亲哈米达·贝加姆（Hamida Begam）积极鼓励这场谋划中的政变。种族和宗教摩擦是造成对这位极权大臣不满的深层原因。中亚正统逊尼派穆斯林（图兰人）贵族不喜欢服从像巴伊拉姆·汗那样的波斯什叶派教徒。当巴伊拉姆·汗任命了一名亲密的什叶派神学家担任宗教大臣〔“萨德尔（*sadr*）”〕掌管国家恩典（如馈赠、赏赐和职位）后，他们的不满更加强烈了。

1560年3月，身在德里的阿克巴命令巴伊拉姆·汗辞去宰相一职。巴伊拉姆·汗觉察到他的地位已遭削弱，只得遵命。这位失宠的大臣可以选择在宫廷中继续任职（但不再摄政），也可以选择以到麦加朝觐的方式临时流亡。这位不幸的大臣选择前去朝觐，然而还未登船起航，他就在途中被一名积怨已久的阿富汗人刺杀了。

走向亲政

1560—1571年，亦即阿克巴成年亲政后的第一个时期，他继续待在阿格拉。有两年的时间，阿克巴的奶妈马哈姆·阿纳加（Maham Anaga）、阿达姆·汗和担任德里总督的堂兄弟希哈布-乌德-丁（Shihab-ud-din）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政治和财政大权。

三巨头在恢复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浪费什么时间。阿达姆·汗和毕尔·穆罕默德·汗（Pir Muhammad Khan）指挥的一支莫卧儿野战部队入侵马尔瓦王国。莫卧儿军队在萨朗普尔镇（Sarangpur）打败了马尔瓦苏丹巴兹·巴哈杜尔（Baz Bahadur）。这位战败的统治者撇下他的妻妾、财宝和战象，逃往康德什（Khandesh）苏丹国避难。他的王后鲁帕玛媞（Rupamati）以美貌出名，她选择服毒自尽，而不是屈辱地沦为阶下囚。自那时以来，这个悲剧题

材已经催生了许多诗作。

尽管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但从阿克巴的观点看，这场战役证明是一场
15 灾难。阿达姆·汗几乎把所有战利品据为己有。然后，这位获胜的将军遵照中亚习俗，大肆屠杀投降守军、他们的妻儿以及众多的穆斯林神学家和“圣裔”（即先知的后裔）。由此造成的恶名让阿克巴极其恼怒。这位皇帝亲自骑马赶到大军总部面斥阿达姆·汗，解除了他的军权。阿克巴另遣主将毕尔·穆罕默德·汗深入德干穆斯林苏丹国康德什的腹地，追捕巴兹·巴哈杜尔。不过，康德什和贝拉尔（Berar）的统治者同流亡君主巴兹·巴哈杜尔结成同盟，击溃了莫卧儿军队。

巴兹·巴哈杜尔暂时恢复了对马尔瓦的控制，直至翌年另一支莫卧儿军队侵入并永久吞并该王国为止。马尔瓦成为实行帖木儿体制的新生帝国政府的一个省份。巴兹·巴哈杜尔作为避难者苟活于数国宫廷，直至8年后的1570年，他作为一名莫卧儿贵族（*amir*）效命于他的征服者。

1561年末，莫卧儿军队凯旋后不久，阿克巴同阿达姆·汗的冲突再次爆发。阿达姆·汗觉得任命另一位贵族为宰相〔*vakil*（瓦吉尔）〕是对他的蔑视，于是在他自己的宫内觐见厅上攻击和杀死了那位新宰相。当这位依旧手持利刃的阿达姆·汗在后宫中面斥阿克巴时，他被盛怒的年轻皇帝打翻在地，从露台上抛掷到庭院中。气若游丝的阿达姆·汗，再次被阿克巴拽起来摔到地上，以彻底结果他的性命。这个戏剧性事件在关于阿克巴统治的历史著述中得到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在细密画中也得到了生动描绘。阿达姆·汗的命运被写入了越来越多的故事当中，而这些故事也共同构成了阿克巴的传奇。

阿克巴立即掌握了统治者所有的行政权力。他取消了宰相职位，创设了四个专职大臣职位，分掌财政、军事、宗室（household）和宗教事务。通过此举，他清除了贵族反叛和不满的一个焦点。莫卧儿贵族中没有谁再能够单独拥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从而能够召集异党。一个权倾朝野的宰相的威胁消除了——至少在该王朝衰落以前是如此。

除了这些举措，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还面对着政治组织问题。军事胜利
16 是不够的；新政权需要一份前后连贯的政治声明。不管以怎样的方式，阿克巴必须把他继承的帖木儿的魅力和权威、从苏尔王朝和德里苏丹那里承袭的

中央集权以及伊斯兰合法性的观念像经纬线那样编织在一起。如果他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北印度将再次陷入莫卧儿人、阿富汗人、拉杰普特人和地区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混战，而这已使过去的30年不堪回首。仅仅为了作为一个统治者生存下去，他必须褫夺或粉碎两大集团的权力：拥有武力和财富的穆斯林贵族和对印度的穆斯林社群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教精英——乌里玛（ulema）和苏菲派教长。

新征服

1561年，阿迪尔・沙・苏尔（Adil Shah Sur）之子舍尔・汗・苏尔尚未宾服，他带领一支大军从阿富汗人在楚纳尔的重要要塞出发，向江布尔进发。两名中亚的乌兹别克裔贵族扎曼・汗（Zaman Khan）和巴哈杜尔・汗，任莫卧儿将领，大败阿富汗人，缴获了他们的武器、财宝和战象。扎曼・汗如实向皇帝汇报了胜利的消息，但却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私吞了战利品。阿克巴对皇家特权受到侵犯感到十分震怒——特别是战象，它的使用在印度是皇家的象征。他为此亲自前往卡拉（Kara）面斥这两位将军。他们对阿克巴行正式的臣服礼，顺从地上交了那些战利品。楚纳尔的占领结束了莫卧儿在东方扩张的第一阶段。

在巴伊拉姆・汗出离后的两年里，这位莫卧儿统治者虽然还没有度过他的20岁生日，却已展示了他那实实在在的政治和组织才能。他宣称他是绝对的统治者，有权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如果这位皇帝行动果敢有力，即便是凯旋的将军也得谦恭侍主。阿克巴变成了他自己的最高统帅和最有韬略的战略家和野战司令。

作为其新近主政和勇武的象征，阿克巴向定都于卡林加尔（Kalinjar）的巴格赫拉—拉杰普特（Baghela Rajput）统治者拉姆・昌德（Ram Chand）派遣了一个使团，促请著名的歌手和乐手谭森（Tansen）前往阿格拉的莫卧儿宫廷。拉姆・昌德曾拒绝了先前苏尔诸王所请，现在却不敢回绝阿克巴。他让谭森带上他的乐器和重礼前往阿克巴的宫廷。据说，当谭森首次在宫廷演出时，阿克巴赏赐了20万卢比作为礼物。得到谭森的侍奉后，阿克巴开始积极地资助音乐的发展。谭森及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和其他学生们，积极发

17

展了到后来广为人知的北印度或印度斯坦音乐。

在马尔瓦之后，第一个重大目标是位于山区、人口稀疏的格拉—卡坦加（Garha-Katanga）或冈德瓦纳（Gondwana）王国。该王国以其出产成群的野象著称。1564年，由乌兹别克裔贵族阿萨夫·汗（Asaf Khan）指挥的一支莫卧儿军队入侵了这个王国。具有昌德拉（Candela）[①] 血统的拉杰普特女王拉尼·杜尔加瓦提（Rani Durgavati），在指挥她的军队做无谓的抵抗时死于乱军之中。莫卧儿人置仍在抵抗的拉杰普特残部于不顾，径直进逼位于乔拉格尔（Chauragarh）的都城。年轻的昌德拉王子比尔·纳拉扬（Bir Narayan）命丧疆场。他的大多数女眷纷纷殉国，遵照拉杰普特贵妇及其婢仆（*jauhar*）特有的血腥仪式自杀和自焚。格拉—卡坦加成为一个大县（*sarkar*），并入刚刚掠取的马尔瓦省。但正如在所有此类帝国兼并中发生的那样，这个王国的边界和内部区划保持不变。

乌兹别克人的反叛

1564年，曾在楚纳尔打败了阿富汗人的乌兹别克裔贵族汗·扎曼[②] 及其兄弟巴哈杜尔·汗惹起了麻烦。尽管这些贵族中的大部分人曾追随胡马雍返回印度，但乌兹别克人对帖木儿王朝的忠诚已不像从前看起来那样牢固。乌兹别克贵族把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乌兹别克统治者沙伊班（Shaiban），他在半个世纪前曾是巴布尔的死敌，而他的后裔仍在统治着中亚地区。由于习惯了比较平等的政治传统，这些显贵憎恨阿克巴的帝国统治风格。巨大的矛盾也存在于坚定的乌兹别克逊尼派穆斯林和莫卧儿军中的什叶派波斯贵族之间。毫不奇怪，心怀异志的乌兹别克人决心在阿克巴还在巩固他的地位时考验一下这位年轻的统治者。

1564年，马尔瓦总督阿卜杜拉·汗（Abdullah Khan）公开反叛。阿克巴带领一支军队赶到曼杜（Mandu），镇压了这场叛乱，迫使阿卜杜拉·汗的

---

① 昌德拉，又拼写为Chandela，北印度的一个拉杰普特人部族。这个部族的一支曾在10—13世纪期间长期统治位于印度中部的邦德尔坎得（Bundelkhand）地区。昌德拉王朝以其国王维迪亚达尔（Vidyadhar）闻名于印度历史。这位国王击退了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的数次进攻，他对雕刻的喜爱仍体现在留存至今的卡朱拉霍神庙和卡林加城堡中。——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是前面提到的扎曼·汗之误。——译者注

追随者避难于当时依旧独立的古吉拉特苏丹国。1565年初，阿克巴试图罢免阿瓦德（Awadh）[1] 的乌兹别克裔高级军官，结果激起了一场乌兹别克人的联合叛乱。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战谈谈在1566年初结束了，阿克巴撤回阿格拉，而叛军们依旧控制着东部各省。

阿克巴还面临着来自他那位统治着喀布尔及其周围各县的同父异母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Mirza Muhammad Hakim）的潜在挑战。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对喀布尔的控制受到巴达赫尚的帖木儿统治者（他的王国在1530年由巴布尔替他收复）的威胁。尽管受到阿克巴的协助，巴达赫尚的军队仍在1566年围困着喀布尔。穆罕默德·哈希姆留下一支守军驻防，而他带着他的部队退往旁遮普平原上的印度河一带。 18

仍不甘心的乌兹别克贵族在获悉这些事件后，便邀请穆罕默德·哈希姆入侵印度。他们进而宣布他为合法的莫卧儿统治者，在江布尔大清真寺的礼拜五祈祷会（*khutba*）上诵读穆罕默德·哈希姆的名字。受此鼓舞，穆罕默德·哈希姆率军穿过旁遮普，包围拉合尔。在这危急关头，一群拥有“米尔扎”（Mirza）即亲王称号的帖木儿贵族也起兵反叛，试图攻占德里。他们年迈的首领穆罕默德·苏丹·米尔扎（Muhammad Sultan Mirza）是帖木儿次子的后裔（阿克巴则是帖木儿三子的后裔）。至少在理论上，穆罕默德·苏丹或他的众多子孙都有权要求占有阿克巴的帝位。这种要求权由于与阿克巴一脉的帖木儿裔公主们的通婚而得到增强。忠诚的将领击退了叛军，抓获了穆罕默德·苏丹·米尔扎。其余的米尔扎们则向梅瓦尔的拉纳及其他拉贾斯坦的拉杰普特族统治者寻求避难和支持。

阿克巴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把这些米尔扎放在一边，率军前往拉合尔，迎战他的那位同父异母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退回喀布尔，现在那里已清除了巴达赫尚的军队。阿克巴没有选择追捕他。在接下去的10年里，米尔扎·穆哈默德·哈希姆成为喀布尔的独立统治者，对印度的阿克巴政权构成了持续的威胁。

这位皇帝带领他的部队掉转马头，挥师东进，以便把乌兹别克人从他们占据的城市和要塞中驱逐出去。六月，恰值雨季，这位皇帝抵达河水暴涨的

① 阿瓦德（Awadh），在不同的英国历史文献中也称为Oudh，Oundh或Oude（中译“奥德”），是现在印度北方邦的中部地区，其传统都城是勒克瑙。——译者注

恒河岸边的马尼格布尔（Manikpur）。乌兹别克人已在河对岸扎营，但没想到皇帝的军队来得如此迅速。阿克巴指挥军队在夜间出人意料地渡过恒河，拂晓时分对叛军发动了进攻。在接下来的混乱中，阿克巴的军队将那些一直反对他的乌兹别克贵族或斩杀或活捉后予以处决。在这场叛乱的最后阶段，这位皇帝把那些沮丧不堪的米尔扎诸王及其追随者赶往南方，迫使他们向古吉拉特苏丹寻求避难。

19 不管怎么说，这位青年皇帝渡过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关头之一。在这三年期间，他慑服叛军既靠武力，也靠谈判和外交。他的帖木儿世系是一份资产，但这份资产本身还不足以保证他手下所有贵族的效忠。最终，战斗解决了这个问题。

新贵族集团

乌兹别克人的叛乱彰显了阿克巴与他的贵族们相较之下的脆弱。这些武士显贵和他们的亲属倚仗世代相传的权位、权威和影响。这些埃米尔（amirs）承袭了强调个人荣誉、尊严和战场上勇猛的好战的军事传统。他们自己总是全副武装，统领着数量不等的个人奴隶、依附亲属和雇佣扈从。

由51名贵族组成的小核心几乎全都是出生于国外的穆斯林，他们是在1555年随胡马雍返回印度的。[①] 其中有27名即超过一半的贵族来自中亚。这些人是出身于察合台突厥人或乌兹别克中亚人世系的身份高贵的酋长。到这个时候，两个世系的成员都可以宣称同胡马雍有着不同程度的血缘联系。所有人都浸透着中亚突厥部落的平等主义和分立主义态度。而且，他们都很清楚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提供了可以取代阿克巴统治的另一种合法选择。另一个集团是由16名波斯什叶派贵族组成的，包括巴伊拉姆·汗，他们成为抗衡图兰人即中亚显贵（*beks*）的首要力量。由于波斯的帝国传统，伊朗人比较愿意接受不可侵犯的君王（*pad shah*）或皇帝的观念。

① 有关贵族构成和数量的数据来自：Iqtidar Alam Khan, “The Nobility Under Akb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Religious Policy,1560–1580,”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68*）, pp. 29–36.

阿克巴招募新贵族，以满足他不断扩大的帝国的需要。25年间，帝国精英增长了6倍，多达222名埃米尔。皇帝确定不移的目标是削减他的中亚贵族的相对数量和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遗余力地征召波斯人进入他的军队。到1580年，波斯贵族47人，察合台和乌兹别克图兰人贵族48人。

然而，除此之外，这位青年首领还从具有印度（而非外来）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中征募新手。当他们清除本地势力，从拉杰普特人和北印度其他印度教集团手里夺得土地后，许多印度裔穆斯林武士变成了地主贵族。阿富汗人，或许是印度穆斯林中的最大群体，一定被排挤掉了。东部阿富汗裔显贵中持续存在的怨恨和抗拒，意味着招纳阿富汗人对帖木儿王朝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20

其他长期定居在北印度、但很少能参与德里苏丹朝廷的政治权力并从中受惠的穆斯林则比较顺从。例如，巴拉哈的赛义德世族（Sayyids of Baraha）就是这样的穆斯林。他们一直被视为勇敢的武士，其名字在16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在帝国编年史中。他们的祖先（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13世纪从伊拉克迁徙而来，定居在德里附近的锡尔欣德。从这个最初的定居地出发，许多后裔繁衍和栖息于该地区的其他村庄和土地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忠诚，赛义德首领能够召集数千好斗的亲戚在阿克巴手下服役。其他印度裔穆斯林贵族应募人数如此之多，乃至到1580年，扩大的贵族集团中已有44人（16%）是本地穆斯林。

更重要的是，阿克巴从信奉印度教的拉杰普特首领中招募莫卧儿贵族。在15世纪，地区王国的印度穆斯林统治者（但诸德里苏丹除外）已经接受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教武士进入他们的核心精英圈。即使是苏尔王朝，也从赫姆（一位吠舍种姓的行政官和将军）的服务中受益。不过，尽管几乎说不上是史无前例，这对帖木儿王朝来说还是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1561年，一个拉杰普特小首领，安伯（Amber）的卡赤瓦哈部族的族长，寻求皇帝进行干预，以免他的权力遭受某位不友好的莫卧儿总督的侵犯。卡赤瓦哈的拉贾（王公）巴拉马儿（Bharamall）曾在与苏尔王朝的冲突中积极支持胡马雍。当阿克巴抵近斋浦尔（Jaipur）时，那位拉杰普特恳求者献上他的一个女儿，欲与这位年轻君主喜结秦晋之好。阿克巴同意了。完婚后，这位皇帝

接受巴拉马儿、他的儿子和孙子以埃米尔身份加入帝国军队。这位卡赤瓦哈王公保住了他在安伯的地位。[1]

在接下去的20年里，阿克巴通过在拉贾斯坦反复征战展示了莫卧儿权力的实在性。其他拉杰普特首领则成功地挤进了帝国精英集团，并作为联姻伙伴把他们的女儿献给这位莫卧儿皇帝。到16世纪，一个以父系亲属和婚姻联盟义务为基础的发散的政治体系使得施行政治集权的时机成熟了。很大程度上由恒河河谷的伊斯兰征服推动的长达数代的开疆拓土，造成了拉贾斯坦生产力和人口密度的提高。阿克巴一般从拉杰普特部族酋长中招募（贵族），他们要么宣称具有王室血统，要么是大贵族世家的子弟。这些塔库尔（*thakurs*）或主人是拉杰普特社会的贵族，与仅拥有中等权力、土地和身份的较卑微的布米亚（*bhumiya*）武士形成对照。

截至1580年，贵族集团中已有43名拉杰普特人（以及少数非拉杰普特印度教徒）。每位王公都被赏以高等爵位、薪俸和额外恩典。其成年诸子及其他男性近亲和同族之人也可获得较低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i*）爵位。按照帝国规矩，拉杰普特贵族把他们的亲属和非亲属扈从编成全副武装的骑兵队以备征调。拉杰普特贵族本人也要效命皇帝，奔赴他被派往的任何地方。在宫廷上，拉杰普特贵族公开承认皇帝的权威和至高无上，而且熟悉波斯和帝国仪礼。在这样做时，他们得到保证，从而可以保留他们作为印度教武士所具有的信仰、习俗和荣誉。

作为对帝国爵位和特权的回报，这些王公承认了莫卧儿帝国对拉贾斯坦的严密统治。通过在宫廷之上给新王公前额点上“缇卡”（*tika*）即朱砂红标记，皇帝合法化了他的地位。与此同时，阿克巴授予爵位和官阶，赏给新贵族大量晋封礼。新王公按例要奉献大量贡品（*pishkash*），作为对所获赏赐的回赠。皇帝授予王公祖传之地（*watan*），作为其不可转让的财产。这些土地不必缴纳贡赋，但其估定税收要作为为帝国服务的酬劳支付（给这些王公）。当卡赤瓦哈王公巴拉马儿归顺阿克巴时，他的领地包括了拉贾斯坦东部安伯乡（*pargana*）的村镇。[2] 政府评估了安伯的岁入，算作按这位王

[1] Kunwar Refaqat Ali Khan, *The Kachhwahas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New Delhi: Kitab Publishing House, 1976）.

[2] Satya Prakash Gupta, *The Agrarian System of Eastern Rajasthan* （*c. 1650– c. 1750*） （Delhi: Manohar, 1986）, p. 5.

公的莫卧儿贵族品级付给他的薪俸和额外恩典。拉贾斯坦境内（有时境外）另外一些乡的税收，也作为可转让的俸地（salary assignment）分配给了巴拉马儿。这些追加土地的数量和位置随巴拉马儿及其后继者爵位和俸禄的变化而变化。净效果是要确保卡赤瓦哈部族在安伯的祖传之地免遭外部或内部威胁，使来自别的土地上的可得税收归于王公。其意图是要挫败任何扩大安伯领地和创建一个较大国家的尝试。当别的拉杰普特首领归顺他时，这位莫卧儿皇帝做了类似的安排。

阿克巴对拉杰普特首领和新拉贾斯坦省实行严密的帝国控制。拉杰普特人的领地没有变成一群自治的纳贡王国。相反，该省的莫卧儿政府与恒河平原上其他直接治理的行省十分类似。一个握有重兵的莫卧儿总督驻扎在新建的阿杰梅尔帝国要塞，而这里变成了该省的省会。只有帝国通货才可流通，只能向前往古吉拉特诸港的陆上商队征收帝国通行税。标准的帝国税收体系，包括对每个村庄的详尽评估、土地调查和登记以及现金征缴，都已成为通例。那些尚未被拉杰普特人埃米尔占有的地区，依例作为可转让的纳税区分给非拉杰普特裔曼萨卜达尔。一个由拉杰普特布米亚、查特（Jat）和其他支配种姓组成的混合阶层，继续充当着帝国收税人和生产农民之间的中介。

正像这一时期吟游诗人文学作品中显示的那样，归顺帖木儿王朝并不违反拉杰普特人的“达摩”（*dharma*）或承袭下来的道德行为律令。与莫卧儿帝国的联系最初鼓励了而不是破坏了亲属团结。每个拉杰普特贵族都非常依赖他的亲属为他提供军役、建议和忠告。他的私密小圈子就是由他的“兄弟团”（*Bhaibamdh*）形成的，里面包括了同一父系祖先六代以内的所有男裔。[①] 每个兄弟团都构成了一个亲属单位，享有统治其通过殖民、征服和拓居而赢得的故土的天然权力。更大的招募范围是父系部族，由数个具有不同地位和权力的兄弟团构成，他们共同宣称他们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共同男性祖先的后裔。兄弟团和部族在声誉和权力上的兴隆皆因他们是莫卧儿军队中的武士。

把他们的女儿献给皇帝为妻的拉杰普特塔库尔们，在他们自己和帖木儿皇室之间建立起有力的联系。对每个拉杰普特首领来说重要性稍逊一筹的认

① Norman P. Ziegler, “Some Notes on Rajput Loyalties During the Mughal Period” in J. F. Richards, ed., *Kingship and Authority in South Asia*, （Madison Wisconsin, South Asian Studies No. 3, 1978）, pp. 231–232.

同单位，是他们在其中嫁女和娶妻的兄弟团。联姻建立起（他们）同其妻子的男性亲属间的联盟，任何时候他们可向这个联盟寻求支持和资助。[①] 尽管不是双向的，因为没有女人来自莫卧儿一方，联姻还是变成了联结拉杰普特首领和帝国的一条重要纽带。对许多塔库尔特别是梅瓦尔的拉纳来说，向皇帝或王子奉献拉杰普特贵妇被视为卑躬屈膝。那些献女的家族做出了最高的臣服姿态。

服务于莫卧儿王朝是同武士服务于一位伟大主人的风尚相容的。拉杰普特首领有义务为他服务的主人效命疆场。一名武士的职责表现在为尘世主人和神祇抛头颅、洒热血的行动中。武士的解脱是这种献身的结果。拉杰普特首领（即塔库尔）通过献身于他的神祇或女神，获得了征服和统治的权力。塔库尔进而把他的权力和权威的主体下移给地位较低的人物。这些人也是塔库尔，他们可以在他的领地内统治更小的领地。在接受阿克巴的征召时，拉杰普特塔库尔也由此把他作为一名穆斯林拉杰普特首领来接受，只是他享有的权力和主权甚至远远超过了最大的拉杰普特主人。自这个时期以来的吟游诗人传统，经常“〔把阿克巴〕等同于罗摩，即信奉印度教的拉杰普特人推崇的那个卓异的刹帝利文化英雄”[②]。

双方都从这种安排中获益。帖木儿王朝赢得了成千上万拉杰普特武士世世代代的忠诚。这些久负盛名的首领的公开效忠影响了数百名较小的拉杰普特世族，他们控制着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各个地方。阿克巴预防了（拉杰普特首领）结成与其祖父1527年在卡努阿面对的拉杰普特联盟类似的另一个拉杰普特联盟的可能性。反过来，拉杰普特首领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不再陷于相互残杀的地方冲突，而是变成了帝国的将军、政治家和高级行政官员。他们不再满足于享有拉贾斯坦半干旱土地上的物产，而是把来自帝国赏赐的财富转移到他们的家乡。在巨大的王朝魅力的进一步庇佑下，阿克巴在拉杰普特人和莫卧儿人之间缔造了一条长达几近两个世纪的政治纽带。

① Ibid., p. 224.

② Ibid., p. 235.

品　级

阿克巴缔造了一个具有不同经验和文化期待的复杂而异质的贵族集团。然而，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多样性的呢？这位年轻的皇帝借助了一种来自其蒙古背景的荣誉阶位，即曼萨卜（*mansabs*）体系。这个体系为帝国军队中的每个军官分配了一种用数值表示的爵位。每个曼萨卜达尔或“爵位占有者”的地位、薪俸、可任官职以及头衔都是由他个人的品级（*zat*）决定的。皇帝决定着所有品级爵位的授予和变更。随着这个爵位体系的演化，分等的爵位变成了一件奖赏或惩处帝国机构中文武官员的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

这个十进位的爵位阶序起源于蒙古人对他们的军事将领实行的那种体系。后一种体系分为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和万人长。后来的帖木儿人继续使用这些术语，尽管实际士兵人数经常少于头衔中的名义数值。甚至苏尔王朝也对它的军官们使用了类似的爵位阶序。从这些先驱那里，阿克巴创造了一个全面的体系，所有武官或文官都位列其中。

理论上，个人的爵位可以是66个从20扎特至5 000扎特偶数阶序中的任何一个爵位（甚或为亲王们设置的10 000扎特爵位）。实际上，只有33个爵位在使用。士兵和文官也同样是曼萨卜达尔，尽管高等爵位通常赐给军事将领而非财政或司法方面的专家。爵位的升降不遵从固定的规则，而是依赖于皇帝的好恶。特别值得嘉奖的功绩——如在战斗中的勇猛和无畏——常会造成爵位的跃迁。来自波斯、图兰（Turan）或别的地方的外来贵族，也像襄助阿克巴的拉杰普特首领和别的地方豪强那样被授予高等爵位。不过，这些爵位并不直接传给子嗣。一个曼萨卜达尔会看到他的儿子参加了莫卧儿军队，经常是作为他自己的分遣队的一名兵士，但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人只能因他的父亲得到一个中等爵位。 25

阿克巴统治晚期，亦即到16世纪90年代，另一个十进位的品级开始被使用。“苏瓦尔”（*suwar*）或“兵员”爵位表示每个曼萨卜达尔需要招募、训练、指挥和供养的武装重骑兵的数量。在阿克巴之后，几乎所有的曼萨卜达尔都拥有用偶数表示的苏瓦尔爵位，从小至十到大至五千不等。数值化的兵

员爵位决定了付给曼萨卜达尔供他维持其军队的额外资金。在阿克巴时代，兵员爵位与征召的骑兵数相匹配。后者从一个由小武官加10名扈从组成的小分队到一支由埃米尔或贵族组织起来的5 000骑兵的野战大军，各个不等。曼萨卜达尔指挥的所有骑兵都受皇帝的节制。所有骑兵必须符合严格的帝国标准。

这种方法没有创造出一支由中央征召和蓄养的官僚化的常备军。相反，由军事首领及其随从形成的组织把征召、蓄养和指挥的负担转给了各个曼萨卜达尔。通过施行统一的帝国标准，阿克巴确保了拥有一支庞大的中央军队的好处，却没有背上这样一个实体通常会带来的沉重的财政和行政包袱。

奇图尔和兰桑波尔

拉杰普特首领愿意接受莫卧儿霸权这一点并不是在没有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的。16世纪60年代早期，最负盛名的拉杰普特统治者梅瓦尔的拉纳依旧桀骜不驯。乌代·辛格（Udai Singh, 1540—1572）是西索迪亚（Sisodia）部族统治者桑伽拉纳的后裔，后者在1527年的卡努阿之战中与巴布尔血战至死。作为西索迪亚部族的首领，他在遍布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所有拉杰普特王公和酋长当中占有最高的礼仪身份。除非能够降服乌代·辛格，不然帖木儿王朝的帝国权威在拉杰普特人眼中将大打折扣。在这个早期阶段，阿克巴仍热心献身于伊斯兰教事业，努力让那些信奉婆罗门印度教的最声名显赫的武士领教他的信仰的优越。

26 乌代·辛格的儿子在阿克巴的宫廷中如坐针毡。当被阿克巴戏谑地问及（正像阿布尔·法兹尔所说的那样）在一场冲突中他是支持他的父亲还是支持皇帝后，这位年轻的拉杰普特王子逃回了梅瓦尔。阿克巴大为恼火，决定发动战争。1567年9月，这位皇帝率领他的军队向奇图尔（Chitor, 梅瓦尔的都城，一座高出拉贾斯坦平原200米的设防城市）发动了一场吉哈德（jihad），即圣战。[1] 当帝国军队逼近时，乌代·辛格的咨议顾问得出结论说，西索迪亚军队不能与莫卧儿人正面交锋。于是，乌代·辛格留下拥有充足供应、能禁得起长期围困的5 000名守军防守奇图尔，而后撤入群山中的

① Abul Fazl, The Akbar-Nama （Calcutta: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3 vols., 1907, 1912, 1939）,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Ⅱ, pp. 464–477.

一个次等堡垒。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阿克巴将奇图尔团团围住。他的突击队摧毁了乡村，占领了另一座主要城市——乌代布尔（Udaipur）。

在对城墙发起伤亡惨重的首波攻击后，围困大军架起三门大炮，轰击这座城堡。与此同时，帝国工兵开始挖掘预备埋设两颗地雷的隧道和一条交通壕（*sabat*）。炮手们就地架起一尊攻城大炮，待交通壕修好后用来轰塌城墙。在这个时刻，守军企图商谈有条件投降；阿克巴拒绝了这个提议。

进入围困第58天后，工兵进抵城墙下，引爆了第一颗地雷。当第二颗地雷爆炸后，这颗地雷炸死了大约200名堵在豁口中的突击士兵。守军封住了城墙。阿克巴于是加紧挖掘交通壕，以便把城墙置于其攻城炮的射程之内。2月22日夜晚，莫卧儿人在城墙上轰开几道豁口，然后开始总攻。在混战中，阿克巴用火枪瞄准和射杀了奇图尔的拉杰普特司令斋马儿（Jaimal），他的死瓦解了守军的士气。很快，冉冉升起的烟柱表明拉杰普特人正在按照殉节（jauhar）仪式杀死他们的家人，准备玉石俱焚。在经历了一天的肉搏战后，几乎所有的守军都战死了。莫卧儿军队屠杀了另外2万—2.5万名平民、城中居民和附近地区的农民，借口是他们积极帮助了守军的抵抗。只有1 000名勇敢的火枪手〔他们是卡尔毗人（Kalpi），曾沉重打击了围城的莫卧儿人〕成功地避过了阿克巴复仇的烈焰。他们佯装成押解囚犯的莫卧儿士兵，捆上自己的妻儿，押着她们径直穿过帝国防线。

27

尽管帝国军队没有发现什么可供掠夺的财宝，这座城堡还是被彻底摧毁，以致从此以后沦为一片废墟。三月初发布的一份捷报庆祝帖木儿统治者成功发动了一场清剿多神教徒的圣战。[1] 然而，乌代・辛格仍安然无恙，直至4年后他去世也未被莫卧儿人抓获。就阿克巴这边来说，他实现了早先发下的誓言，即徒步前往阿杰梅尔，朝拜科瓦贾・姆因-乌德-丁・奇什蒂（Khwaja Muin-ud-din Chishti）神庙。在那里，于整个斋月期间，阿克巴绕行神庙，向穷人和信徒分发礼品，10天后踏上返回阿格拉的路途。

次年即1569年2月，阿克巴率领他的军队袭击了兰桑波尔（Ranthambor）的大要塞。兰桑波尔和奇图尔一起控制着通往海上的主要贸易走廊。哈达（Hada）家族的拉伊・苏尔詹（Rai Surjan）作为乌代・辛格

① K. A. Nizami, *Akbar and Religion* （Delhi, 1989）, pp. 383–399.

的属臣占据着这座城堡及其腹地。在兰桑波尔，莫卧儿人役使数百头牛和数十头大象将15门攻城巨炮拖曳到一座小山上，从山上可以俯瞰这座城堡。仅仅一个月后，当这些大炮开始轰击这座城堡，一条覆道也修至墙下时，守军有条件地投降了。拉伊·苏尔詹同意效忠帝国。作为回报，他得以保留祖产。

围攻奇图尔和兰桑波尔是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这些巨大城堡的陷落向北印度的每一个武士显示了莫卧儿力量的真实性。公然抗拒莫卧儿皇帝是不可能的，顺从或死亡是仅有的选择。

帝国要塞

在他显示任何一座城堡无论怎样强固，都不能挡住他的攻击的同时，阿克巴也在忙于建造他自己的战略要塞网。他最初关注的是加固他在阿格拉的都城，“这座城市在位置上是印度斯坦的中心”。1565年，在“思想深邃的数学家和技能超群的建筑师奠定根基”后，城堡雄伟的城墙和四扇大门开始耸立在亚穆纳（Yamuna）河畔：[①]

28

> 每天都有三四千名精力充沛的建筑师和身强力壮的劳工修筑这项工程。从地基到城垛、城堡都是由粗削石构成的。每块粗削石都被打磨得像一面照亮世界的镜子，红光熠熠，活像命运之神的面颊。它们被天衣无缝般地接合在一起,以至中间连一根头发的发梢都插不进去。在姆希木·汗·米尔·巴鲁·巴尔（Musim Khan Mir Barru Bahr）忠心耿耿的监督下，历时八年，这座庄严的城堡……连同它的城垛、胸墙和射击孔方告竣工。

这座宏伟的红堡在竣工时包括了500多个建筑。时至今日，这座城堡依旧耸立，它“将稳固得如同这个崇高家族统治的根基，长久得好似其命运之神的石柱”。[②]

在接下去的20年里，作为他的大战略的一部分，阿克巴又修建了另外两座宏伟的皇城。安拉阿巴德（Allahabad）〔昔日的印度教城市钵罗耶伽

① Ibid., p. 372.

② Ibid., p. 372.

（Prayag）〕在恒河平原东部扼守着恒河和亚穆纳河的汇流处。旁遮普的都城拉合尔处在抵御来自阿富汗或中亚、经由西北山口的侵袭（传统的入侵路线）的最前线。这三座大型城堡及其宫殿建筑群有重炮守卫，对正面强攻来说几乎是固若金汤。这位皇帝还凭借在拉贾斯坦走廊的门户——阿杰梅尔修建的一座守备森严的城堡（始于1570年），进一步稳固了这条防线。在西北方面，他强化了印度河畔的阿托克（Attock）和罗塔斯（Rohtas）这两个位于战略前沿的据点。在东面，比哈尔的罗塔斯堡守卫在那里。

拉合尔、阿格拉、安拉阿巴德和阿杰梅尔构成的四边形，形成了拱卫莫卧儿帝国权力的保护框架。这些城堡的铜墙铁壁保证了日益增多的帝国财富和坚固的军械库的安全，为皇帝本人及其朝廷和家人提供了终极庇护所。要塞司令由皇帝直接任命，直接向帝国朝廷负责。为了保证它们的独立，逐渐形成了把每座要塞周围的乡村和土地上的赋税划归卫戍部队应其所需的惯例。随着莫卧儿人的扩张，他们占领了许多别的著名要塞并加以守卫，包括瓜廖尔、拉贾斯坦的奇图尔、兰桑波尔和米尔塔（Mirtha）要塞以及德干诸省的阿西尔格尔（Asirgarh）要塞〔接近布尔汉布尔（Burhanpur）〕和坚固的山间要塞。尽管如此，帝国的安全仍有赖于处在帝国绝对中心的印度斯坦地区的主要据点。

29

第二章　新帝国

1571年，阿克巴从阿格拉移驾26英里，迁居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这是一座新建城市，1585年以前一直是他的都城。在他居留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15年里，阿克巴指挥了主要的征服行动，克服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政治危机。这座新城市也是重大的组织和行政举措出台的地方——这些举措给莫卧儿帝国体系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田赋、铸币、军事组织和行省行政方面的杰出创新都是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时期形成的。

为什么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比德里、阿格拉、拉合尔和江布尔这些伟大的印度穆斯林政治都城更受青睐？为什么要从阿格拉历经一天艰辛跋涉迁往西格里村？[①] 事实上，阿格拉和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是联合都城。为安全起见，大量的帝国宝藏和军械及其他储备存放在阿格拉堡。朝廷、后宫和国库可以快速转移到阿格拉，以求得安全。[②]

这座新建的城市与同样是由阿克巴设计的流动的帝国营帐相似。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是一种介于营帐和帝国大都会之间的过渡城市形式。阿克巴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地界内用石头再造了他的营帐。这些建筑的正面和帝国营地上用木头和帆布搭建起来的巨大结构十分相像。如同营帐一样，这座都城给了莫卧儿皇帝一个戒备森严、运转自如的大本营，使他能够从那里编写、排练和上演帝国统治这出大剧。

---

① 关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全面论述，见：Michael Brand and Glenn D. Lowry, eds., *Fatehpur Sikri*（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87）.

② Irfan Habib,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in Brand and Lowry, *Fatehpur Sikri*, p. 80.

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也是一处庇护所，一座皇城。它的建筑和广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位年轻统治者对建筑和设计的热衷。在这里，阿克巴满足了那些代表了帖木儿王朝风格的开创性美学冲动。音乐已经在谭森的领导下获得了良好发展。此外，在优雅的城市背景下，绘画、书法、诗歌、历史、比较宗教学和建筑学也都繁荣起来。

一座伊斯兰城市

30

在那些早期岁月里，阿克巴利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设计和建筑来象征这个政权的伊斯兰基础。两个巢状的神圣建筑主宰着这座城市。雄伟的聚礼清真寺和一位广受尊敬和膜拜的苏菲派圣人的陵墓（*dargah*）是合法而神秘的印度伊斯兰教的两大机构。庄重的大理石陵寝盛放着谢赫·萨利姆·奇什蒂（Shaikh Salim Chishti，死于1571年）的遗体。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曾经常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建议。谢赫·萨利姆对阿克巴期盼已久的嗣子苏丹·萨利姆（Sultan Salim）的降生所作的祝福和预言，促使这位皇帝把他的新都城建在了西格里村。通过把谢赫·萨利姆的坟墓安置在大清真寺内，阿克巴得以借重附着在它上面的显而易见的神圣性，并将之吸纳到他自己的权威中。

皇帝鼓励谢赫·萨利姆的儿孙在帝国军队中充任高级军官，而不是作为他们家族传统的继承者呆在神庙中。把奇什蒂的神秘光环带进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并最终使其从属于皇帝，是阿克巴宣称的这个政权虔敬宗教的一个基本成分。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阿克巴为其隐藏在传播最广、感召力最强的苏菲派虔信主义象征下面的诉求取得了合法性。奇什蒂们受到推崇，是因为他们的苦行和对世俗权力和影响的拒斥。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盛年君主并没有选择把他自己混同于北印度的纳克什班底们（Naqshbandis），尽管他的家族同那个正统的中亚教团保持着长期联系。

在求助于奇什蒂神圣光环的同时，阿克巴还明确肯定了其政权的正统穆斯林基础。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宏伟的聚礼清真寺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建筑物，当然也是最有影响的建筑物。在其落成后的近十年时间里，这位皇帝对这座清真寺的运转有着浓厚兴趣。他的虔敬活动——在帝国首席法官谢赫·阿卜杜尔·纳比（Shaikh Abdul Nabi）的指导下——包括打扫清真寺的

地面和带头祈祷。

在这个时期，阿克巴还通过每年积极组织和资助一次对麦加的官方朝31觐，进一步展示了他对伊斯兰教的虔诚。1574年后，古吉拉特的征服使得径直从西海岸的苏拉特港出发，穿过阿拉伯海，抵达吉达，再抵达圣城成为可能。这位皇帝扩大了最后一位古吉拉特苏丹建立起来的敬神信托（*waqf*）的规模，他把数个沿岸村庄的赋税作为献金送到麦加和麦地那（Medina）。1576年，第一个莫卧儿朝觐团在一位名为米尔·哈吉（Mir Haj）的特命莫卧儿官员的带领下，离开阿格拉前往苏拉特港。一艘专门的朝觐船（*Ilahi*）已等候在那里。一切费用都由这位皇帝承担。他还送去了大笔慈善资金和为信徒准备的数千件名贵礼袍。这首个朝觐团包括了阿克巴的姑妈古尔巴丹·贝加姆（Gulbadan Begam）、萨利姆·苏丹·贝加姆（Salim Sultan Begam）皇后及其他贵妇。只是由于阿布尔·法兹尔（Abul Fazl）的恳求，阿克巴本人才被劝阻下来，没有前往朝觐。[①]

通过每年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步行至阿杰梅尔朝拜科瓦加· 姆因-乌德-丁· 奇什蒂的陵墓，这位皇帝进一步突显了他的虔诚。对阿杰梅尔这个帝国借以控制拉贾斯坦的战略要地的定期访问，也起到了提醒拉杰普特首领莫忘帖木儿强权的作用。在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初：[②]

> ［阿克巴］带着慷慨而高贵的王子苏丹·萨利姆，和他本人一起前去阿杰梅尔绕行那座吉祥和照亮了天堂的陵墓。当那位幸运、神赐和成功的王子的目光落到伟大的科瓦加墓上后，他效仿他那卓尔不群的父亲，极其谦卑地向圣墓和神槛鞠躬，而后行绕行礼和尽朝拜义务。

之后随即举行用那位统治者及王子作砝码称量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的仪式。

我们不能找到什么比这个事件更能清晰地表明阿克巴给他的统治寻求的宗教参照点了。除了他本人在墓前当众匍匐跪拜外，这位皇帝还宣示了他儿子萨利姆的虔敬。这些反复举行的仪式传递出了体现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石

① N. R. Farooqi, "Mughal–Ottoman Relations: A Study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ughal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556–1748,"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86）, pp. 191–196.

② Nizam-ud-din Ahmad, *Tabaqat - i Akbari*,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De and Baini Prashad,（Calcutta: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3vols., 1927–39）, Ⅱ, 429.

头建筑中的同样的虔敬信息。皇家的后裔、皇家的胜利和皇家的权威都源于奇什蒂圣人。

新征服

32

在向西南方的古吉拉特和阿拉伯海扩张的新时期，阿克巴的新都变成了总部。古吉拉特对阿克巴的吸引力恰如从前对其父胡马雍的吸引力那样，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沿海地区的中央平原上有着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农业，盛产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还拥有印度次大陆上最繁忙的海港。把这个海洋王国与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丰富物产连接起来，将会大大增强阿克巴日益扩大的帝国。

阿克巴能够利用古吉拉特的政治麻烦。孱弱的国王穆扎法尔·沙三世（Muzaffar Shah Ⅲ）在数派穆斯林贵族的持续冲突中失去了对其王国的控制。在过去的数年里避难于古吉拉特的帖木儿皇族的米尔扎们（Timurid Mirzas）[①]，已经夺取了该王国南部的权力。这个一举荡平这些逆党叛乱的机会是有诱惑力的。基督教徒从海上干预的威胁也是存在的。如果政治分裂持续存在的话，业已控制了阿拉伯海海路的果阿的葡萄牙人就可能试图夺取西海岸各港口。当一位"哈布什"（Habshi，即阿比西尼亚）贵族由于其领导的派系失势而邀请阿克巴干涉和吞并该王国后，这位皇帝没有片刻的犹豫。

1572年7月，阿克巴占领了都城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和其他北部城市，在礼拜五祈祷会上他被宣布为古吉拉特的合法君主。傀儡国王穆扎法尔·沙像几乎所有北方的穆斯林贵族那样，甘愿俯首称臣。到1573年1月，阿克巴已经驱逐了各个米尔扎。他们在仅仅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后，就逃往德干避难了。这位皇帝留下一位帝国总督掌管这个新的莫卧儿行省，然后返回法塔赫布尔西格里。

突然，在3个月里，古吉拉特贵族恼于他们被排除在帝国军队之外，于是联合起来试图把莫卧儿人从这个王国驱除出去。侯赛因·米尔扎（Husain

① 在这里，Mirza是莫卧儿皇帝授予其子孙的头衔，Timurid Mirzas实际上是指拥有"米尔扎"头衔的诸帖木儿族皇子。——译者注

Mirza）重新占领了坎贝（Cambay）、布罗奇（Broach）和苏拉特（Surat）等主要港口。受到拉杰普特统治者伊达尔（Idar）支持的阿富汗贵族，正在进逼驻艾哈迈达巴德的莫卧儿总督。阿克巴立即对这场危急做出了反应，召集了一支3 000人的轻装野战部队。乘骑着最快捷的母骆驼，他和他的士兵仅仅用了11天时间就行军800公里，抵达艾哈迈达巴德——这条路一支商队需要两个月才能走完。在一场血腥的骑兵遭遇战中，阿克巴率领的较小的帝国部队彻底打败了15 000名叛军，从而平息了这场叛乱。叛乱首领们或死或逃，消除了这位大获全胜的皇帝的忧虑。在离开43天后，他回到了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吉拉特的再征服是阿克巴漫长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事件。速度、果敢和幸运都在他一边。他的战无不胜的美誉过去已经形成，现在更是远播四海了。

33

东进：比哈尔和孟加拉

帖木儿统治者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比哈尔和孟加拉。在那里，名义上称臣纳贡的阿富汗裔统治者和贵族依旧控制着印度东北部的这块河网密布之地。阿克巴不能忍受让他的宿敌阿富汗人在一个如此富饶和显要的地区掌权。1574年，年轻的孟加拉苏丹达乌德·卡拉尼（Daud Karrani）通过让他自己的名字和头衔出现在礼拜五祈祷中否定了阿克巴名义上的主权。在孟加拉人侵入莫卧儿领地后，阿克巴亲率他的部队围困和强攻阿富汗人在巴特那（Patna）的要塞。在莫卧儿人的猛攻面前，阿富汗人军队节节败退，直至达乌德被迫避难于奥里萨（Orissa）。阿克巴返回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而留下他的著名的心腹和财政大臣托达·马尔（Todar Mal）统领其在东方的军队。

托达·马尔指挥东方的莫卧儿军队，追击那位阿富汗人国王，直至他在米德纳布尔（Midnapur）附近的图卡洛里（Tukarori）被迫应战。要不是托达·马尔死战不退和重整了左翼，阿富汗人发动的一场凶猛的大象冲锋差一点就摧毁了莫卧儿军队。这场胜利让阿克巴正式把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合并到莫卧儿帝国。不过，达乌德依旧未被降服，尽管在名义上，他是莫卧儿王朝的一个在奥里萨拥有封土的采邑主。当驻扎在孟加拉的莫卧儿军队染

上瘟疫而从孟加拉撤走后，达乌德就又恢复了他的控制权。1576年，旁遮普总督汗·贾汗（Khan Jahan）派遣的一支援军在拉杰默哈尔（Rajmahal）发动了一场决定性战役，阿富汗人大败。达乌德终被擒获和斩杀。

1576年莫卧儿人艰难取胜后，战争和失利仍在继续。孟加拉依旧是阿富汗裔贵族和印度教王公们控制的一个地区，他们十分厌恶莫卧儿人的军事占领。满怀怨恨的阿富汗人将领数量日减，他们在抗击占优势的莫卧儿军队时只能进行后卫战。最后，到16世纪8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公开反抗都停止了。阿克巴派遣他的一个最能干的拉杰普特贵族拉贾·曼·辛格（Raja Man Singh）前往孟加拉和奥里萨，建立了正规的帝国行政体系。 34

皇帝态度的嬗变

16世纪印度的总体文化和宗教氛围是比较开放和不那么僵化的。莫卧儿人的扩张恰值印度社会和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印度穆斯林长达数世纪的支配权力已迫使印度教机构通过加强民众的虔诚而适应了那种现实。穆斯林在印度北部和德干地区世世代代的生活，已逐步使他们形成了对印度社会甚至对印度教的宽容和同情。

无论在印度教中，还是在伊斯兰教中，许多神秘主义者、学者、知识分子和比较普通的民众都在积极寻求某种形式的融合。卡比尔（Kabir）和其他印度教民众虔敬（*bhakti*）传统中的诗人—圣人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使得在摒弃了两种宗教的形式主义后，拉姆（Ram）/拉希姆（Rahim）都可以得到自由崇拜。其他一些人，如达乌德·达雅尔（Daud Dayal, 1544—1603），也受到富有同情心的苏菲派信徒的虔敬和膜拜。古鲁那纳克（Guru Nanak, 1469—1539）领导的一场公开的融合运动在旁遮普发端。在大众文化中，普通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习俗、仪式和信仰。在农村地区，膜拜天花女神希特拉（Sitla）的习俗经常既在印度教徒，也在穆斯林当中受到同样热情地遵行。

在居住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整个时期，阿克巴参加了有关比较神学和宗教的系统探究和讨论。1575年，他修建了一座大厅以开展宗教和神学方面的争论。他本人对宗教的探究源于他自己的忧虑和当时的精神追求。这位皇帝

反复遭受精神和个人危急的困扰。他不时陷入精神恍惚之中，而这可能是一种轻微的癫痫症。他周围的观察者还传言他有着长期忧郁症的症候。

最初，讨论仅限于伊斯兰教神学问题，但后来，也就是1579年以后，35 参加者当中也包括了博学的耆那教徒、印度教圣人和拜火教祭司。1580年，这位皇帝还邀请了两位耶稣会牧师阿奎维瓦（Aquaviva）和孟瑟拉特（Monserrate）。他们是应阿克巴之邀从果阿赶来向他和他的随从们传授基督教的。

阿克巴在宗教讨论中的积极作用是最引人瞩目的，因为他不识字。尽管他在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庭中长大，但至少有四位家庭教师曾徒劳无功地试图教这位青年王子识字。他的儿子萨利姆（Salim）（也就是后来的贾汗吉尔）评论说：[1]

> 我父亲总是和奉遵各种不同信条和宗教的鸿学巨儒，特别是与印度的智者和鸿学交往。尽管他目不识丁，通过与鸿学和智者的不断交往，他明白了如此之多的事理……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他并不识字。他是那样熟悉诗文和散文的美妙，以至他的缺憾不曾让人记起。

最近一项分析表明，阿克巴可能患有诵读困难症，因而身体条件使他不能阅读。[2] 因为他对手稿内容有着浓厚兴趣，阿克巴养成了每天让人为他本人诵读的习惯。可能正是由于他的不幸，他确实拥有惊人的记忆力。

孟瑟拉特神父生动地描述了在莫卧儿宫廷上同乌里玛的一系列激烈争论。至少以耶稣会士的观点来看，在这些场合，阿克巴明显同情基督教的观点而对穆斯林神学家不能有效反驳他们感到不耐烦。[3] 随着他的探究逐步深入，阿克巴似乎对正统的伊斯兰教及其辩护士越来越不痴迷。随着他请教圣人，聆听热烈的宗教辩论，学习各派的教义，他自己的宗教观点也成熟起来了。逐渐地，阿克巴放弃了从前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转向他自己设想的以光明和太阳为中心的一种折中的崇拜形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

① Jahangir, *Tuzuk-i Jahangiri* （Delhi, 2 vols. in one, reprint edition, 1968）, translated by A. Rogers and edited by H. Beveridge, I, 33.

② Ellen Smart, "Akbar, Illiterate Genius," *Kaladarshana* （1981）, pp. 99–107.

③ Monserrate, *Antonio, The Commentary of Father Monserrate, S. J., On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Akb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translated by J. S. Hoyland; annotated by S. N. Banerjee, pp. 50–51.

他变得比较宽容非穆斯林习俗，而较少倾向于坚持严格实施针对非穆斯林的歧视性做法了。

君主与乌里玛

36

这位年轻的帖木儿君主治理着一个基本上非穆斯林的社会。到16世纪中期，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没有理由指望会出现众多印度教徒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的前景。在深深地沉浸于玄思冥想中的时候，阿克巴面对着一个常见的政治问题：他如何能够保持他作为一个值得信徒支持的穆斯林统治者的身份，而又不至于因此对他的印度教徒臣民采取过分严酷的压制政策以致他们离心离德，揭竿而起？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非穆斯林的积极而非只是消极的政治支持？让伊斯兰信仰声明成为在政治上全面参与帝国体系的入场券，抑或阿克巴能为现代早期的印度创造出一种更宽广、更灵活的政治共同体观念？

随着阿克巴对当时的首席帝国法官的恭顺和尊敬日渐减少，他和精通神圣的伊斯兰教法的乌里玛之间的紧张关系便发展成全面的政治冲突。部分地由于这种斗争，阿克巴提出了一种新的、面向大众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的中心是崭新的王朝意识形态。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这位自由思考的皇帝和他的一群激进的顾问为帝国制订了一套连贯的政治信条。

乌里玛和阿克巴之间的冲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伊斯兰教学者期望这位帖木儿君主能够显示出那些虔诚和献身的品质，以为其臣民率先垂范。阿克巴必须利用他的权力竭尽所能地确保在一个能真正称为“伊斯兰之家”（*Dar - al Islam*）的地方，穆斯林能够按照伊斯兰教教法（the Sharia）过神圣的生活。统治者（其一言一行每日都被详察和记录下来）的虔诚和热情决定其官员们的行为，设定伊斯兰教和国家间的关系在莫卧儿印度的基调。

与上面一点相连的是积极领导和庇护的问题。阿克巴愿意为穆斯林神学家和法学家提供工作和捐助吗？乌里玛依赖国家来资助、组织和管理清真寺、慈善信托、神学院以及每年一次的圣城朝觐。国家则依靠乌里玛担任法庭法官和在地方伊斯兰社区中实施社会和道德领导。

这位青年皇帝变得越来越不同情世俗的乌里玛。大多数莫卧儿神学家和法学家既不是玄思冥想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严肃的宗教思想家。许多人腐败 37

而世俗。帝国的首席恩典官（sadr）毛拉纳·阿卜杜拉（Maulana Abdullah）在拉合尔附近拥有大片地产。他逃避国家每年向穆斯林征收的四十分之一慈善财产税（*zakat*），方法是每年开征时，他都暂时把地产转让给他的妻子所有。当阿克巴发现了这种把戏后，他就不再为他的这位大乌里玛的虔诚或诚挚所动了。

随着他调查的深入，阿克巴发现穆斯林学者把帝国的大片土地作为免税的赠予教产据为己有。许多赠予地是以非法或欺诈的手段获得的。许多这类地产原本只是分配给受益者终身享用，现在已允许非法转让给后裔。不仅如此，大批敬神赠地持有人竟是阿富汗人，他们从苏尔或洛迪统治者那里取得他们的地产。这一点在旁遮普尤为真实。在那里，他们在赠地持有者中占据了多数。

到1578年，阿克巴已确信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彻底改革。他下令对所有敬神赠地的所有权进行全盘清查和核实。所有那些不能验证的敬神赠予地立即被收回。此后，他大大缩小赠地的面积和数量，严格禁止自行继承的做法。后裔必须申请圣俸；他们的请求可能被恩准，但更可能的是被驳回。不过，最沉重的打击是把敬神赠予地分配给所有宗教（而不只是伊斯兰教）的学者和僧侣。生活在修道院（*maths*）中的瑜伽师（Yogis）获得了土地。琐罗亚斯德教的牧师（帕西人）得到了土地。甚至婆罗门司祭也得到了阿克巴的赏赐。

另一类问题产生于中世纪伊斯兰印度中思想自由和正统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阿克巴在位时期，伊斯兰正统领袖中最狭隘的激进主义者一致认为伊斯兰教法必须严格实施。灵活或妥协被看作是必须避免的软弱。所有可能被怀疑为离经叛道的人都要残酷镇压。例如，许多苏菲主义者或神秘主义者经常在他们入定或出定时表达与一元论接近（如果不是相同）的观点。大多数苏菲派大师因而受到怀疑。非正统的什叶派，无论是其波斯分支，还是出现于古吉拉特各沿岸城市的伊斯玛仪派，都是迫害的目标。

38

随着伊斯兰教千周年——希吉拉（Hijra）的第一千周年，始于1592年9月27日——的临近，印度穆斯林的千禧年情结日益高涨。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只在他的墓穴中呆一千年，然后就作为马赫迪（*Mahdi*）重返人间的传说，开始广泛传播。在15世纪，一个以这个传说为基础的异端教派形成了。创始

人赛义德·穆罕默德·江布尔（Sayyid Muhammad Jaunpur）（生于1443年）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在他的一生中赢得了大批门徒和追随者。这些以“马赫达维”（Mahdawis）著称的教徒在古吉拉特和印度西部特别强大，而且似乎对各种身份的阿富汗人都有着特别的吸引力。[①] 赛义德·穆罕默德拒绝了当时乌里玛和四个法律学派的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规定他的追随者要虔诚、禁欲和禅定。尽管反复受到正统乌里玛的迫害，赛义德·穆罕默德和他的儿子及其他继承人继续在古吉拉特、信德和印度北部地区布道和寻找新的皈依群体。[②]

阿克巴在他征服古吉拉特后开始与马赫达维们直接接触，但既没有迫害这个异端教派的首领，也没有迫害这个教派的追随者。相反，他允许马赫达维圣人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宫廷上举行的宗教讨论中解释和捍卫他们的教义。

第三，援引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如何对待“迪米”（*dhimmis*）的规定，乌里玛期望能直接影响针对占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大众的官方政策。[③] 面对印度教的可塑性和坚韧性，莫卧儿乌里玛确实对（不同教徒间）边界的模糊和穆斯林共同体认同和力量的消退感到担心。因而，教义上的纯洁要求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严苛对待偶像崇拜者。

阿克巴在这个问题上同穆斯林宗教定规的冲突由来已久。1563年，这位青年皇帝废除了当印度教朝圣者在喜庆日聚会时向他们征收重税的惯例。

---

① 马赫迪（Mahdi）是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分别称为“弥赛亚”（Messiah/Messias）和“基督”（Christ）。“马赫迪”（Mahdi）源于阿拉伯语mahdi，意为“被准确指引的人”。“马赫达维”（Mahdawi/Mahdavi）意为伊玛目·马赫迪（Imam Mahdi）的追随者。马赫达维们认为伊玛目·马赫迪是安拉的哈里夫和仅次于先知穆罕默德的重要人物。先知和伊玛目都是“马苏姆”（Masum），在所有方面地位相等。——译者注

② S. S. A. Rizvi, *Muslim Revivalist Movements in Northern Indi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Agra, 1965）. pp. 68–134. See also: K. A. Nizami, *Akbar and Religion*（Delhi, 1989）, pp. 42–51.

③ “迪米”或“订约民”（dhimmi）是一个根据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中的非穆斯林臣民。“迪玛”或“契约”（dhimma）是以广泛接受的伊斯兰教义为基础订立的理论上的合约，它为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非穆斯林臣民规定了特殊的身份。迪玛规定迪米以纳税换取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居住权。迪米享有的法律和社会权利少于穆斯林，但多于其他非穆斯林。他们被免除了穆斯林特有的义务，在财产、契约和债务法方面与穆斯林平等。迪米身份最初只是赋予“圣经民族”（即犹太人和基督徒），后来也扩大到琐罗亚斯德教徒、曼达派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最后，最大的伊斯兰法律思想流派把这个术语应用到“圣地”（麦加周围地区）以外各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因而，这种身份适用于从7世纪到现代，生活在从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和摩洛哥到太平洋沿岸的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许多人口。——译者注

这位皇帝还背离伊斯兰教法，恩准非穆斯林修缮年久失修的庙宇或修建新建筑。在另一项引起争议的措施中，阿克巴下令允许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前印度教徒脱教且免受伊斯兰教法的死刑处罚。他禁止把战俘变为奴隶和强迫非穆斯林奴隶皈依（伊斯兰教）的惯常做法。

39 最巨大的政策变化发生在1579年，它对几乎所有的印度教徒都产生了直接影响。[1] 阿克巴废除了仅对非穆斯林征收的“吉齐亚”（*jiziya*），即累进财产税。这是一种每年向非穆斯林个人财产征收的赋税。这些非穆斯林在法律上被划为受穆斯林统治者容忍和保护的“迪米”，即受保护集团。国家官员（通常是乌里玛）以纳税者个人的财富或财产为基础敛取钱财。只有无产者才免于缴纳这项赋税。不过，这种递减型税赋还是给最贫穷的纳税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负担，他们需要每年交纳相当于一个非熟练城市劳工一个月工资的金额。

这项措施的象征价值是极其巨大的。吉齐亚界定了受伊斯兰群体保护的非穆斯林的身份和公共义务。纳税赋予迪米在国家保护下和平生活的权利，免除了他们服兵役的义务。废除这项赋税意味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不平等契约也跟着废除了——因而，阿克巴的行动受到正统穆斯林的切齿痛恨。

其他象征性举动以在政治上包容非穆斯林为目标。皇帝和廷臣们庆祝最重要的印度教节日，如排灯节（Diwali）。这位皇帝采纳了向穷人分发礼品的印度教习俗，用他自己作砝码来称量黄金、白银、谷物和其他物品。在一年中的一个或两个黄辰吉日，这些仪式的收入被分发给穷人和有急需的人。一项特别引人瞩目的政治宣示是在关键的军事/行政岗位上雇用拉杰普特人和其他高等级种姓的印度教徒（见上文）。诸如此类的行动触动了穆斯林共同体成员的一些最敏感的神经。

1578年，阿克巴和穆斯林宗教精英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了。在那一年，首席帝国法官（*qazi*）阿卜杜尔·纳比（Abdul Nabi）审判了一名被控侮辱穆罕默德名讳（在伊斯兰教法中是一项死罪）的婆罗门。这位帝国法官查明他有罪后，宣判这位祭司死刑。尽管面对着阿克巴的明确非难，阿卜杜尔·纳

① Nizami, *Akbar and Religion*, pp.107–108. 尼扎米得出结论，认为阿布尔·法兹尔在《阿克巴本纪》（*Akbar-Nama*）中说1564年废除吉齐亚是错误的。

比还是执行了这项判决。

最后，在1579年，阿克巴在伊斯兰教义问题上掌握了广泛权力。一道帝国敕令公开宣布在莫卧儿皇帝的疆域内，他的无上权力是宗教事务的最高仲裁——高出穆斯林宗教学者和法学家（的权威）。在这道敕令中，阿克巴宣称如果大学者们在宗教法律上意见不一，帖木儿统治者将裁决哪一方的观点是权威的，从而对所有穆斯林有约束力。这道敕令还力图为阿克巴取得高出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khalifa*）权威，后者自1517年控制圣城后一直拥有那个头衔。[1] 在来自皇帝的巨大压力下，首席法官、帝国恩典官和其他几位显赫学者在它发布前签署了这份诏书。唯一一个自愿签字的人是谢赫·穆巴拉克（Shaikh Mubarak），一位杰出的自由派神学家。对帝国强大的宗教权威集团来说，这份诏书的发布是（他们遭受的）一个惊人的失败。

40

1579—1580年的反叛

在辛酸和屈辱中，帝国法官和恩典官躲避到一座清真寺中，公开宣布他们是被迫在诏书上签字的。与此同时，一群驻扎在比哈尔和孟加拉等东部行省的好战的帝国军官发动了叛乱。这些狂热的正统派军官——其中有许多阿富汗人——从未完全满意于莫卧儿统治，被最近的那道诏令激怒了。他们也恼于对军队日益加紧的行政控制。一道新诏令命令所有骑兵应召时，须骑乘大小和质量都符合帝国规格的战马。一旦检查和通过后，这些战马就会被打上帝国的认证标记。对那些战马驽弱的军官来说，这意味着一项巨大的开支。

出身中亚卡克沙尔（Qaqshals）部族（一个突厥人部落集团）的莫卧儿贵族领导了孟加拉的叛乱。他们跨过恒河，与比哈尔的贵族兵合一处，在正面交锋中击溃了依旧忠诚于莫卧儿王朝的军队。他们擒杀了孟加拉总督沙·穆扎法尔（Shah Muzaffar）。然后，这些叛军首领在礼拜五祈祷大会上安排了一名领祷诵读“喀布尔的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Mirza Muhammad Hakim of Kabul）这个名字，把他作为帝国的合法的穆斯林统治者。同时，在这些贵族们的请求下，位于恒河平原东部的江布尔市的伊斯兰

---

[1] Nizami, *Akbar and Religion*, pp. 177–178.

法官发布了一项裁决（*fatwa*），命令所有虔诚的穆斯林起而反抗阿克巴。根据这项裁决，这位皇帝已经变成了一名敌视正统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应该让位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即喀布尔国王。孟加拉的阿富汗裔贵族抓住这个机会，加入叛乱，同那位帖木儿征服者开战。这样，他们正在进行的抵抗就同东方的帝国军官的叛乱联合起来，并从那里获得新的推动力。

41

阿克巴派遣了一支援军，在帝国财政大臣拉贾·托达·马尔的率领下前往比哈尔。效忠阿克巴的军队收复了比哈尔的主要要塞和城市。阿克巴本人带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开赴喀布尔，废黜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这有效地消除了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对帝位的威胁。对支持叛乱的穆斯林法学家和神学家的严厉惩罚平息了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尽管如此，莫卧儿野战将军们还是耗费了5年时间才得以恢复他们对西孟加拉的控制，驱逐叛军残部及其阿富汗人盟友。

在阿格拉，这位皇帝通过任命谢赫·阿卜杜尔·纳比和玛劳纳·阿卜杜拉（Malauna Abdulla）为1579年朝觐团的共同首领，正式终止了更多的宗教抗议。他们将持续留在麦加，以监督每年的帖木儿赠礼得到有序分配。1580年，另一个朝觐团出发前往汉志（Hijaz），但此后，尽管阿克巴曾向麦加的谢里夫（Sharif）做出书面承诺，却再没有从印度派遣朝觐团。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阿克巴对正统信仰的热忱已经消退了。

作为军事统帅的阿克巴

耶稣会教士安托尼奥·孟瑟拉特神父抵达后，受命担任了阿克巴次子穆拉德（Murad）王子的家庭教师，他由此成为皇室的一名成员。1581年，由于随军远征喀布尔，他得以遇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来观察危机期间的阿克巴。[1] 在他发回罗马的内容广泛的拉丁文报告中，孟瑟拉特描述并评价了阿克巴的军事领导才能。

当东方发生叛乱和其兄弟侵入旁遮普的消息传来后，阿克巴让他的母亲

[1] Monserrate, Antonio, *The Commentary of Father Monserrate, S. J., On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Akb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translated by J. S. Hoyland; annotated by S. N. Banerjee, p. 90.

统领12 000名骑兵卫戍部队驻守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他派遣拉贾·托达·马尔统领一支大军前往平息比哈尔和孟加拉的叛乱。1581年2月，这位皇帝“诏令搬运大量金银和其他储备”，用骆驼和大象驮运，又选择了几位重要的皇妃和女儿，一同迁往他那座“巍巍壮观的白色宫帐”——这座宫帐坐落于距该城4英里之外搭建起来的大营中。[①]这座“按照传统的蒙古风格搭建的”巨大营落布局对称，井井有条，给孟瑟拉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②] 42

> 古老的习俗是那皇家的宫帐……应搭建在一块宜人的开阔地上，如果这种地方可以找到的话。右侧是国王长子和他的随行显贵的营帐；这些帐篷紧临国王的宫帐。左侧是次子及其随从的营帐……最重要的贵族们……把他们的营帐安扎在左右两侧的第二线上，紧挨着国王的宫帐。其后面驻扎着大军中的其余人等，他们的帐篷尽可能紧密地环绕在他们各自军官的周围。为了避免拥挤和混乱，它们被划分为不同的军营，每个军营都有自己的营地。国王和每位王公显贵都设有单独的集市……国王和王子们的集市很大，货品充足，不仅有粮食和其他供应品，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商品，以至这些集市看起来像是属于某个富裕的城市而非一座营落。它们总是按照同一规划建设，因而任何一个在营中生活了数日的人都能像他熟知他自己城市的街道一样，熟悉这些集市四周的道路……在战役行军期间，大炮集中排放在大营前面，正对着皇家营区的入口，占据了空阔地带的最广大部分。

在这个巨大营落的中心，“每夜都有一支火把安放在一根高杆的顶端，为迷路者指示方向。”[③]尽管它的规模庞大，莫卧儿营落的设计仍着眼于使其能在行军过程中随整支大军一同行进。皇帝拥有两座一模一样的宫帐，“它们被用来交替前移。当他占用其中一座宫帐的时候，另一座宫帐则被移往前方。”[④]

对大莫卧儿皇帝营地的类似描述成为后来观察者的一个主题。[⑤]对帝国

① Ibid., p.75.

② Ibid., pp. 75–76.

③ Ibid., p. 76.

④ Ibid., p. 77.

⑤ M. A. Ansari, “The Encampment of the Great Mughals” in *Islamic Culture*, 37 （1963）, 15–24. N.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 （Calcutta, 4 vols., 1907–08）, translated by William Irvine, Ⅱ, 62–80.

营地规模的估计通常是认为高达10万人。这种巨大的移动城市在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被精确复制出来，成为皇帝权威和权力的明证。至少通过这种方式，突厥—蒙古人遗产继续对阿克巴及其继承者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43 莫卧儿军队的纪律和组织同帝国营地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为了这次战役，阿克巴集合了50 000名骑兵，500头战象，和“几乎不计其数的步兵”。[①] 那位耶稣会教士很快注意到骑兵的混合性。莫卧儿骑兵既包括了通常从他们的小马上下来作战的拉杰普特人，也包括了中亚的突厥人和波斯人，“当他们在豕突狼奔〔撤退〕中飞奔时，（这些中亚人）是极其危险的。”[②] 他的炮兵仅有28门由于太小而不能用于攻城的野战炮。在每一站，这些炮总是停放在国王营帐的前面。

这支军队以新月队形行军，皇帝居首。它迅速“在一英里半的正面上疏散开来，铺天盖地”。[③] 尽管它的规模很大，这支庞大的军团却装备精良，供水充足。阿克巴带领这支军队来到山脚下，以便能找到最好的水源。孟瑟拉特“惊诧于粮食的廉价，尽管需求如此之大”。帝国的帮办们为了购买各项供给，搜遍各个乡村，还鼓励商人们前来，在移动的街市上售卖。在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这位皇帝向沿途的小酋长和小国王们派遣“传令官”，公开加以威逼利诱。如果他们不拿起武器袭击莫卧儿军，他们将不会受到伤害，而且当他凯旋时，他们还会得到丰厚的报偿。如果他们携带供给品来到营地，这些物品可以自由出售，不用纳税。然而，如果这些地方统治者不服从他的命令，他们将受到严厉惩罚。惧于这支军队的庞大并悦于阿克巴的慷慨，所有地方王公“出于自身利益”都听从了这位皇帝的谕令。[④]

在帝国边疆之外，阿克巴派出300名哨探，让他们分布在距离军队18英里远的四周。当靠近隘路时，这位皇帝就向“周围”派出前哨。结果，“这支军队在行进途中自由伸展，以寻找阴凉和水源，而且在夜间酣然入睡，好像就在自己的国家一样。”[⑤] 工程兵在前面平整道路，为渡河搭建临时舟桥。按照严格的军规，人员和牲畜须排成一列纵队过桥，以免中途发生

① Ibid., p. 83.
② Ibid., p. 85.
③ Ibid., p. 79.
④ Ibid., p. 80.
⑤ Ibid., p. 82.

灾难。

孟瑟拉特通过描述阿克巴对一次违令的反应说明了他如何统领其军队。一名军官受命沿印度河北上前往某个地点，以察看骑兵是否可以从那里徒涉过河。在走了25英里但尚未达到指定地点时，这位军官就被当地军民告知不存在这样的涉河点。他回去报告说，必须搭建一座桥方能通过印度河。当这位皇帝得知他的这位哨探并未抵达目的地时：[1]

44

> 这位国王命令将其抓住，拖到之前告诉他前往的地方，脸朝下绑到一个充气的牛皮袋上，然后投掷到河中。当关于此事的通报传遍军营后，几乎整支大军蜂拥到河边观看这一奇观。这位军官任凭水流的摆布在河中央四处飘荡。他痛哭流涕，哀声央告，力图打动国王，求得赦免。当他被河水冲过国王的营帐时，这位国王下令将他从河中捞起，列入王室财产清单，带到各个街市上公开出售，而最终作为一名奴隶被拍卖。

这位全身污泥的犯官被他的一位朋友以80金币买走，而后阿克巴才宽赦了他。孟瑟拉特评论说，阿克巴“借助这个事例表明了他是何等重视军纪和军令”。[2] 同时，阿克巴在这个事件中并没有沦于残暴。这个事件的巨大影响足以让人对他心悦诚服。

王朝意识形态

从青年时代起，阿克巴就展示了超常的个人魅力。他拥有一切理想的英豪品质。他勇敢，威猛，大度，平易近人。他把强大的个人魅力与异乎寻常的组织和战略才能结合在了一起。阿克巴的个性令人印象深刻，打动人心，超过了任何一位统治者或领袖的寻常传记和形象描述。他的长子萨利姆，即后来的贾汗吉尔（Jahangir），是他最大的崇拜者之一，曾这样描述他父亲的相貌：

> 他相貌奇伟：身材中等，但略高；面色古铜；眼睛和眉毛黝黑，暗而不淡；狮身蜂腰（即身材瘦削），胸膛宽阔，猿臂长手。

① Ibid., pp. 82–83.

② Ibid., p. 83.

> 他鼻子的左侧生有一颗肉痣，形状怡人，大小宛如半颗豌豆……他龙声虎啸，讲话和解释时字正腔圆。在行动和运动时，他不似世间的凡夫俗子，上帝的荣光集中在他身上。

45

其他同时代人的描述大同小异。孟瑟拉特在阿克巴38岁时首次遇到这位皇帝，他说："他的前额光亮饱满，他的眼睛如此明亮和闪耀，看起来就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海洋。"[①] 孟瑟拉特注意到阿克巴总是蓄着长发，裹以印式头巾，"借此表明对印度人风俗的认可，以取悦他的印度臣民"。[②] 这些耶稣会士也被阿克巴的开放所打动：

> 无论怎样都很难夸大〔阿克巴〕向所有希望倾听他的人敞开心扉的程度。因为他几乎每天都会创造机会，使任何一名平民或贵族能与之相见和交谈；他还努力表明他自己乐于交谈，对所有前来与他交谈的人和蔼可亲而非冷目以对。

阿克巴的个人品质使他在政治和战争中一样成功。然而，在他统治的后期，本身已为阿克巴的个性吸引的新幕僚们开始构建一种以他们的主人为中心的更大的意识形态结构。

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时期，阿布尔·法兹尔的视野和政治敏锐使他作为首席帖木儿理论家和宣传家而声名显赫。在他的新职位上，阿克巴的这位智囊开始为帖木儿王朝意识形态的大厦—— 一座旨在为阿克巴及其继承者建立新合法性的大厦——搭建脚手架。在宫廷讨论中，在范围广泛的官方和私人通信中，在颂诗中，阿布尔·法兹尔和他的兄弟——诗人法伊兹（Faizi）开始维护阿克巴统治芸芸众生的神圣权利。[③] 关于这个教义的最系统表述出现在《阿克巴本纪》（*Akbar-Nama*）一书中。该书分卷记述了阿克巴在位47年中每年所发生的事件，还作为一本手册附上了大部头的《阿克巴政典》（*Ain-i Akbari*）。在这本著作的核心，在每一节，阿布尔·法兹尔都嵌入了阿克巴的终极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超越了征服、政变或继承等偶发事件。

《阿克巴本纪》把阿克巴描述为一个超然存在，接近于上帝和真正的

① Monserrate, *Commentary*, p. 196.

② Ibid., p. 197.

③ 下面的讨论基于：J. F. Richards, "The Formul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in J. F. Richards, ed., *Kingship and Authority in South Asia* （Madison Wisconsin, South Asian Studies No. 3, 1978）, pp. 260–267.

现实（true reality）。阿克巴是神秘之光的接受者，唯有上等人（superior men）才能感觉到从他的眉宇间透射出的不可言喻的光芒。只有被挑选的人才能透过那层笼罩着这位莫卧儿皇帝眉宇间光芒的面纱。阿克巴拥有神秘的知识，他的权威超过了公认的伊斯兰教法解释者——当时的“穆吉塔希德”（*Mujtahid*），超过了最神圣的苏菲派大师们（*Pirs*）或人们翘首以待、富有个人魅力的救世主〔“马赫迪”（*Mahdi*）〕。

46

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阿克巴本纪》手稿中的五十多幅插图（原件可能陈列在宫中）把这位皇帝本人的神性、祥和和自制与他周围的那些笨拙的芸芸众生的浮躁、挣扎和昏乱作了对比。这位皇帝的意志安抚和指导着他的臣民乃至全人类的激情。

这种光照主义主题直接借自东方的波斯新柏拉图哲学学派。这种哲学可见于希哈卜丁·苏拉瓦底·马克吐尔（Shihabuddin Suhrawardi Maqtul，死于1191年）的教义。苏拉瓦底认为，一切生命的存在都是由于来自东方的“光中之光”（the Light of Lights），即神的令人炫目的持续不断的照耀。所有人都据有神光，但只有三个等级中最高等的人才是他那个时代真正的神人（theosophists）或大师——如苏拉瓦底本人、柏拉图或（按照阿布尔·法兹尔的解释）阿克巴。一串光彩熠熠的天使是向世人显示上帝圣光的媒介。为首的是天使加百列，他被看作先知穆罕默德的真实的灵魂。

阿布尔·法兹尔在描写阿克巴祖先的前言中明确表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条款。从所有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这位歌功颂德的人追溯了隐秘的圣光的流转，直至它在1556年泽被和照亮了阿克巴的精神和智慧。阿布尔·法兹尔考证出这圣光的世系：从亚当到圣经先知，从圣经先知到约瑟，而约瑟就是突厥斯坦统治者图尔克（Turk）的父亲。图尔克的儿子莫卧儿·汗（Mughal Khan）是九代突厥—蒙古人国王中的第一位国王。这个世系中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被一位敌人打败和驱散了。

这位统治者和他的部落在混乱中退向莫卧儿斯坦（Mughalistan）。在那里，他们不为人知、与世隔绝地生存了两千年。最后，在东方一遥远的山谷中发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莫卧儿斯坦国王的王后阿兰库娃（Alanquwa）在她丈夫早逝后，成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不过，阿兰库娃是一位极其圣洁的妇女，她的眉宇间闪耀着圣光。一天晚上，当她在她的帐

篷中安睡时，一束光芒神秘地进入她体内，让她怀孕了。

47 从这个事件中诞生的三胞胎兄弟被称为“奈仑”（Nairun），即“光生儿”。从长兄那里开始，这束隐秘之光沐浴了包括成吉思汗（Chingiz Khan）在内的9位突厥—蒙古统治者，最后照耀到14世纪的伟大征服者埃米尔·帖木儿·古尔干（Amir Timur Gurgan）身上。当1370年4月埃米尔·帖木儿在撒马尔罕（Samarkhand）称王后，帖木儿王朝的正式法统开始了。这长长的世系传承又经过四代才到达巴布尔、胡马雍和接下来的阿克巴。胡马雍拥有惊人的夜视能力，这使他确信“一个杰出的继承人（他的伟大之光已从他的前庭射出）”将赠给他。阿克巴将是这一世代流转的隐秘之光的接受者。

门徒和曼萨卜达尔

利用新造的帝国习用语，阿克巴和他的顾问们发明了一种把大贵族和他联结起来的隐秘方式。部分地，这种感召力是自然而然地从阿克巴自己强烈的精神追求——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得到了最完全的表现——中产生出来的。在16世纪80年代早期，这位皇帝开始公开以他本人发明的一套仪式崇拜太阳。每日四次，他面向东方，在圣火前匍匐跪拜。与此同时，阿克巴戒绝了过度食肉、性交和饮酒。在北印度，这些完全是印度教日常世界中的典型仪式和习俗。对作为光明象征的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很容易与他的拉杰普特贵族们的出身和世系神话协调起来，而这些神话构成了这些拉杰普特贵族宗教信仰的中心。

稍后，这位皇帝就开始从贵族中遴选崇拜日月的门徒。周日正午，这位皇帝在圣火前主持入教仪式。在这些场合，会有12名新信徒加入门徒团体。每位入教者都宣誓在四个方面效忠阿克巴：在侍奉教主（the Master）亦即阿克巴时，毫不犹豫地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jan*）、财产（*mal*）、宗教（*din*）和荣誉（*namus*）。穆斯林入教者签署一项声明，同意摒弃正统伊斯兰教的束缚，直接崇拜安拉而无需中介。在整个仪式期间，新信徒要行一种极端形式的匍匐礼（称为“斯吉达*sijdah*”），把他的头置于阿克巴脚上。在仪式结束时，阿克巴搀扶起每位恳求入教的人，在他的头上戴上新头巾，

颁给他一枚浮雕着太阳标志的大奖章。每位新门徒还得到一幅要戴在其头巾 48
上的阿克巴微型画像以及为这个场合定制的珍珠耳环。

门徒的数量增长迅速——可能占到了莫卧儿埃米尔的大多数。门徒身份是一个同化异质贵族群体，把他们同皇帝联系起来的极其有效的手段。阿克巴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宣誓的庄重，旨在为莫卧儿埃米尔建立一种新的认同。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主—门徒关系融化了贵族间的血缘、种族和宗教区分。誓言把这些门徒同他们的教友团结起来，让他们承诺摒弃从前的敌意和派系冲突。甚至连宗教信仰也被导向侍奉和崇拜皇帝。

为了他的门徒和教友身份观念，阿克巴利用了几种广为接受的制度。数世纪以来，伊斯兰印度、中亚和中东的军事奴隶制已经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只要他的军事统领满足了善待和同情其部属的起码标准，奴隶士兵就要对前者恭敬顺从，誓死效忠。军事奴隶在直接效命皇帝主人时甚至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义务。

帝国门徒关系的另一个模型是苏菲派教长〔“毕尔”（*pir*）或教长〕同他的皈依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的特定形式因教团而异。然而，一般说来，皈依者把谋求他们身体和精神福利的责任完全委托于他们选定的苏菲派教长之手。后者要在通往真知上帝的神秘道路（*tariqa*）上引领他们前进。作为完全献身于他们的教长的一种象征，苏菲派门徒把他们的头置于教长脚上，同阿克巴采用的匍匐礼（斯吉达）如出一辙。后一种形式中的跪拜凡人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是亵渎神明。毫无疑问，阿克巴深受他早期膜拜已经仙逝的著名奇什蒂圣人谢赫·萨利姆经历的影响。无论何时，只要这位皇帝长途跋涉前往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朝拜萨利姆生前所居的石山，他就会把自己变成一名狂热的信徒。

最后，现成的是印度—波斯人的宫廷礼仪和贵族朝觐国王的模式。宫廷仪式连同其僵硬的礼仪旨在唤起敬畏和谦卑的感情，强调统治者与哪怕是其最高贵的臣民之间的距离。公开接见时的行走、言语和礼节的规则强化了对 49
国王意志的服从。严格指定的位置——距离国王或近或远——形象地显示了国王的宠爱程度。君王的召见需要奉上适当的礼品。这些礼品可以是100金币，也可以是价值更高的珠宝甚或大象。宫廷仪式的高潮是象征性地把臣下揽入皇上怀中。例如，按照由来已久的惯例，莫卧儿王朝把锦罗织就的华贵

礼服作为赏赐臣下功勋的主要礼物。统治者首先把锦袍披在他自己身上，然后再亲手给受赏者穿上。受到这般恩遇的人按礼仪回馈礼品——通常是金币或银币。通过这些手段，一身侍奉国家——统治者和贵族——的观念就得到了弘扬。

拉合尔

1585年，在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喀布尔的米尔扎·穆罕默德·哈希姆死后，阿克巴把他的都城迁到了旁遮普的拉合尔。已于1584年吞并了巴达赫尚的乌兹别克统治者阿卜杜拉·汗，构成了对喀布尔的潜在威胁。乌兹别克人资助那些继续反抗喀布尔的莫卧儿政权的阿富汗部落。阿克巴立即派遣一支军队，由拉贾·曼·辛格统领，占领喀布尔，而后把这座城市及其周围郡县置于帝国直接治理之下。这项任务完成后，阿克巴在拉合尔继续驻留了13年，成功地把莫卧儿的帝国权力施加于整个西北地区。

在拉合尔，这位皇帝设置了边境哨所，警戒阿卜杜拉·汗·乌兹别克。1586年，阿克巴和这位乌兹别克大汗达成了一项协议。阿克巴同意在乌兹别克人入侵萨法维王朝盘踞的呼罗珊（Khurasan）时保持中立。作为回报，阿卜杜拉·汗同意不再支持、资助和庇护阿富汗部落。这样一来放开了手脚的阿克巴，开始针对优素福贾伊（Yusufzais）及其他部落的叛乱展开一系列的绥靖战役。他还得以腾出手来吞并最后两个尚未完全纳入帝国版图的王国——克什米尔和信德，从而使帝国臻于鼎盛。

50 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繁忙的陆上商队贸易。从喀布尔经由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和白沙瓦（Peshawar）的陆上路线，向拉合尔市场提供了来自中亚的马匹，来自中国的水果、丝绸和瓷器，贵金属和许多别的贵重商品。印度的香料、纺织品和其他货物在奢侈品贸易中流往帝国境外，由印度商人运至中亚和伊朗的市场。旁遮普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那里有成千上万的织工为中亚、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各类市场生产特制棉布。这种贸易的规模可以从1586年白沙瓦城堡的一场火灾的影响中判断出来。这场灾难毁掉了一千头骆驼驮运的商品——这些商品属于因道路遭到临时毁坏后留宿在那

里的商人。[1]

这种商队贸易很容易受到土匪的滋扰，甚至被阿富汗部落完全阻断。保持贸易畅通是这些山口两侧的统治者长期关注的事情。在最近几年里，强大的优素福贾伊部落群体控制着斯瓦特（Swat）和巴焦尔（Bajaur），而且威胁着要进一步南下。优素福贾伊部落控制了经由开伯尔的路线，经常阻断道路，抢劫商队。

1585年晚些时候，阿克巴从拉合尔出发前往阿托克要塞（他于1581年修建）。从阿托克，他派遣了一支军队，由扎因·汗·科卡（Zain Khan Koka）统领，前去制服斯瓦特和巴焦尔山谷中的优素福贾伊部落联盟。这位皇帝利用莫卧儿人集中的国家权力来抗衡优素福贾伊这个阿富汗斯坦北部最富侵略性和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莫卧儿人估计该联盟有10万户，每一户的全部男丁都持有武器，随时准备战斗。自1519年巴布尔迎娶了一位优素福贾伊姑娘为妻以来，他们的部落酋长还没有正式臣服莫卧儿王朝。

莫卧儿军队迫使斯瓦特和巴焦尔的许多优素福贾伊酋长屈服。不过，一支经由崎岖山路前往斯瓦特的援军在途中遇到了灾难。身为皇帝宠臣和宫廷智者的拉贾·比尔·巴尔（Raja Bir Bar）同扎因·汗·科卡这名平庸的野战将军之间的各自为政，削弱了阿克巴军队的部署。通常情况下，阿克巴军队的部署是很小心谨慎的。对优素福贾伊人的一次草率进攻，让帝国军队遭到了埋伏在山口中的伏兵的伏击。大约8 000名帝国士兵，包括拉贾·比尔·巴尔，在这场堪称阿克巴时期莫卧儿军队遭受的最大灾难中阵亡。

51

阿克巴立即派遣了两支新的军队再次入侵优素福贾伊地区。在接下来的6年中，莫卧儿军队把优素福贾伊人围困在他们的山谷中。这些帝国军队修建和占领了12座要塞，以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商队贸易。部落兵无法在原野上对抗莫卧儿骑兵，他们无力保护他们的庄稼和他们的村庄免遭毁灭，这些阿富汗人也无力抵御帝国军队对他们的要塞的决定性攻击。阿克巴展示出来的以军事手段牢固控制阿富汗反叛部落的能力，是他维护帝国势力范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

1585年，当克什米尔查克（Chak）王朝的现任统治者阿里·沙（Ali

[1] Ahmad, *Tabaqak-i Akbari*（Eng. Trans.），Ⅱ, 602.

Shah）拒绝把他的儿子送往莫卧儿皇宫后，阿克巴派遣一支军队北上，入侵克什米尔。那位克什米尔统治者立即投降了，但是他的儿子雅库布（Yaqub）自封为王，对帝国军队进行了殊死抵抗。最后，1589年6月，阿克巴亲自从拉合尔驾临斯利那加，以接受雅库布及其叛军的投降。这位皇帝的造访开启了帖木儿王朝对克什米尔秀美河山和在那个山国中修造无数皇家花苑的兴趣。

1586年，阿克巴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印度河下游地区。木尔坦的帝国总督未能确保塔塔（Thatta）（信德）统治者扎尼·柏克（Jani Bek）投降。阿克巴的反应是派遣另一支庞大的莫卧儿野战部队围困印度河上的一座都城——塞赫万（Sehwan）。扎尼·柏克集结了一支大军和无数河上战舰相拒。在一场河上苦战中，莫卧儿将军以少胜多，打败了信德军队。在遭受进一步的失败后，那位信德统治者投降了，并于1593年亲自前往拉合尔宫廷朝拜阿克巴。扎尼·柏克成为莫卧儿帝国的一名曼萨卜达尔，接受了阿克巴的门徒身份，还被任命为木尔坦总督。他从前的王国变成了莫卧儿的塔塔省，被划分为三个县，由一名帝国总督治理。

信德的征服增强了阿克巴收复久为萨法维王朝占据的坎大哈要塞和城镇的决心。1595年，坎大哈的波斯守将由于与沙·阿巴斯（Shah Abbas）失和，归顺了莫卧儿王朝，向一支莫卧儿军队献出了这座要塞。不过，沙·阿巴斯并没有因为这个令人懊恼的事件而选择走向战争。

当1598年阿卜杜拉·汗·乌兹别克去世从而缓解了来自那个方向的入侵威胁后，阿克巴把他的都城再次迁往阿格拉——而不是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从阿格拉，他能够集中精力对付那个最棘手和最艰险的边疆：德干。

52

为什么这位皇帝没有返回他钟爱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而是返回了阿格拉呢？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儿子萨利姆的桀骜不驯所造成的愈发困难的问题。居住在阿格拉这个更加坚固的大本营可能大大好过居住在不安全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相较于帝国的年收入，修建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费用（最近的估计是350万银卢比）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考虑到他的巨额财富，阿克巴的废都只是一项闲置资本。[①]

① Habib,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p. 74, in Brand and Lowry, eds., *Fatehpur Sikri.*

这些只是部分答案。要找到更充足的解释，我们必须审视意识形态。1585年，对阿杰梅尔的朝觐和对奇什蒂圣人的崇拜突然停止了。这位皇帝不再公开朝拜其他苏非教徒墓。皇室的称量仪式也同朝觐分开了。编年史的沉默表明无论在拉合尔，还是在阿格拉，阿克巴都停止定期在聚礼清真寺中朝拜。他不再急于公开显示他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皇家的后裔、皇家的胜利和帖木儿王朝的权威都源自对奇什蒂圣人的虔敬，而这完全处在正统伊斯兰教的制度架构内。1585年后，阿格拉而非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成为新的帝国朝廷的适当城市基地。[1]

返回阿格拉

其余的外部边疆位于德干，这里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反对异教徒的战争频仍之地。德干的地形尽管与印度—恒河平原相比不算适宜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绝不比西北山区或阿萨姆的河滨丛林更让人望而生畏。此外，穆斯林统治的大王国的存在刺激了征服的欲望。德里苏丹们成就的伟业无疑会被他们的继承者——帖木儿人超越。下面是5个将被碾碎从而要么被征服和吞并，要么被置于莫卧儿霸权下的穆斯林苏丹国：法鲁奇王朝（Farruqi）统治下的康德什，尼扎姆·沙王朝（Nizam Shahs）统治下的艾哈迈德讷格尔（Ahmadnagar），伊玛德·沙（Imad Shah）王朝统治下的贝拉尔，阿迪尔·沙（Adil Shah）统治者治下的比贾布尔和库特卜·沙王朝（Qutb Shahs）治下的戈尔康达（Golconda）。除了断断续续缴纳贡赋的康德什苏丹外，其他苏丹都未臣服莫卧儿王朝。 53

然而，这里的社会状况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有利于莫卧儿人的入侵。自德里苏丹国崩溃以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个地区已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德干穆斯林政治文化。除了势力较小的印度穆斯林皈依者，每个国家中穆斯林精英的主干要么是什叶派波斯贵族，要么是逊尼派阿富汗人。这两个集团都不是特别喜欢帖木儿人——阿富汗人尤其如此。

另一个使情况更加复杂的因素是该地区的地主贵族的构成。在康德什以

---

① Richards, “The Imperial Capital”, p. 72.

下地区，拉杰普特人对土地的控制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德干西部，讲马拉提语的马拉塔种姓成员成为被穆斯林打败的亚达瓦人（Yadavas）和前印度教王国的继承人。在东部，泰卢固武士控制着农村社会。后者可以追忆他们在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及其后继国家中的先祖对穆斯林长达数世纪的成功抵抗。逐渐地，这些贵族同化为德干苏丹国中由外部强加的政治阶层。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马拉塔人，还是泰卢固人，人数有限、大多居住在城市中的穆斯林精英为了有效统治，理所当然地依赖于同这些农村贵族结成联盟。

这些德干苏丹很少对地方宗教和文化生活施加限制。他们极少（如果有过的话）把皈依伊斯兰教作为在国家担任高官的条件。确实，几乎以阿克巴在莫卧儿帝国内所用的同样的方式，戈尔康达的易卜拉欣・库特卜・沙（Ibrahim Qutb Shah）（1550—1580年）和比贾布尔的易卜拉欣・阿迪尔・沙二世（Ibrahim Adil Shah Ⅱ）（1580—1626年）都做了广泛尝试来减少他们各自国家内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壁垒。阿克巴的新政策和意识形态立场可能对德干东西两端的地主贵族都很有吸引力。不过，这种联系必须通过谨慎的政治才能和行政管理来建立和维系。莫卧儿人不易或不愿获得马拉塔和泰卢固酋长的忠诚。

1591年，阿克巴向所有德干苏丹派遣了使节，要求他们臣服于莫卧儿人的霸权。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什统治者把他的女儿送给萨利姆王子为妻，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的苏丹馈赠礼品，但都拒绝了正式归顺皇帝的要求。艾哈迈德讷格尔的统治者布尔罕・尼扎姆・沙二世（Burhan Nizam Shah Ⅱ）则故意侮辱了莫卧儿特使。

54 1595年，还在拉合尔期间，阿克巴就下令入侵艾哈迈德讷格尔苏丹国——当时这个苏丹国正经历着布尔罕・尼扎姆・沙二世去世后的继位危机。一支由穆拉德（Murad）王子（阿克巴次子）和巴伊拉姆・汗之子汗・卡南（Khan Khanan）联合指挥的庞大帝国军队，围攻王都艾哈迈德讷格尔。莫卧儿人强使康德什统治者拉贾・阿里・汗（Raja Ali Khan）加入帝国军队。进行抵御的统治者是昌德・苏丹（Chand Sultan），即已逝苏丹的妹妹和幼主的监护人。这位公主坚守要塞，直至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苏丹派来的援军威胁到莫卧儿帝国军队。在达成一项和约后，莫卧儿军队从艾哈

迈德讷格尔撤走，作为交换，贝拉尔省（从前艾哈迈德讷格尔占领的一个王国）割让给莫卧儿皇帝。1596年，贝拉尔成为第一个置于帝国直接治理下的德干省份。

莫卧儿王朝和反叛的德干苏丹国之间持续的紧张和断断续续的战斗成为接下去数年的标志。甚至连康德什苏丹也撤回到他的位于布尔汉布尔的坚固的山区要塞中，拒绝支援莫卧儿军队。1599年，统率莫卧儿德干军队的穆拉德王子因为酗酒而过早辞世。阿克巴把德干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他的第三个儿子达尼亚尔（Daniyal）。不过，1599年9月，这位皇帝离开阿格拉，率领一支8万人的军队开赴德干，亲临指挥。

在这位皇帝的坚强领导下，莫卧儿军队于1600年8月猛攻艾哈迈德讷格尔要塞。在城堡陷落前，尼扎姆·沙王朝公主昌德·苏丹死于一群政敌之手。阿克巴亲率一支莫卧儿军队进入康德什。康德什苏丹巴哈杜尔拒绝归顺，逃入王国都城布尔汉布尔附近的一座坚固的山间要塞：阿西尔格尔。在他一生中的这最后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阿克巴从他在布尔汉布尔的营帐指挥了这次围攻。莫卧儿施加的无情压力迫使巴哈杜尔出城与阿克巴面对面地谈判。他遭到扣留，未获准返回那座城堡。最后，当看到莫卧儿军队攻占了阿西尔格尔的两座外围堡垒后，要塞守军于1601年1月初投降了。

和贝拉尔一样，康德什和艾哈迈德讷格尔的一大片地区成为德干高原上新的帝国行省。阿克巴把这三个行省分封给达尼亚尔王子，让他以德干副王的身份统领。1601年4月11日，这位皇帝离开布尔汉布尔，踏上返回阿格拉的行程。

55

萨利姆的反叛

当阿克巴动身前往德干时，他留下他的长子掌管都城。1600年7月，萨利姆曾做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试图夺取阿格拉要塞，[1] 在该省任命他自己的官员。在那里，他依旧藐视他父亲从德干遣人送来的命令。当阿克巴抵达阿格拉后，萨利姆率领一支3万人的骑兵部队进逼这座都城。阿克巴发给他

[1] 要塞守军由皇帝直接任命的独立军官统领。没有钦命，即便是王子也不能令其服从。

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命令这位王子止步和返回东方。在那里，他为萨利姆提供了孟加拉和奥里萨的总督职位。萨利姆无视这项任命，不过确实回到了安拉阿巴德。1602年5月，他让他的名字出现在礼拜五祈祷文中，并作为皇帝以他自己的名义铸造硬币。

阿克巴从德干召回他信任的顾问阿布尔·法兹尔，派他前去对付萨利姆。惧于阿布尔·法兹尔的威严，萨利姆委托奥尔恰（Orchha）的邦德拉族（Bundela）王公比尔·辛格截杀返回途中的阿布尔·法兹尔。这位邦德拉王公制服了那位大臣人数不多的护卫队，斩杀了阿布尔·法兹尔，并把他的首级带到了安拉阿巴德。

痛苦不堪的皇帝最终通过他的妻子萨利玛·苏丹·贝加姆（Salima Sultan Begam）[1] 同他的儿子达成妥协。贝加姆同其他几位贵妇一起充当了两者之间的和事佬。萨利姆出现在宫廷中，恭顺有礼，得到阿克巴的拥抱，并被指定为皇储。而后，他未经他父亲的允许就返回了安拉阿巴德，除了明目张胆地实施暴行外，还一度沉湎于吸食鸦片和酗酒。在阿克巴的三子达尼亚尔于1604年死于酗酒后，萨利姆返回朝廷，部分是因为他担心他自己的儿子库斯洛（Khusrau）的党羽的诡计。颇有势力的拉贾·曼·辛格和其他人一道要求阿克巴支持他的孙子，而对萨利姆的请求不予理睬。在萨利姆归顺皇帝后，他在这次叛乱的最后阶段被短暂地圈禁于皇宫。

之后还不到一年，阿克巴就染上了痢疾，身体孱弱，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萨利姆躲过了敌视他的贵族的阴谋，探视了他的父亲。后者把皇冠戴到这位王子头上，赐给他胡马雍的宝剑，使他成为皇位的继承人。1605年10月25日夜，阿克巴与世长辞，葬于他在阿格拉附近的锡根德拉（Sikandra）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之中。

56

结 论

当这位皇帝于1605年驾崩时，他的遗产是一个多地域的帝国。这个帝国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印度次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势力。从他的

① 应即前面提到的萨利姆·苏丹·贝加姆（Salim Sultan Begam）。——译者注

青年时代开始，阿克巴就指挥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重大军事战役，使莫卧儿军队在战场上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没有一个王国或地区王国联盟能与莫卧儿军队抗衡。每场胜利都给帝国军队增添了金钱、人力和武器。每一次战役、战斗和围攻都是一个公共事件，在整个次大陆得到广泛报道和讨论。一年又一年，随着帖木儿军队被证明无敌于天下而反叛和抵抗相继失败，阿克巴的声誉日盛。他和他的心腹亲信变成了大众们街谈巷议的人物。以他一生中的著名事件为基础的有关他的民间故事开始四处流传。这位莫卧儿皇帝获得了一顶近于神圣和神秘的桂冠，而这也进一步增强了莫卧儿帝国江山永固的民众感觉。

征服之后，继之以吞并。从前高傲的统治者要么被废黜和处决，要么屈尊效命这位莫卧儿皇帝。从前独立的王国变成了这个日益扩张的帝国的行省。阿克巴强行把北印度的诸多地区国家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内，莫卧儿皇帝是其政治合法性与权威的单一来源。没有哪个苏丹、王公或其他统治者能够不以皇帝的名义来移交合法权。在这位皇帝的眼中，所有这些人都只不过是“土地占有者”（*zamindars*），他们依靠专有职位（*sanad*）来确保他们的世袭地位。皇帝的军事力量使他能够对所有新并入帝国的领地施行严密的行政控制——而且在遭到抵制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这种控制。莫卧儿王朝给纷乱不堪的印度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秩序。

阿克巴部署了数量庞大的重装骑兵，携带弓、长矛和剑等装备的人马、战象、火枪手和炮兵。在他的许多次战斗和战役中，这位莫卧儿统治者比他的对手更有效地使用了新的火药武器。不过，到16世纪中期，火药已经可以从许多地方获得了。阿克巴的一系列胜利有赖于组织能力，而非技术。在追溯这些战役时，认识到这位莫卧儿皇帝面对的劲敌拥有数量庞大、装备良好和斗志昂扬的军队这一点很重要。大多数战斗都是铤而走险和浴血奋战，围攻也是困难重重和旷日持久。在很多时候，阿克巴在率领他的军队冲锋陷阵时，冒着受伤甚至战死的危险。幸运和他的军事才能挽救了他。在一个普遍好战的社会里，这位莫卧儿帝国的建筑师无疑是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

57

第三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在征服和掠夺的推动下，阿克巴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随着新的行省不断加入帝国版图，这个行政体系也得以稳步扩张。这位莫卧儿皇帝主持着一个可以使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在帝国全境自由流动的体系。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是精力充沛的管理者，他们创造性地适应和回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这个基础上，阿克巴的后继者们目睹了整个17世纪帝国效率、实力和财富的稳步增长。

阿克巴利用了印度伊斯兰国家丰富的波斯行政传统和来自大草原的突厥—蒙古人征服帝国的冷酷严峻、血统取向的组织传统。在这种背景下，这位皇帝塑造了一种以集权化、等级化和官僚化的职级为特征的严密结构。填充这些职位的是技术上合格的官员，他们按照标准化的规则和程序行事，编制了大量书面命令和记录。在这个体系的顶端，这位皇帝充当了一名精力充沛和信息灵通的首席执行官。

首要的一步是在阿克巴任凭宰相即瓦吉尔（*vakil*）一职消失从而把所有行政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时迈出的。之后，他任命了4名近乎平权的中央大臣。这些官员有时作为一个咨询机关聚集在一起，但他们事实上在各自领域内都是彼此独立的。他们的职责根据这位皇帝认可的最基本的行政职能来加以划分：财税，军队和情报，司法和宗教资助，皇室及其遍布整个帝国的中心作坊、建筑、道路和运河。任何遗漏的职责都留给皇帝和专门任命的官员处理。这样，外交和外部事务就由皇帝本人亲自掌管，而在从前的伊斯兰国家，这些事务通常是交给一名掌管档案或官方通信的大臣来处理的。这些大

臣及其高等助理和专门官吏是从皇帝奴仆或曼萨卜达尔中招募的。每个部门都维持了一个由书记员、会计员、审计员、通信员和其他胥吏/吏员组成的庞大的辅助团队。 59

中央政府的职责划分在各省中被复制出来。在每个省会，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总督要同一名财务官〔"迪万（*diwan*）"，向瓦兹尔（*wazir*）汇报〕、一名军务主计官兼情报官〔"巴克什（*bakhshi*）"，向中央的总监军汇报〕以及一名恩典官（"萨德尔"，向负责宗教和慈善资助的大臣汇报）分享权力。总督负责他所在行省的总体上的和平、安全和安宁。凭借这种职权，他监督省内全境的督军〔"法乌吉达尔（*faujdars*）"〕和军事重镇〔"塔纳（*thanas*）"〕的守将，后者配有重装骑兵团和火枪手。行省迪万掌管帝国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省财库。总督和迪万之间的分权是帝国行政中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原则。

莫卧儿贵族集团

与这种官僚结构相交的是另一种较为发散的制度。皇帝拥有一群武士贵族效命于他。这些贵族由成年皇子和数百名埃米尔（贵族）和高等曼萨卜达尔构成。在整个帝国境内，这些官员充任行省总督或占据其他高级行政职位。或者，他们受命担任野战部队的军事将领或加入中央军团。在他们的军官任上，埃米尔或曼萨卜达尔还担任战略要塞的司令官，直接向皇帝报告。这些显贵薪酬优厚，统领着人数多达数百乃至数千的家属和部曲。当从一地转向另一地任职时，他们的部众也随其转移。这种帝国体系十分依赖于该集团的军事能力、行政技能以及政治和开拓力量。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个帝国界定为一种"家族—官僚"（"patrimonial-bureaucratic"）体系。①

这个核心的成员及其私募的官吏和仆役还执行其他一些主要的行政任务。作为军队将官，这些贵族征召、训练和装备大量的重装骑兵，他们构成了帖木儿军队的主要攻击力量。他们雇用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团，其中既有骑 60

① Stephen P. Blake, "The Patrimonial-Bureaucratic Empire of the Mughal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 (November, 1979), 77-94.

马作战的，也有徒步作战的。每支分遣队的核心依赖于一个由关系密切的亲属和关系较远的同族伙伴构成的团体。更多的兵员则可以通过印度北部和德干地区的庞大的军事劳动力市场迅速募集。对于准备好出钱的募主来说，训练有素的职业骑兵、步兵和炮手是唾手可得的。

作为扎吉尔即田赋俸禄的接受者，这些贵族在从乡村征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埃米尔和高等曼萨卜达尔利用他们自己的部属征收了巨额田赋中的大部分。其中一些（田赋）用来支付他们自己的优厚薪俸，但更大部分则用于支付其兵员的现金薪酬。这项巨大活动的组织被留给贵族自己负责。中央政府的职责仅限于检查、监控和审计。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阿克巴煞费苦心地从不同来源征召他的贵族。莫卧儿贵族集团变成了一个由自由人而非奴隶构成的混合群体，并保持了这个特征。他们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才智和皇帝的恩宠。拉杰普特人、阿富汗人、印度穆斯林、阿拉伯人、波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察合台人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族群。一些贵族是印度本地人，许多人则不是。大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也有许多人是什叶派或印度教徒。新贵族的不断加入有助于阻止贵族集团内部反对派系和党羽的增长。没有一个族群或帮派大到足以对皇帝形成挑战。相反，帝国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新晋封的、才能卓著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希求通过效忠印度的帖木儿王朝来获得权势、财富和名望。服役贵族的开拓魄力和精神对阿克巴及其继承者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酬劳和激励而非武力和强制，是阿克巴所心仪的方法。曼萨卜达尔是自愿加入皇帝军队的自由人。大多数仆役、工匠、士兵、专业人员和低级帝国官员也是自由工作人员，他们通过他们的效劳获得丰厚的回报。家庭和个人奴隶也大量使用，但自由雇员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们。除了后宫侍卫，没有军事奴隶为皇帝效劳。这个体系为各个层级上表现出色的人提供了优厚的薪酬以及巨大的荣誉和肥缺。

61

这些显贵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势，是耀眼的公众人物。他们的个性、习惯和活动是无休止的谣言和妄测的主题。最大的埃米尔们是全帝国关注的对象。关于受宠或失宠的新闻，关于疾病、嗣子、婚姻、任职及其他消息的新闻，构成了传遍这个帝国的无数街谈巷议的内容。低等贵族是地方和地区关注的对象。在帝国社会的上流阶层，商人和敌对的贵族雇用间谍和密探从大

人物的随从那里探听可靠消息。在下层社会中，在印度城市的集市和咖啡馆中，逸闻趣事和流言蜚语——经常极其准确——记录了这些名流的生活。性取向和丑闻显然是主料。那些以贪婪、反复无常和暴虐著称的贵族会因此受到广泛谴责，那些以慷慨、负责和仁慈著称的贵族则受到赞扬。

无论他们在哪里任职，在朝廷抑或行省，这些贵族的世袭府邸是贵族生活和文化的中心。只要他们的财力允许，所有贵族都会模仿皇帝的风格、礼节和奢华。每个贵族几乎每天都要像皇帝那样坐在高垫上接见觐见者（*durbars*），听取大多关于公共事件的汇报，通过这种方式处理各种事务。官员和属吏因他们的表现而受到公开表彰或申斥。申诉者和造访者跨过贵族胥吏设置的障碍，出现在大人物面前，寻求他的支持或善意。正像这些处置了大量资财的大人物所做的那样，贵族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庇护关系。在庇护人的觐见厅上，艺术家和工匠们找到了诱人的就业机会，向他们的庇护人奉上他们的作品。贵族的府邸是举办豪华宴会和其他聚会的地方。在这里，男宾们可以欣赏到音乐、舞蹈、诗歌或其他娱乐。对一些贵族来说，这类场合是吟诗的地方；对另一些贵族来说，美酒和鸦片是吸引他们的主要东西。

贵族的府邸被划分为主要供男人们使用的比较开放的外庭和保留给妇女的隐蔽的内院。位于闺房石屏后面的是家庭生活的世界，在那里举办事关添丁、嫁娶、丧殡、宗教节日以及社交等的各类典礼。主人的妻、妾和女眷在严格规定的等级中的位次，根据尊贵、血缘和受宠程度的不同排定。家中还使用数百女仆（经常是奴隶）。闺房中的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礼仪和教养的有序整体。在理想情况下，闺房为达贵及其最亲近的男眷提供了一个小憩和休闲之地——一个用来愉悦家中男人的雅致、悦目而整洁的去处。 62

莫卧儿家庭还是一个家庭奴隶制的世界。家里供养着众多的男女奴隶。他们的身份和任务从最普通的到那些需要技能、机敏和才智的，各不相同。还有年轻的男女奴隶为他们的主人（或女主人）提供周到的性服务。阉奴，通常是从孟加拉奴隶市场上购来的受阉男孩，穿梭于府宅外庭和内院之间。他们为幽闭在闺房中的贵妇充当侍卫、仆役，还经常充当经纪人。莫卧儿贵族也雇用阉奴，作为个人的心腹和助手。这些受到宠幸的阉奴深得他们主人的信任。并非不常见的是，尽管受到官方和公众的非难和谴责，这类关系中

含有主人和奴隶间的性关系。

在阿格拉、德里、拉合尔、布尔汉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城市生活的形态是由莫卧儿贵族的居住模式决定的。高等贵族的府邸是城市街区的核心，低等部属和军队在其附近修建房屋和茅舍，而售卖货物和提供服务的商贩则聚居在一个可靠市场的周围。建筑师和建筑工人能在贵族随从那里找到永久性工作。莫卧儿的官员（经常还包括他们的女眷）花费大量金钱修建清真寺、客栈和其他建筑。石桥和水井也是颇受欢迎的工程。在几乎所有城市的中心，这类建筑成为这些达官贵人们富裕和乐善好施的见证。

数十个遍布北印度的新村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莫卧儿贵族对地方市场设施的投资。除了被视为具有公共精神和宗教美德的善举，这些商业中心还满足了每位贵族随从的需要，提高了他从他的扎吉尔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有些暴戾恣睢的王公显贵们以一种不那么仁慈的方式，无视帝国法规，强行干预他们辖区内的地方市场。他们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能够以低价买进所有货物，然后以极高的垄断价格卖出这些货物。更具企业家精神的贵族则把他们的金钱投资于商业：为陆上或海上的长途贸易商人提供资金。渐渐地，贵族们开始租赁或购进商船，插手最高一级的海上贸易。

63

曼萨卜达尔军团

所有的贵族都拥有曼萨卜，但并非所有的曼萨卜达尔都是贵族。一般说来，在阿克巴统治时期，拥有500扎特以上品级的官员能晋身贵族之列。到17世纪，贵族是那些拥有1 000扎特以上品级的官员。贵族和低等官员或曼萨卜达尔担任各种职位，但必要时所有这些人都要担任武职。所有曼萨卜达尔都要按规定供养一支与他们的爵位相称的武装骑兵分队。1595年，共有1 823人拥有曼萨卜，至少控制着141 053名仆从。这些仆从自备战马和装备，作为重装骑兵服役。[1] 贵族也得按要求养护一定数量的战马、战象、役畜和车辆，具体数量根据一个以他们的爵位为基础的公式确定。[2] 这项义务

① Shireen Moosvi, *The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c. 1595* （Delhi, 1987）, pp. 214–219. 文中，Shireen Moosvi 对骑兵最低额的估计是在“附录12A”中给出的，最高额是188 070骑。

② K. K. Trivedi, “The Share of Mansabdars in State Revenue Resources: A Study of the Maintenance of Animals”,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4 （1987）, 411–421.

是与规定他们供养一定数量骑兵的义务分开的。在阿克巴统治临近结束时，曼萨卜达尔和他们的扈从的薪俸和津贴耗费了帝国每年预算总额的82%（9 900万卢比总预算中的8 100万）。

在他们的军职任上，曼萨卜达尔受军务大臣即米尔—巴克什（*mir bakhshi*）的辖制。阿克巴调整了这个职位的职责，以便军务大臣不再是莫卧儿军队的总司令。取而代之的是，他亲自指导整体战略，为特定战役任命野战司令。首席巴克什负责招募、爵位评议和为所有已被任命的曼萨卜达尔准确分配俸禄和津贴（以现金或分配收入的形式）等工作。

在大殿之上，帝国巴克什站在皇帝的右侧。他呈递所有关于高等曼萨卜达尔任命、提升或褒奖的候选人名单。帝国巴克什负责起草和登录任命和调任诏书，上面盖有皇帝的玉玺印章。巴克什负责监察曼萨卜达尔及其骑兵、战马和武备。他的认证是发放薪饷或分配扎吉尔的必要条件。未能通过审查对任何曼萨卜达尔都意味着失去薪俸和津贴。 64

每个埃米尔都统领着一群亲属、雇佣军甚至奴隶。高等曼萨卜达尔的私僚尽管不是帝国精英的成员，却常常担任报酬优厚的军政要职。依附于某一贵族的一些人，特别是贵族的近亲，也拥有爵位和头衔，正像曼萨卜达尔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这些荣誉头衔一样。他们又依次控制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小群官员和军士。一般说来，他的全部扈从始终跟随着贵族，不管他在何地任职。除去家眷和仆役，他们形成了战场上任何一支部队的一个单位。

曼萨卜达尔统领的所有骑兵和火枪手都受皇帝的节制。所有这些兵士都要符合严格的帝国标准。每位军官都要按规定确保他的骑兵配有适当的武器和锁子甲。战马须是标准的中亚或波斯种的骏马，而不是次大陆大多数地区产的那种小驽马。领军掌管的规定数量的骑兵集合时须携带一匹备用战马，以便换乘。检验合格的战马要在马的侧腹上烙上帝国的标记（*dagh*）。

每个曼萨卜达尔都可以自由地从他自己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中招募兵员。后来的规矩倾向于用法律把这一点固定下来，规定将官们从他们的族群之外招募的兵员数量不能高于一定比例（例如，拉杰普特将官主要招募拉杰普特人，印度穆斯林也主要从他们的同类中招募）。除了他们的亲属，所有将官都能在任何一座大城镇中找到可以雇佣的老练精熟的兵士，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是如此。曼萨卜达尔负责同这些人商谈薪酬和条件。付给骑兵的

薪酬通常以现金规定和支付。帝国政府计算出的付给每位骑兵的平均工资是每月20银卢比。[①] 不过，骑兵接受的实际薪金是随其与雇主达成的买卖契约而变化的。

65　扎特和苏瓦尔的双元爵位体系正式显示了曼萨卜达尔军团的统一性、纪律性和内聚性。在当时的编年史中，贵族和高等曼萨卜达尔无一例外，都是根据他们的头衔和他们的双元品级来确定身份的。有爵位的贵族成为帝国意志的可靠工具。除了最低一级的官员，皇帝要亲自审查爵位、头衔和官职方面的一切变动。爵位方面的变化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没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唯一的标准就是皇帝的好恶。只要有可能，高官显贵就会亲自前往皇宫或皇苑的公共觐见厅，向皇帝表达忠顺之情。小曼萨卜达尔通过米尔—巴克什接受以皇帝名义下达的书面命令。只有皇帝才能授予和变更爵位，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据有这个集团的忠诚。

书面规则和程序适用于帝国各地和所有臣民——除非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而予以豁免。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帝国朝廷（无论是都城，还是移动营帐）的日常生活风纪，正像那位仔细的观察者安托尼奥·孟瑟拉特（Antonio Monserrate）注意到的：[②]

> 为了防止大贵族由于享有难以撼动的权力而变得傲慢无礼，这位国王召唤〔他们〕到御前……对他们颐指气使，好像他们是他的奴隶；不仅如此，遵守这些命令是有损于他们的高贵地位和尊严的。

每天，在公共觐见厅上，这班帝国官员都要按品级排成行，站在正襟危坐的皇帝前面，行僵硬的臣服礼。称呼的形式、头衔和精心厘定的宫廷用语，甚至在不怎么正式的场合下，也一成不变地规范着贵族的举止。居住在宫中的贵族共同担负日夜守卫皇帝及其家眷的责任。每周都有一个贵族亲率他自己的部属在皇宫或营帐周围巡行警戒。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所有曼萨卜达尔都为他们的爵位、他们的扎吉尔以及皇帝对他们的恩宠而忧心。

66　所有官员都要在帝国各地轮流任职。阿克巴的贵族和曼萨卜达尔逐渐习惯于时常在相距遥远的行省间辗转任职，期间只有少量时间在都城或帝国

---

①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p. 216.

② Monserrate, *Commentary*.

营地居住。这位帖木儿君主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使他的帝国精英与地方或地区权力分离。这一点通过从国外征召显贵进入莫卧儿政权服务，是很容易做到的。波斯、阿拉伯、突厥或中亚贵族不可避免地被切断了同他们的本土社会的联系。他们同他们的同胞结为一体，但却与故土没有直接联系。拉杰普特人、印度穆斯林甚至连阿富汗人（人数虽少，但在不断增加）在内，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人同作为柴明达尔而控制着各省地方领地的亲属之间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一项强调在他们故土之外积极任职的政策是绝对必要的。

俸地制

莫卧儿扎吉尔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中世纪的伊斯兰伊克塔（iqta），即采邑。随着需要的出现，征服（印度）的突厥人统治者把大小不同的地域——有的像一个行省那么大——分封给他们的贵族和将军治理。这些伊克塔达尔（*iqtadars*）负责在他们的领地内维持治安和征收赋税。在满足必要的开支后，所有剩余款项都要移交给中央财库。理论上，这些伊克塔达尔拥有采邑取决于统治者的喜好；实践上，王朝更替和政治动乱使得伊克塔能留在他们的占有者手中长达数代之久。在洛迪王朝时期，在较小程度上，在苏尔王朝统治期间，阿富汗裔贵族拥有的采邑就让他们获得了地方宅邸、地方财富和地方认同。

阿克巴的革新扭转了这种趋势。和伊克塔不同，莫卧儿王朝的扎吉尔把政治和行政责任从收税权利中分离出来。一个接受土地作为俸给的曼萨卜达尔只获得了在那块封地上收取法定税赋的权利。一个扎吉尔可能包括一个村庄某些地段的土地，一个或多个指定村庄的全部土地，也可能包括多至一个或数个乡的土地。负责薪俸的大臣（*diwan-i tan*）把评定的税收同曼萨卜达尔确定的薪俸和津贴匹配起来，以多种文本发布正式的扎吉尔文档。

67

只有曼萨卜达尔才能持有扎吉尔。所有的其他帝国官吏都是用现金发放薪俸的。收到书面分封诏令后，曼萨卜达尔每年就可以按季度收取其封地上的赋税。除了最低一级的曼萨卜达尔，大多数曼萨卜达尔都派私人代理代表他们执行这项任务。

扎吉尔拥有者只享有财政权利，而没有土地所有权、占有权或居住权。这并不是一种采邑。它只是一种用来实现一个有限目标的财政工具。只是在拉贾斯坦，拉杰普特裔曼萨卜达尔才被准予在他们的家乡享有比较广泛的居住权利和地方权力。凭借特许，他们把世代相传的土地（*watan*）作为分配给他们的扎吉尔的一部分来接受。

在理论上，一个扎吉尔的位置同拥有者的官职或服役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在实践上，成熟的体系通常倾向于要么在任职的行省内，要么在其附近分封扎吉尔。扎吉尔达尔（*Jagirdars*）经常拥有不止一处扎吉尔。这些扎吉尔不一定是毗连在一起的。例如，一个拥有高等爵位的埃米尔可能被授予多达24处的扎吉尔，而这些扎吉尔又分散在数省。

通过经常调任，财政部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官员和他们的封地之间的联系。帝国精英的死亡、调任、擢升和降职使持续转让扎吉尔成为必然。封地可以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位现任官员转让给另一位现任官员。不过，高等的扎吉尔达尔通常获得和保有全部乡的时间长达10年甚至更长，而后才被转手。

财政部对征税的方法和数量施加严格限制。行省迪万的属员从地方情报兼书记员那里获得信息，后者几乎每天都向省会发送报告。他们还依靠来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臣民的控诉和请愿来确认苛征暴敛。尽管明显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个体系还是阻止了最恶劣的弊端，在调控体系所及的地区维持了一个普遍一致的收税标准。

这个成熟的税收和薪俸支付体系是一个灵活而高效的体系。由此，帝国行政中的一些最庞杂的任务交给了曼萨卜达尔，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变成能干的管理者。这个体系还依赖私人代理商，因为需要地方借贷者和货币兑换商（*sarrafs*）的协助，他们经常在曼萨卜达尔等待他们扎吉尔上的税收时向其预付钱款。地方银行家还协助扎吉尔达尔的经纪人通过私人汇票而非运送现金的方式汇寄税款。这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依赖于对一个本质上松散的财政结构实行积极的集中控制。

68

中央军

首席巴克什一般总是亲自陪侍在皇帝左右。他负责维护皇帝本人、皇室和皇城的安全。在阿克巴的统治下，皇家禁卫军包括了12 000多名火枪手和另外数千名佩剑侍卫和弓箭手。四五千名御林军（*ahadis*）作为护家骑兵效命皇帝。巴克什负责运转那个让贵族按周轮流亲率其部队在皇宫或皇帝营帐昼夜守卫的体系。

巴克什和他的属员组织起归皇帝直接调遣的庞大部队。其中包括在中央炮队中服役的炮手，开路先锋和工兵联队，火绳枪步兵，弓箭手连队，战象训练师以及各类杂役和门卫。作为永久卫戍部队分散在帝国各地镇守战略要塞的炮兵和步兵也在巴克什的职责范围内。所有中央部队都直接从国库中领取现金薪俸。军务大臣根据预估费用，向被皇帝指定为战地指挥官的贵族预付资金。需要时，巴克什协同帝国财政大臣负责安排向参战部队运输钱款的工作。

省级的巴克什通常是高级官员，但不是贵族。他们负责监察和验证驻在该省的曼萨卜达尔及其分遣队是否忠于职守。出现在清单中的纰漏会被处以罚俸，或在扎吉尔的场合，由省迪万从渎职的司令官的金库中课征罚金。

首席巴克什监督着一帮公共采访使，后者几乎每天都从帝国各大城镇向省巴克什发送报告。密探秘密向省巴克什汇报，后者再把他们的发现呈报中央。讯报和重要的官方文件经由帝国驿站迅速传递。分驻在位于大道旁边的中继站里的徒步驿卒，携带着装在竹筒中的文书，健步如飞，昼夜兼程。哪怕是来自遥远省城的汇报，皇帝也只需数日即可收到。最重要的讯报每日都要在公共觐见厅上诵读。驻在都城之外的贵族或拉杰普特王公和纳贡酋长们的代理官，都要不辞辛劳地记录下这些朝报，然后遣信使将制成的文书转给他们的主人。这个帝国就是由一条能够异常迅速地传递公共情资的信息环路联结在一起的。

69

帝国的财政管理

帝国的迅速扩张意味着每年都会有日益增多的来自掠夺、进贡和赋税的收入流入帝国财库。帝国财政大臣，即瓦兹尔或库尔迪万（*diwan-i kul*），负责管理所有财政收入、财政体系、铸币厂和货币，以及直接或间接管理所有支出。阿克巴的第一任瓦兹尔是穆扎法尔·汗（Muzaffar Khan）。他在成为帝国迪万后一直任皇家总财务官。在穆扎法尔·汗8年任期临近过半时，阿克巴宫廷中出现了一个由极其睿智的财政官员组成的小组。科瓦加·沙·曼苏尔（Khwaja Shah Mansur）、米尔·法图拉·什拉兹（Mir Fathullah Shirazi）和一位极其能干的印度教徒拉贾·托达·马尔（Raja Todar Mal），成为莫卧儿财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每个人都曾一度或数度担任帝国财政大臣，不过，更重要的是与其他人密切协作，找到所遇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法。

当米尔·法图拉·什拉兹去世时，阿布尔·法兹尔记录了这位皇帝对他的这位臣子的哀悼：①

> 〔阿克巴〕对这位先贤的辞世痛心不已。他经常说这位米尔是他的瓦吉尔、哲学家、医师和天文学家，没有人能理解他对他的悲伤之情。“如果他落入法兰克人之手，他们要求用我所有的财宝来交换他，我将欣然同意这样一项划算的交易，廉价购得那枚宝石。”

70 这些话表达的不只是惯用的颂词。这位皇帝的悼词还显示了他和他的贴身顾问的股肱之情，也显示了阿克巴和他的当朝重臣之间的密切和挚情。我们只能模糊地感觉到这些新帝国的建筑师之间的和睦融洽。这些纷繁复杂的组织工作大多是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时期（1571—1584年）进行的。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阿克巴继承的印度—穆斯林的财政体系变成了一个得力而灵活的工具。中央部门承受的不断增大的工作量促使衙署内部实行劳动分工。财政大臣本人负责直接管理中央、各省和地方财库的运转和人员配

---

① Abul Fazl, *The Akbar-Nama*,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Calcutta, 1907–39) Ⅲ, p. 848.

备（在他作为中央财库和币厂总管一职上，皇家总管即*mir saman*向迪万汇报工作）。有三位主官担当他的直接助手。皇室财务官（*diwan-i khalisa*）负责管理所有土地和纳税实体，它们上交的赋税要直接保存在中央财库。薪俸大臣负责草拟薪俸表或分配扎吉尔。最后，审计长主管着一批审计官，他们负责不断地监视和审核财务记录。

阿克巴的财政大臣们竭尽全力发展一种运转顺畅的金字塔形财政体系。较大乡中首要市镇的财库构成了这个体系的基础。在下一层级上，财库位于每个省会，直至最后，中央财库位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在每一层级上，都有领薪官员——财务官、会计、出纳和办事员——主持工作。这些财库不只是用于保管钱币或其他贵重物品的保险金库。它们还是存入、记录、转移和支出资金的关键节点。阿克巴备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他的财库链上迅速抽取资金，支持他的野战部队。不止一次，帑金的迅速补给使他的军队士气高涨，胜券在握。莫卧儿的财富周转灵便，是这位皇帝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帝国战地指挥官不会受到贿赂和收买的诱惑。

这个莫卧儿体系为帝国官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财务官每15天要书面报告其结余一次，签发存款收据，索取领款凭证。除了皇帝，这个政权对所有人都严格划分了个人资金和国家资金。领取帝国资金只能凭借书面授权——甚至连亲王们也是如此。曼萨卜达尔可以从财库预借资金，但他们必须结清他们的欠款，有时还得根据一套复杂的规则支付利息。他们的账户在他们去世时要受到严格审计，欠财库的钱要偿还。

71

财政是由一组技术精通的官员和办事员管理的。到16世纪，印度教服务种姓——卡特利（Khatris）、卡亚斯特（Kayasths）、婆罗门和其他种姓——已学会了波斯文，在政府管理中变得不可或缺。这些种姓和家族网开始垄断穆斯林萨德尔以外所有其他部门中报酬优厚的低级职位。他们提供年轻的新人充任学徒，这些人已经通过家庭训练学习了官方波斯语、会计、记录方法以及难写的隶书字体。一般说来，这些印度教徒办事员和文秘是高效、可靠和忠诚的。[①]

---

① 对于这类服务家庭的一个杰出成员比姆森（Bhimsen）的描述，参看：John F. Richards, "Norms of Comportment among Imperial Officials" in Barbara Daly Metcalf ed., *Moral Conduct and Authority*（Berkeley, California: UC Berkeley Press, 1984）, pp. 267–281.

这些渴望保持其有利环境的家庭集团是新生的财政部行政传统得以世代相传和发扬光大的首要工具。随着帝国的开疆拓土，这些集团的成员成为在被征服的王国建立规范的财政管理的核心力量。

帝国铸币

1556年，巴伊拉姆·汗以其尚在冲龄的帖木儿幼主的名义，按照失败的苏尔王朝喜爱的印度银币和铜币样式铸造了新的莫卧儿硬币。巴伊拉姆·汗采用了苏尔朝的货币政策，没有使用具有中亚传统的帖木儿风格的铸币。到16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新生的政权有三种金属货币在各地正式流通：银币、铜币和金币。

阿克巴的第一批银卢比，与仍在流通的数千枚苏尔卢比相似，是从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的中央铸币厂发行的。新帖木儿卢比在背面印有“扎拉尔-乌德-丁·穆罕默德·阿克巴主上，加兹尼”（“Jalal-ud-din Muhammad Akbar Badshah, Ghazi”）的头衔。正面显示的是伊斯兰信条“除了安拉，别无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周围是先知的四位同伴的名字。铭文仅用阿拉伯文书写，而没有采用苏尔王朝既用梵文又用阿拉伯文的双元模式。[①]在他的铸币的公开展览中，年轻的阿克巴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保守的穆斯林的形象。

72

阿克巴的铸币师决定继续采用苏尔王朝的21克重铜币“派萨”（*paisa*）——现在称为“达姆”（*dams*）——作为普通交易的基本货币。这些铸币仅铸有波斯文的发行日期和币厂名称，是在帝国都城、与拉贾斯坦铜币厂毗邻的铸币厂或几个充当陆上尼泊尔铜贸易中心的市镇铸造的。[②]1562年亲政后不久，阿克巴就恢复了一种金币的发行。这种金币称为“姆尔”（*muhr*），重10.9克，以旧德里苏丹国的标准为基础。这是自15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斯坦地区首次发行金币。[③]

---

① John S. Deyell, “The Development of Akbar's Currency System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 of the Conquered Kingdoms” in John F. Richards, ed., *Th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of Mugh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9.

② Ibid., p.22.

③ Ibid., p. 23.

到16世纪70年代晚期，与他的税收改革一起，阿克巴实行了货币改革。1577—1578年，这位皇帝任命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铸币厂长为执行官，掌管帝国境内的所有铸币厂。闻名于世的书法家科瓦加·阿布德–乌斯·萨马德（Khwaja Abud - us Samad）承担起这些新的责任。[①] 金币和银币的发行仅限于法塔赫布尔铸币厂和旁遮普、北方邦东部、比哈尔、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铸币厂。高级财务官被派往这些铸币厂担任厂长。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皇帝和他的铸币师曾根据西印度的当地传统轻率地设计了一种风格怪异的方形铸币。1580—1581年，铸造金币和银币的铸币厂数量进一步减少到两家：古吉拉特艾哈迈达巴德的铸币厂和乌尔都（the Urdu），即帝国营地（皇帝驻跸地）铸币厂。铜币继续在几处毗邻铜矿产地的造币镇上铸造，不曾中断。这些措施的意图是要巩固帝国对铸币过程的控制。

1584年，阿克巴下令发行一种新铸币，反映了他统治期间悄悄发生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变革。这些新铸币上只印有一条铭文："真主是伟大的，他荣光万丈"（*Allahu akbar jalla jalaluhu*），其中隐含着这位皇帝的名字和尊号。铸币上印的日期是由新纪元的太阳历伊拉赫（Ilahi）年份和旧的波斯文月份组成的。新币上的书法、铸模和压花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铸币边缘印有装饰性的花纹。特别发行的铸币上则印有野生动植物的画像。[②] 简言之，这些铸币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风格了。然而，新的伊拉赫铸币依旧是保守的，恢复了传统的圆形和重量。

73

纵观这些变化，阿克巴的铸币工们始终小心地维持着所有这三种金属铸币的高质量。金币几乎是纯金，银币的纯度从未跌到96%以下，而铜币的纯度一直很高。这是一个自由或开放的铸币体系。任何一个愿意支付规定的铸币费用的人都可以携带金属抑或旧的或国外铸币到铸币厂，加以铸造。铸币厂分布广泛。1595年，有4个铸币厂生产金币，14个生产卢比，42个生产铜币。

数百万铸币就是通过这个系统铸造出来的。铸币费用决定着铸币价值超过金属块的贴水——贴水率从高至铜块的10.77%到低至银块的5.63%不

① Ibid., p. 30.

② Ibid., pp. 36–37.

等。[①] 新铸卢比（*sikka*）流通，比旧式卢比高出5%的贴水率。莫卧儿财库乐于接受老式的苏尔或其他硬币支付赋税，但折扣率低得足以把其价值压到金属块价值以下。结果，为数众多的阿富汗硬币涌入阿克巴的铸币厂，失去货币资格，加以熔炼，然后作为新的帖木儿铸币重新发行。

在阿克巴统治期间，重铜币达姆是普通交易的硬币和三种金属货币体系中受人青睐的货币。铜币的发行量很大。这个政权用铜币达姆来规定它的田赋征收额。柴明达尔权利的购买者是用铜币付款的。城市市场上普通商品的价格和劳工、士兵和工匠的工资都是用铜币表示的。[②]

统一币制的扩展伴随着帝国的征服。一些新被征服的王国并未立即追随新标准。在一个过渡时期里，一些例外是允许存在的。不过，帝国的财务官们坚持建立一个集中而统一的货币体系。对任何一种特定类型的铸币来说，其图案、重量标准和质地从帝国一端到另一端应是相同的。而且，帝国硬币能从帝国一端向另一端快速流动。从钱窖中发现的铜币在其铸造的当年，就从帝国的心脏地带流通到边疆。用约翰·德耶尔（John Deyell）恰如其分的话来说就是，“莫卧儿的通货具有流动性”。[③]

74

在其统治的整个时期，阿克巴从数十个印度王朝的财库中攫取了旧式银币和金币。由此，莫卧儿的铸币厂长们得到了扩大通常样式的银币和金币所必需的充足供应。他们还把大量的铸币和铸块添加到阿克巴迅速膨胀的货币储备（即上文描述的他的中央财库）中。

矛盾的是，尽管印度并不缺少金银贮藏，但它却仅能从东北地区的丰富矿藏中生产数量微不足道的黄金。16世纪早期发现的梅瓦尔银矿迅速开采殆尽。尽管存在着这方面的缺憾，和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不同，阿克巴不必担心贸易赤字或贵金属荒。恰恰相反，因为印度经济的强大引来了一股稳定的用于偿付印度工业和农业产品出口的贵金属流。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世界上，无论金银的产地在哪里，印度都是这些金属的终极沉淀地。一

① Marie Martin, “The Reform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kbar's Administration: Metrological and Monetary Considerations” in J. F. Richards, ed., *Th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of Mughal India*（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1.

② Irfan Habib: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in Michael Brand and Glenn D. Lowry, eds., *Fatehpur Sikri*（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87）, pp. 144–147.

③ Deyell, “Akbar's Currency System”, p. 45.

旦铸成后，莫卧儿的银币和金币不会流通到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不是因为质地低劣，而是因为外国商人需要印度铸币来支付（印度的）出口产品。

到16世纪后半叶，从新世界进口的白银数量的猛增为帖木儿铸币厂提供了新的供应来源。铜币与银币的比价从阿克巴统治早期的48达姆兑1卢比增长到16世纪80年代晚期的35达姆兑1卢比。① 由于铜在制造青铜炮和黄铜器皿上的新型工业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它的价值，铜币与银币的比价在整个17世纪早期继续高涨。在后来几位皇帝的统治时期，银卢比在少量新安那（*anna*）硬币（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卢比）的支持下，取代达姆铜币成为帝国大部分地区共同的流通媒介。

帝国的预算

75

阿克巴的顾问们不必克服预算赤字。在阿克巴执政的半个世纪里，莫卧儿王朝的帝国储备——包括货币、贵金属以及镶嵌和未被镶嵌的宝石——持续膨胀。1605年，帝国财库贮藏的金币、银币、铜币和未铸币的金属锭价值在1.39亿—1.66亿银卢比之间。② 财库中的大量镶嵌和未被镶嵌的宝石及其他贵重物品，可能具有同等的价值。

持续的领土扩张和良好的治理确保了财政收入超过支出。来自胜利的掠夺使帝国储备大为膨胀。1556年，在巴尼伯德，当败将赫姆的妻子试图逃离战场时，莫卧儿人俘获了数十头满载黄金的大象。这不过是诸多此类足以偿付征服费用后还有盈余的夺宝行动中的第一例而已。此后，按照相当严格的帝国评定税额征收的赋税给帝国财库带来了新的收入流。希林·穆斯卫最近对1595—1596年阿克巴财政收入的估计是，每年总额略少于40亿铜币（达姆）或等值的9 900万银币卢比。③

这张重新编订过的财政表的某些特征是一目了然的。首先，阿克巴统治晚期有着400万—500万卢比的年度盈余。其次，直接由皇帝造成的花费相对

① Habib,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p. 141.

②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pp. 198–200.

③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p. 195.这是《阿克巴政典》中显示的总财政收入数量，向下做了修正，以反映（剔除）免税赠地和其税收虽已计入、但在这个时期尚未完全臣服的地区（的财政收入）。这里也扣除了征税费用，以得到实际净财政收入。

不大。皇室连同其用于显摆和数千奴仆的年度花费少于总预算的5%。中央军事设施（包括畜厩和大炮）以及火枪手和皇家骑兵（*ahadis*）联队的耗费不足总预算的10%。最后，最大一个支出项目是分配给所有曼萨卜达尔的8 100万卢比。其中，超过帝国支出半数的5 100万卢比供养着曼萨卜达尔的骑兵和火枪手分遣队。换言之，这个预算中的绝大部分用于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76

表1[①] 1595—1596年度帝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收　入	百万达姆	百万卢比
实际财政收入：1595—1596年	3960.3	99.01
支出：曼萨卜达尔的俸饷单		
扎特俸禄	827.5	20.69
牲畜津贴	371.4	9.29
苏瓦尔兵饷	2038.9	50.97
小　计	3237.8	80.95
中央军备		
骑兵和步兵	142.9	3.57
牲畜/畜厩	194.0	4.85
军械和盔甲	22.1	0.55
小　计	359.0	8.97
皇室（包括后宫和建筑费用）		
小　计	187.4	4.69
总支出	3784.2	94.6
余　额	176.1	4.41
总　计	3960.3	99.01

①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Table Ⅱ.5, p. 270.

帝国的王室领地

帝国财政大臣直接管理下的王室领地（*khalisa*）所产生的资金直接流入中央财库。来自王室领地和暂时未分配的扎吉尔土地（称为“*paibaqi*”）的收入是中央的主要依靠。皇帝用这些收入来支付他的核心家庭、兵士和外交使团的费用，也用来支付低级曼萨卜达尔的货币薪俸。掠夺、礼金和对去世贵族地产的没收，构成了中央财库巨大但不规则的其他收入来源。近来对阿克巴统治后期情况的估计认为，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占总税收的比重在24%—33%之间。[①] 剩下的全部财政收入直接转给了俸地占有者。 77

王室领地大臣（diwan - i khalisa）主管着一个复杂的财政机构。首都周围的土地不划入王室领地。相反，莫卧儿王室领地是一种财政机制，一个隐蔽的收入来源。它留置了分散在帝国各地的一些特定村庄或乡的税收。王室领地通常设置在肥沃而安全的地区，几乎在帝国的所有行省里都可以看到。直接受命于王室领地大臣的领薪财务官负责征收王室赋税。划归国王财库账目的税收比例随中央财库的预估需求而定。事实上，皇帝占据了一些扎吉尔俸地。这些俸地与授予大贵族的扎吉尔相当，但略大些。皇帝派自己的代表前去征税，就像扎吉尔达尔在他们的扎吉尔上所做的那样。

至1605年，阿克巴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创建了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长达半个世纪的开疆拓土给中央带来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地区统治者或省督可以得到的财富。皇帝通常能够在他的帝国全境调集成千上万的部队，筹集数百万银卢比，征集大量物资。皇帝或其亲信的命令从中央发出，书面和口头报告定期发往帝国都城。作为中心人物的阿克巴每天都在积极听取报告、发号施令。相对快捷的官方通讯对中央集权的政权极其重要。

尽管显然是以阿克巴为中心，但对一位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个帝国的结构和程序还是复杂和令人困惑的。从一个角度看，莫卧儿帝国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官僚体系，实行完全地中央集权，由技术精熟的官僚管理。这些官僚在有章可循的事务中使用了大量纸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帝国似

①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p. 197.

乎是一系列巨大的父系家族，在其顶端加以控制的是皇帝的庞大机构。阿克巴利用大量财政收入来增加他的财富和维持他的铺张奢靡。不过，同样清楚的是，帝国的大埃米尔们吸收了官方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些钱受中78 央的控制，但并不直接划归中央。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阿克巴创立的这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体系更倚重于个人的组织才能、开拓精神和完成统治一个多地域帝国的繁重任务所需的精力。在其结构和运作上，帖木儿帝国既是中央集权的，也是权力分散的，既是官僚化的，也是家族制的。

第四章　田赋和农村社会

79

尽管穆斯林在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统治已经历数个世纪，阿克巴的官员们还是发现巩固国家权力的工作仍未完成。在16世纪的后半叶，制服和平定农村社会既需要武力，也需要外交。即使在直接统治的地区，在市镇的最肥沃的腹地（据说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是受某种税收体系制约的臣民），莫卧儿王朝面对的仍只是部分臣服的地方政体。比较遥远的地域仅有纳贡区。不久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武装的武士拓荒者已在那里定居和拓殖。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控制扩展到这些地区将是史无前例的。

在一个又一个的乡，武装的、可能相互敌视的武士世族——拉杰普特人、查特人和其他地方种姓精英——统治着从事稼穑的农民阶级。这些地方的贵族世系和他们的家族首领即酋长，通过征服、迁徙和殖民支配着各个乡或乡中的某些部分。北方的乡是微型王国，涵盖了少至20个、多至200个相连的村庄。这些（乡）才是印度农村社会中政治控制的初级单元，而非个别的村庄。①

地方精英在组织、资助和领导农民耕作者清理丛林和拓居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扩张经常需要同土著“部落”或非印度教徒集团进行武斗，后者在耕作集约度和居住密集度上都远不如新来者。这种好勇斗狠驱动着农业的扩展，也驱使着这些世族首领投入血腥而变幻莫测的地方战争旋

① 参看：Richard Fox, “Rajput ‘Clans’ and Urban Centers in Northern India,” in Richard G. Fox, ed., *Urban India: Society, Space and Image,* and Richard G. Fox, *Kin, Clan, Raja and Rul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涡。对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引导（农业）扩展的势头以产生更多税赋，而同时又能遏制乡村中发生两败俱伤的纷争。

大多数乡的边界形成了每个拉杰普特、查特、印度穆斯林甚或阿富汗人 80 世族势力范围的界限。位于（乡）中心的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或较小的市镇，家族首领就居住在那里。通常，这是该世族的祖先们在此地区拓殖时最初居住的地方。酋长居住的市镇环以荆棘、竹篱笆、壕沟以及土墙或石墙，以求安全。在这些屏障里面，酋长或家族首领建有他们的居所，设有土豪风格的小朝廷，还维持着军械库、金库和宗祠。市镇本身还是乡的中心市场。其他更小的市镇是小王公或族长的从属酋长和依附亲属的小总部。

这些酋长——莫卧儿人称呼他们为“柴明达尔”（*zamindars*）那样——维持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一个小王公可能直接控制着一个由数百名武装亲属、奴隶和自由的雇佣扈从组成的混合体。在遇到保卫本乡或家族利益的紧急事件时，他还可以召集他的族人下属加入他的队伍。柴明达尔连队几乎全是步兵，因为大多数地方豪族养不起多少战马和战象。他们也缺少炮兵。火枪兵可以找到，但莫卧儿王朝不遗余力地阻止地方贵族铸造枪支和获得大炮。

柴明达尔宣称拥有征收一定比例的收获物的世袭权利。他们利用佃农或雇来的劳工耕种个人占有的土地。一般说来，这类土地是免交普通的国家赋税的。另外，这些酋长还向本乡中的农民、工匠和商人征收一系列的税捐。每年，大量的市场税、人头税和对生产者征收的封建税（如每年从铁匠那里征收一件工具或武器）流入了他们的钱柜和仓库。有些支付使用的是硬币，有些是实物。在传统的限度内，还可以从本乡的低级种姓那里榨取强迫劳动。

拉杰普特、查特、古扎尔（Gujar）族长及其亲属或阿富汗人及别的印度穆斯林世族保有权力，部分凭借人多势众，部分凭借好勇斗狠，部分则凭借积习产生的惰性。在大多数村庄中，最有势力和财富的农民同市镇总部中的族长属于同一种姓，拥有共同的世系纽带。这些村内精英耕种着村庄内最 81 大和最肥沃的地块。在一个复杂的世代相袭的服役和交换关系网络中，属于不可接触种姓的无地劳工、工匠、商人和祭司为支配种姓服务。

从莫卧儿人的观点看，1560年北印度的农村是一幅由大小不同、同中央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从属和控制关系的小公国构成的图景。一些邻近城市的

乡居住着缺少强大家族组织的农民，因而可以以村庄为基础进行管理。北印度的大多数农村社会处在柴明达尔的严密控制下。到16世纪，农村已平定到没有哪个柴明达尔或乡村酋长联盟能够抗衡伊斯兰国家整体力量的地步。前印度穆斯林政权已开始把这些微型王国的边界固定下来，限制它们之间两败俱伤的纷争。印度穆斯林统治者已开始通过发布用波斯语和本地语书写的官方文件来决定嗣位之争，支持受到青睐的继承人。只是在政治混乱的间隙期，地方世族精英或小王公才能自由地进行互相残杀的战争和征服。这就是1530—1560年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冲突期间的情况。

地方贵族确实很少从事更大的政治冒险事业。大体说来，这些人世代臣服于印度穆斯林的国家权力，保持了狭隘的政治视野。像舍尔·汗·苏尔那样的人是例外。大多数地方酋长，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不曾想到或希望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

尽管如此，16世纪60年代莫卧儿人和他们的新臣民之间的关系更像纳贡而非纳税。从前的国家已经认可了每个乡的族长或王公，并谋求他们的效忠。作为向中央税务官定期缴纳货币赋税的回报，这些地方官员——在北方称为“乔杜里”（*chaudhuris*），在德干称为“德什穆克”（*deshmukhs*）——在乡里保持了许多传统的权力。乡首从每年向他们的乡征收的全部赋税中抽取一定的份额，通常是5%。他们还控制着一些豁免了任何税负的土地。作为地方酋长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萨纳德”（sanads）[①]、以书面形式订立的终生契约摆明了这种关系的内容。每位赠地的接受者都要签署一份书面誓约（*muchalka*），作为忠于职守的保证，同时还要为这项任命分期支付一笔相当于6年半税收折扣的费用（pishkash）。一个乔杜里去世后，他的嗣子通常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一张新的任命书。然 82 而，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罢免某个乡首，代之以一个更中意的候选人——通常是来自该乡支配世族和种姓的另一个族人。

印度伊斯兰国家依靠一名地方财务官来充当乔杜里的搭档。“加农戈”（*qanungo*）[②]是一名登记员或会计，其任务是登记村庄、耕地和每年缴纳

① “萨纳德”（sanad），原指伊斯兰教圣训学中用来支持某条圣训合法性的引文或证据。在这里，其引申义应为“凭证”。——译者注

② 这个名称用来指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些乡里世袭的土地登记员，本意为“释法者”。——译者注

的赋税。他的任职条件和乡首相似，只是他的税收折扣通常是3%，而不是5%，而且他的免税土地要小于乔杜里的免税土地。加农戈一般是从印度教徒高等种姓中招募，经常是婆罗门，特别是在德干地区，不过也包括卡特利种姓（北印度的商人种姓）和卡亚斯特种姓（服务于印度伊斯兰国家的最著名的印度教徒文书种姓）。当印度穆斯林担当乡首时，他们也承担起这种角色。有时候，加农戈或乔杜里由两个或更多的人共同担当。

这两个职位一起构成了国家和乡之间的连接装置。通过这些混合的职位，统治者从北印度的农村社会征收赋税、获取信息以及动员支持者。然而，在16世纪中期，国家对这些微小政体的掌控是有限的。大致说来，这些依旧是纳贡关系，而不是评估和征收赋税。除了容易通达的乡，国家并不尝试详细登录土地，以便估量农业产量。相反，年度纳税额是由一种讨价还价过程决定的，纳税额只是粗略地反映了某个乡的财富状况。每个（支配）世族的谈判技巧、好斗性、位置和天然的防御条件决定了年度纳税额。

在16世纪中期以前，国家并没有深入到普通乡之下（的农村社会）。强大的穆斯林苏丹成功地冻结了乡的边界，遏制了印度教柴明达尔的政治抱负，减少了世族间的纷争和挑衅。不过，在许多地方上，他们同个别的村长和村庄精英鲜有联系。

打破农村社会对外封闭的屏障是1560年以后莫卧儿政府的重大任务。83 帝国行政官们鞠躬尽瘁，力图渗入这些包裹严密的结构。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和尽可能多的赋税收入（而非通过谈判商定的贡赋），帝国必须同武装的农村贵族达成妥协。柴明达尔逐渐演变为乡村中的准官方的服役阶级——否则，他们就遭到毁灭。

新税收体制

舍尔·沙·苏尔已经展示了使国家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资财的基本方法。在洛迪王朝治下，阿富汗人统治者利用了他们作为乡税务官的个人经验，也利用了历代印度穆斯林收税官对付北印度严密的农村社会结构时积累起来的知识。在他短命的一揽子税务改革中，我们发现：向农民征收现金赋税而非产品地租；对农地进行地籍清查；调查种植作物；通过估产评定田

赋；根据通行的市场条件，把这些估计的实物税转化为等值货币。所有数据都要精心、系统地收集，定期审核。

舍尔·沙认识到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在鼓励生产方面承担更大责任。[①] 那些从森林或丛林地带开垦土地用于生产的耕作者，应在耕作新土地的最初数年内获得减免赋税的优待。类似的鼓励措施还应施于那些凿井和扩大耕地面积的人。收税应做到系统而严格。要采取措施确保官员们恪尽职守，处理资金时不营私舞弊。一套可信赖的、标准化的、高质量的铸币体系也是必需的。这些措施（的实施）得到了一支调度有方、轻便灵活的武装力量的支持。所有这些反过来有赖于统治者在农村地区大力加强行政管理的意愿和能力。

然而，事实上，苏尔王朝的税收措施失之于过分整齐划一。当阿富汗裔官员试图为整个苏尔王国规定近乎统一的农业税率时，他们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在北印度的一个广大地区内，简单地按照同一标准把实物税换算为现金，不仅是行不通的，还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即便在均质的北印度平原上，各地方的富饶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　84

托达·马尔，阿克巴时期享有盛誉的印度教徒财政大臣，理解和指出了这个问题。当他在16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修订莫卧儿的农业体制时，托达·马尔首先尽力从乡会计（加农戈）那里取得比较完整的田亩和产量统计数据。他手下的官吏开始汇编最低和最高市场价格目录。与此同时，阿克巴实行了种种不同的传统度量衡制标准化。设定为31.92英寸长的帝国码〔“加兹（*gaz*）”〕有助于确立统一的土地面积单位。传统的“比加”（*bigah*）被固定为60平方加兹，约相当于3/5英亩。用来测量产量的重量单位“曼恩”（*man*）被标准化为51.63英镑。

尽管制定了这些度量单位，问题依旧存在。当帝国官员或曼萨卜达尔力图征收在柴明达尔看来过高的赋税时，柴明达尔奋起反抗。至关重要的俸地制（扎吉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580年，托达·马尔开始了一项旨在彻底调整莫卧儿农业税收体制的激进试验。皇帝收回了他的北印度臣属们的所有

① 参看：Iqtidar Husain Siddiqi, “The Agrarian System of the Afghans” in *Studies in Islam*, II（January, 1965）, 229–253, and Iqtidar Husain Siddiqi, *Afghan Despotism in India*（Aligarh: Three Men Publication, 1969）, pp. 136–168.

扎吉尔或俸地。所有土地现在都置于国库官员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直接管理这些土地。

托达・马尔进而把相邻的乡组合为具有相似的和共同的气候和土壤肥力的税区。他在每个税区设立了一个税务官〔“卡鲁里（*karuri*）”〕来管理税务。在这个官员的引导下，测量队从一个乡移往另一个乡，从一个村庄移往另一个村庄。他们使用带铁接头的新式竹竿作为帝国码尺，而不是旧式的麻绳。这种麻绳会随着湿度的变化而伸缩。在5年的时间里，这些测量队测量和登记了税区中几乎所有村庄的田亩和地籍情况。

其他官吏跟随着测量队收集每个耕作者和村庄过去10年有关平均单产和总产的详细数据。他们还收集同一10年期中所有作物——既包括春季收获作物，也包括秋季收获作物——的地方市场价格（数据）。

85 在获得土地面积、单产和价格数据后，掌管该税区的卡鲁里编制了卷帙浩繁、纤悉无遗的数据表。根据这些数据表，他能够算出那个税区中每种作物的标准税率。这意味着财政部能够对该税区的每块田地、每个耕夫和每个村庄的每种作物征收适当份额。这个征收量可以用一个真实反映了地方市场价格的货币额来表示。最后税额的估定依据的是这10年期每块田地和每种作物的平均产量和价格。水稻、小米和小麦一般征收收获量的1/3。其他更值钱的作物的税率较低，例如靛青或糖这类经济作物的税率低至1/5甚或以下。帝国官吏甚至对果树按棵征税，对牛按头征税。

托达・马尔主管的财政部分别为每个村庄、乡、税区、县和省编制了新的准确的赋税评估表。这个新体系考虑到了不同地区间的农业产量差别。新税额的估定是同过去的平均产量和价格紧密相关的。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种现金（交易）关系。国家用铜币（达姆）来表示征税额，希望用铸币完税。农民必须进入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以便支付评定的纳税额。今后，税务官们只凭借书面纳税表来征税。这些纳税表为那个地方的每一比加即每一个耕作单位的作物规定了标准的纳税额。每个农民、每个村庄或每个乡需要交纳的全部赋税可以用收成乘以每年的播种面积来确定。

在实行新的“正规”〔“扎巴特（*zabt*）”〕估税的地区，帝国官吏强行派发纳税表，反过来又从每个村庄的头人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农民那里索取承诺书。村社负责每年分四次及时完成缴纳全部赋税。在首次清查和新体制

建立后，北印度的纳税额同实际收成和市场价格便只具有一种间接联系。在某些地方，帝国官吏实际上每年两次派遣测量队丈量不同作物的播种面积。在别的地方，税务官们在已确定的10年平均值上加上任意一个估计值，来得出每年的播种面积。无论是通过实际测量，还是基于前一年的总数，他们都用每种作物的标准税率乘以播种面积计算出当前的征税额。

86 在扎巴特体系初创后，乡会计每年都从村会计那里和他们自己的记录中收集有关播种面积、单产量和价格的现时数据。这些数据会作为最新记录登录在一张反映过去10年收入状况的登记簿中。这些记录还表明了从每块土地、每个村庄和整个乡征收的实际税额。收税员（*amins*）获得这些数据后同他们自己保存在省财政官（迪万）官署中的记录进行校对。财政部定期利用这些10年平均值系列来修订和更新征税额。只是偶尔在间隔20年、30年或更多年后，一个省系统的土地测量和税额重评才被认为是必要的。

在经历了5年的直接管理和试验后，阿克巴能够再次把北印度的土地交给曼萨卜达尔。扎吉尔体系在更加精确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国家完成了它的目标。（在中央财政部门直接掌控的那些土地上征收的）新税使阿克巴的财库更加充盈。他的贵族们能够利用增多的税收满足他们的花费。国家财政需求像一台大型水泵，通过市场机制把谷物和其他作物从农村吸收到城镇。在一个逐级缩小的市场体系中，这些谷物的出售使得硬币转回到货币借贷者和谷物贸易商手中。这提供了农民下一年耕作所需的借贷资金。显然，这个新体系鼓励了农村对城市的粮食贸易的迅速扩张。在农村地区，谷物贸易商和货币借贷者变得更加活跃和引人瞩目。莫卧儿国家比它之前的王朝大大接近于实现其榨取巨额农村物产的目标。榨取所有谷物产量的1/3和其他作物产量的约1/5，意味着对农村储蓄和利润的苛征暴敛。这些赋税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牺牲柴明达尔从前的索取权和额外收入征收到的。

一个新生的社会阶级

帖木儿王朝对地税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和合理化尽管毋庸置疑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在农村直接课税的成熟体系。新的莫卧儿政府无力执行那些为保持与乡村中的每个生产性农民进行直接而通畅的联系 87

所必需的激进措施。要这样做，莫卧儿军队将不得不解除那些控制着土地的权倾一方的酋长和声名显赫的拉杰普特人、查特人、印度穆斯林、阿富汗人和其他世族的武装。要实现有效控制可能需要放逐、制服或囚禁北印度的许多最果敢的地方社会首领。这些人将不得不用更加驯服的族人或政府输入的新精英来代替。让地区贵族解除武装和屈服，或把他们转变为官吏，是现代早期国家鲜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帖木儿王朝并没有准备好实行更能令人回想起奥斯曼帝国而非典型的印度穆斯林政权的各类举措的政策。

尽管如此，扎巴特体系的施行使得莫卧儿政府有可能发起一项旨在最终改造农村贵族的长期战略。在扎巴特体系下，莫卧儿王朝打破了坚硬的农村包囊，即乡。帝国税务官或曼萨卜达尔的代理们不再只是同乡首或选定数目的村长们打交道。第一次，大多数包括在莫卧儿扎巴特体系中的村庄同国家税务官员发生了直接联系。乡却正在从一个微型的纳贡王国转变为一个为了适应莫卧儿帝国的需要而存在的小型税收和行政单位。

如果有足够的武力做后盾，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的正规体制将逐步把柴明达尔转化为一个依附于国家的、由准官僚构成的公职阶级。这个新阶层依靠武力窃取了决定每个农民放弃多大比重的农产品的权利。地方豪强从前向国家缴纳某种贡赋（当迫于无奈时），每每向农民强征沉重的捐税和劳役。在新制度下，他们被贬谪为固定津贴——通常相当于每年税收总额的10%——的领取者。国家把决定柴明达尔权利的合法持有者的权利更紧紧地抓到自己手中。像乔杜里那样，各个柴明达尔从省财务官（迪万）那里领取书面的任职书。像乔杜里那样，他们要缴纳任职费，签署恪尽职守的誓约。他们受命扩大其管辖区内的耕地面积，并按定制分期缴纳规定的赋税。

88

在改进的扎巴特制度下，先辈们通过垦殖、征服和定居获得的古老的土地支配权被转化为收取一定份额的农产品的权利。只有那些被柴明达尔本人占有的狭小“故土”才一如既往地作为自由领地保留下来。这些柴明达尔权利变成了某种形式的私人产权，经国家批准后，可以传给子孙或卖给外人。得到国家认可的继承系遵照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属人法的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同一性别的继承人拥有同等的继承权。只有向皇帝缴纳贡赋的酋长，才获准把他们的祖产完整地遗留给某位继承人。在这种弱化了的财产权形式中，柴明达尔权利可以出售或租赁给其他亲属甚至外人。遗存的出售和租赁文件

证明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采用——尽管无法证明这种做法发生的实际强度或频率。

撬开北印度乡里地方社会的壁障需要坚决果敢。武装的武士精英几乎从不用友善的目光打量进入他们村庄的小税吏和测量队。只有无情使用超级武力的威吓，才能克制暴力抵抗。统领着数百装甲骑兵的帝国法乌吉达尔不时驻防行省各地，以保证帝国权力的现实不被那些可能不愿按季上缴规定税收的柴明达尔漠视。

尽管必要，只有武力却是不够的。一个稳定的农业秩序需要在普遍接受合法皇权观念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柴明达尔的利益。阿克巴在他统治的早期就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开始着手赢得最重要的酋长、世族精英和其他柴明达尔的自愿合作。但新帝国政府的总体倾向却是至关重要的。忠顺会带来回报吗？还是无论怎样，新制度将会一成不变地刻薄寡恩？

后一种趋向的一些证据存在于德里附近穆扎法尔讷格尔县（Muzaffarnagar District）的一个查特部族（*khap*）[①]——巴里扬（Baliyan）的详尽档案中。当12世纪从旁遮普迁来时，这个部族的先祖们在西骚里（Sisauli）村建立了部族首领（乔杜里）的世袭总舵。从这个总部出发，该部族的“领土扩张、征服和殖民”一直持续到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不过，“当莫卧儿统治建立，北印度的治安状况随之好转后，扩张就停止了”。[②]到16世纪晚期，部族成员通过他们自己的头领和议事会体制，统治着拥有传统的84个村庄的西骚里乡。[③]他们同其他查特和非查特印度教世族集团保持着联系，定期在地区议事会（*sarv - khap*）上会面。

89

保存在部族档案中的决议记录表明了一种由种姓和部族联盟采取显然是集体性的行动的模式。当德里的国家政权日薄西山时，部族联盟议事会征

① 在英文版原书中，khap被译为clan（通常译为“部族”或“氏族”）。不过，在印度语境中，khap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血缘集团，也是一个地缘集团，是一个一般说来由84个村庄构成的地域性社会政治单位（地域范围相当于县）。其下存在着由7个村庄构成的次单位“塔姆巴”（thamba），数个khap联合成一个sarv-khap（部族联盟），其地域范围相当于省。这些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集团内部实行古老的潘查亚特（panchayat）体制。这种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从很早的时候起（不晚于公元前70年左右塞人进入和征服印度时期）就广泛存在于印度斯坦地区。相对于印度历史上频频出现的外来征服政权，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说代表了本地农业和乡村社会的自组织形态。——译者注

② M. C. Pradha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Jats of Northern India*（Bombay, 1966），p. 95.

③ 具体的村庄名单参见：Pradhan, *Political System*, Appendix 3, p. 251.

集了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抵御匪患。当德里的政权强大起来后，部族议事会召开会议，坚持获得对各部族议事会合法独立（地位）的承认，抗议过分沉重和歧视性的课税，如对香客的课税和人头税（“吉齐亚”）。如果赋税减免没有实现，这些查特部族和他们的联盟将集合起他们的民兵，以立即起义相威胁。根据这个部族的记载，1490年，希坎达尔·洛迪的官员们选择了不去挑战这些决议，从而也没有竭力推行他们的要求。[①] 1527年，当拉杰普特势力的复兴似乎指日可待时，联合议事会派遣25 000名士兵，由多普尔（Dholpur）的王公统领，对莫卧儿人开战。在卡努阿之役中，这支军队的数千将士命丧疆场。[②]

突然之间，在阿克巴政权下，反映在联合部族议事会决议中的持续了近4个世纪的紧张和冲突缓和下来了：[③]

> 毗讫罗摩历1631年[④]（1574年），在肖隆（Shoron）〔巴里扬卡帕（*khap* Baliyan）〕，西骚里村的拉奥·兰迪·拉伊（Rao Landey Rai）主持召开了一次部族联盟（*sarv - khap*）的潘查亚特会议，讨论自莫卧儿统治出现以来这个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阿克巴最近发布的帝国公告给予宗教信仰和各部族（*khap*）潘查亚特以完全的自由。

聚集在一起的数千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帝国承认其代表的所有18个成员部族议事会，要求享有处理宗教事务的自由，还要求有权在各部族地区让部族官员征收赋税。

90 6年后，另一次联合议事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感谢莫卧儿皇帝最近下令准予这些部族享有宗教自由和内部自治。这道命令保存在巴里扬档案中，上面写道：[⑤]

---

① Pradhan, *Political System*, Case 45, pp. 256–257.

② Pradhan, *Political System*, Case 47, p. 257.

③ Pradhan, *Political System*, Appendix 4, Case 48, pp. 257–258.

④ 原文为in 1631 S. B.，应为in 1631 B.S.之误。B. S.为Bikram Sambat （Vikrama Samvat）的缩写，即毗讫罗摩历，该历法的纪元始于公元前58年。这是一种在印度广泛使用的历法，还是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官方历法。相传，这种历法是马尔瓦的超日王（Vikramaditya）创立的，以纪念他对塞人的胜利。不过，现代的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这个超日王并不存在，他们更相信这种历法实际上同印度历史上的塞人国王阿泽斯一世（Azes Ⅰ）有关。——译者注

⑤ 见：Pradhan, *Political System*, p. 97. 这道圣谕作为“一号敕令”被翻印在第96页和第97页之间的一组彩色插图上。尽管上面的印鉴难以辨认，但作者准确翻译了上面的文字。

> 依照当前诏书（firman）……印度的某些社群议事会在穆斯林苏丹时期，在朕统治以前，被课以某些赋税，兹予豁免。在朕治下，每个社群议事会得我应允，可自由行使其传统之职责。在朕眼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俱为一体，故朕赐此等议事会以〔行动〕自由。他们免纳吉齐亚（*jazia*）（宗教税）及其他赋税。
>
> 印度皇帝——阿克巴大帝治下，于伊斯兰教历989年（公元1580年）9月11日诏令天下。诏令发布者为大瓦兹尔阿布尔-法兹尔和拉贯·托达·马尔。

两年前发布的另一道敕令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系专门针对来自巴里扬部族的两个查特部族乔杜里颁布的。[①]

正像这些交易所揭示的，阿克巴对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上河间地区的地方部族做了一些让步。这些议事会可以像以前那样不受干扰地行事。查特人反抗了数世纪的赋税被免除了。不过，作为回报，这些部族议事会接受了新税制。在帝国的萨哈兰普特（Saharanput）县，所有乡的土地（包括巴里扬及他们的盟友查特和古扎尔部族的土地）都在丈量后登记造册。[②] 他们要求使用地方代理征税，但并不抗拒新税制的实施。至少在这个地区，帝国的政策既依靠武力，也依靠安抚。

在把其农业体制强加给北印度平原上形形色色的贵族时，莫卧儿王朝开始把这些贵族糅合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后者尽管不断抗争，却发现其自身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以求实现富贵腾达和界定其身份的某个重要方面。

乡绅和免税赠地

91

莫卧儿帝国在乡村的成功依靠的是一个可称为“乡绅阶级”的大量地方成员的服务，他们的利益和活动既在农村，也在城市。也就是说，这些人填充了地方经济和行政中的特定位置，他们的技能对莫卧儿农业体制来说是绝

① Ibid. 上面的文字似乎是泛泛地针对4个查特部族和一个古扎尔部族的，但保存下来的副本却是针对“肖隆的帕楚·马尔乔杜里和西骚里的拉德·辛格乔杜里”（“Chaudhury Pacchu Mal, Shoron, and Chaudhury Lad Singh, Sisauli”）。

② 这些数据记录在《阿克巴政典》德里省项下的表格中，见：Abul Fazl Allami, *The Ain-i Akbari*, translated by H. S. Jarrett, second edition, corrected and annotated by Jadunath Sarkar（Calcutta, 1949）, pp.296–297.

对重要的。在他们中间包括了印度的印度教徒中识字的商人种姓，也包括了少数的穆斯林商人。这些马哈詹们（*mahajans*）[1] 用现金从农村购买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然后将他们的货物运送到最近的市场或乡镇上，再从那里运至较大的城市市场。农村商人以收获物为抵押向农民农场主发放贷款。在较大的镇上，各类商人构成了市场，其头人得到政府的承认。这些职员定期报告价格、稀缺状况和其他有关的市场信息。

乡村信贷的另一个来源是信奉印度教的货币借贷者和货币兑换商，他们在市镇和较大的村庄上都很活跃。除了借贷和兑换货币，他们还为资金转移或短期商业信贷发行贴现汇票。来自这些种姓的人在地方和省的税收体系的各个环节上充任文书、代理商、收税员和经理。他们在乡里任收税员，任财库文书，任扎吉尔达尔的代理，或任加农戈（土地登记员）。在这类职位上，他们的角色和地方穆斯林文书及商业集团出现了交叉，后者是他们争夺此类官职的竞争对手。

随着帝国税收体系的稳固和扩展，这个乡绅阶级的财富也增加了。尽管只能看清这些过程的轮廓，以城镇为基础的乡绅的数量和财富还是紧随着市镇的繁荣而稳步增长。其他形式的帝国资助促进了这一时期乡绅阶级的兴起和城市的繁荣。

很早以前，还在穆扎法尔·汗政府治下，交纳赋税的土地和资产与让渡了赋税的土地和资产之间的区别就确立起来了。后者是通过向特权接受者分配正规税收而提供庇护或支付酬劳的一种方式。作为税俸赏赐的土地（*madad-i ma' ash*）经常是那些统治者允许虔诚而可敬的人为养活自己而自行征税的土地。从前的印度—穆斯林统治者和他们的贵族已经把这类好处给予了一个主要的穆斯林教团——苏菲派的大师和信徒——以及可敬而虔诚的乌里玛成员。对印度中世纪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这支“祈祷大军”每日对统治者的颂扬都是一个无法估量却意义重大的政治支持源泉。对这些恩赐

92

[1] “马哈詹”（Mahajan）是印度某些种姓使用的姓，同他们的职业有关。今天北印度的马哈詹大部分来自拉贾斯坦，他们在莫卧儿统治时期逃入喜马拉雅山区，以逃避穆斯林的统治。这个词由两个印地语词合成：Maha意为“大”，Jan意为“人”。这样，这个姓的字面意思就是“大人”。在印度，有三个社群使用这个姓：一个居住在从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市到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查谟市之间的地区，另一个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第三个则广泛分布在北印度的其他许多地方。——译者注

进行管理则是首席宗教官员萨德尔的首要职责。

当阿克巴在16世纪70年代开始他的税务改革时，他发现了许多弊端和许多敌视他的阿富汗人占有赠地，特别是在旁遮普。这位皇帝取消了非法转变为世袭领地的赠地，收回了另外一些通过欺诈得来的赠地。新政策迫使受让人把他们占有的赠地转移到北印度中央各省的一些选定的乡和县里。在那里，这些免税赠地能得到更好的管理和控制。但这项新政策却是在前述1579年叛乱中达到顶点的不满情绪的一个根源。

另一个招致不满的地方是阿克巴把赠地受让人的范围扩大到非穆斯林。阿克巴比之前的任何一位印度穆斯林统治者都走得更远，他把税俸赠地赏给了许多神圣的个人和机构[①]。保存在杰克伯尔（Jakhbar）村湿婆神庙〔距旁遮普的伯坦果德（Patankot）16英里〕中的两份幸存下来的文件，证实了这种新的变化。和今天一样，在16世纪晚期，这所神庙是苦行派（Kanphatha）湿婆瑜伽师（Saivite Jogis）中一位显赫的玛罕特（Mahant, 意为“大师”）的驻地[②]。1581年发布的一道圣喻给10年前获得的税俸土地追加了50比加的免税地，以补偿因洪水淹没而荒芜了的土地。由于乌丹特·纳特瑜伽师（Jogi Udant Nath）曾经“有幸应邀入宫”，他得以获准保有早前的赏赐地和（晚近）追授的土地。作为回报，他“在年复一年地享用那块（土地）上的全部物产时，全心全意地祈祷这个征服王朝万世长存”。[③] 国库收税官或那个乡里的扎吉尔达尔乖乖地奉命移交了这些（圣喻上）规定的土地。

93

另一份较近的文件是阿克巴在位41年时发布的一道敕令的原件，上面盖有他的铁制御玺的印章（上面罗列了他的诸位先祖，直至帖木儿）。这道敕令重申了这次赠地的有效性，但在数量上减少了80比加。[④] 针对地方官员的

① 指宗教界人士和团体。——译者注

② Jogi是“瑜伽师”(yogi)一词的口语形式，意指把修习瑜伽(yoga)作为一种日常活动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印度形成了一个印度教共同体，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一个种姓。这个种姓的人生活在北印度，也有少数人生活在南印度的卡纳塔克邦。他们信奉湿婆神，分为苦行派(Kanphatha)和占卜派(Augur)两个小集团。苦行派瑜伽师佩戴硕大的耳环，以生活于12世纪甚或更早时期的戈拉克纳特为师尊。他们有时被视为密教托钵僧，因为他们强调获得超自然能力而不是虔敬和冥思等比较正统的修持。——译者注

③ B. N. Goswamy and J. S. Grewal, *The Mughals and the Jogis of Jakhbar* （S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67）, pp. 51–52.

④ Goswamy and Grewal, *The Mughals and the Jogis*, pp. 59–63.

同样的指令和套话在这道敕令里得到重复。这位瑜伽大师亲临皇宫同阿克巴有兴趣会见著名的宗教领袖这一点是吻合的。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这类赠地为许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乡绅提供了生计。穆斯卫估计，12个行省的所有赏赐地上的赋税加起来至少达到每年220万卢比，相当于全部税收的2.38%。[①] 此外，由于集中，政治效应更加显著。边缘省份——东部的孟加拉和奥里萨，西北的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没有任何赠地。半数以上的赠地位于4个中心省份：阿格拉、德里、阿瓦德和安拉阿巴德。而且，这些省份中的某些乡更受青睐。绝大部分赠地看来出现在4个地带，较大市镇高度集中在那里。[②]

直到18世纪早期，阿克巴和他的政府创造的这些结构依旧存在，令人惊异地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正规税收体系和扎吉尔体系一起对北印度的农村社会产生了强大影响。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莫卧儿强权的推进和支持下，这个结构侵入到农村生活的坚硬内核，重塑了莫卧儿印度的经济、文化和社会。

① Shireen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c. 1595*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9 and Appendix Ⅰ. A.

② Ibid., 162–165.

第五章　贾汗吉尔：1605—1627年

94

当阿克巴在1605年抱病在床并奄奄一息时，当时称萨利姆亲王的贾汗吉尔差一点把皇位输给他17岁的长子库斯洛。安伯的拉贾·曼·辛格·卡赤瓦哈（Raja Man Singh Kachhwaha）和米尔扎·阿齐兹·科卡（Mirza Aziz Koka，他的女儿嫁给了这位年轻王子）未能说服大多数贵族支持这场政变。相反，由巴拉哈的赛义德家族领导的一个反对派把萨利姆安全地带到了即将驾崩的皇帝面前，奄奄一息的皇帝在咽气前把皇冠、皇袍和阿克巴自己的宝剑赐给了这位继承人。为期一周的居丧结束后，萨利姆在阿格拉堡承袭帝位，把皇冠戴到了他自己的头上，号称"努尔-乌德-丁·贾汗吉尔·帕德沙·加兹"（Nur-ud-din Jahangir Padshah Ghazi）。一场对抗业已发生，但并未演化为一场嗣位战争。

曼·辛格显然同新政权达成了和解，前往孟加拉担任总督，而库斯洛也似乎重新得宠，居住在阿格拉堡，过着半幽禁的生活。6个月之后的1606年4月，库斯洛借口祭奠阿克巴陵墓，带着数百随从逃往旁遮普。库斯洛迅速集结起一支12 000人的军队（用截获的一支帝国运宝队的10万卢比资金招募而来），围困拉合尔的旁遮普总督。贾汗吉尔在同其子谈判的企图失败后，派遣了一支援军。这支援军在拉合尔城外同那位王子发生了战斗。这场短暂而血腥的战斗以（库斯洛的）溃败告终。库斯洛企图逃往喀布尔，但整个乡间正通过密布各地的乡正和市长通缉他。当他和他的官员们试图夺占一处渡口渡过杰纳布（Chenab）河时，他们被抓获了。

贾汗吉尔甫至拉合尔，就宣布处死大多数被抓获的库斯洛的追随者，在

他们的前首领面前施以刺刑。那些成功地平定了这场反叛的贵族们获得了升迁和新的扎吉尔。所有杰赫勒姆（Jhelum）河和杰纳布河之间地区的乡正们也获得了免税地，以犒赏他们在镇压这次叛乱中的忠诚。

当贾汗吉尔北上喀布尔指挥抵御萨法维王朝对坎大哈城堡的进攻时，库斯洛从拉合尔的囚禁地逃脱出来，参加了一场杀害他父亲的密谋。400名年轻贵族和曼萨卜达尔宣誓个人效忠这位王子，并进而接受了信徒徽章。一位告密者向贾汗吉尔皇帝揭发了这场阴谋。他迅即处决了几名魁首，还下令弄瞎他儿子的眼睛（其后不久，库斯洛恢复了部分视力）。对伤残的库斯洛的更严密的监禁结束了这场嗣位之争。

内部边疆的巩固

在帝国的正式边界内，加紧和深化帝国控制的进程重新开始。对贾汗吉尔来说，最烦扰的内部问题是梅瓦尔的拉纳。他是乌代布尔的拉杰普特部族——西索迪亚的头领，曾成功地抗拒阿克巴。[①]

> 真正的关键之点在于拉纳·阿马尔·辛格（Rana Amar Singh）和他的先辈们自豪于他们的山国和他们的居所的力量，从未正视或服从过印度斯坦的任何一位国王。

贾汗吉尔的最早行动之一就是派遣他的儿子帕瓦兹（Parwaz）亲王征讨梅瓦尔。面对西索迪亚统治者的避战策略，这场战役失败了。此后，几乎每年的征讨也都这样失败了。1613年，贾汗吉尔亲自从阿格拉赶往阿杰梅尔。在给他的儿子库拉姆（Khurram）亲王增派了一支新的部队后，这位皇帝派他进入拉贾斯坦的山区。库拉姆在山区中被莫卧儿将军们认为险要的地方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哨卡，派遣一支又一支的骑兵队袭扰拉纳及其将军们，还把大多数显赫的西索迪亚家族的家人扣为人质。最后，由于无法逼退这位心如磐石的莫卧儿王子，阿马尔·辛格投降了。

这位拉纳“选择了服从和忠诚”，而贾汗吉尔“原谅了拉纳的冒犯，还

① Jahangir, *Tuzuk-i Jahangiri* （Delhi, 2 vols. in one, reprint edition, 1968）, translated by A. Rogers， edited by H. Beveridge, Ⅰ, 274.

发布了一道宅心仁厚的圣谕……上面印有我的掌印，预示着吉祥如意”。[1]阿马尔·辛格亲自前去面见库拉姆，正式表示臣服。他借口年事已高，请求让他的嗣子卡兰（Karan）代替他前往贾汗吉尔的朝廷，担任帝国的一名埃米尔。对这场胜利，贾汗吉尔龙颜大悦，他同意了阿马尔·辛格的请求。库拉姆也返回阿杰梅尔，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这位皇帝开始诱惑他的新臣属："鉴于有必要赢得卡兰的心，而他生于草莽之间，从未见过朝会，一直生活在群山之中，我每日都会送给他一些新鲜的礼物。"[2] 这位皇帝确实慷慨赏赐了贵重礼品——包括5头大象——给这位年轻的西索迪亚王子，在后宫单独召见他，甚至还带他去打老虎。卡兰带着5 000扎特和5 000苏瓦尔的爵位返回梅瓦尔，富贵已极，但无疑也心醉神迷。为了进一步表示庆贺，贾汗吉尔命令他的石匠们为阿马尔·辛格和卡兰·辛格雕刻真人大小的石像。这两尊石像放在阿格拉堡瞭望口的外边，皇帝每日清晨在那里与公众会面。[3]

96

梅瓦尔拉纳的投降意味着对莫卧儿的抵抗是徒劳无功的。没有哪座高山或哪片荒漠可倚为安全的避难所。骄傲的王公们，如古吉拉特遥远的卡提阿瓦半岛（Kathiawar peninsula）上的扎姆（Jam），以前从未亲自前往古吉拉特苏丹或阿克巴的宫廷朝觐，现在谨慎地决定向贾汗吉尔俯首称臣。没有来自这位皇帝的书面御批或萨纳德（sanad），任何一个酋长都不能主张长久时效权而不受到挑战。

在数百个地方，地方王公或族长们现在发现他们自己承受着被武力要求俯首称臣和每年交纳贡赋的压力，而以前他们只是偶尔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遭遇。长期交纳贡赋的柴明达尔面临着来自帝国官员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过分紧张，各种形式的反抗乃至直接的反叛就会发生。一些谈判总是可能的，但一旦妥协失败，后果将是严重的：那就是一场大规模使用武力的惩罚性远征。如果幸运，犯上作乱的统治者能保住他的生命和头衔；而如果不幸，另一名地方权位（*gaddi*）的觊觎者将占据宝座。或者，直接吞并也一直是一种选择。随着吞并而来的是普通的帝国官吏精英的统治。先前拥有统治权的王公在他们从前的领地上变成了纯粹的柴明达尔。

① Ibid.

② Ibid., p. 277.

③ Ibid., p. 332.

锡克人和莫卧儿人的冲突

1605年，在库斯洛命途多舛的政变期间，这位反叛的王子曾和第五代锡克古鲁——阿琼（Arjun）短暂相遇。在旁遮普的一个繁荣的锡克人市镇——哥印德瓦尔（Goindwal）上，阿琼错误地为库斯洛祈福。贾汗吉尔似乎一直对深孚众望的宗教人物深恶痛绝。在这位皇帝的自传中，他评论道：[1]

97

> 在比亚河〔Biyah，即比亚斯河（Beas）〕河畔的哥宾德瓦尔（Gobindwal）[2]，有一个名为阿琼的印度教徒，穿着圣人般的服饰，矫揉造作，这竟使他凭借他的言谈举止，迷惑了许多头脑简单的印度教徒，甚至许多无知和愚蠢的伊斯兰信徒。他们为他的神圣大声欢呼，响彻云霄。他们称他为“古鲁”（*Guru*），来自各地的愚民争相朝拜他，对他虔信有加。在三四代（精神继承者）的时间里，他们保持了这种勾当的长盛不衰。我曾多次制止这种无聊的事情，或将他带进伊斯兰教的信众之列。

只不过是在库斯洛的额头上涂了一个象征吉祥如意的藏红花粉指印，阿琼就遭受了同库斯洛的大多数追随者相似的命运。贾汗吉尔“命令他们交出他〔阿琼〕，把他的房子、居住地和孩子移交给穆尔塔扎·汗（Murtaza Khan），而且在没收了他的财产后，还下令说他应该被处死”。[3] 这样，阿琼就成为第一位倒在莫卧儿王朝前面的锡克人烈士。

阿琼年轻的儿子哈格宾德（Hargobind）幸存下来，承袭了他父亲的角色，成为第六代锡克人古鲁。部分是作为对阿琼遇害的反应，青春年少的哈格宾德采用了一种新的准帝王气派。他佩戴两把宝剑，举行朝会，和他的随从狩猎，还在阿姆利则修建了一座堡垒，好像他是一位王公或亲王。贾汗吉尔闻讯后前去打击这位年轻的锡克领袖的气焰。他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瓜廖尔堡的国家监狱长达两年时间（1609—1611年）。

---

① Jahangir, *Tuzuk*, Ⅰ, 72.

② 即哥印德瓦尔。——译者注

③ Ibid., p. 73.

刚一获释，哈格宾德就把他的家人和锡克教的核心机构向北迁移到了喜马拉雅山山麓。在这里，在位于莫卧儿帝国边陲的比拉斯布尔（Bilaspur），在一种与拉杰普特统治者（他们在山区幸存了下来）相似的环境中，这位年轻的锡克领袖作为一名柴明达尔建立起他的朝廷。遍布各地的支持者继续从平原上提供给养。在贾汗吉尔统治时期，向山区的退却终结了莫卧儿人对这位古鲁和他的追随者的进一步迫害。

宗教和政治

98

贾汗吉尔对待锡克古鲁的严酷看来与其说是源于对他的宗教教义本身的敌视，不如说是源于阿琼明显的政治威胁。培养了大批民众追随者的宗教领袖遭受迫害，他们独善其身的同伴却没有遭受迫害。如同阿克巴那样，贾汗吉尔也寻访知名的圣人，如广受尊崇的毗湿奴派苦行僧——乌贾因（Ujain）的戈萨因·扎德鲁普（Gosain Jadrup）。之前阿克巴就曾造访过他。在数度邀请他到阿格拉帝国宫廷的努力都失败后，最终，在1616年，贾汗吉尔在这位圣人的隐居地——在乌贾因附近的山壁上凿出的一个洞里——造访了他。皇帝和圣人交谈了数个小时。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位皇帝又数度回来造访。对1620年他的最后一次会面，贾汗吉尔评论说：[1]

> 周一，12日，我会见戈萨因·扎德鲁普的热望再次升温。我急匆匆赶到他的陋室，没有任何仪式。我喜欢与他交流。我们相互之间倾吐着优雅的言辞。全能的上帝赐给他清新脱俗，极强的理解力，温厚的性情，敏锐的智力。他拥有上帝赐予的知识和一颗超凡脱俗的心，以至他把这个世界及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抛到了背后。他离群索居，心满意足，无欲无求。

贾汗吉尔同戈萨因·扎德鲁普的会面经常成为宫廷画师创作的对象。这些宫廷画师发现尘世华丽和神圣禁欲的并列是一个有力的主题。

一个闻名于世的穆斯林宗教人物谢赫·阿玛德·希尔辛迪（Shaikh Ahmad Sirhindi）与贾汗吉尔的相处却没有那样好。尽管他是强调遵守教法

① *Tuzuk-i Jahangiri,* translated in Rizvi, *Muslim Revivalist Movements in Northern Indi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Agra, 1965）, p. 328.

的正统的纳克什班底苏菲教团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但希尔辛迪还是采取了一种激进的、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属于异端的姿态。根据一种危险地近于异端的观念，希尔辛迪一方面承认预言可能已随着“最后的先知”（the Seal of the Prophets）穆罕默德（的去世）而消失，另一方面又危险地近乎异端宣称某些具有预言能力的信徒仍然可以直接感受到神的启示。希尔辛迪坚称他是先知同伴（the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的现代化身，和后者一样拥有穆罕默德的预言能力。[①] 没有先知做中介，他也能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因而，希尔辛迪能够为伊斯兰教众提供指导。他的无数信件和论文宣称在伊斯兰教的第二个千年（始于1592—1593年），他将成为“第二个千年的复兴者”（*mujaddid-i alf-i thani*）。在第二个千年，他能帮助扭转伊斯兰教江河日下的颓势，阻止先知穆罕默德同他的教众日益分离。

99

希尔辛迪写了数百封信给他的世俗弟子和纳克什班底同侪，有时也写信给莫卧儿贵族和皇帝。那些写给莫卧儿埃米尔的信经常公开指责这个政权吸收印度教徒参加。作为阿布尔·法兹尔的被保护人在阿克巴宫廷中任职的数年，让希尔辛迪确信这位皇帝是反对真正的伊斯兰道路的。他希望贾汗吉尔废弃阿克巴的政策，改变策略。在几封信中，希尔辛迪呼吁压制印度教徒和他们的假宗教。希尔辛迪通过对贾汗吉尔处决古鲁阿琼（被看作一名印度教徒）一事的恶毒评论，表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挫折感和愤怒：[②]

> 很庆幸的是，在这些天里，哥印德瓦尔那个受到诅咒的异教徒被处决了。这是邪恶的印度教徒承受巨大失败的肇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他们都要被杀死。对穆斯林来说，压制异教徒就是生活本身。

希尔辛迪表达了许多穆斯林学者共有的愤懑。那些依赖国家资助的神学家、法官、苏菲派大师和其他人特别受到阿克巴政策的困扰。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个由乌里玛组成的人数众多、异常活跃的乡绅阶级盘踞在北印度的市镇上。事实上，这类人在谢赫·阿玛德·希尔辛迪的旁遮普老家人数极其众多。对物质损失的担心同对精神损失及印度穆斯林共同体削弱的担心交织在

① Yohanan Friedmann, *Shaykh Ahmad Sirhindi: An Outline of His Thought and a Study of His Image in the Eyes of Posterit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0.

② 译文和原文见：Friedmann, *Shaykh Ahmad Sirhindi*, p. 73.

一起。毫无疑问，谢赫·阿玛德表达和回应了这些关注。

然而，并非所有神学家都支持谢赫·阿玛德。阿布达尔·哈克·迪拉维（Abd-al Haq Dihlawi），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穆斯林学者，直接挑战希尔辛迪的观点。在一封保存下来的信中，阿布达尔·哈克对谢赫·阿玛德的狂妄自大和他自称"分有"先知同伴的"财富"进行了公然抨击。① 宣称在他自己和上帝之间无需中介是对先知的冒犯，是异端邪说。

1619年，谢赫·阿玛德日渐隆起的声誉和大众的追随引起了贾汗吉尔的注意，他召见了他。在他的自传中，贾汗吉尔评论说，希尔辛迪"散布伪善和欺诈，"招收门徒，引领穆斯林接受伪信和异端。这位皇帝对希尔辛迪宣称他已经超越了受正确引领的先知同伴们所达到的精神阶段，感到特别愤怒。② 在觐见时，谢赫·阿玛德"极其狂傲自大，对他的整个无知自鸣得意"。③ 谢赫·阿玛德的骄狂让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瓜廖尔堡国家监狱，以便使他自己的迷乱和"人民的亢奋"得以平伏。④ 一年后，谢赫·阿玛德获释，并重获恩宠。他随贾汗吉尔的帝国军营一同前往德干。 100

希尔辛迪对印度伊斯兰教的影响是有争议的。他的信件由他的门徒编纂成三大卷，在莫卧儿时期及其以后的印度持续受到广泛阅读。在他于1624年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为他编写了一部圣徒传记文学，称颂希尔辛迪为伊斯兰教中受到迫害的斗士。他被描述成一位在促使帖木儿政权回归伊斯兰教法正道的斗争中的领袖。他对伊斯兰复兴的关注和他对印度教徒的反感，无疑加剧了伊斯兰共同体和印度教共同体在17世纪的隔阂。

培育帝国文化

不像他的父亲，贾汗吉尔不是一名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组织者和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他的许多精力投入到莫卧儿王朝的宫廷文化中。宫廷（包括它的宏伟的宫殿和宅院）和大贵族们的卫星宫殿构成了都城生活中熠熠生辉的亮色。宫廷仪式和排场用来震撼所有那些向帖木儿统治者俯首称臣的人

① Friedmann, *Shaykh Ahmad Sirhindi*, pp. 88–89.

② 这段文字的全部译文见：Rizvi, *Muslim Revivalist Movements*, p. 287.

③ Ibid.

④ Ibid.

们。然而，在贾汗吉尔统治时期及其以后，一成不变的仪式捆住了主角们的手脚。特别是皇帝本人整日忙于参加各种仪式。宫廷生活的包裹效应使贾汗吉尔更难以亲自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更倾向于把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委以他101 人。不过，随着他失去活力，这位皇帝变得神圣起来了。环绕着他本人的光环变得更加夺目。

贾汗吉尔没有建立新的都城，而是把阿格拉作为帝国中心。在料理战略急务的漫漫日子里，他从阿格拉转往喀布尔、阿杰梅尔或曼杜，而庞大的营地成了临时性的帝国总部。贾汗吉尔在恒河岸边的山地附近建立新城的一次尝试由于他的抱病而终止。[①] 取而代之的是，这位皇帝把他的全部创造力投入到为数众多的建筑工程，其中凝聚了他本人的超群不凡的美感。

在这些建筑中驰名世界的是北印度和克什米尔的巨大的帝国花园。由于喜爱克什米尔的凉爽和环境，贾汗吉尔数度在平原上酷热难耐时临幸那个山谷避暑。他对建筑的强烈嗜好促使他规划和设计了4个美轮美奂的露天花园——沙丽玛尔巴格（Shalimar Bagh）、阿查巴尔（Achabal）、弗纳格（Vernag）和尼沙特巴格（Nishat Bagh）。[②] 这些花园的残迹在今日仍可以看到。[③] 对溪流、池塘、凉亭、遮阴树以及花草灌木栽种的运用都独具匠心，堪称典范，甚至在今日，尽管其规模宏大，这些花园的样式和图案还是展现出令人心醉的精巧优雅和错落有致。

贾汗吉尔时常从统治者的公共舞台退回到他通过慷慨资助和非凡的鉴赏力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较为私密的小天地中去。他在细密画中发现了一种适意的美学形式。这位皇帝是一个严苛的批评家。从他的画师那里，他获得了构图技术和空间层次技术上的大胆创新。在贾汗吉尔的指导下，帝国工作室中的天才艺术家们绘制了主题广泛的画作。由于这位资助者及其周围的人抱有的天生的兴趣，动物、花卉和其他天然事物成为绘画的对象。在贾汗吉尔时期，莫卧儿绘画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达到了其顶点。[④]

---

① Beni Prasad, *History of Jahangir*（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 322.

② Bagh意为“花园”。因而，沙丽玛尔巴格意为“沙丽玛尔花园”，尼沙特巴格意为“尼沙特花园”。——译者注

③ Sylvia Crowe, et al., *The Gardens of Mughul India*（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72）, pp. 90–120.

④ Milo Cleveland Beach, *The Grand Mogul: Imperial Painting in India 1600–1660*（Williamstown, Massachusetts: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1978）, p. 25.

当然，对贾汗吉尔来说，就像对阿克巴一样，绘画依旧是一种政治武器。无数以这位皇帝为焦点的政治人物画留存了下来。自这个时期以来的许多画作——例如，一幅由阿布尔·哈桑（Abul Hassan）创作的描述贾汗吉尔在一个象征世界的球体上拥抱着被矮化了的沙·阿巴斯（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的绘画就是如此——以显示其（帝国）绘画的公共性。[1] 尽管如此，作为资助人的贾汗吉尔似乎更多的是受到了鉴赏能力的激发。 102

经常退回到私人生活领域部分地反映了贾汗吉尔的懒散，而这是由他日益沉湎于每日大量食用鸦片和酗酒造成的。以一种怪异而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方式，贾汗吉尔的慵懒加强了帖木儿政治文化中两种相互交错的基调：帖木儿王朝，特别是巴布尔、胡马雍和阿克巴这些帝室之胄，对莫卧儿帝位的家族占有；以及统治者本人日益增长的神圣性。这两种基调共同对任何一个挑战者或篡位者——无论是帖木儿人，还是非帖木儿人——都构成了千钧重负。

努尔·贾汗的擅政

1611年，贾汗吉尔遇到、爱上和迎娶了在孟加拉遇害的一位莫卧儿官员的年轻寡妻米茹尼萨（Mehrunissa）。她是一名年方30岁的古典波斯美人，其时正在服侍阿克巴的一位遗孀。米茹尼萨的父亲，封号为“伊提玛德-乌德-达乌拉”（Itimad-ud-daulah）[2]，是贾汗吉尔朝堂上的一个高等贵族。这位新皇后迅速成为贾汗吉尔钟爱的后妃（在全部20名后妃中），被封为“努尔·贾汗”（Nur Jahan），意为“世上之光”。努尔·贾汗的美丽，她对这位皇帝的挚爱，她强烈的个性，以及她从时装设计到狩猎方面的才能，让她对贾汗吉尔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她的父亲成为帝国迪万，即宰相。她的兄弟阿萨夫·汗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迅速成为朝廷中的一个大贵族。

努尔·贾汗和贾汗吉尔的次子库拉姆结成同盟，后者作为帝位法定继承人拥有旁遮普西萨尔（Hissar）乡的扎吉尔，有权居住深红色营帐。1612年，库拉姆和阿朱曼德·巴努（Arjumand Banu）结婚，后又迎娶阿萨夫·汗

① Bamber Gascoigne, *The Great Moghul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1), p. 130.

② “伊提玛德-乌德-达乌拉”意为“国家柱石”。——译者注

的女儿穆姆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在王子和阿萨夫·汗共同举办了这场奢华的婚典后，他们之间的联盟就牢固建立起来了。

这4个人——努尔·贾汗、她的父亲伊提玛德-乌德-达乌拉、她的兄弟阿萨夫·汗和帖木儿王子库拉姆—— 一起对贾汗吉尔施加了巨大影响。帝国政令有时就是以努尔·贾汗的名义发布的。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铸造的银卢比的正面印有贾汗吉尔的帝号，反面却印有“谨奉努尔·贾汗皇后贝加姆命铸造”（“struck in the name of the Queen Begam, Nur Jahan”）的字样。[①]

103

通过把她的名字添加到他的铸币上，贾汗吉尔公开宣告了努尔·贾汗同他共享一项处于伊斯兰教君主权力核心的特权。在1611—1622年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贾汗吉尔严重依赖努尔·贾汗及其同伙的建议。

可以预料的是，在这位皇帝宠幸的小圈子之外形成了一个敌对的派系。以马哈巴特·汗（Mahabat Khan）——也是一位伊朗裔埃米尔——为首的反对派贵族，把失明的库斯洛王子作为他们抵制努尔·贾汗及其朋党控制贾汗吉尔的象征。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嫉恨努尔·贾汗权势的皇帝嫔妃，都普遍认为库斯洛是一个悲剧性的、深受欢迎的皇室人物。民众还认为他是贾汗吉尔真正喜爱的儿子，而不是那个傲慢无礼、飞扬跋扈的库拉姆。努尔·贾汗集团期待着在皇帝百年之后宣布库拉姆继承帝位。鉴于皇帝骄奢淫逸，他的（猛然）去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皇帝的门徒及其世袭任职[②]

贾汗吉尔彷徨于效仿和拒斥他的父亲之间，认为他继承来的角色是“真命天子”[③]，能比常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权力。用这位皇帝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新尊号“努尔-乌德-丁”（“信仰之光”）把他同太阳的“光辉”

---

① H. Nelson Wright, *Coins of the Mughal Emperors of India* （New Delhi: Deep Publications, 1st Indian reprint edition, 1975）, p. 93.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Catalogue of the Coins in the Indian Museum, Calcutta*，Ⅲ，“Mughal Emperors of India，” 1908.

② 下面一节改编自：J. F. Richards, “The Formul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in Richards, ed., *Kingship and Authority*，p.268–277.

③ “真命天子”原文为light-suffused monarch，意为“弥漫着光芒的君主”。这里意译为“真命天子”。——译者注

连接起来了。[①]

贾汗吉尔继续从他的贵族中招收天子门徒，而且似乎更加卖力地保卫他对他的门徒的权威，甚至超过了阿克巴认为必要的程度。科瓦加·卡万德·马哈茂德（Khwaja Khawand Mahmud），一位受人欢迎的纳克什班底教团的大师，曾在阿克巴统治时期招收了许多贵族做他的门徒。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仪式和信仰——它们同该教团的信条一致——的忠诚。贾汗吉尔继位后不久，一个高等贵族就抱怨说科瓦加·卡万德·马哈茂德曾强迫他成为自己的门徒（*murid*），尽管科瓦加知道他已经是这位皇帝的门徒。这位大师回应说，他是"神法"（Holy Law）的门徒，受命服从那些掌握权柄的人。因而，他，科瓦加，本人就是皇帝的门徒。只是这种机敏的答复才使得这位纳克什班底大师免于触怒皇帝。[②] 104

关于天子门徒制度继续存在的重要的直接证据，来自英格兰詹姆斯国王驻莫卧儿宫廷的大使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的信函和日志。罗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1615—1618年）几乎每天都要拜谒贾汗吉尔的宫廷和营帐。他通过成为贾汗吉尔喜爱的一个酒友而同这位皇帝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

像阿克巴那样，贾汗吉尔从他喜爱的贵族中间挑选和接受门徒，"他们配得上接受*shast wa shabah*"，即作为门徒身份象征的印章、指环和其他类似的帝国信物。在他自己的日志中，这位皇帝描述了收徒仪式的细节。[③] 尽管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的全部重大意义，他本人还是成为了贾汗吉尔的一个门徒。1616年8月，贾汗吉尔显示了对这位大使的宠爱，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为他举行了入教仪式：[④]

> 8月17日，我前去拜谒国王。我一进来，他就招呼他的侍女，拿出一枚他自己的金像章，上面系有金链，下面吊着珍珠吊坠。他把它递给阿萨夫·汗，〔瓦兹尔阿萨夫·汗〕提醒他不要强使我施

---

① Rizvi, *Muslim Revivalist Movements*, p. 221.

② Rizvi, *Muslim Revivalist Movements*, p. 184.

③ 这部分的全文见：S. A. A. Rizvi,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Muslims in Akbar's Reign*（New Delhi, 1975）, p. 400.

④ William Foster, ed., *The Embassy of Sir Thomas Roe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Mogul, 1615–1619*（London: Hakluyt Society, new series, 2 vols., 1894）I, 244–45.

> 以任何我并非情愿的礼节。这是惯例，无论何时，只要他赠送了礼物，接受者就要跪下，以头触地……于是，阿萨夫·汗来到我面前，我试图用双手去接；不过，他示意我摘下帽子，然后把它戴到我的脖子上，径直领我来到国王面前。我并不理解他的意图，不过怀疑他要我施称为*Size - da*〔门徒的跪拜礼，即“斯吉达”〕的国家礼节（the Custome of the Country）。但是，我还是宁愿交出我的礼物。他示意我向国王致谢。我遵照我自己的风俗那样做了。

105 罗评论说，尽管他从皇帝那里得到的信物的实际货币价值微不足道，这种信物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1]

> 拥有（这种信物）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荣耀。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戴着国王像章的大人物接受的不过是价值6便士的金像章，上面系着一根4英寸长的小链子。他们自己还破费在上面系上宝石或闪闪放光的珍珠吊坠。

被选定为天子门徒是一项特别大的荣耀。那些佩戴皇帝微型像章的人构成了钦定的帝国官吏集团。

反过来，贾汗吉尔也以业已去世的科瓦加·姆因–乌德–丁·奇什蒂（Khwaja Muin-ud-din Chishti）的门徒自居。他相信，这个奇什蒂的代祷给了他生命，也给了阿克巴一个嗣子。与他的父亲不同，他的父亲似乎已经放弃了他自己对这位奇什蒂圣人的崇拜，贾汗吉尔则公开展示他的尊崇之情。1614年，在阿杰梅尔，这位皇帝拜谒了奇什蒂的陵墓，向这位教长的信徒和后人馈赠了大量礼物。在此居住期间，贾汗吉尔染上疾病，久烧不退。几周后，这位身体已经孱弱的皇帝最终前往奇什蒂圣人的陵墓，为健康祈祷。当他的祈祷应验后，贾汗吉尔决定“由于我本质上是科瓦加的一个穿耳的奴隶”，他将在他的每只耳朵上钻一个孔，每个耳孔都戴上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2] 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贾汗吉尔自己的门徒和景仰者就开始群起效仿，在他们的耳朵上挂上了珍珠。贾汗吉尔向那些已经做出这种姿态的官员分发了732颗珍珠。门徒链条从那位奇什蒂圣人伸展到那位皇帝，又从那里延伸到他自己的门徒。帖木儿和奇什蒂的神圣性融合在一起了。

---

① Ibid.

② Jahangir, *Tuzuk*, Ⅰ, 267.

进兵东北边疆

在贾汗吉尔治下，这个帝国依旧是一个战争国家，惯于侵略征服，开疆拓土。在东北方，在经历了征服阿富汗人的令人厌倦的战役后，莫卧儿人碰上了新的敌人——阿霍姆人（Ahoms）。大约自1400年以来，这个强悍和好斗的掸人民族从他们在上缅甸的老家出发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缓慢迁徙。在迁徙过程中，他们打败和同化或驱逐了这个地区的土著部落和印度教民族。当他们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推进时，阿霍姆人逐渐受到印度宗教和文化的影响。 106

阿霍姆人的勇毅限制了莫卧儿王朝在东北部的势力。不像许多印度政权那样，阿霍姆人并没有在长达数世纪的反对穆斯林势力蚕食的斗争中被压垮。如同他们的对手，他们也有着胜利侵略的历史可供回顾。阿霍姆统治者未受到种姓、种族或宗教的羁绊，能在战时动员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臣民从军或服徭役。他们在夺取和占领的土地上实施一种修建道路、岸堤和灌溉水塘的系统计划。阿霍姆国家通过征发徭役和征集物产向人民课税和组织他们，而非像印度伊斯兰国家那样是通过土地。政策一旦下达，阿霍姆国王就强迫整个地方的人民背井离乡，迁往另一个居住地。莫卧儿人发现这种东南亚式的组织和战争极难对付。

贾汗吉尔在位时期，莫卧儿和阿霍姆的军队几乎年年都在东北部的河滨和丛林地带作战。阿霍姆军官竖起竹栅栏，挖掘陷阱和深坑，相当娴熟地运用他们的火枪手。他们在夜间奇袭莫卧儿的营地，令帝国军队士气低落，进展缓慢。17世纪中叶的编年史家拉霍利（Lahori）记载了在这块河流密布的地带作战的莫卧儿军队对阿霍姆人的率直的评论：[1]

> 当地的人们剃光了头发，剪掉了胡须。他们以陆上和水中的各种动物为食。他们皮肤黝黑，相貌丑陋。酋长们骑着大象或乡间小马，但整支军队只是由徒步士兵构成。战舰船体庞大，装备精良。士兵们使用弓箭和火绳枪，但却不敢靠近穆罕默德的士兵，尽管他

---

① 转引自：E. A. Gait, *A History of Assam*, 3rd revised edition （Calcutta, 2 vols., Thacket Spink, 1963），Ⅰ, 124.

们在水战中十分英勇。在行军途中，他们迅速而巧妙地在他们的营地周围筑起土墙和竹栅栏，再以深沟环绕。

纯粹由于形势所迫，莫卧儿人在孟加拉和阿萨姆这样河网密布的地域除了使用骑兵和战象，还学会了在河面上使用配有舰首大炮和火枪手的战船。

107

边疆地区的门徒制度

年轻人，自阿克巴去世以来已经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被纳入皇帝门徒集团。以米尔扎·内森（Mirza Nathan）之名为世人所知的波斯贵族安拉–乌德–丁·伊斯法哈尼（Ala-ud-din Isfahani），在他的自传中证实这种制度继续富有魅力。[①] 1607年，年轻的米尔扎·内森跟随他的父亲伊提玛姆·汗（Ihtimam Khan），率领由武装战船组成的帝国舰队开赴东部边疆。在他到达孟加拉后不久，米尔扎·内森就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进而恶化为一种热疾。在他生病的第7天，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他昏睡时，他梦见“精神和尘世王国的国王”（即贾汗吉尔）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②]

喂，内森！这是一只老虎躺下睡觉的时候吗？起来，我们已通过我们向全能和无所不在的主的祈祷而令你免罹病痛和烦扰。赶快，鼓起男子汉气概，诚心诚意地投入到你的事业中去，成为你伟大的父亲的同道和他的助手。

内森醒后，热疾痊愈，对他的使命变得信心十足。在他的父亲和孟加拉总督伊斯拉姆·汗·奇什蒂（Islam Khan Chishti，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苏菲家族的一个成员）的帮助下，内森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描述了他的神奇梦境，请求招收他为圣上门徒。作为答复，一名帝国信差携带着一枚“镶嵌着（帖木儿王朝）世系图”的贾汗吉尔小像章返回。尽管他没有被召回宫廷为他个人举行仪式，通过把这枚像章佩戴在他的头巾上，米尔扎·内森公开展示了他的忠心和他作为钦定门徒的身份。

米尔扎·内森夜梦皇帝和他按此梦境行事的热望无疑源于他在皇家出

---

① Mirza Nathan, *Baharistan-i Ghayb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 I. Borah（Gauhati, 2 vols., 1936）。该书由米尔扎·内森于公元1632年完成，全面描述了贾汗吉尔时期莫卧儿军队在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扩张时他作为一名现役军官的职业生涯。

② Nathan, *Baharistan*, Ⅰ, 17, 74.

生和长大的事实。当库拉姆王子在其反叛期间抵达孟加拉后，他称米尔扎为“我朝特殊的臣仆之一……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我们的膝下成长”。[①] 内森事实上是一个“哈纳扎德”（*khanazad*，字面意思是“自家儿郎”）。在贾汗吉尔时代，这似乎意味着在童年和青年的时候实际居住在皇家或与之过从甚密。后来，这个词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世袭帝国官职。对内森来说，这种身份及其可能带来的所有恩宠同门徒制度交汇在了一起。 108

在帝国宫廷或军营中维系这些门徒纽带和世代为官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在皇帝主持的朝会上，世代相袭的关系每日都得到重申。在盛大的朝会上，正式的权威和臣服仪式在礼物交换中完成：除了礼服、骏马、嵌有珠宝的武器甚或钱财，皇帝还赏赐官职、头衔和擢升爵位。他的臣属则一成不变地馈赠金币或其他合适的贵重礼品。这些礼物中最让人动心的是皇帝短暂穿过或在肩上试披过的长礼服或短礼服。托马斯·罗曾从贾汗吉尔那里得到“一件他自己穿过一两次的金斗篷。他让人把这件斗篷披到我的背上，我施礼谢恩……在这里，获赏一件皇帝穿过或他披过的新外衣，被看作最高的荣宠”。[②] 同皇帝神圣的肉体接触是他对他的臣下关心和敬重的明示。

当贵族们像米尔扎·内森那样在外领兵打仗时，皇帝和门徒之间的这些人身关系又是如何维系的呢？一个切实的方式存在于升迁所必需的交换中。1612年，他首次擢升到500扎特和250苏瓦尔品级。到1621年，作为对他在平定一位穆斯林柴明达尔叛乱中所建功勋的奖赏，米尔扎·内森得到进一步升迁，成为1 000扎特和500苏瓦尔的埃米尔。由贾汗吉尔和努尔·贾汗共同签署的圣旨传达给米尔扎，上面规定了他的新爵位，赐给米尔扎一个新头衔：希塔布·汗（Shitab Khan）。这位新达贵还获赠一件长礼袍。为了完成这笔交易，内森向努尔·贾汗皇后回赠了42 000卢比。[③] 这次个人交换的所有关键环节都是远距离完成的。

别的礼物交换有助于维持这个假象。在各类场合，特命钦差大臣赠送一套软围巾；皇帝亲手赠送盾牌，或两副珍珠耳坠（象征着门徒身份）。作为回赠，内森组织野象围猎，把他精心挑选出来的猎物作为个人贡品献给皇帝。

---

① Nathan, *Baharistan*, Ⅱ, 702.

② Foster, *Embassy*, Ⅰ, 334.

③ Nathan, *Baharistan*, Ⅱ, 666.

109 米尔扎·内森和其他帝国官员一样，偶尔会收到盖有这位帖木儿皇帝国玺的书面命令，即圣旨。这类特殊诏书由一到两名帝国钦差或皇家骑兵（阿哈迪）带出宫廷。在这些场合，礼仪规定接旨人的行为举止须像皇帝亲临一样。有关贵族要驱驰数英里远迎信使，行斯吉达即完整的宫廷跪拜礼，把圣旨举过头，甚至要在打开前亲吻盛放圣旨的御函。

这位皇帝使用了一种比较戏剧性的通信形式。一名拥有高等爵位的信差可能被派去逐字逐句口授皇帝的口头命令或训诫。[1] 为了终止接替伊斯拉姆·汗·奇什蒂担任孟加拉总督的卡西姆·汗（Qasim Khan）的臭名昭著的派系活动，贾汗吉尔派遣了一名拥有易卜拉欣·卡拉尔（Ibrahim Kalal）头衔的财政官携带诏书前去训诫孟加拉总督、省财务官、省监军兼主计官（巴克什）以及采访使。当这位钦差抵达省都后，总督迎接了他，行施了规定的跪拜礼，接收了皇帝诏书。

次日清晨，当孟加拉总督、他的3名主要官员以及他手下所有主要将领齐聚觐见厅后，易卜拉欣·卡拉尔根据记忆庄重地口授了贾汗吉尔依次对4位主官的口头责难。他没有等候答复，就离开了觐见厅，立即踏上归途。[2] 敬服礼甚至在那位统治者没有在场的情况下也反复施行了。

在北部山区的扩张

在北方的喜马拉雅山麓，莫卧儿人的日子要比在阿萨姆好过。到16世纪90年代，阿克巴已经建立起他对大多数拉杰普特统治者的宗主权。他们不大的山谷王国占据了从克什米尔到孟加拉边境的喜马拉雅山麓地带。尽管保留着内部自治，这些酋长们被迫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年年缴纳贡赋，在需要时为帝国提供部队，还要送他们的儿子到朝廷任职，或遣女与（莫卧儿）贵族联姻。莫卧儿皇帝保留了干涉王位继承的权利。少数山区王公还被皇帝比108 照他们在拉贾斯坦的拉杰普特同族授予曼萨卜达尔这样的个人职位。阿克巴还开了在喜马拉雅山区派驻法乌吉达尔即督军（military governors）的先例，以监督喜马拉雅山麓的王公们。这些官员管理着从纳贡王公那里强夺来的、

① 这方面的实例参见：Nathan, *Baharistan*, II. 307–310.

② Ibid.

被兼并为帝国直辖领土的土地。

喜马拉雅山能让商人和游牧民经由山路通过，但却阻绝了武装入侵。莫卧儿皇帝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把形式统治权扩展到这个地区的所有小王公身上。这样做不必担心引起强大邻国的报复。贾汗吉尔在喜马拉雅山区的首要目标是征服冈格拉王公（Raja of Kangra）。后者凭借他那座巨堡的传奇性力量保护自己，就像这座城堡曾保护了他的祖先那样。早自1615年起，莫卧儿人就开始围攻这座都城，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战绩。最后，直到1618年，库拉姆王子才攻占了这座城堡。翌年，贾汗吉尔亲自前往庆祝他的胜利，为此在冈格拉堡的庭院中建立了一座清真寺。

同波斯和中亚的关系

莫卧儿印度西北面的伊斯兰地区——波斯和中亚——对阿克巴的后继者们形成了一大堆错综复杂的问题。贾汗吉尔很清楚这个地区是巨大的危险之源。从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到他自己王朝的创立者，掠夺者和征服者都是从西北方向突入北印度。莫卧儿政策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目标就是凭借统率有方的集中的草原骑兵折冲可能的入侵。喀布尔和白沙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占据住，如果可能，还要占据坎大哈和加兹尼。使事情越发困难的是，西北边境只能在边境十分紧张的短暂时期内封闭，因为边境两侧的统治者都要从熙熙攘攘的商队贸易中获益。

这些地区重要的象征意义更让人不堪重负。撒马尔罕是帖木儿的都城，丢给了乌兹别克人的沙伊巴尼德（Shaibanid）王朝统治者。后者是巴布尔、察合台突厥人和他的皇族后裔的宿敌。布哈拉（Bukhara）、巴尔赫（Balkh）和巴达赫尚是图兰人的地区，而这些土地本应该在很早以前就回归到莫卧儿的主权之下。这些地区也是纳克什班底苏菲派教团和狂热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它构成了帖木儿传统的一部分）的故乡。贾汗吉尔的公开目标是“征服我的先祖们的世袭王国——马瓦拉安那儿（Mawara'a-n-nahr，即

111　‘河中’[1]）”。[2] 征服中亚一直是莫卧儿王朝的一个愿景。

17世纪的波斯提出了更加困难的问题。莫卧儿同萨法维波斯的外交关系随每位统治者采取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变化。除了围绕坎大哈发生的精心策划的冲突，日益增长的敌意从未演变为没有限制的战争。在沙·阿巴斯在位期间，萨法维国家尽管在领土、人口和资源方面较为弱小，但能轻松应对来自莫卧儿帝国的任何军事挑衅。（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都通过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干涉邻近地区而威胁对方。萨法维王朝在图兰或乌兹别克人地区势单力薄，莫卧儿王朝则对德干戈尔康达的什叶派统治者忧心忡忡。

萨法维王朝对帖木儿王朝有着一个后者无法制衡的严重威胁。波斯贵族和行政官在莫卧儿贵族中构成了最大的族群之一，并同他们的故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可以想见，如果波斯裔曼萨卜达尔得到足够的鼓励，他们就可能发生叛乱，引萨法维王朝入室。然而，却没有印度人在萨法维波斯拥有类似的地位。

长期以来，莫卧儿王朝苦于波斯人宣称的对印度伊斯兰殖民地（或在这方面，对图兰）的文化优势。帖木儿王朝接受了这个判断，尽管他们对此十分反感。在这种不平衡之外，还有作为虔诚的什叶派的萨法维人的强烈的宗派偏见及其对帖木儿人广为接受的正统逊尼派的蔑视。令他们十分气愤的是，莫卧儿王朝的劫后余生归功于萨法维王朝先是对巴布尔，而后是对胡马雍的庇护。比襄助本身更令人屈辱的是沙·伊斯梅尔（Shah Ismail）和沙·塔赫马斯普公开要求每个人坚持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教。

萨法维王朝和帖木儿王朝之间的复杂互动也是亲密关系的产物。萨法维和帖木儿诸帝都以一种奇怪的、经常是怪诞的方式，彼此寻求对方肯定他们的高贵和价值。在他们自己的眼中，除了奥斯曼苏丹，他们没有别的对手。信件、特使、礼品和画像的频繁交换显示这两位皇帝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个人关系——但他们从未谋面。

这两位皇帝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竞争在争夺坎大哈要塞、市镇和行省的斗

① Mawara’ a-n-nahr（“马瓦拉安那儿”）系阿拉伯文，意为“那条河（阿姆河）以外的地方”，地理上指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在中文中称为“河中”。对应的拉丁文名称是Transoxania（“特兰索克萨尼亚”），意为“横跨阿姆河两岸的地区”。——译者注

② Jahangir, *Tuzuk*, I, 89.

争中得到了明显体现。1595年，当两位萨法维王子变节后，阿克巴收复了坎大哈。贾汗吉尔甫一登基，赫拉特和其他边境地区的萨法维总督们就对坎大哈组织了一次不成功的奇袭。在经历此次失败后，沙·阿巴斯被迫忽略这颗眼中钉，转而支持同贾汗吉尔建立热络的外交和个人联系。 112

到1620年，当贾汗吉尔病入膏肓时，他的皇后努尔·贾汗和库拉姆王子（后来的沙·贾汗）投身于在莫卧儿朝廷上一争高下的复杂斗争中（见下文）。利用这个间隙，沙·阿巴斯在1622年冬季亲率波斯大军围攻坎大哈。在援军尚未召集起来时，300名武备松弛的莫卧儿守军就投降了，把坎大哈拱手送还给波斯人控制。

德干诸役和宫廷政治

在阿克巴去世时，莫卧儿人正信心十足地向南扩张，征讨残存的穆斯林苏丹国。康德什、贝拉尔和艾哈迈德讷格尔的极北部处在帝国的牢固控制之下。莫卧儿王朝对艾哈迈德讷格尔的不完全兼并和阿克巴对塞利姆（Selim）王子[1]叛乱的关注使得那个王国爆发了抵抗运动。马利克·阿姆巴尔（Malik Ambar），一个"哈布什"（"habshi"，即阿比西尼亚奴隶军官），在距离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的宏伟山堡15千米处的卡得吉〔Khadki，后改称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为苏丹·穆尔塔扎·尼扎姆·沙（Sultan Murtaza Nizam Shah, 1599—1631年）修建了一座都城。

刚一登基，贾汗吉尔就恢复了对艾哈迈德讷格尔的军事行动。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一任又一任的帝国军官发动的不温不火的战役没有产生什么结果。马利克·阿姆巴尔得到了该地区扎达夫（Jadavs）和另外几个马拉塔贵族世系的支持。最后，在1616年，莫卧儿王子帕维兹（Parwiz）指挥一支得到增援的部队在贾尔纳（Jalna）附近的一次大战中粉碎了艾哈迈德讷格尔军队。帝国军队洗劫和摧毁了马利克·阿姆巴尔在卡得吉〔即基尔吉（Khirki）〕的都城。马利克·阿姆巴尔逃往道拉塔巴德堡避难，在莫卧儿军队撤退后恢复了游击战。

① 同"萨利姆"（Salim）。——译者注

在这个当口，德干诸役同宫廷中复杂的王朝政治模式纠缠在一起。当贾汗吉尔命令库拉姆王子在德干取代他的兄弟帕维兹时，库拉姆拒绝动身前往 113 指挥德干战役，从而仅留下部分残废的库斯洛留在后方。他和努尔·贾汗劝说贾汗吉尔把库斯洛移交给努尔·贾汗的兄弟阿萨夫·汗监管。这样消除后顾之忧后，库拉姆率领一支大军前去征讨艾哈迈德讷格尔日益减少的部队。贾汗吉尔和他的朝廷一同迁往曼杜督战。在遭到失败后，马利克·阿姆巴尔把贝拉尔和艾哈迈德讷格尔完全丢给了那位莫卧儿王子。

随着库拉姆在德干的胜利和贾汗吉尔远游曼杜和古吉拉特海岸，努尔·贾汗集团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当这位皇帝在外游历5年半而终于1619年4月返回阿格拉后，政治风云在一年之内就发生了突变。贾汗吉尔的健康每况愈下到了努尔·贾汗（不得不）努力接管帝国日常运转的程度。由于库拉姆王子急于继承大统和越来越像君主一样行事，努尔·贾汗和库拉姆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作为回应，1620年，努尔·贾汗安排贾汗吉尔年方16岁的幺儿沙尔雅尔（Shahryar）同她的女儿拉蒂里·贝加姆（Ladili Begam）结婚。这样，当她丈夫死后，她将拥有一名受她控制的男嗣承袭帝位。努尔·贾汗和库拉姆彻底决裂了。这个大胆行动使三位王子——库拉姆、库斯洛和现在的沙尔雅尔——成为帝位的竞争对手。每位竞争者都拉拢了各自的贵族派系聚集在自己周围。

然而，皇帝一返回阿格拉，德干的叛乱之火又重新燃起。马利克·阿姆巴尔拒绝了强加给他的王国的条约，鼓励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派遣军队帮助他驱逐莫卧儿人。贾汗吉尔命令库拉姆率领一支援军（赶往德干），但这位王子拒绝领命，除非他能带走库斯洛。结果，贾汗吉尔很不情愿地把库斯洛移交给他的兄弟。

库拉姆长达6个月的辉煌战役最后以恢复帝国对艾哈迈德讷格尔的控制和迫使比贾布尔与戈尔康达交纳巨额赔款而告终。在这整个时期，艾哈迈德讷格尔既没有被完全征服和吞并，也没有沦落到纯粹纳贡国的地步。至少在30年里，一个共通的德干外交模式持续存在。对莫卧儿人的武力抵抗和临时臣服之间的变换，深深地影响了德干西部的政治文化。在这种互动中并非最 114 微不足道的参与者是西部的那些主要的马拉塔酋长。由于莫卧儿人无力对他们的故乡实施有效的政治控制，他们获得了自治、战利品和财富。

1621年中，贾汗吉尔病重的消息传到了布尔汉布尔。库拉姆秘密杀害了不幸的库斯洛，而后向贾汗吉尔谎称他的兄弟身染重疾，不治而亡。1622年1月，瓦兹尔伊提玛德–乌德–达乌拉突然亡故，留下他那悲痛不已的女儿努尔·贾汗孤苦无依。努尔·贾汗开始在阿格拉的朱木拿河畔的一座花园中修建他父亲的陵墓。这座精美的陵墓在6年后竣工，由镶衬着各种彩色纹饰的白色大理石砌成，成为莫卧儿时期的建筑宝藏之一。

库拉姆王子（沙·贾汗）的叛乱

1622年3月，当朝廷还在克什米尔时，沙·阿巴斯突然围攻和夺取了坎大哈要塞。尽管收到明确命令，库拉姆王子还是拒绝离开德干加入救援部队，除非他被授予指挥全权。最终，贾汗吉尔接受了努尔·贾汗的建议，允许他的儿子继续留在南方，而派遣他的一些贵族北上。贾汗吉尔任命年轻的沙尔雅尔为整支坎大哈远征军的统帅（另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贵族为副统帅）。库拉姆占有的一些扎吉尔（包括西萨尔乡）转给了沙尔雅尔。马哈巴特·汗，这个帝国中最有势力的贵族之一，从喀布尔赶回，加入努尔·贾汗/沙尔雅尔一派。

库拉姆确信他已经输掉了这场政治斗争，于是起兵反叛，带领德干军队从曼杜北上。几乎所有驻扎在德干、马尔瓦和古吉拉特的埃米尔和军官们仍忠于他的事业。马哈巴特·汗接掌了仍然效忠（于皇帝）的部队，他们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外同起事的德干军队开战。库拉姆在遭受血腥失败后，退回马尔瓦。就是在这里，他收到了来自古吉拉特行省财库中的100万卢比现金，得以为他的军队补充装备和兵员。贾汗吉尔和努尔·贾汗指挥忠于他们的部队进兵阿杰梅尔，收复了古吉拉特，把库拉姆逐出了马尔瓦。在他的军官纷纷弃他而去后，库拉姆带着一小支部队退回那座就位于布尔汉布尔（康德什的都城）城外的宏伟山堡阿西尔（Asir）。该城守将归顺了他。

这位反叛的王子被迫再次流离，他带着他的家人和日渐减少的随从到戈尔康达避难。库拉姆对来自阿卜杜拉·库特卜·沙（Abdullah Qutb Shah）的慎重支持倍感鼓舞，于是动身途经奥里萨前往东北地区。一次军事胜利让他控制了孟加拉和比哈尔。在获得新的资金、炮兵、战马和新兵员后，库拉姆

115

让他的部队沿恒河乘船溯流而上。在安拉阿巴德附近兵败后，库拉姆逃往孟加拉，那里叛变的柴明达尔又迫使他折而南下。库拉姆把他的妻子和他刚刚出生的四子穆拉德·巴克什（Murad Bakhsh）留在恒河岸边宏伟的罗赫达斯堡（Rohtas），自己动身前往他昔日的敌手马利克·阿姆巴尔的营地。令人不解的是，他在那里得到了庇护。马利克·阿姆巴尔卷入了一场同比贾布尔苏丹及其新盟友——莫卧儿皇帝——的战争。

库拉姆率领一支由尼扎姆·沙王朝（Nizam Shahi）部队和莫卧儿叛军组成的联军，连续数次奇袭布尔汉布尔。这些战役失败了，而这位王子也抱病在身——可能多半是因为沮丧不堪。新谈判达成的条款完全是由努尔·贾汗拟就的。库拉姆同意以德干诸省总督的身份继续留在南方，同时送他的两个小儿子——达拉·希科（Dara Shikoh）[1] 和奥朗则布（Aurangzeb）到皇宫做人质。

只是在经过了纵横数千英里的几番苦战后，贾汗吉尔和努尔·贾汗才成功地平定了这场嗣位之争。不管结果如何，帖木儿体系的最大弱点令人痛苦地显现出来了。具有雄才大略和勃勃野心的成年王子对占据帝位的人构成了持续的威胁，也成为持续的党争的焦点。

马哈巴特·汗的政变

库拉姆叛乱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帕维兹王子成为嗣位之争中的有力竞争者，而在此以前，他被视为一个整日里醉醺醺的庸人。马哈巴特·汗成为帕维兹的靠山和谋士。他们两个人联合起来威胁到了努尔·贾汗安排沙尔雅尔继位的计划。当努尔·贾汗提请人们注意马哈巴特·汗没有按惯例得到皇帝的恩准就让他的女儿同一名莫卧儿贵族订立婚约的事实后，公开冲突爆发了。这导致了对马哈巴特·汗未来女婿的逮捕、拷打和监禁。马哈巴特·汗陪送的嫁妆也被没官充公。

116

1626年3月，马哈巴特·汗选择直接同努尔·贾汗和阿萨夫·汗对抗，率领四五千拉杰普特士兵向北直逼朝廷。这位反叛的将军到达杰赫勒姆河

① 即达拉·舒科（Dara Shukoh）——译者注。

畔的帝国大营，在那里抓获了防守松懈的皇帝。努尔·贾汗被迫向马哈巴特·汗屈服。马哈巴特·汗现在已经控制了贾汗吉尔，于是在大营行进途中让这位皇帝恢复了其日常活动。在抵达喀布尔后，这位将军似乎没有清晰的计划，但仍继续看守这位皇帝，指导帝国事务。努尔·贾汗和阿萨夫·汗成功地在帝国骑兵（阿哈迪）、其他贵族和喀布尔市民中煽动起反拉杰普特人的情绪。暴力冲突造成了拉杰普特人大量伤亡。

在努尔·贾汗的精心策划下，贾汗吉尔摆出一副对他的忠实臣子和劫持者——马哈巴特·汗百依百顺的姿态。对皇帝的监控变得越来越松懈了。六月，在返回拉合尔的途中，当行至罗赫达斯城堡附近时，这位皇帝要求把他自己的皇家骑兵和曼萨卜达尔的骑兵集合起来检阅，并他要求马哈巴特·汗分散部署他的拉杰普特部队。皇帝的骑兵刚一集合完毕，马哈巴特·汗就立即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逃离了大营，托庇于身在德干的库拉姆王子。

在这出怪异的戏剧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哈巴特·汗并不曾试图伤害皇帝，也不曾试图以另一位帖木儿家族的人甚或他本人取而代之。相反，当他最初抓获贾汗吉尔后，马哈巴特·汗宣称他这样做只是出于无奈，因为他害怕会在针对他的阴谋中丧命或沦为阶下囚。在绝望中，他“斗胆冒昧地肩负起保护陛下的重任”。[①] 对所有当事人来说，这位帖木儿统治者仍然是权威的有力象征。

贾汗吉尔统治的结束

1626年10月，在德干的布尔汉布尔，帕维兹王子死于酗酒，时年38岁。当时有人怀疑库拉姆蓄意谋杀了他的兄弟。现在只剩下了沙尔雅尔王子（他娶了努尔·贾汗的女儿，是她当前中意的继承人）和库拉姆王子是帝位的成年候选人。在1627年的炎热时节，贾汗吉尔再次前往他喜爱的克什米尔避暑。不出数日，贾汗吉尔身染重疾。这位孱弱不堪的皇帝在返回途中，距离拉合尔不远的地方，于1627年10月28日驾崩。当他去世时，他的两个儿子都 117

① 参见：Beni Prasad, *History of Jahangir*, p. 404.

不在他身边。沙尔雅尔患有一种罕见的麻风病，头发全部掉光。他遵从医嘱先于贾汗吉尔皇帝返回旁遮普，希望平原上的温暖气候能帮助他早日康复。库拉姆则在南方的德干任职，相距千里之遥。

贾汗吉尔刚一咽气，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库拉姆王子秘密党羽的阿萨夫·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敢地阻止了他的姐姐努尔·贾汗扶助沙尔雅尔继位的计划。他让努尔·贾汗为停放在营帐中的贾汗吉尔守灵，从而把她牢牢地禁闭起来。他接管了由她照看的沙·贾汗的三名幼子。瓦兹尔派遣一名帝国信差南下，把库拉姆从德干千里迢迢地召回。同时，阿萨夫·汗得到了营地上大多数贵族的同意，宣布已经死去的库斯洛的幼子达瓦尔·巴克什（Dawar Bakhsh）为皇帝。这位不幸的青年王子只是作为一个将为库拉姆的利益而牺牲的卒子而被推出来的。

阿萨夫·汗借此迫使当时尚在拉合尔的沙尔雅尔王子作为一名篡位者同他的堂弟争斗。利用在拉合尔城堡的700万卢比财政资金，沙尔雅尔动员起一支由仓促拼凑起来的雇佣军组成的庞大而散乱的军队。就在拉合尔城外，他被阿萨夫·汗轻松击败了。沙尔雅尔在拉合尔城堡中被生擒，他被迫正式归顺达瓦尔·巴克什，而后遭到监禁和弄瞎双眼。

不出20天，那位帝国信差就抵达库拉姆驻地。这位王子即刻北上。沿途的莫卧儿官员大献殷勤，库拉姆则报之以封赏。他已经被视为皇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当这位王子横渡讷尔默达河时，传来了沙尔雅尔被阿萨夫·汗打败的消息。上述猜测得到了证实。库拉姆提前给已经带着皇帝一行赶到阿格拉的阿萨夫·汗下了一道谕旨，要他弄瞎——如果必要，杀死——沙尔雅尔、傀儡皇帝达瓦尔·巴克什和帖木儿皇族的其他成年堂兄弟。1628年1月19日，阿萨夫·汗囚禁了达瓦尔·巴克什。然后，他命令在礼拜五祈祷中诵读库拉姆的名字，从而宣告库拉姆为皇帝，尊号沙·贾汗（Shah Jahan）。两天后，当沙·贾汗的信函送达后，这位瓦兹尔下令处死沙尔雅尔、达瓦尔·巴克什和他的兄弟以及贾汗吉尔的兄弟达尼亚尔亲王（Prince Daniyal）的两个儿子。1628年1月24日，沙·贾汗进入阿格拉，被拥立为皇帝。

118

第六章　沙·贾汗：1628—1658年

119

在他登基后，沙·贾汗，这位次大陆上最重要的统治者，控制了广袤的领土，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财富。他是一个古老而完美的皇家世系的继承人。这位新皇帝对这些情况和他自己的力量的自豪是不加掩饰的——在同代人看来已近乎傲慢。沙·贾汗的信心并非毫无根据。他的能力已经在长年的军事征伐、外交斡旋和政治谋划中得到检验。1628年，在他的正式加冕礼上，这位好斗而干练的人承袭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那种身份。帝国和皇帝相得益彰。

沙·贾汗把他的都城建在阿克巴修建的宏伟的阿格拉城堡。直到1648年朝廷、军队和皇室迁往新竣工的帝国都城——位于德里的沙贾汗阿巴德（Shahjahanabad）以前，阿格拉一直是都城。新都城的精神和形式明显不同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正像他这个人一样，沙·贾汗的新城适合一个更加正式、更加可畏和雄伟的君主国和帝国。

汗·贾汗·洛迪

1629年，汗·贾汗·洛迪（Khan Jahan Lodi），一位拥有帝国最高爵位（6 000扎特和6 000苏瓦尔）的阿富汗裔贵族，逃离阿格拉，向德干地区艾哈迈德讷格尔的尼扎姆·沙（Nizam Shah）王朝统治者寻求避难。这个反叛行动，自阿克巴时代以来尚无先例，再加上汗·贾汗·洛迪同贾汗吉尔的非同寻常的关系而越发显得耸人听闻。它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发生一场遍布

各地的阿富汗人起义的可能性不仅不能被排除，还可能成为贵族忠诚危机的一个征兆。然而，汗・贾汗是为了活命才不得已反叛，推翻他的皇帝主子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在许多方面，他的反应是对一种新的、更少温情的帝王权威的反应。

年轻的汗・贾汗・洛迪原名毕尔・汗（Pir Khan），曾在征服孟加拉的最后阶段加入了拉贾・曼・辛格统领的阿克巴军队。[1] 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阿富汗裔曼萨卜达尔迅速成为达尼亚尔王子的宠臣，在达尼亚尔死后又成为贾汗吉尔的宠臣。正像这位皇帝那样，毕尔・汗对苏菲主义和神秘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获得3 000扎特爵位和萨拉巴特・汗（Salabat Khan）的新头衔后，他成为少数受到信任的贵族之一，可以经常在浴室的内觐见厅（*gusalkhana*）面见皇帝。皇帝甚至曾提到让他的这位门徒迎娶皇家公主。

120

汗・贾汗・洛迪一直得到贾汗吉尔的完全信任，即使他的成就乏善可陈。他指挥了一场失败的德干战役；在坎大哈失陷期间任木尔坦行省的总督；在库拉姆王子叛乱期间应召保卫阿格拉；最后就任德干总督。在最后一个职务上，他勾结艾哈迈德讷格尔的尼扎姆・沙王朝统治者，出卖了德干上的一大片称之为"巴拉加特"（Balaghat）的地区。就在贾汗吉尔驾崩之前，根据汗・贾汗的命令，这个地区的法乌吉达尔和其他莫卧儿官员就已经把他们的哨所让给了艾哈迈德讷格尔官员，退往布尔汉布尔。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汗・贾汗・洛迪从这项臭名昭著的交易中收取了30万金胡恩（*hun*）的酬金。

当贾汗吉尔死后，汗・贾汗・洛迪犯了一个错误，拒绝了沙・贾汗要求他在嗣位之争中予以支持的提议。他一度似乎甚至要抵制这位新统治者。然而，在最后，汗・贾汗・洛迪还是来到朝廷，但依旧疑虑重重——这同他与贾汗吉尔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新皇帝要求他解散他的部分追随者，他的一些扎吉尔也被收回。在经历了8个月日益加剧的紧张后，1629年10月，汗・贾汗・洛迪秘密携带他的家人和随从从阿格拉逃往德干。令人敬畏的巴拉哈的赛义德家族（Baraha Sayyids）的一名成员率领一队忠于皇帝的军官

---

[1] 关于他的传记，参见：Shah Nawaz Khan and Abdul Hayy, *The Maathir - ul - Umara* （New Delhi, 1st reprint edition, 1979）,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and Baini Prashad, 3 vols., I , 795–804.

追赶汗・贾汗，使他在多普尔附近涨满河水的昌巴尔（Chambal）河边的一场死战中险些丧命。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兄弟、女婿及其60名扈从战死，他的许多女眷和依附者则被遗弃在后面。在朱吉哈尔・辛格・邦德拉（Jujhar Singh Bundela）的帮助下，汗・贾汗和他的两个幸免于难的儿子成功抵达尼扎姆・沙・穆尔塔扎二世（Murtaza Ⅱ, Nizam Shah）的宫廷，受到欢迎，还被授权统领艾哈迈德讷格尔的军队。

1630年初，沙・贾汗派了3支独立的部队南下，随后也把他的朝廷迁往布尔汉布尔。在接下去的一年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拉锯战。无论是尼扎姆・沙王朝的军队，还是莫卧儿的军队，他们在行军途中都劫掠、焚烧和蹂躏乡村。这的确增加了正开始遭受长期旱灾和饥荒之害的民众的苦难。1630年的大饥荒作为德干和古吉拉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最悲惨的一次而将令人铭记。汗・贾汗・洛迪神态沮丧，斗志低落。事实证明他是一名无能的将领，在1630年末遭到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后，他带领几百名骑兵向北逃亡，经过马尔瓦，前往旁遮普。他希望能在那里得到阿富汗人的支持。然而，他却不断受到各地莫卧儿官兵的袭扰，最终被擒获处死。他的首级被送往南方，交给沙・贾汗。沙・贾汗在布尔汉布尔达布蒂河（Tapti）的一艘游船上接受了他的这份战利品。由一名高等埃米尔发动的一场最富戏剧性、潜在威胁也最大的叛乱被成功平息了。汗・贾汗・洛迪并没有从其他贵族那里获得重要的支持。

121

回归伊斯兰政治文化

在沙・贾汗时期，正统伊斯兰教回应阿克巴和贾汗吉尔政策的结果首次对官方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印度正统逊尼派穆斯林的大规模复兴主义运动中，纳克什班底亚—苏菲教团的著名领袖们站到了最前沿。这个教团中著名的个人魅力型导师——如死于1603年的科瓦加・巴齐・比拉（Khwaja Baqi Billah）——强调遵奉伊斯兰教法的极端重要性，但并不鼓励在他们的追随者中实行极端形式的神秘主义崇拜。[①] 像谢赫・阿玛德・希尔辛迪（见第五

① Sayyid Athar Abbas Rizvi, *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3），Ⅱ, 185–193.

章）及其儿子和信徒那样更具争议性的人物，在他们坚持伊斯兰教法法规的时候采取了极力反对什叶派和印度教徒的立场。[1] 显然是出于为防止逊尼派教众遭受异端和印度教同化能力侵害的关注，纳克什班底亚—苏菲派人士成为广大印度穆斯林态度转变的代言人。这并不局限于纳克什班底亚派信徒，沙塔尔（Shattari）、奇什蒂和其他著名的苏菲派教团也日益受到复兴主义情感的影响。这一时期苏菲派僧侣和俗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同时参加了数个教团，成为它们的成员，这确保了各种态度和信仰在帝国虔诚的逊尼派教众中迅速传播。

沙・贾汗与正统伊斯兰教的联系反映出次大陆上伊斯兰共同体日益定型和更加正式的形象。这位新皇帝明确的伊斯兰风格明显背离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形成的包容性的政治感召力。这些变化对莫卧儿政治文化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对所有虔诚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伊斯兰教法正像四大律法学派之一解释的那样，是唯一可接受的检验官方政策的试金石。沙・贾汗小心翼翼地开始用这个标准来审查莫卧儿的政策。一些作为教规采纳的新政策改变了阿克巴对非穆斯林普遍实行的自由主义方针。1633年，在他在位的第六年，沙・贾汗开始实施禁止建造或修缮教堂和神庙的伊斯兰教法规。当他获悉富有的印度教徒希望完成贝拿勒斯（Benares）几座尚未竣工的神庙的修建时，他下令拆毁这座城市中所有最近修建的神庙。[2] 在这首次毁庙风波后，只有那些遭遇战火的著名神殿受到了破坏。[3]

沙・贾汗以他的先辈们鲜见的热情庆祝伊斯兰教节日。例如，为了庆祝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Milad），1633年9月16日，这位皇帝举办了一场虔诚的庆祝大会，引人瞩目地在公共觐见厅的大堂上吟诵《古兰经》中的诗句。[4] 集聚在那里的知名乌里玛和苏菲派僧侣都得到了金钱的赏赐。[5]

皇家对圣城蛰伏已久的兴趣复苏了。沙・贾汗开始重新为年年在一名莫卧儿官员——朝觐官（Mir Haj）——的带领下驶向西部海港的朝觐车队

① Ibid., pp. 223–241.

② E. Bedley and Z. A. Desai, eds., *The Shah Jahan Nama of 'Inayat Khan*, （Delhi, 1990）, p. 154.Sri Ram Sharma,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Mughal Emperors*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Inc., 2nd edition, 1962）, pp. 86–87.

③ Sharma, *Religious Policy*, pp. 86–87.

④ *'Inayat Khan*, p. 207.

⑤ Sharma, *Religious Policy*, p. 81.

提供资助。每年都有两艘莫卧儿船只从古吉拉特驶往汉志，上面载着印度朝圣者。他们的费用由政府支付。[①] 为了兑现在他的登基大典上发下的一个誓言，沙・贾汗派了两名学者满载印度产品前去朝圣。这些产品将在麦加和麦地那出售，所得分给穷人。[②][③]在他统治期间，又派出了8个类似的使团。[④] 1643年，麦加的沙里夫贾伊德・宾・穆赫辛（Zaid bin Muhsin, 1631—1666年）向莫卧儿朝廷派遣了一个外交使团，受到热情接待。1650年，曾惊叹于莫卧儿宫廷财富和权力的前使团首领谢赫・阿布杜斯・萨马德（Shaikh Abdus Samad）返回印度，被封为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还受命担任军队的首席法官。[⑤]

孔雀宝座和泰姬陵

沙・贾汗对莫卧儿至高无上的深信不疑，在修建不同规模的纪念物上找到了创造性的体现。他定制的第一个作品"孔雀宝座"为新的庆典时代开了先河。在他的登基典礼上，这位皇帝留出价值1 000万卢比的钻石和其他宝石用于装饰新宝座。帝国最娴熟的工匠们历时7年才雕刻完精美的图案。所有可能的表面都镶嵌上了由数百颗雕琢精美的红宝石、翡翠、钻石和珍珠构成的花饰。华盖上方是那著名的"孔雀，其高高翘起的尾巴由蓝宝石和其他彩色宝石制成，身体由镶嵌着宝石的黄金制成，胸前有一颗硕大的红宝石，其下悬挂着一枚50克拉的梨形珍珠……"[⑥] 1635年3月，沙・贾汗在阿格拉堡的一次盛大朝会上登上了他的新宝座。

泰姬陵（Taj Mahal）是他的第二个工程，规模也更大。作为世界史上纪念建筑的杰作之一，这项工程受到特别的尊崇。1631年6月17日，在德干地区的布尔汉布尔，沙・贾汗深爱的妻子穆姆塔兹・玛哈尔死于难产（第14次

① N. R. Farooqi, "Mughal-Ottoman Relations: A Study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ughal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556-1748,"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86, p. 208.

② Farooqi, "Mughal-Ottoman Relations," p. 204.

③ Ibid., p. 206.

④ Ibid., pp. 208-209.

⑤ Ibid., p. 208.

⑥ Jean Baptiste Tavernier, *Travels in Indi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2 vols. 1889） Ⅰ, 381-384. 这个宝座本身在1739年波斯入侵者纳迪尔・沙（Nadir Shah）将其搬运出印度时遭到毁坏。

生育）。这位皇帝悲痛欲绝，陷入对她的哀思而不能自拔。这位皇后的遗体在由她的儿子——舒贾王子（Prince Shuja）运回阿格拉之前，临时埋葬在布尔汉布尔。穆姆塔兹·玛哈尔（最终）被埋葬在亚穆纳（Yamuna）河边的一块土地上。根据沙·贾汗的命令，帝国的建筑师和工匠们开始在墓地上方修建大理石墓基。这座陵墓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泰姬陵。

陵墓本身，连同其巨大的球状白色大理石拱顶和周围四座细长的尖塔，124 只是占地约42英亩的更大一座带墙建筑群的中心部分。一个由拱门和庭院构成的壮丽组合体提供了进入围墙花园的通道，（从那里）可以看到远端墓室的入口。这些花园本身分为4个部分，相互之间由两条互相交错的水道分隔开来。这整个建筑群是众多创新和巨大耗费的结晶，历时17年才得以完工。

沙·贾汗确实是为他的爱妻修建了一座陵墓。然而，在他的悲伤之外，这组陵墓建筑群还表明了皇帝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教在帖木儿帝国的中心地位。泰姬陵“是作为复活日的一个巨大象征来设计的。在那一天，死者将站起来走向圣座下面的审判地。”[①] 泰姬陵的每一部分，从最细微的装饰到最高大的建筑，都形成了旨在支持这种寓意的统一整体的各个部分。

泰姬陵的大门和花园是“天国伊甸园大门和花园的象征性复制品。”[②] 大门口代表了穆罕默德在他神奇地飞升天堂〔所谓的“米拉吉（Miraj）”〕时进入伊甸园的入口。花园中的4条水道代表了伊甸园中的4条河流。（花园）中央隆起的大理石水池代表了天国的丰裕池（Al-Kawthar）。大理石墓本身连同其球状拱顶是对天堂上帝宝座（Throne of God）的临摹。在复活日，上帝就端坐在伊甸园上面的这个宝座中进行审判。那四座尖塔可看作中世纪流行的宇宙学中提到的上帝宝座的四根支柱。

这些寓意在精心布置的、包含了《古兰经》诗句的长篇铭文中得到了明确阐述。这些铭文的设计和题写是由帝国书法家阿玛纳特·汗（Amanat Khan）完成的。对阿克巴墓，他也承担了类似的工作。大门的南面题写了第89章“黎明”（“The Daybreak”）的全文，其主题是“审判日”的内容。这一章以最令人恐惧的意象，誓言上帝将惩罚那些邪恶和自私的人。然而，

---

① Wayne E. Begley, “The Myth of the Taj Mahal and a New Theory of Its Symbolic Meaning,” *The Art Bulletin*, 1979, pp. 7–37.

② Ibid., p. 13.

在最后，这一章是以上帝对信徒的许诺结束的：[①]

安定的灵魂啊！

你应当喜悦地，被喜悦地归于你的主。

你应当入在我的众仆里；

你应当入在我的乐园里。[②]

泰姬陵就是那个乐园。穆姆塔兹·玛哈尔和她身边的沙·贾汗躺在位于上帝宝座下方的陵墓里。在其位置稍低的坟墓的墓志铭上，沙·贾汗被描述为伊甸园的门卫利兹万（Rizwan）。他所做的一切乃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努力，为的是塑造出一副浸透着上帝威严和权力的形象—— 一种极其伊斯兰化的形象。

新都：沙贾汗阿巴德—德里

1639年，沙·贾汗启动了他最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建设一座新都城。阿格拉的皇宫空间狭促，而城市本身也拥挤不堪。一个由建筑师、工匠和占星家组成的工作组推荐了德里正南面断崖上的一个地点，从那里可以俯瞰亚穆纳河。[③] 作为北印度古老的印度穆斯林帝国的中心，德里是特别合适的。一本18世纪早期的地理学概要的作者注意到，“（德里）一直是伟大的苏丹们的*dar al-mulk*（帝国京都）和伊斯兰教众的中心（markaz-i dairah Islam）。”[④] 印度早期征服者的陵墓和纪念建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德里还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宗教中心。数十位受人尊崇的圣人和苏菲派大师的陵墓就在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乡村。在每位圣

① Begley, “Taj Mahal,” p. 13 and n. 34.

② 这里的译文摘自：《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页。——译者注

③ Stephen P. Blake, “Cityscape of an Imperial Capital, Shahjahanabad in 1739” in R. E. Frykenberg, *Delhi Through the Age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3.

④ From “Bahjat al-Alam” of Hakim Maharat Khan Isfahani, Persian Manuscript Collection Ethe 729, India Office Library, folio 34a quoted in Blake, "Cityscape," p. 155.

人的忌日，数千名香客赶往德里，参加乌尔斯（urs）节[1]，庆祝他进入伊甸园。让人回想起穆斯林胜利和虔诚的纪念物，被牢固地镶嵌进这座新的都城。阿克巴曾拒绝让德里成为穆斯林征服据点的象征，但沙·贾汗却急于把德里变成这种象征。

在一个黄道吉日，即1639年4月29日，挖掘开始了。[2] 建筑工程稳步推进了9年。这座城堡及其建筑在它们的修建过程中耗费了600万银卢比。最后，一切都已就绪。在1648年4月19日这钦定的良辰吉日，沙·贾汗郑重其事地迁入沙贾汗阿巴德定居下来。接下来是数日盛大的庆典和皇帝的慷慨赏赐。在公共觐见厅上，贵族、学者和贤达名流聚集在一张巨大的刺绣天鹅绒遮篷下面。

126

沙贾汗阿巴德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宫廷城市。皇帝让雄伟的宫城——“吉祥堡”（*Qila Mubarak*）濒临河边，位于两条主干道交汇的地方。这座至今依旧屹立着的城堡筑有宽阔的、60—75英尺高的红色砂岩城墙，周长几近两英里，呈不规则的八边形。一条石头铺砌的、注满了水的护城河保护着陆地一边，亚穆纳河则保护着另一边。

城堡的南半部坐落着主体宫殿和许多供皇帝、后宫和家人使用的生活区及公寓。这些豪宅中最大的一处属于沙·贾汗的爱女贾汗·阿拉·贝加姆（Jahan Ara Begam）。城堡北半部有两座大花园，水池和水道贯穿其间。环绕在外墙四周的是官署、仓库、铸币厂、数十所工场和御厩。

在城堡正对面的一个小山丘上耸立着气势宏伟的聚礼清真寺——贾玛清真寺（Jama Masjid）。它是印度此类清真寺中最大的一个，能容纳数千人在里面祈祷。贾玛清真寺的旁边是一所免费为病人诊治的医院和一所宗教学校（madrasa）。就其气势和位置而言，贾玛清真寺构成了能够与那座雄伟的城堡比肩而立的标志性建筑。

这座宏伟的宫城是贯穿该市两条笔直而宽阔的干道的终点。从这座城堡的拉合尔门延伸出去是一条建有拱廊的宽阔街道，两旁排列着1 500

---

① 乌尔斯（urs），字面意思为“婚礼”，是南亚苏菲派圣人的逝世周年纪念活动，经常在圣人的圣殿或陵园举行。南亚苏菲派信徒主要是奇什蒂信徒，他们称他们的圣人为“求爱者”，上帝为“所爱”。他们称圣人的逝世为wisaal（与所爱和合），逝世纪念活动为urs（婚礼）。——译者注

② Blake, “Cityscape,” p. 155.

多家店铺和柱廊。这条大街和两旁的商店是由沙·贾汗的一个叫贾汗·阿拉·贝加姆（Jahan Ara Begam）的嫔妃设计和出资修建的。该市运河的一条支流从这条街道的中央流淌而过。数个广场中的第一个被称为“*Kotwali Chabutra*”，即治安官月台，位于公共区域的中心。在那里，城市治安官公开审判和惩戒罪犯。另一个大广场位于一个大水池的中央。贾汗·阿拉·贝加姆修建的一个萨莱（*sarai*）即旅馆位于这个广场的北端，一所哈马姆（*hammam*）即公共浴室位于另一端。夜间水池映月，这个广场因此被称为“银色广场”或“月光广场”（Chandni Chawk）。

另一条主干道从这座城堡的阿克巴拉巴德（Akbarabadi）门（阿格拉门）向正南伸展1千米多，通向城市（外）城墙的阿克巴拉巴德门。运河的一条支流在这条街道的中央流过。沙·贾汗的另一名嫔妃，纳瓦布·阿克巴拉巴蒂·贝加姆（Nawab Akbarabadi Begam），修建了两排商铺。在这座城门的正南面，纳瓦布·阿克巴拉巴蒂·贝加姆设计了一个大广场。在其一端，她修建了一座壮丽的清真寺，与它毗邻的是一个旅馆（萨莱），而在对面的另一端则修建了一所公共浴室。

127

沙贾汗阿巴德城墙里面的其余部分被运河和中央大道分隔成由贵族的府邸、清真寺和花园构成的街区（*havelis*）。这些显贵们的由高墙和士兵护卫起来的府邸包括了供贵族及其妻妾、他的官员和办事员、他的奴隶、仆役和士兵使用的各类私人生活区。最大的府邸可容纳5 000人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周围集聚着数以百计的商人、佣工和其他依靠大人物的慷慨和惠顾生活的市民的住所。

作为皇帝“住所”或“龙邸”的沙贾汗阿巴德是一件杰出的城市作品。每天，在这整座城市中，帝国朝会的奢华仪式都在较小的规模上被贵族们模仿着。他们在他们的府邸中举行朝会。每天，伊斯兰世俗和宗教生活的公共仪式都在这座大城市的集市、浴室、萨莱、花园和清真寺中举行。在其鼎盛时期，沙贾汗阿巴德构成了一个伟大帝国跳动着的心脏。

除了这三项工程，沙·贾汗在他统治期间还一直让他的建筑师和工匠们不断进行其他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包括完工于1637年的贾汗吉尔陵、拉合尔堡的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以及完工于1641—1642年的克什米尔的沙丽玛花园（Shalimar Garden）。希林·穆斯卫估计，沙·贾汗在他在位30年中花在建

筑上的全部费用至少有2 890万卢比。[①] 这个数值虽然惊人，但它却只相当于用在战争和领土扩张企图中的金钱的一小部分。

内部边疆的巩固

在沙・贾汗的强力领导下，帝国继续扩张。莫卧儿政权在次大陆上的每个地区都重组了政治关系，重塑了政治文化。甚至从前地处偏远的避难地区，也感受到了帝国权力的冲击。

128

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坐落在苏拉特和西部诸港通往德干的布尔汉布尔的主要路线上的拉杰普特人小王国——巴格拉纳（Baglana），一直是这个或那个穆斯林统治者的纳贡国。然而，1637年，沙・贾汗决定完全吞并这个小王国。莫卧儿军队在奥朗则布亲王（Prince Aurangzeb）的指挥下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这个王国。巴格拉纳的王公巴哈吉（Baharji）成为莫卧儿军中的一名位列3 000扎特品级的埃米尔，但他没能以世袭扎吉尔（watan jagir）的名义继续占有他从前的王国。相反，巴格拉纳被划入康德什省，受一名莫卧儿法乌吉达尔和省迪万代表的管辖。帝国开始在德什穆克和其他地方贵族的协助下从那里征收标准赋税。巴哈吉在被征服后不久死去。他的儿子皈依了伊斯兰教，晋封为道拉特曼德・汗（Daulatmand Khan），赐1 500扎特爵位，在康德什省以世袭扎吉尔的名义控制一个乡。

在横跨印度河下游的西北边境行省信德，政治权威的微弱和部落政体的极端破碎意味着莫卧儿人在他们能够实施标准化的帝国治理以前，不得不首先建立某种权威结构。截至沙・贾汗统治时期，这个过程进展良好。莫卧儿官员们对在那个不毛之地中以饲养马、牛、羊和骆驼为生的彪悍的游牧民施加了强大压力。[②] 从北面塞赫万（Sehwan）设防城市基地顺河而下，到纳萨普尔（Nasapur），再到位于印度河三角洲上的省都塔塔，沙・贾汗的总督和法乌吉达尔对俾路支和其他部落发动了惩罚性远征。尽管不时退避，但还

---

① Shireen Moosvi, "Expenditure On Buildings Under Shahjahan-A Chapter of Imperial Financi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ical Congress 46th Session* (Amritsar, 1985), pp. 285–299.

② Sunita Zaidi, "The Mughal State and Tribes in Seventeeth Century Sind,"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6 (1989), 343–362.

是有数千部落民遭到杀害或被卖为奴隶。由骑兵和火枪手驻防的莫卧儿小型要塞（*thanas*）组成了一个网络。这些政策打击了部落匪帮对居住在城镇附近的定居耕作者的掳掠和抢劫，使商队和河上交通变得较为安全。

莫卧儿的政策也试图从信德部落民那里征收赋税或劳役，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省税务官力图从每个牧民身上定期收取赋税。这些赋税是以现金而非牲畜的形式征收的。如果缴纳不出，就会招致一场惩罚性征伐。有时，税收也会予以减免，以换取对商贸或旅客的保护。族长被扣为人质，以确保 129 他们的追随者不为非作歹。信德的许多酋长接受了酬金、荣誉和作为“扎吉尔”的土地。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征税时得到莫卧儿人的支持。一些人甚至被赐予小块曼萨卜，作为对他们的友好态度的承认。那些掌管着陵墓和其他圣地从而能够调解部族纠纷的穆斯林苏菲派僧侣，获得了免税赠地和现金津贴，从而把他们同帝国事业联系在一起。

比较卑微的拉杰普特家族承受了新的压力。1531年，一个地位较低的拉杰普特部族——邦德拉族（Bundelas），强行在贝德瓦（Betwa）河上的乌尔查（Urchha）建起一座都城。[1] 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邦德拉族拉杰普特人中的庶支在那时已开始称为“邦德尔坎得”（Bundelkhand）的地区建立起其他几个部族中心。在阿克巴统治的早期，一支莫卧儿军队迫使邦德拉统治家族臣服和缴纳贡赋。

1595年，邦德拉王室的一名成员，比尔·辛格·德夫（Bir Singh Dev），应萨利姆王子的请求谋划了对阿布尔·法兹尔的暗杀。一俟登上帝位，贾汗吉尔就进行干预，排除了其他更可能的候选人，把比尔·辛格·德夫扶上了邦德拉王位。同时，这位邦德拉统治者当上了莫卧儿的一名高等埃米尔。他的王国作为世袭扎吉尔也继续保留在他的手中，条件与最大的拉杰普特贵族相当。在他于1627年去世（贾汗吉尔也在同一年去世）前，比尔·辛格凭借这些有利的条件积累了大量财富，确立起对邦德尔坎得的稳固统治权。

当比尔·辛格的儿子和继承者朱吉哈尔·辛格（Jujhar Singh）亲自到

---

① 科尔夫称邦德拉族是一个“冒充的”拉杰普特部族，它的成员不能在更大的内婚制拉杰普特联盟网络中同其他拉杰普特部族通婚。Dirk H. A. Kolff, *Naukar, Rajput and Sepoy: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Military Labour Market in Hindustan, 145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0–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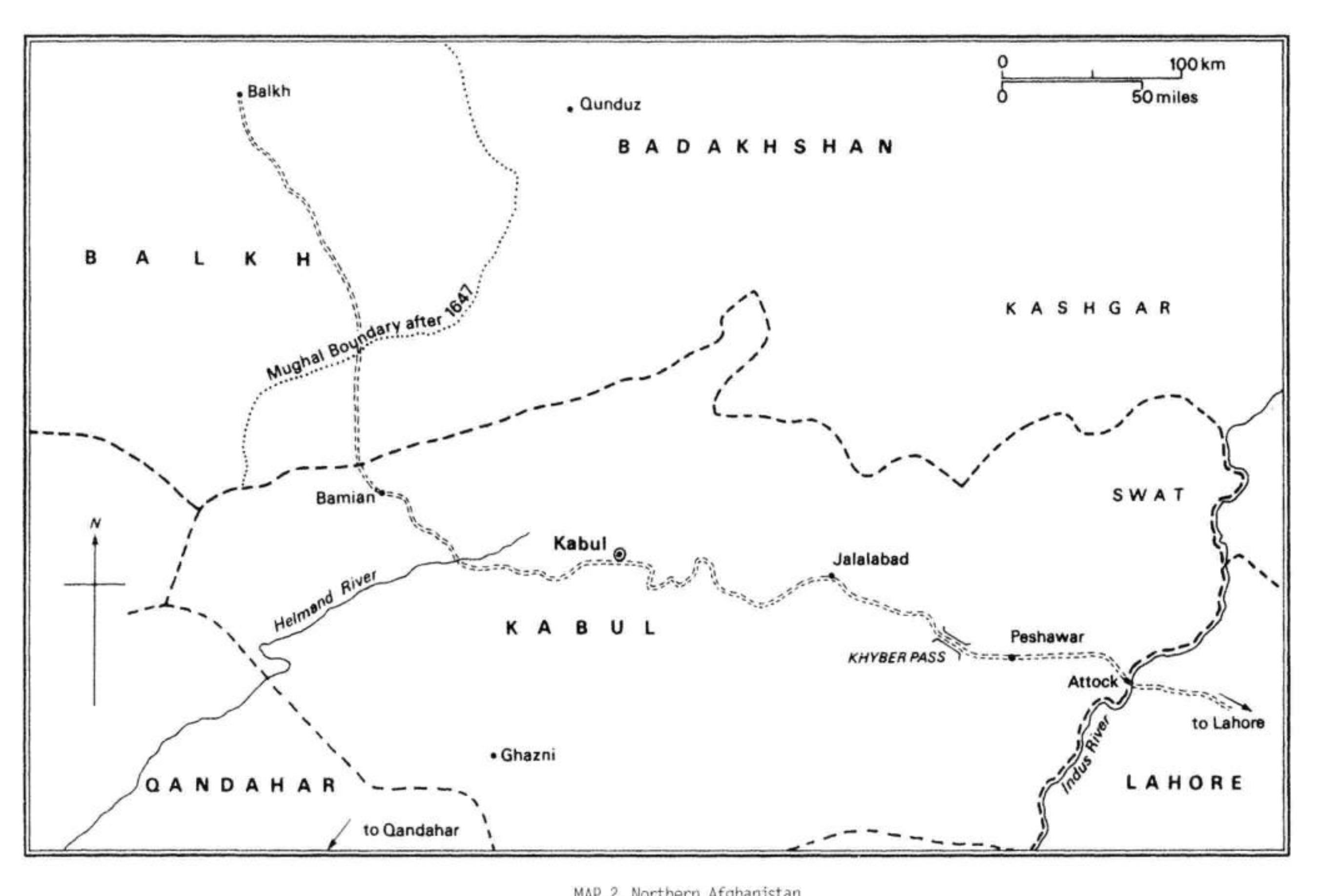
沙・贾汗宫廷朝觐时，这位皇帝启动了对那位已逝邦德拉埃米尔的地产的官方调查。这场调查可能是由那位已逝的拉贾在镇压沙・贾汗反对贾汗吉尔的叛乱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引发的。在这种前景的震慑下，朱吉哈尔・辛格未经允许就离开阿格拉，逃往乌尔查。沙・贾汗派遣了一支34 000人的部队予以追捕。帝国军队在捣毁乌尔查之前，首先摧毁了那座城堡周围的乡村。3 000邦德拉士兵殁于此役。遭此大败后，朱吉哈尔・辛格奴颜婢膝地祈求宽恕。沙・贾汗勒索了150万卢比赔款，40头战象（一种地区输出品），还吞并了一个县，将其置于帝国治理之下。这位皇帝还坚持让朱吉哈尔・辛格作为一名莫卧儿贵族亲自带领他的儿子和部队，投入到正在进行的德干诸役中冲锋陷阵。

130 当他最终于1634年返回乌尔查后，朱吉哈尔・辛格违反了帝国的准则，指挥军队非法地奇袭了与他比邻的统治者——冈德（Gond）的拉贾比姆・纳拉扬（Bhim Narayan）。邦德拉人进攻和占领了冈德人古老的城镇和要塞乔拉格尔，杀死了比姆・纳拉扬，攫取了在这座要塞中发现的100万卢比积蓄。由于对这位已逝拉贾的儿子心怀怨恨，沙・贾汗命令朱吉哈尔・辛格让出他已经占领的土地，把财宝交还皇帝，此外还要缴纳罚款。

朱吉哈尔・辛格对这道命令的公然违抗激怒了沙・贾汗。他派遣了另一支大军，以16岁的奥朗则布王子为名义统帅，入侵邦德尔坎得。莫卧儿军队再次迅速打垮了乌尔查，并安插了一位较为恭顺的统治者。德维・辛格・邦德拉（Devi Singh Bundela），一个显赫的邦德拉家族的首领和莫卧儿的曼萨卜达尔（为了支持比尔・辛格・德夫，他的世系曾受到贾汗吉尔的冷落），成为乌尔查的拉贾。

莫卧儿骑兵追击朱吉哈尔・辛格、他的家人及其残兵败将，一直追到了印度中部的另一个冈德人王国昌达（Chanda）的丛林地带。那时，这个王国还没有承认帝国的宗主权。当被莫卧儿军队追上后，朱吉哈尔・辛格的主要王妃被她们的奴婢杀害，而其余的王室女眷都被送进莫卧儿宫闱。（他的）两个幼子和一名孙儿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另一位拒绝改信的年龄较长的儿子立即遭到处决。朱吉哈尔和他的长子被赶入丛林，在那里被一群冈德人擒杀。

在昌达，莫卧儿将领强迫不幸的冈德拉贾支付巨额赔款，要其同意每年交纳80 000卢比贡赋或进奉20头大象。在乌尔查，在对邦德拉金库的严密搜



MAP 2. Northern Afghanistan
Source: I.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 1982), 14A.

地图2　阿富汗北部地区

Qunduz	昆都士	BADAKHSHAN	巴达赫尚
Balkh	巴尔赫	BALKH	巴尔赫
Mughal Boundary after 1647	1647年后的莫卧儿边界	KASHGAR	喀什葛尔
Bamian	巴米安	SWAT	斯瓦特
Helmand River	赫尔曼德河	Kabul	喀布尔
KABUL	喀布尔	Jalalabad	贾拉拉巴德
KHYBER PASS	开伯尔山口	Peshwar	白沙瓦
Attock	阿托克	to Lahore	通往拉合尔
LAHORE	拉合尔	Indus River	印度河
Ghazni	加兹尼	QANDAHAR	坎大哈
to Qandahar	通往坎大哈		

索中发现了价值1 000万卢比的金钱和财宝。沙・贾汗亲自前往乌尔查，观看这个地区秀丽如画的瀑布、山峦和宫殿。在乌尔查，“这位崇奉伊斯兰教的皇帝拆毁了比尔・辛格・德夫在他宫殿附近修建的高大宏伟的神庙，在其旧址上建起了一座清真寺”。[①] 这些对中印度内部边疆的入侵行动，使莫卧儿王朝对邦德尔坎得和冈德瓦纳的政治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132

西北边境上的失败：巴尔赫

17世纪40年代，沙・贾汗力图收复当时由他的夙敌乌兹别克人统治的帖木儿人在中亚的故土，以此测试莫卧儿实力的限度。乌兹别克人的领土包括了奥克苏斯河（阿姆河）北面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以及南面的巴尔赫和巴达赫尚。占据喀布尔和白沙瓦有助于确保莫卧儿西北边疆的安全，但像乌兹别克人那样的一支草原势力仍旧是北印度的一个无法预料和难以对付的威胁。

沙・贾汗同布哈拉的大汗保持着长期的外交联系，以便源源不断地获得有关那个汗国政治局势的情报。两边使用的最有用的使者是纳克什班底亚苏菲派僧侣。作为这一时期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成员，后者扮演了中心角色。莫卧儿皇帝们试图利用他们同这一教团的源远流长的家族联系。

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一个机会出现了。在经历了同自己的儿子阿卜杜尔・阿齐兹（Abdul Aziz）长达一年的失败内战后，乌兹别克统治者纳扎尔・穆罕默德・汗（Nazar Muhammad Khan）派遣一位特使到莫卧儿宫廷请求援助。沙・贾汗援引了他们之间长久的友谊和同为逊尼派穆斯林统治者的

① Abdul Hamid Lahori, *The Padshah Nama* （Calcutta: Bibliotheca Indica, 2 vols., 1867），Ⅰ, 121–122. Quoted in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eb*（Calcutta, 5 vols., 1912–1924），Ⅰ, 29.

宗教渊源，做出了友善的回应。

这位皇帝集合了一支带有野战炮兵的60 000人的大军，由穆拉德殿下（Prince Murad）统领。穆拉德领受的命令是要么让纳扎尔・穆罕默德・汗作为一名纳贡统治者复位，要么就干脆吞并这个王国。1646年7月，穆拉德王子和他的联合指挥官阿里・马丹・汗（Ali Mardan Khan）在只是遭到轻微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巴尔赫。这些帝国主义者把那位大汗金库中的1 200万卢比洗劫一空，但却未能抓获已逃离该城的纳扎尔・穆罕默德・汗和营救他的人。由于对巴尔赫阴郁而荒凉的风光感到心灰意懒，还不到一个月，穆拉德王子就吁请返回印度。沙・贾汗指派他的瓦兹尔萨杜拉・汗（Sa'dullah Khan）接替那位有失体统的王子，组织占领军。

为了准备针对阿卜杜尔・阿齐兹和尚未平定的乌兹别克人的春季战役，沙・贾汗从古吉拉特召回他的次子奥朗则布，派他到巴尔赫担任新的帝国总督。沙・贾汗本人则紧随其后，从喀布尔提供支援。当奥朗则布历尽艰辛进入巴尔赫后，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艰难的战争。乌兹别克人在付出了极大代价后发现了莫卧儿野战炮兵和火枪兵的威力。不过，在运动迅速的小规模战斗中，他们能够在机动性上胜过莫卧儿人，从而造成了一种僵局。在1647年夏，莫卧儿人坐镇巴尔赫，同布哈拉的阿卜杜尔・阿齐兹举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谈判。

133

令他们沮丧的是，帝国军队发现他们不能依靠这块土地自给自足。在这片荒凉的山地里，莫卧儿人找不到印度谷物运销商（*banjaras*）那样的商人。在印度，这样的商人通常会给他们提供粮食。劫掠（粮食）近乎徒劳无功，因为通常还算富饶的巴尔赫灌溉果园和粮田已在战争中遭到毁灭。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沙・贾汗和奥朗则布谈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不是同阿卜杜尔・阿齐兹，而是同他的父亲达成的。最后，在1647年10月，面对冬季开始的威胁，奥朗则布把这座城市和邻近的巴尔赫各县交给了纳扎尔・穆罕默德・汗，以换取一项在名义上臣服莫卧儿皇帝的和约。由于受到乌兹别克部队和四处劫掠的土库曼部落的不断袭扰，撤退中的莫卧儿军队在经过白雪皑皑的山口艰难返回喀布尔的途中遭受了数千人的伤亡。

在两年的持续努力结束时，1647年的莫卧儿—乌兹别克和约把帝国边疆从喀布尔向北延伸了大约40—50千米。至于其余部分，沙・贾汗不得不假

装满足于接受远在巴尔赫的纳扎尔·穆罕默德·汗对他的主权的形式上的承认。他的军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严重威胁到乌兹别克人在布哈拉的都城或接近于攻占撒马尔罕。

两年的乌兹别克之战显示了重申帖木儿王朝对人口稀少和贫瘠荒芜的中亚地区的统治所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根据官方的账目，沙·贾汗在征服那里的王国的尝试中耗费了4 000万卢比，而这些王国的全部年收入不过数百万卢比而已。莫卧儿王朝在这个地区寻找家族合法性的努力在路途遥远、资源匮乏和地方抵抗顽强的严酷现实下，终成南柯一梦。在某种意义上，莫卧儿—察合台王朝又一次没有能够打败他们的夙敌——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

西北地区：坎大哈

134 沙·贾汗的一个确定目标是从他的萨法维敌人手中收复坎大哈要塞。最终，在1638年，当波斯守将阿里·马丹·汗由于担心他会受到反复无常和性格残暴的沙·萨菲（Shah Safi, 1629—1642年）的杀害而把坎大哈献给莫卧儿王朝时，机会来了。沙·贾汗对这位杰出的和深受爱戴的萨法维贵族甚是欢迎，赐以5 000扎特和5 000苏瓦尔爵位，并立即任命他为克什米尔总督。

10年之后，沙·阿巴斯二世（Shah Abbas Ⅱ, 1642—1666年）决定对坎大哈采取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1648年冬，利用沙·贾汗在巴尔赫新败之机，萨法维军队在这位年轻的沙的率领下出发了。尽管事先得到了关于这场行动的警告，沙·贾汗还是听从了那些认为冬季战役不可想象的贵族们的劝阻，而没有派遣援军。斗志消沉的坎大哈总督在两个月内就投降了。

萨法维王朝的胜利立即引来了暴怒的莫卧儿皇帝的反应。在接下去的4年里，沙·贾汗对坎大哈发动了3次重大战役，每次都耻辱地失败了。1649年，沙·贾汗进驻喀布尔，组织了一支50 000人的大军，由瓦兹尔萨杜拉·汗和他最能干的儿子奥朗则布统率。这支军队抵达了坎大哈，但未能攻破这座要塞的防御，于是在冬季到来前撤退了。3年后的1652年，奥朗则布率领的另一支莫卧儿军队也未能在冬季到来之前攻陷这座要塞。莫卧儿人确实在一场激战中击退了一支波斯援军，但未能打破这座要塞的防御。

莫卧儿军队在这里的失败部分地反映出以位于帝国末端的喀布尔为起点的供给线过于漫长。同时，这也部分地反映了萨法维誓死守住坎大哈的决心。然而，在极大程度上它又说明，莫卧儿的攻城炮兵完全不能胜任这项任务。萨法维炮手给攻城士兵带来了持续的伤亡。而精准度较差的莫卧儿大炮却不能提供有效的掩护火力。许多莫卧儿大炮在填装弹药过多时还会爆裂，造成伤亡。

1653年4—9月间，沙・贾汗做了最后一次打破坎大哈防御的尝试。他派他的爱子达拉・舒科（Dara Shukoh）前去指挥一支更庞大的围城部队。后者为此项任务定做了3门用于攻城的大炮。当它们终于运达后，虽然这些新的攻城大炮的确成功地轰开了这座要塞的几处城墙，但并不及时。供给的减少和冬季的来临迫使（莫卧儿军队）又返回了喀布尔。沙・贾汗在1656年曾考虑进行第四次尝试，但他的谋士们说服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坎大哈依旧处在萨法维王朝的占领下，直至这个王朝自己在18世纪早期陷入困境。

两次入侵巴尔赫和巴达赫尚的尝试以及3次近距离围攻坎大哈，在几近10年的时间里消耗了莫卧儿的财富和精力。最后，沙・贾汗还是彻底失败了。他既没有抵达撒马尔罕，也没有保住通往印度的门户——坎大哈。代价是沉重的。正像莫卧儿历史学家萨迪克评论第二次坎大哈之战时所说的那样："除了血流成河，三四万人牺牲，以及3 500万卢比的耗费外，这次远征一无所获。"[1]

北　方

在喜马拉雅山麓，一个偏远的拉杰普特人山国——噶尔瓦尔（Garhwal），于1635年成功击退了一支试图把这个山国变成纳贡国的莫卧儿军队。莫卧儿人受到的打击如此严重，以至在几近20年后，沙・贾汗才派遣了另一支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再去进攻其都城斯利那加（Srinagar）。在这支军队被迫撤退后，这位皇帝又集合了一支4 000人的部队，带着大炮不辞艰辛地进入山区，威胁噶尔瓦尔的都城。在这个时候，即1656年，这个山国的拉

① Muhammad Sadiq, "Shahjahan - Nama," British Museum, Oriental 174. Folio 173a. As translated and quoted in Islam, *Indo-Persian Relations*, 114.

贾屈服了，同意交纳贡赋，送他的儿子到帝国宫廷听旨。①

在其他的地方，莫卧儿人确实成功地推进到了次大陆的边界山脉以外。在克什米尔北面的崎岖难行的高山国家，一小群穆斯林在一个称为“小西藏”（Lesser Tibet）或“伯尔蒂斯坦”（Baltistan）的山谷中艰难为生。在伯尔蒂山脉的阴影下，这里的居民从河流中淘取少量的黄金，饲养毛用绵羊，操持有限的养蚕业，还种植水果、小麦和大麦。② 当克什米尔的查克王国沦入阿克巴军队手中的时候，小西藏的穆斯林统治者为那个王国的最后一位什叶派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庇护。那个王族③ 的王子们有时会带兵杀回莫卧儿王朝控制下的克什米尔，进行劫掠。这种挑衅是莫卧儿王朝对他们眼中的这个“荒凉和赤贫之地”——这个地区每年只能向它的统治者提供100 000卢比的财政收入——发生兴趣的直接根由。④

136 1634年，这位阿布达尔（Abdal）在形式上承认了莫卧儿皇帝的主权，让沙·贾汗的名字出现在他都城的“呼图白”（khutba）即礼拜五祈祷会上。一俟他的名字在这个仪式上消失后，沙·贾汗即命令克什米尔总督扎法尔·汗（Zafar Khan）入侵小西藏。1637年春，扎法尔·汗率领一支由2 000骑兵和10 000步兵组成的军队，向北挺进150英里，翻过艰险的山口，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远征。在这些山口雪封之前，这支军队只有区区两个月的夏日天气可供利用。由于整条路线几近荒无人烟，入侵者带上了这次战役所需的全部装备。

当莫卧儿军队抵达后，他们遭到了顽强抵抗。面对莫卧儿火枪兵和下马战斗的骑兵的持续围攻，阿布达尔的军队奋力保卫着他们的两座主要山间要塞。直到莫卧儿人攻破这些要塞后，阿布达尔才投降。扎法尔·汗从阿布达尔的金库中索取了100万卢比的赔款，又命令他们要在礼拜五祈祷会上诵读沙·贾汗的名字，还把这位阿布达尔和一位查克王公作为俘虏带回克什米尔。⑤ 这一幕显示了这位皇帝的势力勉强能及的最大范围和莫卧儿将领及其

① Banarsi Prasad Saksena, *History of Shah Jahan of Delhi*（Allahabad, reprint of 1932 edition, 1973）, p. 123. Begley and Desai, eds., *'Inayat Khan*, eighth regnal year, Ⅰ, 269.

② 关于这个地区的物产，参看：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Delhi, 1982）, map 3^B 35^+ 75^+.

③ 指查克王族。这个王族的第一位国王是加兹·查克（Ghazi Chak）。——译者注

④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Delhi, 1982）, map 3^B 35^+ 75^+.

⑤ Saksena, p. 114.

部队在最佳状态下的技能、坚韧和效率。

东北地区

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的河滨地带，沙・贾汗最初满足于让有效的帝国控制边界保持在库奇比哈尔（Kuch Bihar）和卡姆鲁普[①]（Kamrup）一带。[②]在卡姆鲁普的都城哈焦（Hajo），一名莫卧儿法乌吉达尔守卫着通向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的前沿通道。越过这个前沿地带，卡姆鲁普被废王公的兄弟巴里・纳拉扬（Bali Narayan）作为阿霍姆王的附庸在达朗（Darrang）建立了一个深沟高垒、军力强大的缓冲国。双方都从活跃的贸易中获益。捕获的大象、从河中淘取的黄金、胡椒和木材是印度所需要的，而印度的大量纺织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的市场上销售得很好。

然而，1636年初，缓慢积聚的紧张关系在一场阿霍姆—莫卧儿战争中达到了顶点。这场冲突的爆发源于一名穆斯林阿萨姆商人的遇害。他是莫卧儿人派到阿霍姆人那里去的特使。在这场冲突的初期，巴里・纳拉扬和阿霍姆人围困哈焦，迫使它的守军投降。翌年，从孟加拉派出的一支莫卧儿人的两栖部队恢复了主动。1637年11月，在布尔毗塔（Burpetah）的水陆大会战中，莫卧儿骑兵、大炮、火枪和战舰摧毁了一支阿霍姆部队，把巴里・纳拉扬赶回了达朗。莫卧儿军队乘胜追击，大败阿霍姆的河上舰队，攻占了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水寨——卡扎里（Kajali）。擒杀巴里・纳拉扬后，莫卧儿人完成了对卡姆鲁普的重新占领了。 137

阿霍姆人的反应是倾巢出动他们的全部战斗舰队和陆军。1638年，在卡扎里附近，阿霍姆陆军和河上舰队驱逐了莫卧儿人，但损失惨重。在这个关头，阿霍姆王和莫卧儿法乌吉达尔达成了一项和约。阿霍姆人正式承认了莫卧儿人对卡姆鲁普的控制，而莫卧儿人则同意维持阿霍姆王国的独立地位。边界的修复给这个地区带来了20年的稳定。在签署这项条约后，沙・贾汗正

① 卡姆鲁普（Kamrup）现在是阿萨姆邦的一个县，它的名字源于阿萨姆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迦摩缕波”（Kamarpura）。——译者注

② 下文基于：Sudhindra Nath Bhattacharyya, *A History of Mughal North - east Frontier Policy*（Calcutta: Chuckervertty, Chatterjee & Co. Ltd., 1929）, pp. 256–286 and S. C. Dutta, The *North - east and the Mughals*（1661–1714）（Delhi: D. K. Publications, 1984）, pp. 23–28.

式承认了阿霍姆王朝的完全独立。如同西面的萨法维王朝，阿霍姆统治者依旧处在印度莫卧儿政治体系之外。

德 干

在贾汗吉尔去世时已经掌管德干的沙·贾汗，没有浪费什么时间就开始对德干残存的伊斯兰国家组织了外交和军事压力。在1630—1631年，当大饥荒尚在肆虐时，这位皇帝对汗·贾汗·洛迪的追逐使得莫卧儿军队对艾哈迈德讷格尔发动了一场重大战役。当时身在布尔汉布尔的沙·贾汗一得到这位叛乱者的人头，就又重启战端。1632年，德干的莫卧儿总督马哈巴特·汗带领一支军队成功地包围了道拉塔巴德要塞。这是在征服德干西部苏丹国——艾哈迈达巴德中的最后一幕。尼扎姆·沙王朝的年轻王子以前是马拉塔人将军沙吉·朋斯拉（Shahji Bhonsla）的傀儡，现在则成了恰好位于阿格拉南面的瓜廖尔要塞监狱中的终生国家囚犯。艾哈迈德讷格尔的许多穆斯林贵族和少数马拉塔人将领进入莫卧儿军队效命。在吞并的领土上，一名帝国总督、迪万和其他官员在新的行省施行统一的莫卧儿税例和行政管理。

138

受到最近取得的这场胜利的鼓舞，热情高涨的沙·贾汗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尚存的两个穆斯林苏丹国：位于德干西部讲马拉提语和卡纳达语的比贾布尔和德干东部讲泰卢固语的戈尔康达。1635年，这位皇帝向每个苏丹提出了一项专横的要求，要其承认莫卧儿霸权。每位苏丹都必须在（他们的）硬币上压出帖木儿王朝的头衔，在礼拜五祈祷会上诵读这位皇帝的名号，奉他为统治者，甚至还要求年年进贡，并接纳一名莫卧儿外交官进驻阿迪尔·沙（Adil Shahi）和库特卜·沙（Qutb Shahi）的宫廷。

戈尔康达的库特卜·沙统治者迅速答应了这些要求。而在那位阿迪尔·沙表示拒绝后，沙·贾汗派遣了3支莫卧儿大军齐集比贾布尔，把那里的乡村破坏得一片荒凉。面对确定无疑的失败，那位苏丹迅速投降了。强加的协议把这两个王国紧紧地置于莫卧儿的势力范围之内。由此，南面的帝国边疆得以稳定了几十年。

帝国概观

沙・贾汗的建筑显示了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扩张、财富增长和形势稳定。1647年，历史学家阿卜杜尔・哈米德・拉赫里（Abdul Hamid Lahori）在结束他对沙・贾汗在位最初20年的长篇记述时，概括了帖木儿统治的显著特征。[1] 其一就是沙・贾汗帝国的整个幅员。莫卧儿的版图从远在西北的信德延伸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锡莱特（Sylhet），从新近征服的巴尔赫向南伸展到德干诸省的南部边界。22个行省包含了4 350个基本的行政单位——乡。帝国是如此辽阔，以至于阿格拉或拉合尔行省中的许多大乡每年交纳的税收都超过了100万卢比。拉赫里自豪地指出，这个数额超过了巴达赫尚整个国家的全部预算。

其次，拉赫里强调了帝国税收的数量。"扎马"（jama）即帝国的年度课税额从仅仅20年前贾汗吉尔时期的70亿达姆剧增到88亿达姆。拉赫里把这种增长部分地归因于沙・贾汗时期人口和耕作面积的增长。在曾被战争弄得荒无人烟的德干4省和艾哈迈达巴德（古吉拉特），（人口和生产的）恢复特别引人瞩目。近来（在1636年莫卧儿人取胜和达成德干外交协议之后），这些地区恢复到了它们最初的繁荣状态。 139

第三，拉赫里赞美了他的圣主的财富和理财能力。阿克巴在他统治的51年里积累起大量财富，但贾汗吉尔却在其在位的22年间花掉了这笔积蓄的大部分。沙・贾汗克服了这种困难，成功地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为了增加他的积蓄，这位皇帝规定帝国的卡里萨应调整为12亿达姆，相当于3 000万卢比。这意味着近1/7的年度财政收入要直接流入帝国国库。这个数额比以前任何时候归中央金库支配的数额都要大。

尽管在军事和赏赐上靡费甚巨，沙・贾汗自登基以来还是积累了价值9 500万卢比的储备——其中半数是硬币，半数是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不过，他也花费了2 500万卢比用于修建各类宏伟的建筑，如在德里、阿格拉、拉合尔、喀布尔和帝国其他地区修建的清真寺、宫殿、城堡、陵墓、狩

① Lahori, *Padshah Nama*, Ⅱ, 709–716.

猎场和花园。

第四，拉赫里强调了帝国的军事实力。领薪骑兵计有200 000人。这个数目不包括法乌吉达尔和阿米尔[①] 招募的用来征税的地方兵士。曼萨卜达尔自己拥有8 000名骑兵。7 000名皇家骑兵（阿哈迪）和乘马火枪兵在宫中服役。其余的185 000名骑兵由王子、大贵族和其他曼萨卜达尔的骑兵分队构成。根据沙·贾汗九年颁布的条令，（实际）召集的骑兵数要达到名义苏瓦尔等级数的1/4。中央军计有40 000名徒步火枪手、炮手、投弹手和火箭手。其中的10 000名步兵听候皇帝调遣，其余则驻扎在各个行省和要塞。支付给直接听命于皇帝的骑兵和步兵的现金薪俸，每年高达6.4亿达姆或1 600 140 万卢比。付给曼萨卜达尔供其维持所属部队的薪金由他们领受的级别确定。

拉赫里的概述说明，由阿克巴创立的那些核心制度——这些制度曾十分成功地推动了（帝国的）扩张——在他的儿子和孙子那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相反，帝国的技术专家们改进和系统化了那些程序和政策。帝国的税收系统继续从印度农夫、工匠和商人的生产中征收巨额款项。评定税额在半个世纪里翻了一番。在阿克巴在位的第40年（1595—1596年），扎马总计40亿6 110万达姆，而1647年时为88亿达姆。[②] 这种增长可以部分地归结到领土的增加上。4个德干新行省和巴格拉纳王国在帝国税收中添加了18亿4 000万达姆，同时中亚的领土也添加了1亿8 000万达姆的税收。然而，扎马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归功于老行省耕作面积和产量的提高所带来的赋税增长。莫卧儿帝国的税收足以在增加中央储备金的同时，让沙·贾汗在军事、建筑和奢靡的宫廷生活上一掷千金。

17世纪上半叶，这种正规（扎巴特）税制覆盖的地域范围扩大了。留传下来的17世纪晚期的详细记录，证明德干诸省施行了统一的税收体系。在奥朗则布担任副王时，德干诸省的迪万穆尔希德·库里·汗（Murshid Quli Khan）成为德干4省纳税土地丈量和评税工作的设计师。[③]

---

① 阿米尔（amils），即收税官。——译者注

② Moosvi,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p. 194. 它给出的总数略高于上述第三章给出的扎马数额。

③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Ⅰ, 189–193; Shah Nawaz Khan and 'Abdul Hayy, *The Maathir - ul - Umara* （New Delhi: 1st reprint edition, 1979）,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and Baini Prashad, 3 vols., Ⅱ, Ⅰ, 304–309.

为了帮助遭受战争和饥荒蹂躏后的重建，穆尔希德・库里・汗启动了一项生气勃勃的计划。他为荒芜的村庄招募头人和居民，提供种子和耕牛贷款，提供打井或修建灌溉河堰的贷款。此外，他还向农民提供了持久的和平和安全保证。田亩测量和评税分队仔细记录地籍、灌溉设施以及可耕地和荒地等方面的情况。比较偏远的山村允许按犁一次性支付税款，或以分成制形式交纳赋税。不过，大多数村庄经过了赋税调查，都按扎巴特税例以现金纳 141 税。穆尔希德・库里・汗的体系形成了后来德干所有赋税征收（体制）——莫卧儿的和马拉塔的——的基础，直到19世纪早期英国征服后才告结束。

扎吉尔体系保持着其在财政和军事上的核心重要性，但在让评税额跟上扎吉尔达尔的薪俸需求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技术问题。农民的抵制、歉收和过期的土地测量和评税数据都促使每个村庄和乡的实际税收额低于最初评定的数值。政府不是每年更新扎马数值，而是采用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为了表明实际税收额与评税额的比率，以10年期记录为基础，村庄和乡按“月度”（“month-scale”）加以分类。稳定而富饶的地区如果收税额接近评税额，就被归入“十二月度”（“twelve-monthly”）的地区。这样的地区经常是卡里萨或亲王们的扎吉尔。那些主要位于德干的荒凉之地被贴上了“四月度”（“four-monthly”）的标签，其收税额只相当于评税额的四分之一。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基于这种“月度”的分数值。当曼萨卜达尔获得的俸地等级低于“十二月度”时，他们需要招募和供养的骑兵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①]

沙・贾汗还要处理他的贵族和曼萨卜达尔的名义上的苏瓦尔等级与其实际召集兵员之间出现的日益扩大的缺额（问题）。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扎特和苏瓦尔官秩的俸禄都从阿克巴时期的水平逐渐下降了。沙・贾汗不是提高薪俸和要求数值品级和实际兵员之间实现1∶1的比率，而是把这种比率调低到1以下。在他们的扎吉尔所在行省任职的官员要招募相当于他们的品级数值三分之一数目的全副武装的骑兵，那些在他们的扎吉尔所在地以外的行省任职的官员募集的兵员数量要达到品级数值的四分之一，而那些奉命远征（如前往巴尔赫）的官员则只需募集相当于品级数值五分之一的兵员。[②]

---

① M. Athar Ali, *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angzeb*（Aligarh, 1966）, pp. 46–48.

② Lahori, *Padshah Nama*, Ⅱ, 506–507.

但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莫卧儿军事实力出现了任何绝对的削弱。拉赫里所说的总数达200 000人的帝国装甲骑兵，还是大大超过了1595—1596年阿克巴供养的147 000余名骑兵。[①] 他关于曼萨卜达尔所属骑兵队的数目是根据四分之一这一水平计算得出的。

142

沙・贾汗对军事的关注没有扩大到武器方面。与阿克巴对火绳枪和大炮抱有浓厚兴趣不同，他的继承者中没有谁很关心火器的技术改进。改良的燧发枪很缓慢地渗透到印度军事市场上。曾在沙・贾汗时期遍游印度的方济会士塞巴斯蒂安・曼里克（Sebastian Manrique）评论说："大多数蒙兀儿士兵使用弓和箭。在他们的军队中携带火器的人是火绳枪手和没有品位的人，他们被称为'图方吉'（tufangis）。他们携带着火绳枪。这些火绳枪虽然制造粗劣，但如同过去一样，是令人生畏的武器。"[②] 皇帝和他的将军们似乎满足于使用那些能够很容易地从军事劳动力后备军中招募到的火枪手。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他们中亚传统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弓箭手依然受到莫卧儿人的青睐。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发现采用更好武器或更有效地配置火枪兵的努力。

炮兵是另一个困难的领域。自从1526年巴布尔在巴尼伯德首次使用野战炮以来，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到沙・贾汗时期，莫卧儿人自诩拥有发射60—120磅弹丸的重型大炮、发射8—12磅弹丸的轻型野战炮和架设在骆驼身上、发射3—5盎司弹丸的回旋炮。[③] 但正像波斯和中亚战役所显示出来的那样，进步是缓慢的。当被萨法维王朝优良的大炮刺痛后，沙・贾汗成功地铸造了一些可怕的攻城炮，并拖运到了坎大哈要塞。

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贵族，都没有支持军械学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大炮的铸造是欧洲或奥斯曼土耳其移民的职责，他们基本上被听任自行其是。一般说来，印度的铸铁技术是落后的。[④] 莫卧儿人也把布置大炮的技能拱手让给了各式各样领取高薪的欧洲和土耳其炮手。其中一些人能很好胜任，但另

---

① Moosvi，该书中列出了从10—10 000各个品级的1 823名曼萨卜达尔（第204页）；附录12 - A（Appendix 12 - A）中列出了4 441名御林军和141 053名曼萨卜达尔骑兵（第296页）。

② Sebastian Manrique, *Travels of Fray Sebastian Manrique 1629–1643* （Cambridge: Hakluyt Society, 2nd. series, No. 51, 1927），Ⅱ, 125.

③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 （Calcutta, 4 vols., 1907–8）, translated by William Irvine, Ⅰ, 265–6 and 316.

④ 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Ⅰ, 293.

一些人则的确不能。莫卧儿人在训练印度炮手方面并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　143

莫卧儿贵族的变化

拉赫里在结束他的史书时列举了帝国的各个贵族。他提到了一些穆斯林教长、乌里玛、医生和诗人，但避免提及任何一位非穆斯林。然而，他首要的关注点是确定那些效命于沙·贾汗、品级在500扎特以上的埃米尔和曼萨卜达尔。由于这是现今极为少见的系统列举莫卧儿贵族的文献之一，许多现代学者对它进行了大量分析。

1647—1648年，拉赫里提到了总计578个人的名字，其中133人已经去世，445名官员仍在担任现职。他严格按照数值品级顺序列举每一位官员，以反映他们在朝堂和皇帝眼中的优先次序。扎特爵位的分派通常在最高一级以1 000为单位累进，3 000爵位以下以500为单位累进，而1 000扎特以下爵位则以100为单位累进。拉赫里提供了第二种即苏瓦尔或骑兵品级（这种品级不能超过扎特品级）和（如果授予的话）补充的"二马，三马"（"two - horse, three - horse"）官阶。后者给予接受者更多的兵饷，赋予他们更大的招兵责任。

从拉赫里的列表和其他有关贵族的数据汇编中可以确凿无疑地看到，随着帝国的扩张，由曼萨卜达尔组成的军官团在人数和财富方面都有了稳步增长。即使在对官阶数量的膨胀做了调整后，这支帝国精英的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从阿克巴统治结束时的283名军官增加到1647年的445名。[①] 没有变化的是权力、军事指挥权和财富在这个小小的军官团体中的异乎寻常的集中。由大约73名拥有2 500扎特及以上官阶的亲王和大埃米尔构成的核心集团，确实是帝国的支柱。

这个列表从沙·贾汗的儿子——4位亲王开始。达拉·舒科作为长子和太子，拥有最高的帝国爵位：20 000扎特，20 000苏瓦尔，15 000二/三马。沙·舒贾、奥朗则布和穆拉德·巴克什按照年龄和品级的降序列出。正像附表显示的，这4位帖木儿王子的个人和招兵俸饷合计7亿2 400万达姆，相当

① M. Athar Ali, *The Apparatus of Empire: Awards of Ranks, Offices and Titles to the Mughal Nobility*（*1574–1658*）（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x.

144 于当期帝国评定税收的8.2%。[①] 他们要募集28 000名战马和装备达到官方标准的骑兵——这是按他们兵员品级的1/4计算的结果。通常，只把最富饶的“十二月度”扎吉尔分封给王子们。每年从这些扎吉尔上征收的（实际）税额接近于评定额。

表2　帝国精英：2 500扎特及以上的贵族[②]

达　姆（百万）	扎　特	（人数）	苏瓦尔	二/三马	兵员数（按1/4标准）
724	亲　王	4	42 000	35 000	28 000
400	7 000	4	21 000	15 000	12 700
88	6 000	2	8 000		2 000
929. 7	5 000	15	74 000	23 500	30 250
336. 8	4 000	10	29 400		7 350
743. 4	3 000	33	66 500	4 500	18 875
87. 2	2 500	5	8 500	2 000	3 128
合计					
3309. 1		73	249 400	80 000	102 303

帝国中爵位最高的4名贵族（通过比较得出）分别是阿里·马丹·汗、扎法尔·江（Zafar Jang）、伊斯拉姆·汗和萨阿杜拉·汗（Sa'adullah Khan），每人拥有7 000扎特和7 000苏瓦尔。除了萨阿杜拉·汗，他们都拥有5 000二/三马官阶。他们都是穆斯林：两人是伊朗裔，一人是图兰人（中亚人后裔），另有一人是印度裔穆斯林。他们合计享有4亿达姆俸饷（相当于全部帝国赋税的4.5%），可募集12 700名骑兵。

这73名核心精英接受和花费了33亿零910万达姆，令人吃惊地达到了帝国年评税总额的37.6%。他们要募集（根据1/4标准确定）102 303名骑兵在军中服役。单单为他们个人爵位支付的薪俸就达到了6亿4 350万达姆，相当于
145 全部扎马的7.3%。利用这些资金和他们侵占的雇佣骑兵的剩余资金，这些显贵供养了众多妻妾和奴隶，仆役和工匠，管事以及乐师、诗人和圣人。他们慷慨资助慈善活动，进行大规模建筑，向皇帝进献必不可少的礼品。这些贵

① A. Jan Qaisar, “Distribution of the Revenue Resources of the Mughal Empire Among the Nobility” in *Proceedings, Indian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ssion*, 1965, 27th session, pp. 237–243.

② 计算数据来自拉赫里的列表。这张列表的英文版参见：Athar, *Apparatus*, pp. 212–226.

族中的每一个都领导着一群地位较低的曼萨卜达尔。[1] 通常，这些低等曼萨卜达尔包括儿子、侄甥、叔舅和自己也拥有较高爵位、但一般说来依附和效命于其亲属的其他亲戚。另外，非亲缘的庇护纽带也把大贵族和低等贵族联结在一起。

表3　1647—1648年500扎特以上的曼萨卜达尔[2]

类 别	人 数	百分比（%）
穆斯林		
亲 王	4	0.9
伊朗裔	126	28.4
图兰裔	103	23.3
阿富汗裔	26	5.9
印裔穆斯林	65	14.7
其他穆斯林	29	6.6
小 计	353	79.8
印度教徒		
拉杰普特裔	73	16.5
马拉塔裔	10	2.3
其他印度教徒	7	1.6
小计	90	20.3
合计	443	100.0

穆斯林官员占据了高等曼萨卜达尔的4/5（见表3），而印度教徒在数量上仅占1/5。在各级官吏集团中，波斯和中亚裔（图兰人）的穆斯林贵族继续在人数和权势方面占主导地位。刚好超过半数的官员属于这两个集团（见表3）。尽管如此，随着帖木儿王朝招纳的本地贵族越来越多，这个精英集团的构成也变得日益混杂。在扩张过程中，这种趋势的后果是（莫卧儿）政权同地方社会的结合。在阿克巴和贾汗吉尔时期，由于他们在争夺北印度的激烈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阿富汗裔官员受到怀疑，因而在人数和权势方面也受到严重限制。但在沙·贾汗时期，更多的阿富汗裔官员获得了高等爵 146

① 关于稍后奥朗则布时期这种小集团的一个实例，参见：J. F. Richards, "Norms of Comportment among Imperail Mughal Officers" in Barbara Daly Metcalf, ed., *Moral Conduct and Author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260–261.

② 计算数据来自：Lahori, *Padshah Nama*, Ⅱ, 715–752.

位。有26名阿富汗裔贵族在列，刚好超过贵族总数的5%。这些人同阿富汗裔柴明达尔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从喀布尔到达卡的整个北印度至关重要的乡——的殖民地有着直接联系，还同西北山区走廊中的阿富汗人部落有着甚至更加重要的联系。

最初由阿克巴增补的两个平衡集团保持了它们的地位。包括巴拉哈的赛义德家族在内的65名本地或印裔穆斯林官员所占比例略低于贵族总数的15%。他们也同北印度的穆斯林柴明达尔保持着密切联系。

73名拉杰普特裔官员在人数上稍多一些。品级最高的拉杰普特贵族拥有5 000扎特和5 000苏瓦尔爵位，属于第三等大贵族，低于亲王和6位拥有7 000扎特和6 000苏瓦尔爵位的贵族。他们是那些最大的拉杰普特人王国的首领：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马瓦尔的拉索尔（Rathor）部族王公；贾伊·辛格（Jai Singh），安伯的卡赤瓦哈部族王公；拉纳·加扎特·辛格（Rana Jagat Singh），梅瓦尔地区西索迪亚部族的王公（Rana）以及高尔的王公比萨尔·达斯（Bethal Das）。另外还有5名拉杰普特人，包括邦德拉和哈达（Hada）部族的首领，跻身于拥有2 500扎特及以上爵位的大埃米尔之列。一般说来，在这个层次上，当皇帝批准了对拉贾（王公）职位的继承后，爵位的晋封就是自动的。分配给拉杰普特头领的扎吉尔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王国内的世袭扎吉尔。地位较高的拉杰普特官员通常担任战地指挥官这样的军职或法乌吉达尔那样的准军职。例如，几乎没有拉杰普特人担任行省总督。他们也不能就任于需要非军事技能的行政职位。

势力较单薄的拉杰普特贵族或者直接跟随他们的主人和亲戚服役，或者拥有帝国爵位，但仍是依附于他们的拉贾的小圈子的成员。这一年拉杰普特贵族的苏瓦尔爵位和二/三马爵位合计需要供养的部队，约占全部曼萨卜达尔部队中的23 500人。[①]

147 （贵族人数）最主要的增长是向南扩张的结果。两个官员集团在他们头衔的末尾带有“德干伊”（“Deccani”）的限定词。一些从前效命于某位德干苏丹的穆斯林贵族，现在加入了莫卧儿贵族集团。8个爵位在4 000—1 500扎特之间的人欣然融入了各种穆斯林贵族集团。

① 计算数据来自：Athar Ali, *Apparatus*, pp. 212-226.

10个品级在1 500—5 000扎特之间的马拉塔人军官同样转变为帝国官吏。最成功的是马鲁吉·朋斯拉·德干伊（Maluji Bhonsla Deccani），他拥有5 000扎特/5 000苏瓦尔爵位，他的兄弟帕素吉（Parsuji）的爵位则为3 000扎特/2 000苏瓦尔。马鲁吉·朋斯拉先前是艾哈迈德讷格尔苏丹国的一名高官，在沙·贾汗执政初期和他的两位兄弟一起加入了帖木儿军队。[1] 当马鲁吉的长兄在比贾布尔的苏丹·阿迪尔·沙（Sultan Adil Shah）的指挥下反过来同莫卧儿人作战时，马鲁吉和帕素吉由于继续忠于莫卧儿王朝而受到奖励。他们同他们的部队一起积极参加了围攻道拉塔巴德要塞、征服巴格拉纳以及其他德干战役。无人获得重要的行政职位，而是全都驰骋疆场。这兄弟两人“总是行事谨慎机智，博得了所有德干总督的欢心。马鲁吉带有几分温文儒雅，而且……他对朋友忠贞不贰”。帕素吉以其在生活方式中对莫卧儿习俗的喜爱而闻名遐迩。

和拉杰普特人不同，这10名指挥官的部属和亲属并未直接赏有曼萨卜爵位。结果，与他们的拉杰普特同行相比，马拉塔人仍旧是他们将军的私属，较为隔离和较少融入帖木儿政体。仅限于在德干部署的事实，进一步表明了皇帝对他们的接纳有限。

尽管如此，马拉塔人仍是贵族群体中一个全新的印度教徒和柴明达尔成分。甚至在阿克巴统治结束时，还没有一个马拉塔贵族被接纳进帝国军队，而在贾汗吉尔统治时期，也不过仅有一人而已。这种同化是在德干建立与地方社会联系的极为重要的一步。这在一个穆斯林只占全部人口很小部分的地区是特别重要的。

在德干，和北印度不同，莫卧儿人没有发现控制着土地上的农民的本地穆斯林豪强。在从前属于艾哈迈德讷格尔的整个德干西部地带，莫卧儿官员一直在努力恢复同马拉塔族中间人即在每个乡（subdistrict）控制着税收和地方权力的德什穆克们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如果帖木儿王朝能像德干苏丹们那样从马拉塔裔柴明达尔中招募代表，把他们安置在帝国政府的较高职位上，在这个地区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任务将会大大简化。　148

---

① Shah Nawaz Khan, *Maathir - ul - Umara*, Ⅱ, 42–5, translation; text Ⅲ, 520–24.

"宗室子弟"

莫卧儿贵族构成的变化同帖木儿宫廷文化和贵族风尚的变化步调一致。统治者同他的精英们的关系变得较不热烈而更形式化了——更多地表现为准亲属关系而非门徒关系。在他登基后立即发布的一道早期谕令中，沙·贾汗废除了在正式朝会上施行的极端匍匐礼（"斯吉达"）。这种礼仪受到阿克巴和贾汗吉尔的喜爱。大多数虔诚的穆斯林认为斯吉达礼是亵渎神圣的——这种极端的虔敬礼只应由信徒向上帝本身施行。通过废止这种做法，沙·贾汗安抚了正统派的感情，但也正式宣告了门徒关系连同其忠诚宣誓和成员标识同时被废止了。

贾汗吉尔经常在他的回忆录中使用"哈纳扎德吉"（*khanazadgi*）这个词，意指家族世代相袭地忠诚为官。自称"哈纳扎德"（*khanazads*，意为"生而富贵"）的拉杰普特人、图兰人、伊朗人、印裔穆斯林甚或某些阿富汗裔埃米尔，形成了贵族群体中的一个很大部分，即便没有占据多数。所有这些人都视在莫卧儿政权中服役及在那个政权中的优先权为他们的特权。哈纳扎德吉一直是门徒关系的核心价值所在：在效命于皇帝时忠诚、尽责、献身，但缺少了其浓厚的情感面向。从孩提时代起，每个哈纳扎德就受到（珍视）贵族和军事荣誉礼教的熏陶。武士荣誉和体面地臣服于皇帝是相容的。维护这种风尚的是帖木儿人的王朝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继续在塑造和影响着各种归属于莫卧儿皇帝的神圣性。[1]

哈纳扎德们完全适应了莫卧儿精装版的印度—波斯宫廷文化的光鲜夺目和雍容雅致。理想的哈纳扎德是高贵的、谦恭的和彬彬有礼的。他理解所有社交场合中复杂的行为规范——从朋友间最不正式的宴饮聚会到朝堂之上最严格的盛大公共仪式。他推崇并经常引用波斯文和可能的印度斯坦文或突厥文诗篇，欣赏印度斯坦的音乐、绘画和其他宫廷艺术。

149

受到皇帝个人注意的时刻不时进入每位哈纳扎德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他们会在公开的朝会上接受表彰、新头衔、荣誉和爵位的晋升。在其他场合，杰出的官员会得到在国君较私密的觐见厅中与之亲密会

① 参见：Richards, "Norms of Comportment among Imperial Mughal Officers".

面的恩遇。责备和惩罚也是可能的，并且经常发生。不过，沙・贾汗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待他们的官员方面还是比较温和仁慈的。莫卧儿显贵们没有受到萨法维王朝统治者那样恣意横暴的对待。上朝面君当然是令人紧张的，但也并非每日都有性命之虞。尽管受到了削弱和篡改，但一条情感的纽带确实持续存在于皇帝和帝国官员之间。

由于知晓其价值，皇帝对哈纳扎德吉进行培育和奖赏。贵族们在生下一个儿子后，就会向皇帝进献一份礼物，请求他为这个孩子取名字。皇帝要知晓和批准他的贵族子弟们的婚姻。某位埃米尔的所有儿子在成年后都要应召成为效命于皇帝的曼萨卜达尔。虽然他们不能得到其父亲的爵位和头衔，而且也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地产，但他们是提拔的对象，升迁很快。

哈纳扎德吉及与之相连的世代为官的好处也适用于在财政领域担任迪万或其他职务的官员。不过，在财政和科层管理方面的技能尽管是必需的，而且经常能带来优厚的待遇，但同将官和士兵们的技能相比，却无疑被认为在重要性上稍逊一筹。像穆尔希德・库里・汗那样一位有名的财政官也只是在他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时才被擢升为3 000扎特/500苏瓦尔的官秩。省迪万拥有的爵位通常低于行省总督甚至某些市政官或法乌吉达尔的爵位。尽管如此，忠于职守的风尚的确扩展到了低级官吏中间。

比姆森・萨克瑟纳（Bhimsen Saxena）是一名信奉印度教的曼萨卜达尔，来自卡亚斯特（Kayasth）种姓。他的自传揭示了哈纳扎德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弥漫到了受雇于帝国不同行政职位的各级技术官员中间。在比姆森看来，莫卧儿皇帝是“上帝的真正仆人和他的代理人”，他力图“促进和平和繁荣”。“帝国的果实”是人们的幸福和福利。比姆森——他的家族有着担任帝国行政官员的悠久传统——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哈纳扎德。他把自己看作帝国大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其低微却必要的工作，这个体系就不能运转。 150

家族世代为官的观念同对莫卧儿贵族生活方式的采纳一起对各种（高等和低等）品级和身份的人们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吸引力。与门徒关系不同，哈纳扎德吉要求效忠和顺从，但并不强求向一个个人魅力型的主人表示强烈的个人忠诚。在某些方面，向家族世代为官（观念）的回归是对成功做出的一种反应。和阿克巴不同，沙・贾汗不必诱导他的贵族殊死努力和义无反顾。

他的确希望（他们）在战斗中总是表现得英勇无畏，表现出职业士兵的一贯风尚。不过，贵族的成功还需要个人的感召力，需要对典礼和礼仪的关注，以及那些对各个地方的显贵们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和组织能力。那些愿意适应这些要求的印度教贵族和将军们能够获得赏识。

到17世纪中叶，莫卧儿帝国幅员辽阔，所向无敌，富甲天下，是德里苏丹们难以企及的。对一个伟大的帝国来说，沙贾汗阿巴德是一个适宜的新都城。帝国的象征和意识形态正缓慢地向伊斯兰正统主义回归。然而，到沙·贾汗统治结束时，这个帝国正在走向其最大的政治危机。

第七章　继位战争

151

在沙・贾汗统治的后半叶，莫卧儿帝国内由来已久的政治和观念冲突围绕着能力最强、势力最大的两位王子日趋尖锐。自由派发现沙・贾汗的长子达拉・舒科王子是一个善辩和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吸引了那些依旧忠于阿克巴的折中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贵族、帝国官员、学者、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保守派则发现沙・贾汗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则布是他们的支持者，后者吸引到他身边的是那些希望按照伊斯兰教法把帝国转变为一个更加正常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贵族、官员、神学家和官方乌里玛。后一派别从印度伊斯兰教内部日益显著的复兴主义运动获得了信心。到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其他主要的政策问题，如德干征服及莫卧儿与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关系的问题，加入到了这场对弈中。

这两位王子成为代言人，部分是因为他们的高等爵位、身份和他们布控的庇护网。然而在事实上，达拉・舒科和奥朗则布之所以重要的缘由在于未来。在沙・贾汗的4个皆已成年的儿子中，将有一人赢得不可避免的嗣位之争，而达拉和奥朗则布是最有可能胜出的人选。另外两位兄弟穆拉德和舒贾，尽管也是胜任的行政官和将军，但却被普遍认为是争夺帝位的较差人选。他们没有像达拉或奥朗则布那样采取如此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

达拉・舒科一直待在朝中，同皇帝保持着亲密的个人接触。作为备受宠爱的太子，他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他最大的同盟者是他的大姐——贾汗・阿拉（Jahan Ara）公主，在她母亲穆姆塔兹・玛哈尔去世后，她当上了皇家的女主人。

从他的求知欲、开明和对神秘主义的兴趣来看，达拉在许多方面是向他的曾祖父阿克巴的回归。他是苏菲派卡迪尔（Qadiri）教团两位主要教长——穆拉·米尔（Mulla Mir，仙逝于1635年）和穆拉·沙·巴达克西

125 （Mulla Shah Badakshi，仙逝于1661年）的热忱信徒。[①] 在他研究神秘主义的初期阶段，这位王子编纂了一部苏菲派圣徒传和一部叙述正统神秘主义信仰的著作。

从1641年开始，这位日益成熟的学者根据《古兰经》上关于没有一块土地没有留下先知指引的训示，确信《吠陀经》和《奥义书》构成了《古兰经》上提到的隐秘经典。他认为《奥义书》是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一神教的终极源泉。在他聘请的婆罗门学者的帮助下，达拉把52篇奥义书译为一部波斯文著作，取名《大密藏》（*Sirr-i Akbar*）。在随后编定的一本波斯文著作《两洋汇流》（*Majma'al-bahrayn*）中，这位学者型王子争辩说印度教的本质和伊斯兰教的本质是相同的。利用词汇相似性分析技术，达拉断定穆斯林苏菲派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实践同奥义书中的一致。例如，伊斯兰教中的*ruh*（即“灵魂”）就相当于吠檀多印度教中的“阿特曼”（*atman*）。苏菲派关于“爱”（love）的观念与印度教的“摩耶”（*maya*）即幻象的观念相同。达拉让人把《两洋汇流》译为一本名为《大洋汇流》（*Samudra Sangam*）的梵文典籍，以便印度教学者也能够阅读这本书。

这位王子只是成功地使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相信他是一个背教者，傲慢地忽略了伊斯兰教的祈祷义务和其他仪式。同三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成了他家的常客）的长期讨论及对他们的庇护，证实了这种印象。同印度教巴克提派圣人巴巴拉尔·瓦伊拉吉（Babalal Vairagi）的交谈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尽管达拉可能依旧是一个虔诚的一神论者，背教的外表还是使他在政治上易于受到乌里玛的攻击。

尽管他天生聪慧，达拉·舒科却是一名平庸的将军和一名感觉迟钝的首领，未能嗅到正确的政治氛围，也未能博得贵族们的同情。据说，他的过分自矜和傲慢令这个帝国中最有势力的埃米尔们深感屈辱。[②]

① 下面对达拉·舒科的讨论来自：Aziz Ahmad, *Studies in Islamic Culture in the Indian Environment*（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pp. 191–200.

② 对达拉缺点及其所树敌人的描述，参见：N.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Calcutta, 4 vols., 1907–8）, translated by William Irvine, Ⅰ, 221–226.

奥朗则布，沙·贾汗同穆姆塔兹·玛哈尔生的第三个儿子，具有完全不同的个性。尼克洛·马努西（Niccolao Manucci）对所见所闻的描述就足以说明问题了：[①] 153

> 这位王子迥异于其他王子，生性诡秘而严谨，行事深藏不露，但精力异常充沛。他性情忧郁，总是忙这忙那，希望实行正义，做出恰当的决定。他极其渴望世人承认他是一位智者，聪慧，热爱真理。他慷慨适度，只要适当，就给予奖赏，赠送礼物。不过首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伪装成一名行者（faquir），一名神圣的托钵僧，他由此弃绝了这个世界，放弃了对王位的一切要求，满足于在祈祷和禁欲中度过他的时光。

奥朗则布显然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人，一丝不苟地遵行伊斯兰教的公共仪式。他既不饮酒，也不食鸦片。在致力于他自己的精神探求的过程中，奥朗则布同乌里玛的成员或来自正统纳克什班底教团的教长进行了长谈。他热心地阅读《古兰经》、法学论文、安萨里（Al-Ghazzali）和其他著名伊斯兰学者的著作。不过，正像马努西暗示的那样，奥朗则布的虔诚并不妨碍他拥有世俗的雄心，长期在帝国高端政治中纵横捭阖。

作为一名老练的军事统帅和行政官，奥朗则布担任莫卧儿德干总督长达8年，担任古吉拉特总督长达3年，然后在入侵巴尔赫和对坎大哈要塞的最初两次围攻行动中担任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尽管他在这些职位上表现得尽心尽责，才能出众，奥朗则布同他父亲的关系依旧充满了怨愤和隔膜。在达拉·舒科和贾汗·阿拉的怂恿下，沙·贾汗经常，而且很多时候是不公正地，指斥这位最不讨他喜欢的儿子的各种缺点。奥朗则布在皇室中的首要同盟者是他的姐姐，即穆姆塔兹·玛哈尔的第四个孩子罗珊·阿拉·贝加姆（Raushan Ara Begam）。她不断向他通报有关皇帝和宫廷政治的消息。

1652年，在达拉指挥的第三次坎大哈战役以耻辱告终后，沙·贾汗再次任命奥朗则布前往治理德干诸省。接下去的5年里，帝国内部尖锐的冲突就是围绕着朝中的达拉和德干的奥朗则布之间的政治斗争展开的。

---

① Manucci, *Storia*, Ⅰ, 229.

围绕着德干的冲突

沙·贾汗派奥朗则布前往南方，吩咐他改革和恢复有效的帝国行政。自从奥朗则布1644年离任后，连续几任无能的总督、腐败的官吏、毁灭性的战役以及糟糕的农业年景，已经降低了这个地区的生产能力。许多村庄荒废了，从前耕作的土地现在已是荆棘丛生。每年，这里帝国财政收入的不足都迫使沙·贾汗给予补贴，以满足德干军政机构的花费。

在奥朗则布的坚强领导下，著名的税务官穆尔希德·库里·汗恢复了帝国农业体系的秩序和可预见性（参见上文）。为了促进农耕，穆尔希德·库里·汗在康德什和贝拉尔向农民出借大量贷款，让他们修复和扩大河水灌溉。在所有4个省份，他劝诱能人担任头领，还通过实行各种赋税减免，恢复废弃的村庄。[①]

帝国税收开始增加，但不足以弥补赤字。奥朗则布提出的增加从马尔瓦和古吉拉特转移资金的请求，导致他和沙·贾汗争吵不休。在一封措辞更加激烈的书信中，奥朗则布还主张占有来自戈尔康达的每年80万卢比的贡金。由于深陷预算危机，奥朗则布迫使他的父亲允许他入侵和吞并戈尔康达苏丹国。在17世纪，戈尔康达以其富有特别是它富饶的钻石矿而饮誉世界。但由于沙·贾汗本人作为王子举兵叛乱时曾托庇于戈尔康达，使他仍然对阿卜杜拉·库特卜·沙怀着友好的情感，因而否决了这次入侵。然而，奥朗则布并不罢休，他开始同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即卡纳塔克的库特卜·沙王朝征服者——米尔·朱姆拉（Mir Jumla）秘密通信。[②] 这个最初的行动把17世纪最著名的两位人物聚拢到了一起。

①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Calcutta, 5 vols., 1912–1924），Ⅰ, 187–194.

② “米尔·朱姆拉”是戈尔康达的库特卜·沙王朝给予穆罕默德·赛义德的封号（见下文）。——译者注

穆罕默德·赛义德："米尔·朱姆拉"

1636年强加给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的附庸身份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北部边疆，延缓了莫卧儿人的入侵。阿迪尔·沙王朝和库特卜·沙王朝统治者的一个确定不移的政策目标，就是通过劝说或贿赂阻止莫卧儿人在德干实行侵略性的前进政策。他们的北部边疆一旦得到条约的安全保证，每个统治者就可以放手向南扩张。

155

在东南平原和称为"卡纳塔克"（Karnatak）的高地地区，政治权力分散在许多泰卢固族和泰米尔族纳亚克（*nayaks*）手里。他们是伟大的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a）武士贵族的后裔。沙吉·朋斯拉（Shahji Bhonsla）的比贾布尔军队（现在效命于阿迪尔·沙）和其他阿富汗人和马拉塔人将军强行吞并了从帕拉尔（Palar）河〔位于马德拉斯（Madras）以南60英里处〕到高韦里（Kaveri）河①〔位于朱罗（Chola）心脏地带〕之间的地区。后一地区变成了一个行省，称为"比贾布尔属卡纳塔克"。这些征服把穆斯林政权的前沿向次大陆南端方向推进了500千米。

在17世纪40年代，来自戈尔康达的大批军队粉碎了本地人的抵抗，征服了位于北面的克里希纳河（Krishna）和帕拉河之间的卡纳塔克。这片富饶而肥沃的土地也称为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是新兴纺织工业的中心。数千织工、染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生产了几百万码的布匹，供应不断成长的海外市场。

这场胜利的策划者是穆罕默德·赛义德，一个具有超常禀赋的人。穆罕默德·赛义德是伊朗一个油料商人的儿子，年轻时作为一名伊朗商人的雇员迁移到戈尔康达。很快，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就在闻名遐迩的戈尔康达矿区获得了一张获利丰厚的钻石矿开采特许状，并迅速成为戈尔康达波斯商人和船东中的佼佼者。这些人定居在海得拉巴（Hyderabad）或大港口默吉利伯德讷姆（Machhilipatnam），同他们在戈尔康达统治精英中的波斯同乡保持着

① 一条流经现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杜邦的大河，英文中常拼写为"Cauvery"。——译者注

密切联系，并在这个王国的海上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

到1634年，有着超常组织技能和个人魅力的穆罕默德·赛义德已选择同戈尔康达的官方权力保持密切联系，以此获得更大报偿。在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体系下，戈尔康达的各级穆斯林官吏深深涉足商贸和航运。[2] 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通过各种垄断方法推进他们的商业利益。在很短时间内，穆罕默德·赛义德当上了默吉利伯德讷姆港口和其他沿海地区的总督。1638年，156 他自己升任王国的首相，接受了“米尔·朱姆拉”的头衔，他让他的代办们盘踞这些职位。

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作出的入侵卡纳塔克的谋划中，米尔·朱姆拉证明自己是一位天生的军事战略家和外交家。在10年（1642—1652年）当中，他的军队致力于扫荡分散的印度教武士及其部队的堡垒。他那些令人生畏的骑兵、步兵和炮兵甚至摧毁了信奉印度教的纳亚克们的最坚固的城堡。

到1652年，米尔·朱姆拉已经在为戈尔康达统治着海得拉巴属卡纳塔克——一个幅员几近4万平方千米、年税收400万卢比的王国。他的军职极大地增加了他的财富。从印度教神庙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和从新近征服的库鲁尔（Kullur）冲积钻石矿床（当时世界上最富饶的钻石矿床）获得的钻石，增加了他的营业资本。[3] 尽管他定期向北面的海得拉巴解送税款，但从戈尔康达式的包税体系中获得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留在了他的手中。米尔·朱姆拉日益扩大的商业帝国的代理商遍布莫卧儿帝国的各个市场，也出现在波斯、穆哈（Mocha）、缅甸、阿拉干（Arakan）和勃固（Pegu）等地。除了陆上贸易中役使的成群成群的驮畜，米尔·朱姆拉还至少掌握着10艘商船，穿梭于孟加拉湾和红海之间。

或许并不令人奇怪的是，米尔·朱姆拉同他的君主阿卜杜拉·库特卜·沙发生了冲突。在躲过库特卜·沙国王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后，米尔·朱姆拉转而投靠比贾布尔和莫卧儿帝国，以便为他自己和他新近建立的领地在另一个国家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

---

① Jagdish Narayan Sarkar, *The Life of Mir Jumla* （Delhi: Rajesh Publications, 2nd. Revised edition, 1979）, pp. 4–5.

② Sinnappah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5–225.

③ Sarkar, *Mir Jumla*, p. 77.

奥朗则布和米尔·朱姆拉

时刻都在等待时机的奥朗则布开始同米尔·朱姆拉通信。这位德干总督向米尔·朱姆拉提议：他把海得拉巴属卡纳塔克让给莫卧儿王朝统治，然后从南面进攻戈尔康达；与此同时，奥朗则布的军队则从西北方向突进。米尔·朱姆拉接受了奥朗则布的提议，从而成为入侵戈尔康达计划的同谋。

1655年11月，当阿卜杜拉·库特卜·沙失去了对米尔·朱姆拉的性情粗野的儿子穆罕默德·阿明（Muhammad Amin）——他是米尔·朱姆拉派往戈尔康达宫廷的特使——的耐心，把他投入监狱后，这就为奥朗则布动员沙·贾汗采取行动提供了所需的借口。这位皇帝晋封米尔·朱姆拉和他的儿子为高等莫卧儿埃米尔，并下令阿卜杜拉·库特卜·汗释放穆罕默德·阿明。然而，在戈尔康达统治者收到沙·贾汗的命令之前，奥朗则布就已经派遣了一支侵略大军进入戈尔康达。莫卧儿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海得拉巴城，那位库特卜·沙王朝统治者及其朝廷则退进戈尔康达城堡避难。在这里，他们被莫卧儿军队团团围住。在两个月内，米尔·朱姆拉和他的军队从卡纳塔克赶来，加入奥朗则布的队伍。

在这间歇，达拉·舒科和贾汗·阿拉在德里朝廷上收到了阿卜杜拉·库特卜·沙的代理人的提议。这位太子进行了干预，说服沙·贾汗迫使奥朗则布撤兵。这位库特卜·沙王朝的统治者将被迫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失去一些边境领土，并让他的一名女儿嫁给奥朗则布的儿子穆罕默德·苏丹（Muhammad Sultan）。不管他如何牢骚满腹，来自皇帝的一道罢兵令还是让奥朗则布只得撤军。

到年中，米尔·朱姆拉已经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北上到了沙贾汗阿巴德的帝国朝廷。在莫卧儿的瓦兹尔意外死亡后，沙·贾汗把那个职位授予了这位新来者，同时品级提升1 000扎特。沙·贾汗还同意把整个海得拉巴属卡纳塔克当作他的新任大臣的扎吉尔，并派遣帝国官员前往戈尔康达接受这块土地。奥朗则布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得力的朋友和拥护者。他迅速获得了对沙·贾汗的巨大影响力。在这位拥护者的帮助下，奥朗则布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赢得了那位皇帝的赞许。

1656年11月，身染沉疴已达10年的穆罕默德·阿迪尔·沙去世了。他的18岁的儿子阿里·阿迪尔·沙二世（Ali Adil Shah Ⅱ）面对的是党派林立的贵族和乘机反叛的柴明达尔。奥朗则布和米尔·朱姆拉早已拟就了一个计划，一俟盼望已久的穆罕默德·阿迪尔·沙的去世成为现实，就入侵这个王国。奥朗则布一直忙于挑唆众多在比贾布尔服役的贵族和军事将领。

沙·贾汗批准了这次入侵，还派米尔·朱姆拉带兵前往襄助。1657年中，当莫卧儿军队即将攻取都城比贾布尔时，沙·贾汗在达拉·舒科的再次恳求下，下令奥朗则布中止这最后的征服。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满足于接受一大笔战争赔款和接手当时已经占领的土地。皇帝命令米尔·朱姆拉返回德里。1657年9月，在奥朗则布被迫撤退途中，沙·贾汗生病了。声势浩大的莫卧儿嗣位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158

战　争

在一场积蓄已久的、痉挛性的政治危机中，沙·贾汗的辉煌统治结束了。当这位皇帝染病后，在成年的帖木儿王子们之间压抑已久的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为一场四边继位战争。这场战争使作为指定继承人居住在宫中的达拉·舒科与他的3位弟弟兵戎相见：穆罕默德·舒贾，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总督；奥朗则布，德干4省的总督；穆拉德·巴克什，古吉拉特和马尔瓦的总督。他们都是穆姆塔兹·玛哈尔的儿子，因而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而非同父异母兄弟。尽管沙·贾汗表达了对他的长子达拉·舒科的偏爱，但帖木儿的皇子采邑体制（appanage system）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继承惯例。

这是可怕对手之间进行的一场血腥斗争。达拉、舒贾、奥朗则布和穆拉德相互征伐，而那种（兄弟间的）热忱和亲密则只能深埋在这些具有不同个性的兄弟心中。每位王子都拥有帖木儿家族的魅力和皇室权威。这使他们对帝位都有无可争议的要求权。每位兄弟都在战争、治国和行政中久经历练，从而能够得到极其干练的军政人员的效忠。每位都控制着一个力量基地，拥有充足的财源，能够召集大量装备精良的部队。只有一位竞争者能获得帝位，其他人将走向坟墓。

当沙·贾汗未能主持每日的朝会后，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

落。在德里，集市上的店铺持续关闭数日，而公众也甚为焦虑。[1] 在宫内，只有达拉、他的医生、他的女儿贾汗·阿拉和少数几位受到信任的官员获准探视皇帝。达拉迅速掌握了局势。他抓捕了他的兄弟们的代理人和耳目，对他们与他们主人间的所有通信进行监控。沙·贾汗的与世隔绝和达拉的审查监控引起了人们对皇帝要么已经龙驭上宾，要么完全不能自主的猜疑。一个月后，皇帝病情好转，能够出现在公众面前。此后，这位心神沮丧、身体欠佳的皇帝便缓缓移驾阿格拉，以临近他妻子的陵墓。

159

在孟加拉，穆罕默德·舒贾王子立即在拉杰默哈尔自立为王，率领他的骑兵、炮兵和河上舰队溯河而上，进逼阿格拉。在瓦拉纳西（Varanasi）附近，他的军队与一支从德里出发、由达拉之子苏莱曼·舒科（Sulaiman Shukoh）亲王和拉贾·贾伊·辛格（Raja Jai Singh）率领的防御部队遭遇。1658年2月中旬，在清晨发起的一次成功的奇袭击溃了孟加拉军队。舒贾和他的残兵败将沿河逃往蒙吉尔（Monghyr）。

在南面的古吉拉特，穆拉德·巴克什立即派遣一支6 000人的部队从苏拉特商人那里勒索了50万卢比的强迫借款，并围攻这座要塞。这座要塞的守将（由皇帝单独任命）拒绝投降。12月5日，在拒绝接受他父亲康复的消息后，穆拉德举行了公开的加冕仪式。1月初，苏拉特要塞连同其财宝和贮备落入穆拉德之手。随后，穆拉德准备北上。

在德干，（皇帝病重的）消息传到奥朗则布耳中时，恰值他正要同比贾布尔苏丹缔结一项和约。之前，他已成功地入侵了那个王国（见上文）。[2] 在10月至1658年1月初期间，奥朗则布力图一边向比贾布尔强加惩罚性的和约条款，一边准备争夺帝位。然而，同舒贾和穆拉德不同，奥朗则布没有迈出像自立为王那样无法逆转的一步。他转而致力于同穆拉德保持频繁的秘密通信，同舒贾也保持着比较热络的联系。在艾哈迈达巴德和奥兰加巴德之间，装在竹筒中的加密信函通过信使经由新近设立的专门中继站不断传递。在数周之内，奥朗则布和穆拉德就达成了一项联合行动的计划。如果他们打败了他们的兄弟，奥朗则布将让穆拉德作为一名独立的国王统治旁遮普、阿

① 马努西是达拉·舒科的一名年轻炮手，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全面描述了这场战争。参见：Manucci, *Storia*, Ⅱ, 229–386.

②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Ⅱ, 278–79.

富汗、克什米尔和信德，而他将统治其余的领土。与此同时，通过四处游说，奥朗则布诱使德干的大多数高等贵族站到他的一边。

1658年2月初，奥朗则布命令他的部队北上。在冈比拉（Ghambira）河上的达尔马特（Dharmat）村，他和穆拉德兵合一处。在这里，他们遇上了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Jaswant Singh Rathor）指挥的沙·贾汗部。在随后的战斗中，奥朗则布利用布置得当的大炮和骑兵打败了皇帝的军队。皇帝的残兵败将狼狈逃回德里。[①]

160

在德里，达拉重建了一支50 000人的队伍，在阿格拉南面的昌巴尔河上以防御姿态等待他的兄弟们来犯。奥朗则布在找到一处没有设防的浅滩后，从侧翼包围了他。在阿格拉附近亚穆纳河上的萨姆加尔（Samugarh）村，这两支军队对峙于一片宽阔的平原之上。5月29日，在印度的炎炎夏日下，嗣位之争中的大决战开始了。奥朗则布高超的战术和纪律相对严明的炮兵和骑兵胜过勇猛的拉杰普特骑兵的反复冲锋。最后，在这一天临近结束时，达拉从他的战象上跌落下来，然后乘马逃离战场。一场大溃退开始了。

大约夜里9点，达拉和他的一小支随从抵达他在阿格拉堡的府邸。由于无颜面对他的父亲，他在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在他的家人和少数几个扈从的陪伴下，携带着他的财宝逃往德里。奥朗则布攻占了阿格拉城，在谈判失败后又开始围困他那身在阿格拉堡的父亲。在被切断来自亚穆纳河的水源后，沙·贾汗于1658年6月8日投降，成为他儿子的阶下囚。阿格拉堡的巨大财库和军火库落入奥朗则布之手。

达拉只在德里做了短暂停留，随后就又前往拉合尔。当奥朗则布开始追击后，他和穆拉德之间的紧张加剧了。尽管受到警告，穆拉德还是在6月25日进入他兄弟的大帐吃晚饭。在这里，他被解除武装，沦为阶下囚，随后就同他的儿子一起被送进大牢。次日，奥朗则布收编了穆拉德群龙无首的部下。

奥朗则布在德里逗留了很长时间，于7月21日在沙丽玛尔（Shalimar）花园自立为帝，号“阿拉姆吉尔（Alamgir）”，即“世界霸主”。这一举动标志着嗣位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时，虽然结局实际上还并非确定无疑，但奥朗则布在此后对付他的兄弟时已具有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

① Ibid., pp. 20–25.

当奥朗则布的军队跨过萨特莱杰（Sutlej）河后，达拉惊慌失措，沿印度河南下逃匿，而他身后追赶他的是奥朗则布的部分军队。在巴卡尔（Bhakkar）这座河上要塞，他丢弃了他的部分军队、重炮、上千万卢比财宝中的一大部分以及许多依附者。达拉带着数名侍从向南逃至阿拉伯海边。他最终从那里逃到古吉拉特避难。

到9月底，奥朗则布把追击达拉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军官，以便应付新的威胁：他的兄弟舒贾。舒贾拒不相信奥朗则布让他偏安东方的诺言，召集了一支25 000骑兵的部队和一支河上舰队溯河而上。12月末，奥朗则布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苏丹携手同舒贾作战。尽管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在最后一刻带领他的拉杰普特骑兵投向舒贾，奥朗则布的军队还是在人数和大炮方面大大超过了孟加拉军队。在遭到溃败后，舒贾带领他的残部落荒而逃。

161

在这期间，达拉在古吉拉特重拾勇气，募集资金，征召了一支20 000人的部队，北上解救他的父亲。当他抵达拉贾斯坦的阿杰梅尔时，由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保证忠于其事业的数千拉杰普特武士并没有出现。相反，达拉面对的是他的劲敌——他的兄弟奥朗则布——率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1659年3月中旬，奥朗则布的军队在阿杰梅尔城外的小山上经过3天浴血奋战击溃了达拉的部队。达拉侥幸偷生，再次逃亡。

在返回德里的途中，奥朗则布踌躇满志，盘算着再举行一次真正盛大的登基大典。1659年6月5日，在一个良辰吉日，奥朗则布在沙贾汗阿巴德堡的公共觐见厅上登上宝座。一位司仪在“呼图白”仪式上大声诵读他的名字和头衔，而新铸的硬币也同时发行。不过，继位战争的善后事宜依旧存在。

达拉被迫再次逃亡后，在接下去的3个月里四处流浪，力免被擒。从古吉拉特，到卡奇沼泽地（the Rann of Kutch），再到锡斯坦和博兰山口（Bolan Pass），他找不到什么资助和慰藉。最后，他得到了马利克·吉万（Malik Jiwan）的相助。马利克·吉万是一名阿富汗酋长。数年前，达拉曾在德里的刑场上救过他的命。当他们到达后，一名帖木儿裔公主，即达拉心爱的妻子娜蒂拉·巴努（Nadira Banu），死于痢疾。达拉让他的大部分卫兵护送她的遗体到拉合尔安葬。一俟他的卫兵离开，马利克·吉万就逮捕了达拉，并向印度河边追捕他的人通报。

当达拉·舒科作为一名囚犯抵达德里后，奥朗则布先是拿他在该城的大

街上游行示众，予以公开羞辱。达拉的出现和他过去的慷慨唤起了许多民众的同情。当夜，奥朗则布、他的姐姐罗珊·阿拉（Raushan Ara）和他的谋士们在商议后决定处死达拉。官方乌里玛以背教和崇拜偶像的罪名判处达拉死刑。1659年8月30日夜，两名奴隶杀死了达拉和他最小的儿子希皮尔·舒科（Sipihr Shukoh）。

162

随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又发生了一场严酷的水战，由米尔·朱姆拉统率帝国军队擒拿舒贾王子。舒贾向东且战且退，直至最后他的部队在坦达（Tanda）受到决定性的打击，溃不成军。1660年5月初，舒贾带着他的家人和少数亲信部队乘船离开达卡，投奔到四处掠夺的阿拉干国王那里避难。在这里，由于被怀疑密谋反对阿拉干王，他终究难逃一死。

只有穆拉德·巴克什作为奥朗则布的俘虏在瓜廖尔堡的国家监狱中苟延残喘。1661年初，一次由忠实于穆拉德的一些莫卧儿官员谋划的营救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他留下来依旧是一个威胁。这次，奥朗则布没有简单地处死穆拉德，而是安排了一场谋杀讼案。在继位战争开始时，由于怀疑古吉拉特的迪万是沙·贾汗的追随者，穆拉德怒而刺死了他的这位同僚。在奥朗则布启动调查后，那位迪万的次子要求按照伊斯兰教法为他父亲的死讨还公道。瓜廖尔堡的加齐（qazi）负责审理此案，最后宣布穆拉德有罪。那个儿子拒绝接受赔款，而是要求以命偿命。1661年12月4日，由两名奴隶执行了死刑判决。

嗣位危机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和获胜的帖木儿君主的权威。帝国分裂为两个或更多郡国的事情没有发生。分裂帝国只是谈判的筹码，而不是别的。这些要人明白，无论谁获得了帝国都城和帝位，在四分五裂的领土——无论它们是在东面、西面，还是在南面——恢复统一前，都不会得到安宁。最终的奖品是登上统治一个单一而统一的帝国的宝座。

在整个莫卧儿印度，嗣统之争是高度公众化的戏剧。军队的调动、联盟、战斗、论争、皇帝的健康、逃亡以及最后的处决——所有这些都能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流言蜚语在各个城镇的集市上快速传播。由萨拉夫（sarrafs）、商人、苏菲派教团和印度教庙宇维持的各类情报网竭力获取和传播实时消息。徒步和骑马接力传送情报的信使穿梭在帝国的大道上。欧洲商人整理了关于这场危机的报告，并发回欧洲。对诸多事件如此（高度）的共同参与，表明了这个帝国在多大程度上已被连接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体系。

1658—1659年的战争使一个军事化国家和社会的财富变得很紧张。这场危机耗费了包括行省和中央金库以及贵族和官吏的个人财产在内的巨大的帝国储备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当每一方的将军们招募更多兵勇和购买物资和军火时，军需花销出现了飙升。这场内战至少暂时逆转了收入流向和储备积累。在战争期间，帝国中心或指定扎吉尔占有者的正常税收流几乎干涸了。 163

没有出现引人瞩目或波及广泛的柴明达尔和农民起义。大多数乡村只是袖手旁观，等待尘埃落定。奥朗则布初期的胜利看来阻止了对（莫卧儿）政权的直接挑战。然而，在冲突持续期间，地方税政虽仍在运转，但软弱无力。扎吉尔达尔和皇室卡里萨的税收几近干涸，变成了涓涓细流。当作战部队在乡间行进时，农业生产也遭到了破坏。不幸的是，战争引起的破坏和混乱由于从1658年开始的数年干旱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整个印度北部和中部，伴随着政治危机出现了普遍的匮乏，在许多地区就是饥荒。在德里、阿格拉和拉合尔，受干旱煎熬的农民从附近的乡村涌进了每座城市。皇帝和埃米尔们在每座城市都开设免费食堂，分发煮熟的食物。在这些城市，物资匮乏和储备货币的大量抛入把物价推高到了饥荒时的水平。[①]

在次大陆的任一地区，凭借帖木儿皇室血统和充足的资金就足以募集到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兵士和获得武器、牲口和军用物资。1659年初，当达拉·舒科从萨姆加尔出逃到达古吉拉特的艾哈迈达巴德后，他的同情者沙·纳瓦兹·汗从穆拉德的财库中提取了100万卢比送给他。利用这些资金，达拉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募集了大约20 000名骑兵和获得了40尊大炮。[②] 在各个地区，士兵和供应商俯拾皆是。

大体说来，这场战争中的忠诚并不是由更大的问题，而是由实用主义或个人效忠决定的。对贵族和高等曼萨卜达尔来说，效忠经常是由帝国官场上的沉浮盛衰决定的。每个贵族表现出来的热情度是由当事王子的个人魅力决定的。对官员和私人雇员来说，忠诚是由对职位的忠诚或对指挥官的世系或部族忠诚决定的。对流动的军事劳动力市场上的那些芸芸众生来说，忠诚是一个薪酬和践约的问题，是职业荣誉和战斗与战役情境的混合物。 164

① Shireen Moosvi, “Scarcities , Prices and Exploitation: The Agrarian Crisis, 1658–1670,” *Studies in History* Ⅰ （1985）, 46–47.

②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Ⅱ, 164–65.

继位冲突确实造成了公开的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分立。奥朗则布利用每一个机会声明他对达拉背离伊斯兰教及其偶像崇拜的厌恶。当奥朗则布和穆拉德同意联合起来分裂帝国时，公开的书面声明确认谋划中的战争并不只是一个个人权力问题。实际上，他们有着更崇高的目标："从伊斯兰教王国拔出偶像崇拜和不信宗教的毒刺，制服和粉碎偶像崇拜的首领〔达拉〕及其党羽和据点。"①

无论是认为奥朗则布的宗教诉求博得了穆斯林贵族对他的支持，还是认为他的宗教诉求促使印度教贵族起而反对他，都是颇有疑问的。然而，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这4位竞争者中究竟哪一个胜出确实对帝国及其居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舒贾或穆拉德获胜，他们可能会沿袭沙·贾汗的政策，而不会做多大的变动。如果达拉获胜，更广泛的政治诉求就可能成为他在位期间的标志。至于他是否能够在面对穆斯林和印度教群体中越发保守的氛围时维持这个计划，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能给予回答。然而，事实是，奥朗则布给帝国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一层狭隘的伊斯兰教色彩。正是奥朗则布对伊斯兰排外主义的坚持，塑造了接下去半个世纪的帝国政策。

①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Ⅰ, 335-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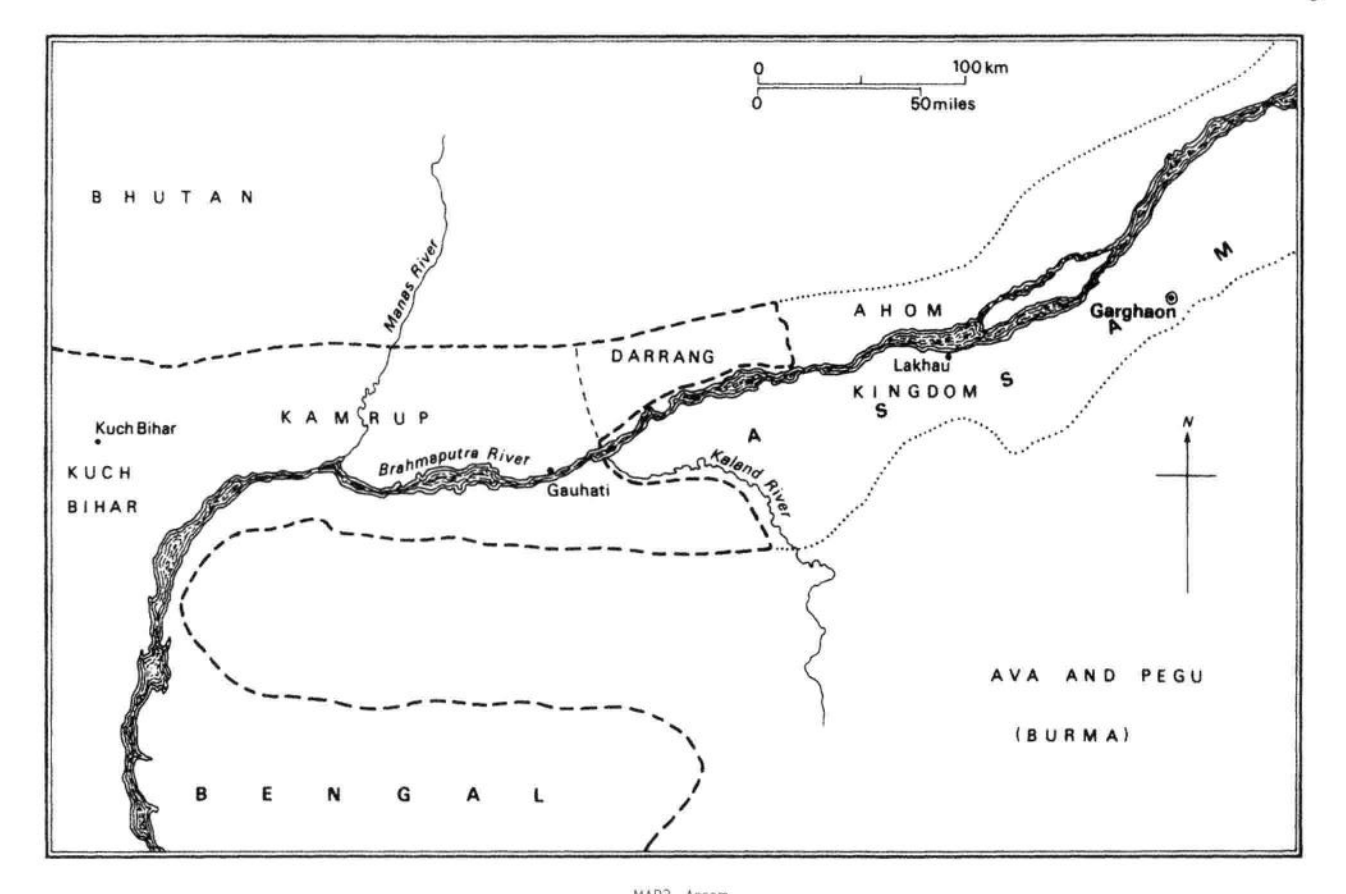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奥朗则布时期的帝国扩张：1658—1689年

165

在他于90岁高龄去世前的半个世纪里（1658—1707年），奥朗则布一直是一个明显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在他统治的前20年，这位皇帝把他的都城定在沙贾汗阿巴德—德里。在接下来的10年里，随着这位皇帝在拉贾斯坦和德干东征西讨，宏伟的营地成为帝国流动的都城。在他统治的前30年里，已经把"阿拉姆吉尔"即"世界霸主"添加到他的头衔中去的奥朗则布一直致力于培育一个更彻底的伊斯兰政权，致力于在帝国的边疆侵略扩张。然而，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次大陆山脉以外地区发动的几次劳而无功的战役，生动地揭示了在北方进一步扩张的惨重代价。这些战役加强了这位皇帝业已公开的南进倾向——征服早已习惯于伊斯兰统治的地区。

测试帝国的界限：东北方向

在东北方向，孟加拉不断增长的出口经济和穆斯林的移民边疆（使得这一地区）看上去像是一个用武进取之地。帝国的权威在这个地区依旧难以伸张。当舒贾王子的孟加拉总督任期被嗣位战争打断后，像库奇比哈尔的统治者普勒姆·纳拉扬（Prem Narayan）那样的柴明达尔起兵反叛。与此同时，阿霍姆国王查亚德瓦吉·辛哈（Jayadhwaj Sinha）派遣一支军队入侵和吞并



MAP3. Assam
Source: I.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 1982), I A–B.

地图3 阿萨姆

BHUTAN	不丹	Manas River	马纳斯河
Kuch Bihar	库奇比哈尔	KAMRUP	卡姆鲁普
Brahmaputra River	布拉马普特拉河	Gauhati	高哈蒂
DARRANG	达朗	Kaland River	卡兰德河
AHOM	阿霍姆	Lakhau	拉克豪
ASSAMKINGDOM	阿萨姆王国	Garghaon	噶尔冈
BENGAL	孟加拉	AVA AND PEGU (BURMA)	阿瓦和勃固（缅甸）

了位于莫卧儿边境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一个县——卡姆鲁普。[①]

1660年中，奥朗则布决定恢复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任命他在德干的伙伴穆罕默德·赛义德·米尔·朱姆拉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总督。在这位总督就任的第一年，米尔·朱姆拉重建行省政府，恢复赋税征收，在这所有3个地区普遍树立起莫卧儿王朝的权威。他把省都从拉杰默哈尔东迁到达卡，以更好地反映孟加拉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移。他还利用他自己的代理商和欧洲贸易公司大力投资各类贸易活动。[②]

167

根据他的官方采访使的报告，到1661年11月，米尔·朱姆拉在“同阿萨姆异教徒的圣战”中已准备进驻前沿。[③] 为了这次冒险，这位莫卧儿总督集合了一支由12 000名骑兵、30 000名步兵和数百艘军舰组成的部队。后者包括了10艘“古拉巴”（*ghurabs*），即承载着14门大炮、由4艘划艇拖曳的炮舰。[④] 米尔·朱姆拉径直进军库奇比哈尔，未受到库奇比哈尔统治者（业已逃离）的抵抗就进入了设防的都城卡萨尔巴里（Kathalbari），从而把这个王国纳进帝国版图。该王国拉贾的新近皈依伊斯兰教的儿子加入了莫卧儿军队。征服者任命了一名临时的法乌吉达尔和迪万，改称库奇比哈尔为“阿拉姆吉尔讷格尔”（Alamgirnagar），并建立起一座帝国铸币厂。

随后，莫卧儿军队就直逼卡姆鲁普。在扫除了阿霍姆人的抵抗后，莫卧儿军队迅速收复了卡姆鲁普的都城高哈蒂（Gauhati）。入侵者溯河而上，在一场决定性的水战中瘫痪了阿霍姆的河上舰队。到1662年3月，莫卧儿军队丢下这支舰队，深入内陆，攻取噶尔冈（Garghaon）。不过，阿霍姆统治者

---

① 伊尔凡·哈比布的《莫卧儿帝国地图集》中的地图“阿萨姆13A和13B〔Irfan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Delhi, 1982）, maps Assam 13A and 13B〕显示了17世纪60年代莫卧儿帝国和阿沙姆（Asham）即阿霍姆（Ahom）王国的边界。

② Jagdish Narayan Sarkar, *The Life of Mir Jumla*（Delhi: Rajesh Publications, 2nd revised edition, 1979）, p.278.

③ 转引自：Sarkar, *Mir Jumla*, p. 287.

④ 后面的描述引自：Sarkar, *Mir Jumla*. and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Ⅲ, 146–182.

及其朝廷已经从这座都城逃走。战利品包括大量财宝、储存在谷仓中的数百吨稻谷、大炮和军火以及数十艘河舰。

恰在此时，雨季开始了，米尔・朱姆拉进入都城附近的要塞。阿霍姆人切断了莫卧儿人前哨（thanas）同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舰队之间的通路。在5月到10月间，都城中的莫卧儿陆军和拉克豪（Lakhau）的河上舰队一直经受着饥馑、瘟疫、阿霍姆人的持续进攻和士兵的逃亡。当雨季结束后，供给和援军的到来使得莫卧儿军队能够再次同阿霍姆人交战。最后，到1663年初，“斯瓦加迪奥”（Swargadeo，意为“天王”）及其贵族开始乞和。这位阿霍姆统治者同意成为莫卧儿帝国的附庸，答应遣送一名女儿带着嫁妆到莫卧儿宫廷完婚，进献大量财宝和大象，放弃达朗（Darrang）和西部诸县的大片领土。当米尔・朱姆拉正忙于安排分批撤军和新县的治理时，他身染重疾，于1663年3月不治身亡。奥朗则布未能派出另一位像米尔・朱姆拉那样能够深孚众望和力挽狂澜的统帅，前去巩固帝国对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的控制。相反，当对和约的争议重新燃起莫卧儿人和阿霍姆人之间的冲突时，连续几位阿霍姆国王面对的莫卧儿法乌吉达尔都基本上没有得到德里的支援。最后，高哈蒂几经易手后在17世纪80年代落入阿霍姆人之手，而卡姆鲁普也永远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

168

皇帝在孟加拉沿海边疆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从孟加拉湾东岸的一个设防港口——吉大港（Chatgaon）[①]，阿拉干的马格人（Maghs）和一群早已定居在那里的葡萄牙人从事海盗活动，并掳掠孟加拉沿海的居民为奴。由于孟加拉农民逃避猎奴者，原本富饶的三角洲一带失去了大批大批的人口。1664年，莫卧儿的新任孟加拉总督沙伊斯塔・汗（Shaista Khan）雇用一支沿海武装船队载运莫卧儿突击队前去围剿吉大港。沙伊斯塔・汗正式吞并马格人的老巢，改称“伊斯兰堡”（Islamabad），使之成为孟加拉的一个县，此外还遣送数千名获救的孟加拉奴隶回家。这位总督对奥朗则布关于这次征服收获几多的垂询答复如下：“事实上，这次征服的收获（jama）是穆斯林心中开始（对海盗）泰然处之（jamait）。既然马格人的暴行已被清除，我们可以

① 吉大港，现在一般拼写为Chittagong，也拼写为Chatigaon。——译者注

容易地想见孟加拉耕作的扩大将会何等迅速。”[①]

内部边疆：吞并帕拉茂

偏僻的帕拉茂（Palamau/Palaun）酋长国是一个位于比哈尔正南面、焦达讷格布尔（Chota Nagpur）和中印度山峦之间的森林山国。它的稀疏的人口在山区不连贯的谷地中从事着既有定居农业、又有流动农业的混合农业。在17世纪早期，车罗人（Cheros），一个部落民族，面对拉杰普特人权力的兴起，退到了帕拉茂。到17世纪20年代中期，拉贾·莫蒂尼·拉伊（Raja Medini Rai）把车罗领土的范围扩大到焦达讷格布尔和比哈尔省的最南端。由于车罗人在邻近的莫卧儿诸县掠夺牲畜，帝国政府和车罗人之间的裂隙日益扩大了。 169

1641年，比哈尔的莫卧儿总督直接受命于沙·贾汗，领导了一次对帕拉茂的惩罚性远征。面对这种威胁，普拉塔普·拉奥（Pratap Rao）屈服了，并支付了80 000银卢比的赔款。莫卧儿人吞并了作为这个王国的三大设防城镇之一的德夫冈（Devgaon）及其郊区。两年后，普拉塔普家族成员试图废黜拉奥的一次尝试为莫卧儿王朝的干预提供了机会。莫卧儿战役统帅扎巴尔达斯特·汗（Zabardast Khan）开辟出一条林间小路，从德夫冈强行军至帕拉茂城下。他迫使普拉塔普·拉奥亲自投降和签署了一项纳贡协议。由于对此并不满意，扎巴尔达斯特·汗把这位车罗拉贾（王公）作为一名囚犯带回到在巴特那的总督觐见厅。在巴特那，普拉塔普·拉奥接受了1 000扎特曼萨卜，为皇帝效劳，但以世袭扎吉尔的形式保留了他的王国，交换条件是每年纳贡100 000卢比。

由于莫卧儿官方估计的帕拉茂拉贾的全部年现金收入仅有250 000卢比，对莫卧儿王朝的贡赋很快就出现了拖欠。车罗人继续进行的掠夺牲畜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奥朗则布刚一登基，就命令比哈尔总督达乌德·汗·潘尼（Daud Khan Panni）征服这个酋长国。1661年初，达乌德·汗

① 引文见：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Ⅲ, 212.萨卡尔把希哈卜丁·塔里希（Shihabuddin Talish）在记述这场战役的《惩戒之战》（Fathiyyah-i-ibriyyah）一书中的波斯文描述部分地译成了英文。Jadunath Sarkar, *Studies in Mughal India*（Calcutta and Cambridge: M. C. Sarkar and W. Heffer, 1919）.

在他的数名法乌吉达尔和柴明达尔参赞的陪同下，占领了帕拉茂最北端的一些要塞。在雨季过后，他督导他的6 400人的队伍穿过丛林，直驱（帕拉茂的）都城。在攻破这座要塞的城墙前，莫卧儿军队已在两次激战中彻底击败了守军。普拉塔普·拉奥落荒而逃，来到该王国的一个偏远角落苟延残喘，偏安一隅。达乌德·汗·潘尼任命一名莫卧儿法乌吉达尔把这个王国作为比哈尔省的一个县来治理。

在20年的时间里，莫卧儿人反反复复的惩罚性征讨把这个森林中的小酋长国牢牢地纳进了帝国的政治体系。至此，皇帝、他的谋士和比哈尔总督还未看到政治妥协有什么价值。吸收普拉塔普·拉奥进入帝国埃米尔核心的尝试是草率的。根据这个看似最可信的借口，奥朗则布命令比哈尔总督带领一支军队突袭帕拉茂拉贾。一场短暂、血腥但徒劳的抵抗终以该王国被兼并而告终。

170

测试帝国的界限：西北地区

喀布尔的莫卧儿总督在次大陆脆弱的西北边陲统治着一大片半干旱的山区。这是一块四方辐辏之地。物品、牲畜、人员和思想经由开伯尔、博兰及其他著名的山口，穿过这个地带进行着活跃的交流。[①] 这个地区的居民形成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世系和部落集团，适宜有限耕作和放牧的山谷把它们区分开来。更大的共同的穆斯林文化分为两个部分：处于统治地位的帕坦人（Pathans）的文化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塔吉克人（Tajiks）的文化。帕坦人讲普什图语，一般是居住在帐篷中的游牧民和商人，而塔吉克人讲波斯语，是生活在山村中的定居耕作者。

帕坦人组织为分层的父系家族，而这些父系家族又形成有着各自名称的部落——优素福贾伊（Yusufzai）部落、阿弗里迪（Afridi）部落和瓦兹尔（Wazirs）部落。这些部落由部落大会（*jirgas*）统治，以酋长或汗（*khans*）为首领。除了从事游牧业，作为游牧民兼商人的帕坦人把成群的

① 这里的描述基于：Joseph Arlinghau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fghan Tribal Society: Tribal Expansion, Mughal Imperialism and the Roshaniyya Insurrection 1450–160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8）.

马匹带进印度，而把印度的物品带回中亚和波斯。另一些帕坦人则作为土匪劫掠这些商队——或者在被政府补助金收买时（为这些商队）提供保护。此外，数千帕坦人（即印度人所说的阿富汗人）在莫卧儿帝国及其他印度—莫卧儿国家充当士兵、商人和高等行政官。许多阿富汗人在北印度乡村的一些地方惯于扮演柴明达尔的角色，拥有多寡不等的财富和权力。这些移民同他们尚在山中的亲族和部落同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寄钱回家。

对莫卧儿王朝来说，控制喀布尔和西北边境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考量。当帕坦人爆发了一连串反对帖木儿统治的部落起义后，奥朗则布做出了迅速而果断的反应。1667年，斯瓦特谷地中一名自立为王的优素福贾伊部落酋长，领导优素福贾伊亲族联盟同驻扎在阿托克和白沙瓦的莫卧儿分遣队展开了激战。动荡一直持续到帝国监军（*mir bakhshi*）穆罕默德·阿明·汗（Muhammad Amin Khan）从德里带来一支9 000人的部队以扑灭进一步的反抗时为止。

171

更严重的是1672年阿弗里迪人的起义。阿弗里迪酋长阿克马尔·汗（Acmal Khan）自立为王，以他自己的名义铸造硬币，向莫卧儿人宣战，还对商队贸易封闭了开伯尔山口。阿弗里迪人突袭和屠杀了一支在白沙瓦和喀布尔之间驻扎的帝国军队。其他的帕坦部落，包括著名的反莫卧儿诗人库什-哈尔（Kush-hal）领导的卡塔克人（Khataks），也参加了这次起义。次年仲冬，莫卧儿人遭到埋伏在白雪皑皑的山口中的阿弗里迪伏兵的袭击，又损失了一支大军。最终，在1674年6月，奥朗则布亲自带领另一支帝国军队进入大山。这位皇帝派出装备精良、供给充足的纵队前去打通开伯尔及其他山口。另一支帝国军队在巴焦尔受到伏击，损失惨重。不过，莫卧儿军队重新控制了主要的商路。与此同时，奥朗则布又通过许以黄金、荣誉和其他奖赏诱使反叛的部落首领驯服和停止反叛。

1675年末，奥朗则布留下刚刚设防完毕的驻兵前哨，返回德里。此后，喀布尔的新任总督埃米尔·汗（Amir Khan）自己深深卷入了帕坦人的部落政治，支持接受帝国政策的派系。为了保持山口的畅通，他支付了巨额补助金作为保护费。个别酋长接受了经常性的酬金。另一些帕坦人（酋长）则被授予莫卧儿军职。事实证明埃米尔·汗是如此精明，以至在他持续担任喀布尔总督的20年里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部落反叛。

一项针对地方武士贵族的和谐而灵活的政策，如果得到足够武力的支持，是能够遏止已经在优素福贾伊和阿弗里迪起义中显露出来的亲族联盟、君主政体和国家建设等趋势的。镇压这些反叛所付出的努力，使奥朗则布不再有兴趣像他父亲那样深入中亚作战。

伊斯兰教政策和帝国文化

奥朗则布完成了对阿克巴意识形态和始于沙·贾汗的兼容并蓄型政治文化的那种转变。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目标简单说来就是：莫卧儿帝国必须变成一个根据伊斯兰教法的戒律和为了印度穆斯林共同体的利益进行统治的伊斯兰国家。这个政权将尽一切可能鼓励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但是，如果这一点做不到，（这个政权）就会对大众施行公正而严厉的统治。帝国的政治文化日益以排他性的穆斯林语汇来界定。

172

奥朗则布为帝国制定的目标是同他自己作为哈纳菲派（Hanafi）的一名追随者而具有的宗教狂热完全一致的。在他的晚年，奥朗则布超出了正常虔敬的界限。即使作为皇帝，他还是花费了7年时间专心背诵整部《古兰经》。[①] 然而，最初的尴尬是他需要为废黜和囚禁沙·贾汗的行动寻求合法性。对他父亲的反叛把奥朗则布置于既违犯伊斯兰教法，又违反穆斯林大力推崇的孝道的可怕地位。1659年，这位皇帝派遣了一个使团携带着大量礼品前去朝见汉志圣城的统治者——沙里夫·贾伊德（Sharif Zaid），以获得正式承认。在此行遇挫后，另一个使团终于带着庆贺这位皇帝荣登帖木儿帝位的圣物返回。此后，奥朗则布就成了圣殿的慷慨资助人：[②]

> （奥朗则布）经常把大笔钱财送给在那些圣城中静修的虔诚之士，在一些年里每年一次，在另一些年份里则两年或三年一次。在那些圣城中，有许多人永久受雇于他，从他那里领取日俸，作为他的代表绕行天房，向先知的陵寝致敬，诵读由这位虔诚的皇帝亲手

① Ibid., p. 314.

② Saqi Mustaid Khan, *Maasir-i 'Alamgiri*, p. 525 as quoted in N. R. Farooqi, "Mughal-Ottoman Relations: A Study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ughal Ind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556-1748,"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86, p. 210.

抄写和进献给麦地那的两本《古兰经》。

在安抚了他自己的良心，在某种程度上也安抚了大众舆论后，奥朗则布放手实现他对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化设想。

当奥朗则布有条不紊地推进他的终极目标时，他的热忱被其高度发达的政治和外交本能缓和下来了。奥朗则布依旧对自己的帖木儿世系引以为豪——不过是作为穆斯林征服者的后裔，而不是作为天启圣光和知识的继承人。例如，在他继位后的第十一年，这位皇帝以不合伊斯兰教义为由结束了始自阿克巴时代的一项惯例，即日出时出现在阳台上，供所有人向他膜拜或祈福（*darshan*）。[1] 像他的父亲那样，他转向哈纳扎德吉观念而非门徒观念来规定他与贵族和帝国官吏的理想关系。奥朗则布由于其对穆斯林官员的明显偏向而进一步缩小了世代尽职的观念。 173

奥朗则布对更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热望，阻塞了莫卧儿政治意识形态的几种主要的表达方式。他终止了对撰写编年史和制作书籍插图这种复合技艺的资助。在他即位10年之后，他停止了详尽记载其统治的《阿拉姆吉尔本纪》（*Alamgir-Nama*）的撰写工作。只有私人秘密撰写的史书才流传了下来。帝国工作室被关闭了，而数十名绘画大师及其助手也被解散了。他很少修建纪念性建筑物——其中没有一座能同贾汗吉尔的花园或者与阿克巴或沙·贾汗的宫殿相比。结果，帝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变得狭隘了，并最终变得贫乏。

那折中的、兼容并蓄型的宫廷文化首当其冲。随着新的道德主义和教法主义色彩弥漫在宫廷生活中，非伊斯兰教的仪式被取消了。他第二次加冕仪式甫一结束，这位皇帝就废除了对伊朗新年即太阳年开始时“诺鲁兹”（Nauroz）节的庆祝活动。同年，奥朗则布解雇了宫廷乐师，终止了那项曾使印度斯坦音乐得到辉煌发展的帝国资助。饮酒和鸦片消费遭到禁止。贵族和皇帝再也没有举行过食用这些物品的较不正式的社交活动。尽管这条禁令可能延长了皇帝及其许多密友（他们都很长寿）的寿命，但它也确实妨害了皇帝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的联系。考虑到皇帝和贵族联系在莫卧儿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

---

①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Ⅲ, 89.

奥朗则布的美学冲动和资助仅限于伊斯兰艺术和科学。他的最大成就是以《阿拉姆吉里法论》（*Fatawa-i ʹAlamgiri*）闻名的法律教本。当受到请求后，独立的法学家就神圣的伊斯兰教法的解释给出书面意见，称为“法论（fatwa）”。这些裁定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时常相互矛盾，有时也并非建立在深厚的法律学识基础上。因此，自奥朗则布立志“使一般的穆斯林大众根据哈纳菲派神学家（乌里玛）的法律裁决和判例行事……”起，他就任命了一个学者委员会把权威和可靠的（法律）解释编纂成一部单一的著作。[①]《阿拉姆吉里法论》迅速在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作为正统穆斯林正确行动的指南得到了认可。

174

其他措施直接提高了乌里玛及其服务的伊斯兰机构的地位、权力和收入。在奥朗则布治下，乌里玛的命运彻底恢复到了阿克巴在16世纪80年代剥夺他们的影响和权力之前的状况。大法官（加齐）和敬神慈善机构的监理（萨德尔）位列贵族，时常觐见皇帝。这些人控制着大批圣职的委任。对整个帝国内的敬神信托监理、传教士、法官和其他领薪职务的任命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奥朗则布通过花费巨资修葺和维护清真寺，支持宗教慈善事业，进一步使乌里玛心满意足。他对帝国全境乌里玛和更大范围的穆斯林绅士集团所做的最重要让步是在免税赠地方面。奥朗则布逆转了阿克巴的政策，在1672年没收了印度教徒持有的全部赠地。尽管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施行，这项新政策还是代表了帝国穆斯林乌里玛的巨大胜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自己分到了更多的土地资源。1690年，在对乌里玛所做的另一次重大让步中，奥朗则布把所有这类赠地彻底变成了世袭地。[②]

对许多高级贵族来说，一般仅有有限的军事和行政阅历的神学家和法学家的崛起，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向。乌里玛经常是彻头彻尾地贪婪和腐败。阿卜杜尔·瓦哈卜·波拉（Abdul Wahhab Bohra）在担任大法官的16年间，以在任命帝国法官时收受贿赂而臭名昭著。他退休时拥有估计高达330万卢比的财富和其他珍贵物品。[③] 作为这个时期最敢于仗义执言的贵

① Saqi Mustaid Khan, *Maasir-i Alamgiri* （Calcutta, 1947）, translated by Jadunath Sarkar, p. 315.

② Irfan Habi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London, 1963）, p. 311.

③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Ⅲ, 75.

族之一，波斯裔埃米尔"马哈巴特·汗·米尔扎·拉赫拉斯普"（Mirza Lahrasp, Mahabat Khan）就斥责奥朗则布"为虎作伥"（making "sparrows into huntsmen"）和在国家事务上过分依赖神学家的主张。[1]

在1659年第二次加冕时，奥朗则布设立了一个新职位——"穆塔希布（*muhtasib*）"，即监察官，从乌里玛当中任命。这个独特的伊斯兰教官职负责管理城市市场，防止混乱和欺诈公众。穆塔希布也负责实施伊斯兰教法中有关禁止渎神、饮酒和赌博以及其他公开的异端或偶像崇拜行为的规定。穆塔希布承担了本地印度城市治安官（*kotwal*）的一些职责，而这在以前印度穆斯林的体制中是闻所未闻的。在德里，奥朗则布任命沙·贾汗的前任法官（*mufti*）、一个来自撒马尔罕的杰出穆斯林神学家——穆拉·奥兹·瓦吉（Mulla Auz Wajih）为首席穆塔希布，领埃米尔衔。[2] 其他穆塔希布则带领属员和兵士分驻在帝国的主要城镇。

175

伊斯兰政策和非穆斯林

奥朗则布的复兴主义迫使他正视帝国针对非穆斯林的政策。他的1669年谕旨命令拆除所有最近违反伊斯兰教法修建或重修的神庙。[3] 在帝国全境，尽管自然不是全部，但许多这类神庙还是被官方拆毁了。皇帝的特定目标是马图拉（Mathura）和瓦拉纳西圣城中著名的石庙。在马图拉，由比尔·辛格·邦德拉（就是他谋害了阿布尔·法兹尔，见上文）耗资300万卢比修建的气势宏伟的科瑟夫·拉伊（Kesev Rai）神庙，被夷为平地。镶满珠宝的黄金偶像被运至阿格拉，埋在贾汗·阿拉清真寺的台阶下。一座新的清真寺在被毁神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4]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动公开宣示了皇帝对偶像崇拜的看法；它也是对邦德拉家族及其对帝国的令人忧虑的效忠的指摘（见上文）。皇帝传达出来的信息既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

奥朗则布在其统治期间，发布了许多歧视性的谕旨和条令。对前往无数

---

① Athar Ali, *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angzeb*（Aligarh: Asia Publications, 1966）, p. 99.

②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Ⅲ, 77.

③ Sri Ram Sharma,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Mughal Emperors*（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Inc., 2nd edition, 1962）, pp. 130–131.

④ Ibid., p. 133.

印度神庙朝拜和参加周期性节日的朝圣者征收的赋税本已被阿克巴废除，现在又恢复了。1665年这位皇帝敕令征收国内关卡税时，穆斯林的税率为货值的2.5%，印度教徒的税率为货值的5%。向省督和税务官发布的一道通喻要求解雇印度教徒官吏，而代之以穆斯林。① 尽管经常没有得到彻底执行，这些及其他措施还是广为人知，受到大多数人的厌恶。②

176

热心的帝国官员拥有实施这些新敕令，特别是在城市的非武士集团中实施这些新敕令的极大权力。1669年，在苏拉特，那里的加齐使那座城市的整个班尼亚（Bania）即印度教商人集团惶惶不可终日。他强迫这个集团中的几名成员皈依伊斯兰教，又胁迫其他人改宗，除非他们交纳赎金。他还以防止毁损该城中的印度教神庙和圣殿为名敲诈了大笔钱财。这位加齐强行为一名担任波斯文书记员（即办事员）的班尼亚人举行了割礼和皈依礼，这个职员随后自杀。在这个时刻，出现了群众抗议："各类班尼亚家庭的所有家长离开了这座城镇，只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留在苏拉特，让他们的兄弟或别的近亲照看。这些人的人数达到了8 000。"③

比较务实的帝国官员没有支持这位加齐。而且，如果没有涉及政治效忠问题，皇帝本人也愿意妥协。苏拉特总督拒绝制止民众的大批离去，理由是班尼亚人也是皇帝的臣民，"在这个国家，他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些班尼亚人来到附近的布罗奇。他们不顾那位加齐的威胁，在那里停留了3个月。他们受到艾哈迈达巴德市政官的庇护，后者力图诱使这些抗议者前往他的城市。最后，随着这座港口商业的停顿，在收到皇帝许诺要"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一些保障和给予他们更多宗教自由"的信函后，这些班尼亚人才同意返回。④ 奥朗则布还用一名比较温和的法官替换了那位过分狂热的加齐。

1679年，奥朗则布宣布了他那项最具争议的措施：他恢复了吉齐亚，一种对非穆斯林征收的多级财产税。宫廷神学家要求采取这种做法，而他的许

① S. Moinul Haq, *Khafi Khan's History of Alamgir* (Karachi: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1975), translation of Muhammad Hashim Khafi Khan, *Muntakhab-al Lubab*, p. 252.

② 这些措施的详尽描述见：*Sharma, Religious Policy*, pp. 142ff.

③ Sushil Chaudhury, "The Surat Crisis of 1669: A Case Study of Mercantile Protest in Medieval India," *Calcutta Historical Journal*, 5 (129–146), 1983.

④ Ibid., p. 140.

多贵族似乎反对这种做法。[1] 在全帝国境内，由低级曼萨卜达尔组成的核心集团成为城镇中的特殊吉齐亚征收官。在农村地区，省迪万每年加收4%的 177 核定土地税。[2]

这项新税在德里激起了激烈的抗议声浪。这座城市及其郊县的数千名印度教徒在皇帝阳台（位于德里城墙上）前面的亚穆纳河畔集会，抗议这项新税。当奥朗则布离开城堡前往参加每周在贾玛清真寺举行的祈祷会时：[3]

> ……人数如此之多的印度教徒从城堡门口聚集到贾玛清真寺恳请收回成命，以至人行通道被阻塞。乌尔都营地集市（军市）上的货币借贷者、布匹商人和店主以及该城所有的工匠都放下他们的工作，聚集到皇帝经过的道路上……骑在大象上的〔奥朗则布〕，不能抵达清真寺。那些不幸的人的数量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然后，他下令让威猛的大象强行通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杀死或被踩在大象和骏马脚下。一连数日，他们聚集在同一条大道上，请求免除（吉齐亚）。最后，他们还是被迫要交纳吉齐亚。

是吉齐亚征收官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普遍遇到了愤怒的抗税行动——至少最初是如此。

奥朗则布的最终目的是让非穆斯林改宗伊斯兰教。只要可能，这位皇帝就向皈依者赏赐锦袍、馈赠金钱和加官晋爵。[4] 人们很快就明白了，皈依（伊斯兰教）是获得皇帝恩宠的一条可靠道路。在许多世袭性地方职位的继承争讼中，奥朗则布选择（支持）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候选人，而摒弃他们的竞争对手。乡首和加农戈（即簿记员）是被特别选中强迫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对所有当事人来说，信号是十分清晰的。共同的政治共同体也必须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

① N.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 （Calcutta, 4 vols., 1907–8）, translated by William Irvine, Ⅱ, 288.

② Sharma, *Religious Policy*, pp. 152–158.

③ Moinul Haq, *Khafi Khan*, pp. 258–59.

④ 沙尔马（Sharma）从朝廷的官方公报中精选了一份皈依者的名单，见：Sharma, *Religious Policy*, pp. 170–174.

锡克人的殉教

奥朗则布的新政策加剧了同旁遮普平原和山麓一带仍在扩张的锡克人团体的紧张关系。在去世前，古鲁哈格宾德（Guru Hargobind）不顾他的两个依旧健在的儿子的嗣位要求，提名他已经早逝的长子的儿子——哈里・拉伊（Hari Rai）为他的继承人。而在那次惨烈的莫卧儿嗣位战争期间，哈里・拉伊对达拉・舒科提供过支持和帮助。因而，在奥朗则布取胜后，他要求哈里・拉伊送他的长子拉姆・拉伊（Ram Rai）到莫卧儿宫廷做人质。奥朗则布旨在利用这个历史悠久的策略，让那位年轻的锡克后嗣接受莫卧儿朝廷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的熏陶。奥朗则布还计划控制锡克人的嗣位传承，就像他对许多别的柴明达尔所做的那样。而锡克人的一个派别也支持拉姆・拉伊，倾向于让他成为继承人。[①]

年迈体衰的哈里・拉伊拒绝了他的长子的继位要求，转而任命小儿子哈里・克里山（Hari Krishan）为他的继承人。皇帝于是把这位古鲁及其年轻的继承人召集到德里。就在德里，1664年，哈里・拉伊寿终正寝。奥朗则布还没来得及就继承问题做出决定，锡克人的一个派别就已经选举哈里・拉伊的叔父和古鲁哈格宾德最小的儿子——泰戈・巴哈杜尔（Tegh Bahadur）为他们的新古鲁。[②]

泰戈・巴哈杜尔被普遍承认为新的锡克首领。在接下去的10年里，他热忱地从事组织和宣教工作，足迹遍布旁遮普各地，甚至到达过孟加拉和阿萨姆这样远在东方的北印度地区。正是在这个时期，数量可观的查特人——印度河—恒河平原上人数最多的耕作种姓集团——开始大批皈依锡克教。泰戈・巴哈杜尔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大众欢迎，而他的布道也得到了极其热烈的响应。

到17世纪70年代早期，锡克人开始同奥朗则布捣毁偶像的政策发生冲突。帝国官员们收到了既要捣毁印度教神庙，也要捣毁锡克人谒师所（Sikh

① J. S. Grewal and S. S. Bal, *Guru Gobind Singh, A Biographical Study*（Chandigarh: Punjab University, 1967）, p. 29.

② 原文如此，泰戈・巴哈杜尔应为哈里・拉伊的叔父，而非兄弟——译者注。

Gurdwaras）的命令。与此同时，几个有关穆斯林受这位古鲁劝诫皈依锡克教的事例，也传到了奥朗则布那里。他下令逮捕泰戈·巴哈杜尔。在阿格拉，这位古鲁和5名同伴被抓捕归案，然后押解至德里。在那里，加齐的法庭进行了审理，宣布这位锡克领袖犯有渎神罪，判处他死刑，并在1675年11月执行了处决。第二次殉教发生后，锡克人在每年春季在山中举行的白萨克（Baisakhi）大会上又拥立那位遇害领袖的幼子戈宾德·辛格（Gobind Singh）为新古鲁。[①] 奥朗则布就这样一举收获了生活在北印度平原上的成千上万名查特和卡特利—锡克教徒（Khatri Sikhs）的切齿痛恨！[②]

拉杰普特人的反叛

179

对新的好斗的正统主义最敏感的考验存在于皇帝与他的拉杰普特贵族的关系上。表面上，拉杰普特人在当前还没有抱怨的理由。他们在帝国贵族中仍是一个有影响的集团。[③] 的确，帝国中爵位最高的贵族是斋浦尔的米尔扎·拉贾·贾伊·辛格·卡赤瓦哈（Mirza Raja Jai Singh Kachhwaha）。他拥有7 000扎特和7 000苏瓦尔爵位，在继位战争中是奥朗则布最忠实的支持者。1665年，贾伊·辛格成为德干诸省的副王，这是一个通常由成年的帖木儿王子担任的职务。1679年后，帝国政府中的所有拉杰普特人都免除了吉齐亚——尽管他们家乡的臣民并没有得到豁免。

尽管如此，拉杰普特贵族作为一个集团还是受到了一种似乎是蓄谋已久的政策的挤压。如同他们的爵位总数那样，拉杰普特贵族占贵族总数的比重明显下降了。[④] 皇帝削减了在拉贾斯坦以外地区分封的帝国扎吉尔，从而减少了这些武士为他们贫瘠的家乡挣得的帝国补助金。[⑤] 这些拉杰普特贵族——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在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帝国的一支极其重要的作战力量——的财富，近来遭到了削减。

---

① Grewal and Bal, *Guru Gobind Singh*, pp. 44–47.

② 卡特利—锡克教徒（Khatri Sikhs），指属于卡特利种姓的锡克教徒。卡特利种姓是北印度的一个书记员和商人种姓。——译者注

③ Athar Ali, *Mughal Nobility*, p. 35, Table 2（a）.

④ Athar Ali, *Mughal Nobility*, pp. 23–24.

⑤ Athar Ali, *Mughal Nobility*, p.100.

来自帝国政府的财富和权力，为拉贾斯坦的拉贾们在祖传领地内按照莫卧儿行政模式建立起一种地方主导的国家结构提供了支持，使之成为可能。一些土地直接以王田（即卡里萨）的形式进行管理。其余土地则作为扎吉尔分给忠诚的亲属或别的家臣。大拉贾们从不属于统治部族的拉杰普特人中间召集了一支服役贵族，他们对统治者族人以平等和手足身份提出的要求形成了制约。所有这些支持者在提高其拉杰普特庇护人的爵位、财富和身份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

在位拉贾的死亡对所有相关人等都是一个危机时刻。莫卧儿皇帝可以自由选择去世拉贾的任何一个儿子或任何一位别的男性亲属为新的部族首领。通常，这种选择会很快做出，也不会遭到抵制。各个拉杰普特人和非拉杰普特人派系都会尽其所能地适应新秩序。

180 在先皇统治时期，位于拉贾斯坦西部的马瓦尔的拉贾（Raja of Marwar）兼莫卧儿埃米尔——噶吉・辛格・拉索尔（Gaj Singh Rathor），在经历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后，于1638年死在阿格拉朝廷任上。他的小儿子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立即前往阿格拉为他的父亲举行火葬。1638年5月，沙・贾汗不管当时尚在朝廷的噶吉・辛格的长子如何请求，还是把朱砂授职标记点在了贾斯万特・辛格[①] 的前额上。皇帝赏给现在的拉贾贾斯万特・辛格4 000/4 000曼萨卜，一件绣满纹饰的锦袍，一柄饰有宝石的短剑，一面旌旗，一面定音鼓，一匹战马和一头大象，[②] 又把焦特布尔（Jodhpur）和马瓦尔（Marwar）的另外4个乡作为扎吉尔分封给他。此外，皇帝还任命一个非拉索尔家族的拉杰普特人为贾斯万特・辛格未成年时的首席财政官（迪万）。数日后，贾斯万特・辛格把6头大象作为回礼（pishkash）进献给皇帝。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当沙・贾汗前往拉合尔和白沙瓦时，这位年轻的拉贾和他的拉杰普特骑兵一直陪伴在这位皇帝左右。他数次从沙・贾汗那里接受了更多的荣衔和礼品。直到1640年2月初，这位新拉贾才得以返回马瓦尔，正式和他在焦特布尔堡的拉索尔亲属一起庆祝他的就职。[③]

① 原文为Jawant Singh。根据上下文，应为Jaswant Singh，即“贾斯万特・辛格”。——译者注

② V. S. Bhargava, *Marwar and the Mughal Emperors*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66), pp. 80–81.

③ Ibid., p. 82.

40年后的1678年12月，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大君去世。那时，他正在阿富汗的贾姆鲁德（Jamrud）任军事指挥官（*thanadar*），几近流放。在他死时，他还没有儿子做他的男性继承人。贾斯万特·辛格的两名妻子都因身怀六甲，才免遭火葬柴堆的荼毒。[①]一收到从贾姆鲁德传来的这条消息，奥朗则布就立即采取了一项官僚主义举措，在形式上把马瓦尔的所有扎吉尔转为帝国的王室领地（卡里萨）。这并不是吞并，而只是以扎吉尔的形式重新分配该王国所必需的一个步骤。这位皇帝带着他的朝廷来到阿杰梅尔的莫卧儿都城，监督派去接收这个王国的官吏和部队。当这支部队占领焦特布尔后，他们就在这座马瓦尔都城肆意毁坏神庙和偶像。返回德里后，奥朗则布任命另一位拉杰普特人埃米尔——贾斯万特·辛格已逝哥哥的儿子因陀罗·辛格·拉索尔（Indra Singh Rathor）为马瓦尔的统治者。 181

这些事件的续集并没有遵照通常的剧本。拉索尔对奥朗则布决定的不满在马瓦尔爆发为一场全面的反叛。通过授职给贾斯万特·辛格的侄儿因陀罗·辛格·拉索尔，这位皇帝有意忽视了下述事实：在延宕已久的从贾姆鲁德返回德里的途中，那两位拉杰普特王妃每人都顺利地生下了一名男婴。较大的那个男孩取名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其生母是一名来自梅瓦尔的西索迪亚部族的拉杰普特公主。到1679年6月，贾斯万特·辛格的高级官员杜尔噶达斯·拉索尔（Durgadas Rathor）把他的部队和家室带到了沙贾汗阿巴德的拉索尔府邸。在一次朝会上，杜尔噶达斯和高级拉索尔官员恳求让那位较长的男孩——阿吉特·辛格成为马瓦尔的新统治者。奥朗则布拒绝了，但又说他将在皇宫中抚养阿吉特·辛格，等他成年后再赐给拉贾头衔和贵族爵位。然而，这是以这名男婴要作为一名穆斯林来养育为条件的。以杜尔噶达斯·拉索尔为首的拉索尔官员断然回绝了这项提议。

就在这个时候，最小的那个男婴夭折了。奥朗则布派遣了一支武装分遣队，由德里治安官（kotwal）率领，前往拉索尔府邸抓捕那两名王妃和那个尚存的后嗣。杜尔噶达斯拒绝交出已逝拉贾的遗孀和儿子，结果引发了一场交火。在拉杰普特长矛轻骑兵与帝国分遣队激战时，杜尔噶达斯让两位王妃

① 除非另有说明，下面对拉杰普特战争的描述基于：Sarkar, *Aurangzib*, Ⅲ, 322–375；V. S. Bhargava, *Marwar and the Mughal Emperors*（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66）, pp.115–166；Robert C. Hallissey, *The Rajput Rebellion Against Aurangzeb*（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7）；and Moinul Haq, *Khafi Khan*, pp. 263–281.

女扮男装，骑马出城，而他自己也带着那名婴儿绝望地逃离了这座城市。一名女奴带着她自己的孩子，扮作王妃，走在后面，结果被擒。两队拉杰普特人马断后，浴血奋战，阻击追兵。最终，杜尔噶达斯带着他的“战利品”抵达焦特布尔，然后把阿吉特·辛格和他的母亲托付给富有同情心的拉索尔族人，为他们寻得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奥朗则布宣布抓到的那位奴隶之子就是真正的阿吉特·辛格，然后把他交给后宫作为一名穆斯林拉杰普特王子来抚养。接下来，奥朗则布派他最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阿克巴（Muhammad Akbar）亲王率领一支莫卧儿军队攻占马瓦尔。拉索尔守军的拼死抵抗没有阻止入侵者占领焦特布尔。在这个关头，相邻的梅瓦尔的拉纳进行了干预。这位拉纳被身为阿吉特·辛格生母的西索迪亚公主（也是他的女亲属）的恳求所动（收容了他们），因而担心梅瓦尔将是（莫卧儿人的）下一个入侵目标。由于缺少野战炮，即使这两支拉杰普特军队联合起来，也未能挡住莫卧儿的主力部队。到该年末，莫卧儿军队占领了梅瓦尔的都城——乌代布尔。该城内外大大小小的神庙在莫卧儿人的偶像破坏运动中轰然倒地。拉纳和他幸存的骑兵退到山中，开始进行游击战。

182

1680年初，奥朗则布返回阿杰梅尔，把平乱战事交给了从孟加拉总督任上调回的阿扎姆亲王（Prince Azam）和他的两位兄弟：穆阿扎姆（Muazzam）和穆罕默德·阿克巴。在几近一年的时间里，莫卧儿人在对付各王国拉杰普特人的袭扰活动上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执政拉纳的寿终正寝和他的儿子贾伊·辛格（Jai Singh）的袭位也没有使抵抗中断。奥朗则布增派了援军，并严厉申斥了他的儿子们未获全胜。

阿克巴的反叛

在这整个时期，拉杰普特人持续不断地派遣密使恳请阿克巴王子反叛他的父亲。他们争辩说，奥朗则布的宗教偏执和他对拉杰普特人的歧视将毁灭这个帝国。在拉杰普特人的支持下，他能够夺取帝位，扭转这些错误的政策。莫卧儿公主泽布尼萨（Zeb-u-nissa）与阿克巴暗通声气，在给她兄弟的大量密函中也支持这个策略。1681年1月1日，阿克巴终被说服。他自立为

帝，给他的属僚加官晋爵。

阿克巴带领他的混合部队行军120英里，花费了足足两周时间，赶到阿杰梅尔。奥朗则布只带着少量骑兵部队在那里宿营。阿克巴的拖沓表明要起兵反对他父亲令人生畏的权威需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最后，在1月15日，这位反叛的王子在阿杰梅尔城外与奥朗则布对阵。就在那天傍晚，穆阿扎姆亲王在强行军后抵达他父亲身边。他带领的部队两倍于奥朗则布的军队。

和平常一样，奥朗则布正忙于实施他自己形式的心理战。一封致阿克巴的伪造信函称赞他执行了皇帝的谋划，合力屠杀位于他的部队和阿克巴部队之间的拉杰普特人。这封信函传到了杜尔噶达斯·拉索尔的手中。他不能接近那位正在酣睡的帖木儿王子。由于害怕遭到出卖，他和他的拉杰普特骑兵悄悄上马，星夜逃向马瓦尔。阿克巴的大多数莫卧儿官吏和士兵都投向了皇帝一边。这位王子只能从他的个人卫兵中召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和他一起仓皇而逃。

183

奥朗则布即刻派遣穆阿扎姆王子去追赶。业已发现奥朗则布阴谋的拉杰普特人把阿克巴藏匿在深山中。最终，数月后，杜尔噶达斯带着这位王子长途迂回到新的马拉塔统治者沙姆巴吉（Shambhaji）的宫廷。当时的观点认为，穆阿扎姆王子和德干诸省总督汗·贾汗·巴哈杜尔（Khan Jahan Bahadur）暗地里同情阿克巴，他们本来能够抓住他，但却并没有那样做。[①]阿克巴的出逃猛然间把原来只是由拉索尔人发动的一场棘手的叛乱转变为一次全面的帝国危机。

阿克巴的变节立即减轻了帝国对拉杰普特人的压力。在经过数月断断续续的战斗后，梅瓦尔的拉纳同意缔结一项和约。根据这项和约，他把3个乡让给莫卧儿人直接治理，并同意为了换取梅瓦尔而永久交纳吉齐亚。莫卧儿军队撤退后，奥朗则布送了一件锦袍，以承认贾伊·辛格拉纳承袭他父亲的王位。

然而，在马瓦尔，对莫卧儿人的抵抗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奥朗则布让焦特布尔的法乌吉达尔负责指挥讨伐反叛者的惩罚性战役。年幼的亡命拉贾阿吉特·辛格从一个庇护地辗转到另一个庇护地，漂泊不定，但一直是拉索

① Moinul Haq, *Khafi Khan*, pp. 279-280.

尔人游击战的核心象征。要等到20年后，皇帝和其时业已成年的阿吉特·辛格才会商谈一项协议。在这个关键时期，帖木儿王朝失去了大多数拉索尔族拉杰普特的效忠。

与拉索尔和西索迪亚部族的决裂是否可以避免，这是难以评定的。假如奥朗则布比较愿意顾及拉杰普特人的感受，这场叛乱或许不会发生。奥朗则布显然对贾斯万特·辛格在继位战争中支持达拉和涉嫌参与策划西瓦吉（Shivaji）从浦那的逃亡（见下文）愤怒不已。不过，参照40年前贾斯万特·辛格本人的授职先例，这本不应妨碍一次顺利的王位继承。

奥朗则布新近对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关系主要维度的强调，使拉杰普特人和莫卧儿王朝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正像在阿克巴亲王反叛前对他的呼吁所表明的，许多拉杰普特人对新的（政治）气候甚为不安。奥朗则布试图在马瓦尔王座上安插一名穆斯林皈依者的举动，表明他赋予这个问题极大的重要性。奥朗则布新的强硬路线确实使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贾斯万特·辛格的拉杰普特和非拉杰普特扈从，都明显感觉到皇帝的行动将让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在经历了第一次暴力冲突后，随着冲突扩大到梅瓦尔，抵抗者和镇压者相互对立的言辞日益具有了宗教的意象。这种好战的意象销蚀了那条把拉索尔、西索迪亚和其他拉杰普特部族同帝国联结起来的感情和利益纽带。

184

第九章　经济、社会变迁和国际贸易

185

奥朗则布在德干的胜利既取决于他的将才和军事技能，也同样取决于帖木儿（帝国）的财富。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征服和领土扩张后，莫卧儿皇帝拥有了巨额财富。从1561年阿克巴吞并马尔瓦到1687年攻陷戈尔康达，每一次胜利后都从战败统治者的密窖中掠夺了大量财宝——经常足以补偿征服的费用。从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征税中得来的正规财政收入也流进了皇帝的金库。在1689年，奥朗则布没有理由预见到财政短缺。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日常的行政开支，这个帝国都能够在财政上做到自给自足的。

如果某一年出现了赤字，中央财库还守卫着一个巨大的金银币和金银锭储藏（可供使用）。数百名莫卧儿贵族和高等曼萨卜达尔拥有的数百万卢比的流动财富，也一定可以当作一个补充储备。不像同时期的现代早期欧洲君主那样，莫卧儿皇帝们并不依靠从私人金融家那里贷款来支付日常开销或为哪怕是最费钱的军事战役筹款。[①] 需要资金的战役统帅经常被授权去从省财库的一般储备中征集大笔钱款。

税收体系

莫卧儿财政的核心是对农业生产和城市贸易课税的税收体系。通过坚持现金付款，该政权迫使来自乡村的谷物和其他商品在一个上升的市场等级

① J. F. Richards, "Mughal State Finance and the Premodern World Econom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 285-307.

体系中出售。从卡里萨土地上收税的莫卧儿税吏和为扎吉尔达尔收税的代理人，每年按例分几次收取铜币和银币税款。

186 在阿克巴和奥朗则布期间，国家征税额翻了一番还多。总税额（jama），即十分之一的城市关税和十分之九的土地税（mal）合计，从阿克巴统治晚年的58亿3 460万达姆增长到奥朗则布刚刚去世后的1709年的133亿3 990万达姆。[①] 这种增长部分来自征服增加的土地，部分来自课税的加重。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皇帝和帝国精英们不断膨胀的税收收入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了巨大增长。

对这种税收收入增长的估计被17世纪价格的长期趋势弄得复杂起来了。一些经济史学家表明，在这个世纪的最初60年里，以银币表示的价格翻了一番，随后价格趋向稳定，直到1700年又开始出现了一个长达50年的上升趋势。[②] 因而，从一个角度看，在这个长时期里，帝国税收只是跟上了银币的通货膨胀趋势。最近，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认为，17世纪南亚次大陆上的长期价格数据既零碎，又缺乏说服力："因而总的来说，印度的证据表明价格暴涨至多是零星的，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商品……"[③] 鉴于缺少长期定量数据，白银的流入很有可能被日益扩大的印度货币体系和经济吸收掉了。而且，白银增长的速率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减缓甚至阻止了价格上涨。

尽管如此，对任何一种财政管理来说，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地上调其征税额是一个可怕的前景。要不断取得成功，就需要有一个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运转良好的可靠结构。莫卧儿财政官员们是否实际上注意到了价格长期上涨趋势并据此行事，是另一个问题。但他们的成功征税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

如果假定的价格上涨确实发生了，可耕地面积也的确增长了，国家强加给农业的全部负担就会相应减轻。也就是说，与1600年同样重的实际税负相 187

---

① Habi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London, 1963）, p. 399.

② Irfan Habib, "Monetary System and Prices" in 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vols., Ⅰ, 376.

③ Sanjay Subrahmanyam, "Precious Metal Flows and Prices in Western and Southern Asia, 1500–1750: Some Comparative and Conjunctural Aspects," *Studies in History*, 7, n. s. （1991）, 79–105.

比，1700年的课税落到了更多耕作者身上，他们耕种着更多土地。因而，必然的是，同样的征税额至少对该地区某些农村社会阶层造成的负担减轻了。鉴于莫卧儿税务条例的规定有利于新开垦的土地，最初的农民耕作者或柴明达尔和他们的佃农可能不同程度地从中获益。

扎巴特税制赋予莫卧儿行政官员们一种通过强化帝国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来提高税额的手段。这种正规的税制牢固地建立在每年收集耕种面积、作物、价格和收成等数据的基础上，从而成为对农业生产课税的精确工具。当有足够武力支撑时，土地清丈和数据收集能使政府从收取地方豪强贡赋（pishkash）转变为课税（或“马尔”，即田赋收入）。在扎巴特制度下，所有柴明达尔都被贬抑为替每个耕种者和村庄向帝国官员转交既定税赋的人。在某些地区，税务管理能够绕过柴明达尔而直接同个别村庄中的主要农民耕作者〔莱雅提柴明达尔（*raiyati*[①] *zamindars*）〕打交道。

阿克巴的农业体制不是一个静止的实体。一任又一任的帝国迪万扩大了这个正规体系覆盖的领土范围。在1595年和17世纪末之间，测量和登记的土地从2亿零160万比加增加到2亿8 480万比加。这种增长中一个不确定、但可能较小的部分，是对再次清丈时发现的业已纳入这种体系的村庄和乡的耕地面积扩展的记录。然而，一个较大的部分源于把新乡纳入这种正规体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已测量土地的净增长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功绩。

变迁模式并非千篇一律。少数行省仍在新体制之外。西北边疆——喀布尔和塔塔——处在正规的农业体制之外，克什米尔也是如此。同样，位于河流众多的东北边疆的孟加拉和奥里萨也没有清丈土地。一些行省清丈出来的土地面积还减少了。拉合尔和木尔坦出现了轻微下降。阿杰梅尔和古吉拉特减少的幅度更大。

9个省份记录下了扎巴特土地的增长。在这些行省，清丈出来的全部土地增加了1亿1 080万比加。这个数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即便分摊到整个世纪，这也意味着帝国政府平均每年都要对超过100万比加的土地进行全套的清查工作：制定规划，予以执行，记录结果。这种规模的行政努力证明了莫卧儿帝国税务管理的浩繁和坚韧。此外，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要对从前已经测

188

① 莱雅提（raiyati），阿拉伯语词，名词形式为“莱雅特”（raiyat），意为农民。在英语文献中，该词又常拼写为ryot，中文译者通常音译为“莱特”。——译者注

量的土地定期重新测量(，情况就将更加如此)。例如，在17世纪70年代中期，奥朗则布下令对比哈尔省重新调查和测量。在这位皇帝于1680年后动身前往德干之前，8个县中只有5个县得到了重新调查。[1] 扎巴特体制的扩展发生在两个地区：帝国的心脏地带——印度斯坦，以及南方4个比较古老的德干行省。

在整个17世纪，恒河平原上德里、比哈尔、安拉阿巴德和阿瓦德诸省的扎巴特土地都出现了巨大增长。如果除去转给德里的两个县，阿格拉也出现了一定增长。在这5个省，调查、测量和课税的土地增加了4 230万比加。到1700年，181 300个村庄的土地得到丈量——几乎占全部登记在册的土地的4/5。在这个世纪末，德里、阿格拉和安拉阿巴德被测量的村庄超过了90%。显然，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完全覆盖印度斯坦地区的土地。

这5个省的征税额在10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从17亿8 400万达姆增长到35亿8 400万达姆。清量土地的稳定增长有助于莫卧儿国家在这个世纪里跟上农业生产的增长（和物价上涨）。当耕作者开辟出新的土地和占据新的村庄后，这些耕地就能得到调查和登记，以便征税。同样，当耕作者转向栽培更值钱的经济作物（如甘蔗或棉花）后，税务系统就能征收到更多赋税。

在德干诸省，到1700年，康德什、奥兰加巴德、比德尔和贝拉尔在清丈中列出了6 030万比加可耕地。从这些省中被确认的全部30 006个村庄中，82%（24 637个）在清丈之列。[2] 在阿克巴统治结束时，处于严格的莫卧儿管理下的德干各区的土地都没有受到清丈。以亲王身份统治德干的奥朗则布委派他那天才的财政官——穆尔希德·库里·汗（Murshid Quli Khan）在南方实施扎巴特体系。首次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发生在1652—1656年间，即奥朗则布的第二任期期间。1689年后，由于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海得拉巴）都不再接受这种正规的地税体制，这个体制摇摇欲坠了。

189

扎巴特和未丈量土地之比可以作为衡量帝国中央集权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当由调查员和登记员组成的莫卧儿小组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乡去往另一个乡，地方上的拉杰普特、阿富汗裔或其他贵族就失去了权

① Muzaffar Alam, "Eastern India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crisis,"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8, January–March 1991,62.

② Habib, *Agrarian System*, p. 4.

力和自治。新近被清查和征税的乡的乔杜里变成了服从新的纪律和控制的职员。大柴明达尔的先辈们曾累世向印度伊斯兰国家缴纳贡赋（pishkash），现在这些柴明达尔变成了“收税的柴明达尔”（*mal-wajib zamindars*），他们征收规定的税赋以换取免税自留地和固定比例的税收。为了保住一点从前的权力，这些地方领袖可以立约作为一名从小柴明达尔那里收取酬金的塔鲁克达尔（*taluqdar*）交纳税赋。这些小柴明达尔通常是那些现在受到国家干预控制的家臣或亲属。

由于拥有详尽而全面的数据，省财务官缩小了与每位柴明达尔可能争议的范围。他们借助他们的税率表和耕地面积表来决定合理的税额。扎巴特的扩展提高了政府与村庄精英直接交涉的能力。迪万能够更好地确定和定义莱雅提地区。在这些地区，是由村内柴明达尔而非柴明达尔来订立交纳规定赋税的契约。莱雅提地区的扩展扩大了可自由分配给小曼萨卜达尔的俸地的面积。在以村为单位的安排下，较小的官吏不必担心烦人的（*zor-talab*）地方贵族的桀骜不驯。一般说来，扎巴特体系既缓解了帝国皇室土地（卡里萨）代理人的征税问题，也缓解了俸地领受者（扎吉尔达尔）的征税问题。

这种体系当然没有阻碍，甚至还可能以某些方式鼓励了这些地区生产能力的扩大，特别是在具有较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上。迪万使用新增税收的一部分来加强和改进帝国的财政结构。行政压力的增大削弱和架空了乡村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同时，和平、秩序和新的市场机会，连同国家的鼓励，增加了可供生产者、中间人（商人、掮客和货币借贷者）、柴明达尔和国家分享的剩余数量。结果，到这个世纪末，农村社会驶进了变迁的快车道。 190

农村经济

尽管有时具有压迫性，莫卧儿财税体系并没有抑制农业投资和减慢人口增长。最近伊尔凡·哈比布的一项保守估计表明，印度总人口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直缓慢增长，从1600年的尚不足1亿5 000万人口增长到1800年的约2亿人口。[①] 甚至一再发生的周期性的高死亡率——当季风雨连续两

① 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 167.

年或两年以上不足时，就会出现大量死亡和时疫——也只是减缓而不是停止了人口增长。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乡村地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支撑了人数的增长。

就当前考察的这个世纪而言，莫卧儿印度的农村经济是繁荣的。在农业中，农民继续生产着剩余。总之，在这个长时期里，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17世纪的印度农民高效而成功地种植了大量粮食作物和工业作物。莫卧儿税收体系偏向于支持具有较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如靛青、棉花、甘蔗、乔木作物或鸦片。这样，国家激励加上需求增加，刺激了为市场栽培的经济作物的发展。

印度农民迅速抓住了赚钱的新作物。在1600—1650年间，两种新的世界级作物——烟草和玉米——在整个莫卧儿印度得到了广泛种植。[①] 随着孟加拉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丝绸生产地区，孟加拉农民迅速学会了植桑养蚕的技术。[②] 在东恒河平原上，17世纪中叶以后，由设立在巴特那的新欧洲贸易中心推动的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促进了棉花、鸦片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扩展。[③]

在莫卧儿帝国境内的几乎每个地区，从事定居农业的移民的边疆都以191 牺牲平原地区的放牧者或丛林地带的流动耕作者为代价向前推进。在东北地区，沿着喜马拉雅山麓即特赖（terai）一带以及在孟加拉东部和阿萨姆，富有活力的穆斯林农民从丛林中开辟出大量农田，用来种植水稻。[④] 在西北地区，旁遮普的国家税收在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最近定居下来的前游牧印度教徒以及日益占优势的锡克教查特（种姓）农民，在旁遮普富饶的河谷中积极开辟农田。十分肥沃的土壤足以补偿种植小麦、棉花、油籽和其他作物时在掘井方面的大量投资。随着集镇大量涌现以满足该地区繁荣的陆上贸易的需要，对经济作物的需求变得强烈起来了。[⑤]

肥沃的土壤和相对容易的灌溉鼓励了恒河平原东部的农村扩展。在阿瓦

---

① Raychaudhuri and Habib, *Economic History*, p. 217.

② Ibid., p. 217.

③ Alam, *Eastern India*, p. 68.

④ Ibid., 225.

⑤ Muzaffar Alam, *The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9–145.

德，拉杰普特人积极拓殖新的土地，以扩大他们的柴明达尔地产。[1] 在戈勒克布尔（Gorakhpur）县，阿克巴时期广袤的森林到18世纪早期让位给定居农业。政府采取特别措施鼓励土地开垦和定居。在那个时期，征自戈勒克布尔的赋税增长了267%。[2]

在比哈尔，在沙・贾汗在位时期，帝国政府分割了原来的罗赫达斯（Rohtas）县，从中分离出一个新县——沙哈巴德-波杰布尔（Shahabad Bhojpur）。这种变化部分地反映了对乌贾因尼亚—拉杰普特族（Ujjainiya Rajput）柴明达尔定居其间的波杰布尔地区（位于比哈尔西部边界一带）的行政控制的加强。不过，这种变化也部分地反映出耕作在森林边疆地区的极大扩展——政府积极推动了这种扩展。18世纪末叶的一部描述沙哈巴德和该地柴明达尔起源的书中写道："沙・贾汗时期的柴明达尔大部分起源于清除森林后形成的移民区（*bankatai*）。拓荒移民的那些人变成了柴明达尔，可终身收取nankars（凭借柴明达尔权利截留的税收部分）。在这些柴明达尔死后，他们的子嗣可领取准许继承他们保有的权利的证书（sanads），条件是继续（为帝国）效力。"[3]

柴明达尔

从16世纪80年代阿克巴实施新的税收体制到1680年奥朗则布启程前往德干的100年间，乡村地区隐约出现了一个混杂的中间人社会阶级。扎巴特体系覆盖地域的不断增加，有助于打破那些控制着每个乡的武士的包囊式防护。地方酋长或世族再也不能通过对他们的邻人发动小规模的邪恶战争来增加他们的领地。尽管依旧握有武力，偶尔实行暴力，但莫卧儿帝国的各级柴明达尔还是必须履行合约上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否则他们的萨纳德将不再续订。同时，由帝国需求推动的繁荣的地方和地区市场，也让所有地方豪强和望族能够得到新的、至少是更多的财富资源。 192

随着时间的流逝，莫卧儿农业体系的稳定加强了各级柴明达尔在合约中

① Ibid., p. 99.

② Ibid., p. 103.

③ 引自：Alam, *Crisis of Empire*, pp. 65–66.

的地位。帝国在合约中保证柴明达尔享有的年度土地税份额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财产权，可以出售、继承甚至抵押。[1] 显然，如果农村经济陷入危机——无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是过度课税造成的，这类财产权市场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17世纪买卖柴明达尔权利的无数事例是与农村经济的增长相一致的。

其他柴明达尔通过订立契约获得了在本不属于他们原有的柴明达尔地产的土地上为国家征收赋税的权利。这些塔鲁克达尔得到了对这项职责的补偿，不过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柴明达尔的全部权利，也不能享有柴明达尔的全部税收份额。[2] 在和平安定的正常环境下，在大多数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任务。

繁荣和稳定给较小的村庄或库德—卡什特（*khud-kasht*）柴明达尔带来了好处。村柴明达尔是村内精英的成员，他们拥有所有权，从而能够遗赠、出售或转让他们的土地。只要他们缴纳他们应该缴纳的那部分村庄土地税和继续耕种他们的土地，税务官就无法驱逐他们。这些耕种他们自己土地的农民也因拥有耕牛和耕犁而显得与众不同。

村柴明达尔作为一个法人团体，联合管理村内的财政事务。他们集体负责交纳土地税，而村长就来自他们中间。与此同时，他们交纳赋税时税率低于佃农或外来耕作者的纳税率，减免程度由习俗确定。这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民还管理着公共牧场、林地、池塘和其他村内共享资源。[3]

193

在库德—卡什特耕作者阶层中间，我们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存在着不平等和内部分层。来自17世纪晚期拉贾斯坦东部的资料表明，最富裕的农民（大概是每个村中的2—5名大人物）拥有6—8套犁牛组合，他们以作物分成为条件出租给他们较不富裕的同乡。[4] 这些精英农民从投资经济作物和扩大耕作中获得了利润。他们经常在村庄内外从事货币借贷。

来自拉贾斯坦东部的详细证据显示，17世纪晚期耕作稳步扩大，比较

① Raychaudhuri and Habib, *Economic History*, pp. 176–77, 246.

② Habib, *Agrarian System*, pp. 171–72.

③ Satish Chandra, "The Structure of Village Society in Northern India" in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Delhi: Orient Longman, 1982), p. 33.

④ Satish Chandra, "Rol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Zamindars and the State in Providing Capital Input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of Cultivation" in Chandra, *Medieval India*, pp. 171–72.

富裕的拥有土地的农民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到这项活动中来。精英农民交纳的赋税普遍少于北印度那些不能分享村内法人特权的租佃农场主（*pahi*）耕作者。较富裕的农民经常拥有过剩资金，足以取息放贷。他们从耕地面积扩大和经济作物增长中获益。

17世纪80年代，国家对地方贵族的战争褪变为更为正规的税收管理和偶尔为之的惩戒行动。逐渐把拉杰普特人、查特人和其他地方武士集团转变为准官吏的过程稳步进行。尽管如此，这项任务尚未完成。地方柴明达尔只是部分地得到控制和解除武装，或被比较驯服的新来者取代。日益增长的现金经济为他们提供了从货币借贷和经济作物中获利的机会。莫卧儿人尽管课税沉重，但也给柴明达尔和精英农民留下了巨额资产。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农村权贵和村庄精英也在积累着反抗的手段——只待出现地方叛乱的时机。

乡绅和集镇

194

到17世纪80年代，数百个繁荣的集镇（*qasbas*，卡斯巴）已经在北印度遍地开花。在每个乡里，中心集镇充当了为交纳帝国赋税而出售谷物的主要市场，也充当了货币借贷者和谷物交易商的中心。这些卡斯巴培育了一个日益成长的乡绅阶级。扎吉尔达尔的代理人、谷物商、货币借贷者、柴明达尔、退休的小官吏和解甲归田的军官，都在那里建立官邸，修建家宅。许多宗教人士和其他供奉赠地即免税地（madad-i mash）的接受者，也在集镇上定居。赠地持有人经常聚敛了大量资财，能够购买更多土地的柴明达尔权。

新镇经常是已经建立或即将荒废的居民点经由企业家活动而复兴起来的。莫卧儿王朝的扎吉尔达尔、柴明达尔、宗教人士甚或宫廷太监都致力于提高他们的地产的经济潜力，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个人的声望。修建一个客栈，打一眼水井，或建立一个市场（*ganj*），只需要相对有限的资金。在莫卧儿时期普遍和平和繁荣的条件下，这类活动是很活跃的。例如，现在是一个同名的县镇的沙贾汉布尔（Shahjahanpur）镇，就起源于沙·贾汗以创建一个居民点和修建一座城堡为条件，赏赐给他的两名阿富汗裔官员的14个村庄。这两名阿富汗裔官员从印度河以外的地方引进阿富汗人同胞定居在这个

镇上，并根据他们的世系和所属部落把他们分别安置在不同的街区。[1]

集镇生活对穆斯林特别有吸引力。他们是在许多北印度卡斯巴上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一般说来，在北印度，穆斯林乡绅从官方赏赐中获利匪浅。奥朗则布旨在把这些地方的免税赠地保留给穆斯林的政策，显著增加了以地方集镇为基础的乡村穆斯林精英的财富。到17世纪中晚期，乡里的加齐（qazis，即法官）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变得很抢眼。[2] 许多卡斯巴被穆斯林主导的程度，反映在编年史家对18世纪早期锡克人起义中（卡斯巴）抵御班达·巴哈杜尔（Banda Bahadur）部队袭扰的描述中（见后文，第十二章）。

萨特莱杰—杰纳布河间平原上的巴塔拉（Batala）镇，位于旁遮普的

195 拉合尔东北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卡斯巴。巴塔拉在1465年由拉姆·德夫（Ram Dev）——一个刚刚皈依伊斯兰教的巴提—拉杰普特人（Bhatti Rajput）——在一个古代村落遗址上修建。他是布鲁尔·洛迪苏丹（Sultan Buhlul Lodi）的总督治下的旁遮普的税收承包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水灾和战争后，整个地区已经变得人烟稀少。拉姆·德夫积极鼓励移民和拓荒，使得许多村庄在巴塔拉周围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洛迪时期结束时，巴塔拉已经成为一个乡治所所在的镇，镇上驻有一名收税官。[3]

当巴布尔从喀布尔出发深入洛迪统治的旁遮普劫掠时，巴塔拉曾经遭受了数年的战火和破坏，但到1527年，这个镇及其周围的腹地被完全纳进了新的莫卧儿体制。到18世纪早期，巴塔拉的人口估计在15 000—20 000人之间。每个穆斯林职业或宗派集团、每个印度教种姓，都生活在各自的邻里（*mohullas*）中，具有众所周知的名称和边界。国家任命了各类官职。数代税务官和从地方招募的加农戈接受了莫卧儿政府的任命。由省萨德尔任命的数代穆斯林加齐排解纷争，审判罪犯，保护镇上的人身和财产。

在几近200年的时间里，巴塔拉的居民经历了不间断的和平，直至1709年锡克人的进攻为止。巴塔拉周围耕地的半数以上能得到众多水井的灌溉。后来，沙·纳儿（Shah Nahr）水渠（沙·贾汗下令修建的一条向拉合尔送水的水渠）的一条支渠把灌溉用水引进了巴塔拉。许多土地由信奉伊斯兰教的

---

① Raychaudhuri and Habib, *Economic History*, p. 443.

② Alam, *Crisis of Empire*, pp. 110–119.

③ 下面对巴塔拉的描述自：J. S. Grewal, *In the By-Lanes of History: Some Persian Documents from a Punjab Town* （S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75.

阿拉因（种姓）拉杰普特人及其佃农进行精耕细作，栽培用于出售的花卉。集中到镇市上的小麦、粗糖和其他剩余产品，再进一步销往拉合尔。织工、染工、铁匠、皮匠、木匠和其他工匠大批大批地出现在巴塔拉镇，他们几乎都是穆斯林。用来制作腰布（*lungis*）和其他衣服的普通棉布、马鞍、鞋子、华丽的皮革制品以及木雕，都是供出口的制成品。作为旁遮普最重要的商人种姓，信奉印度教的卡特利人（Khatris）控制了该镇的商业生活。多达30个亚种姓的卡特利商人、店主和货币借贷者拥有住所和商业财产。别的商业种姓靠做萨拉夫（即货币兑换商）和金匠营生。 196

然而，巴塔拉镇上的多数人是穆斯林。这个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伊斯兰教中心，直接受惠于官方的资助。沙姆希尔·汗（Shamshir Khan），一个在阿克巴时期任巴塔拉收税官的改信伊斯兰教的拉杰普特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水库或池塘，周围环以花园、清真寺和他自己的陵墓。这些工程完工于1588—1589年间。这个税吏的陵墓变成了旌表他对巴塔拉的穆斯林乐善好施的纪念碑。这些穆斯林如果识字，就会在这座陵墓的壁上用墨水涂鸦上他们的名字、出身和职业。在这位收税官的请求下，阿克巴把可带来10万达姆收益的土地赐予著名的布哈拉（Bukhar）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沙（Sayyid Muhammad Shah）。他利用这些资金为居民和旅客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慈善食堂（*langarkhana*）。

在贾汗吉尔和沙·贾汗统治时期，皇家继续向圣人和信徒馈赠礼品，赏赐赠地。在奥朗则布漫长的在位期间仅修建了一座聚礼清真寺，由这位皇帝设立的一笔固定津贴来维持。在奥朗则布的统治临近结束时，一个叫穆罕默德·法兹鲁丁（Muhammad Faziluddin）的卡迪利（Qadiri）苏菲派大师，又建立了一所济贫院和一所神学院。这两个机构都从奥朗则布的继承人那里获得了免税土地。

国际贸易

在17世纪期间，莫卧儿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到一种日益重要的新的外部联系的推动：莫卧儿印度和早期现代欧洲之间的联系。北欧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还有奥斯坦德人（Ostenders）——组织起股份制贸易公

司，而无视葡萄牙人是主宰印度洋的海上强权和贸易商。每个贸易公司都是根据王室特许状从事经营的，特许状授予其垄断一国对印贸易的权利。其中最强大的实体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和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事实证明这两个公司是历时悠久、获利丰厚的远程贸易公司。（作为一个王家贸易公司，法属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后来者，而且苦于有悖常规的管理。）这些东印度公司（简称“EIC”）创造和培育了同印度次大陆稳步扩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

东印度公司出口莫卧儿印度的工业和加工产品到欧洲，欧洲用新世界的硬币来购买这些产品。每个地区都从这种交换中得到了好处。在这个世纪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膨胀的贸易利润相伴而来的是更多欧洲人的出现。有利可图的贸易也鼓励了而且在事实上也有赖于本国王室的强大支持。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英格兰和荷兰民族利益的体现。

197

在北欧人的推动下，印度直接出口到欧洲的商品规模和种类都有了极大提高。东印度公司严重侵害了葡萄牙人的黑胡椒贸易。黑胡椒是葡萄牙人在（印度）半岛西南部种植胡椒的地区获得的主要产品。随着欧洲民众对胡椒消费需求的增长，EIC从印度的输入量也相应增加。1621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估计每年欧洲的胡椒进口量为700万磅，其中葡萄牙人进口了140万磅，英属和荷属公司分担了剩下的560万磅进口量。[①] 至1670年，这两家公司的年进口量达到了最高峰，合计1 350万磅。[②]

其他印度商品，如在阿格拉附近的巴亚纳（Bayana）和古吉拉特种植和加工的靛青，在欧洲拥有一个稳定而赢利的市场。由于与菘蓝相比生长较快和价格较低，印度的靛青是一项重要的出口产品，直到18世纪新世界更便宜的货源取代它为止。产自孟加拉北部卡西阿姆巴扎尔（Kasiambazar）及其腹地的桑树种植园中的生丝，1650年后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丝织工业的一个新的供给来源。欧洲军火工业大量需要的硝石，也成为返回欧洲的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压仓货。

---

① K. N. Chaudhuri, “Foreign Trade with India” in Raychaudhuri and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Ⅰ, 399.

② K. N. Chaudhuri, *The European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Table C.14, p. 529; and Chaudhuri, “Foreign Trade with India,” p. 399.

一个更重要的进展是把印度的纺织品列为出口商品。在这个世纪的早期，东印度公司就已经涉足古吉拉特和科罗曼德尔东南部同印度尼西亚历时悠久的棉布贸易。来自这项贸易的利润有助于抵销香料的费用，而已经在巴塔维亚定居的荷兰人在这项贸易中占据了近水楼台之便。试运很快就为比较便宜的印度棉布开辟了一个市场，并在低端市场排挤掉了呢绒和亚麻布。到17世纪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拍卖市场上出售了25万匹印度布。[①]随着在阿姆斯特丹销量的增长，荷兰的运输量很快出现了飙升。到该世纪中叶，印度棉织内衣和外套的舒适性和耐洗性已在欧洲广为人知。诸如印花布（patterned calico）和轧光布（chintz）之类比较昂贵的棉布料开始渗透到奢侈市场。印度丝绸也有大量需求。

198

在1660—1689年间，随着价格和需求的急剧上升，欧洲对印度纺织品的需求也出现飙升。166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输入了273 746匹棉布（大约相当于420万平方米）。（进口）增长曲线在1684年达到顶点，为1 760 315匹（或2 690万平方米）。[②]荷兰的进口尽管略为逊色，但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饱和的欧洲纺织品市场在1689年突然陷入萧条，直到进入18世纪才又开始出现增长趋势。

欧洲的回程贸易几乎仅限于从新世界——有一段时期从日本——输送贵金属。在这整个时期，英国人仅能指望出售少量的绒面呢和呢绒、未加工金属（如锡、铅和铜）以及一些欧洲奢侈品。荷兰人能够供应来自摩鹿加群岛和锡兰的香料。这两个地方已沦落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然而，对这两个公司来说，对印度商品的购买力取决于输送的贵金属量。在166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随着纺织品出口的加快，荷属和英属公司合计平均每年输送超过34吨的白银和差不多半吨黄金。[③]在莫卧儿帝国版图内，输入的贵金属和硬币直接被送到帝国铸币厂熔化和冲制成卢比或金姆尔（gold muhrs）。然后，它们才能被用来支付给供应布料和其他商品的印度掮客和商人。在秘鲁铸造的成箱的银里亚尔（*reales*），经常经阿姆斯特丹或伦敦转运，直到抵达苏拉

① Chaudhuri, "Foreign Trade with India," p. 401.

② Chaudhuri, *Trading World*, Table C.24, p. 547.

③ 这些年度平均值是根据1660—1760年间两家公司的有关数据计算来的。见：J.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p. 24.

特的莫卧儿铸币厂后才开箱。

新贸易中心的建立

199

在印度的极南端和东南亚，荷兰人能够像葡萄牙人曾经做过的那样，自由地建立他们自己的设防贸易基地和有望控制生产者。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在1610年以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从南方四分五裂的印度教纳亚克王国那里得到许可，在布利格德（Pulicat）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定居点。然而，在次大陆上较大和较强的国家疆域内，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总的目标是获取戈尔康达苏丹国位于戈达瓦里河（Godavari）口的默吉利伯德讷姆（默苏利珀德姆）和莫卧儿王朝治下古吉拉特的西部海港——苏拉特。1605年和1606年，一个荷兰代理商造访默吉利伯德讷姆，与戈尔康达的库特卜·沙王朝统治者商谈通商事宜。这是在东南亚市场上需求很多的上等轧光布的主要生产区。国王敕许荷兰人在默吉利伯德讷姆建立一个贸易站，而且向荷兰人征收较低的出口关税。10年后，荷兰人获准在苏拉特开设一个永久商站。[1]

最初，英属东印度公司没有投资设立它自己的定居点。取而代之的是，公司于1611年在默吉利伯德讷姆创立英国商站，1613年又在苏拉特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永久商站。1615年，这个公司唆使詹姆斯一世派遣托马斯·罗作为国王大使前往贾汗吉尔宫廷。罗不辱使命，进一步巩固了英国人在苏拉特的地位，使得他们能够派遣代理商深入内地，在阿格拉、布尔汉布尔、巴特那和其他贸易中心设立贸易站。

在这些贸易中心，那些分别是他们各自公司雇员的荷兰或英国代理商出售欧洲货物，购买印度纺织品和其他出口商品。这些贸易中心或“代理商区”（“factories”）是由欧洲商人组成的自给自足的社区。他们有着社区纪律，保持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按照当时的风格，带有围墙的商站建筑群既是生活区，也是贵重物品的安全存放地。这些东印度公司雇佣欧洲人负责武装守卫，也雇用印度人。较大的商站，特别是像圣乔治堡（Fort St.

① Chaudhuri, “Foreign Trade with India,” p. 388.

George）那样的南方商站，很早就发展成为几近独立的城邦。

印度商站位于一个直接管理的贸易体系的一端，伦敦或阿姆斯特丹则位于另一端。只存在两个市场：即在印度各个地区的各类商品的购买市场和各类进口商品的欧洲销售市场。这些公司拥有并运送这些货物，全程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正像经常提到的那样，它们确实是现代多国公司的先驱。 200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股东们——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人董事会”（the Court of Seventeen）和伦敦的“股东大会”（the Court of Proprietors）——主持着这些新近发展起来的复杂组织，使其在运营中能保持很高的效率和稳定。每个公司都在其国内设立了一系列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账目、进货、存储、运输、金银块采购和其他方面的事务。通过发行股本、贷款和债券，它们募集了大量短期和长期资本，以硬币的形式运送到亚洲。它们设立了极其详尽的账户，包括商品、航运、商站和贸易季度的损益表。

最初通过反复尝试和不断摸索完善起来的惯例被制定为决策规则，在日后始终如一地加以应用。公司官员制订了一套复杂的航运日程表，用于他们远在天边的贸易站。日程表必须为印度和欧洲间的每一趟几乎耗时两年的贸易远航提供详尽的安排。所有专门的EIC船只要么直接为公司所有，要么是为贸易而租借的。船上配有公司职员。所有船只都配有武器，完全能够抵御欧洲战舰以外的各类船舰的袭扰。

在欧洲，这些公司把印度货物存放在仓库中，并以垄断价格进行销售。通过这些做法，这些公司能够把价格和利润的波动降到最低限度。在印度，荷属和英属公司都十分努力地对购买印度产品进行合理化安排。由个别工匠顺次生产的纺织品——纺工、织工、染工、漂白工和印花工——在标准化方面需要做出特别努力。EIC代理商向印度的中间人及批发商订购大约在8—10个月后交付的数千匹特定质量和样式的布料。预付款使商人和他们的织工有义务按期交付布料，对生产者来说则充当了定购保证金。

到该世纪中叶，在莫卧儿印度，这条新贸易渠道的影响已经被人们感觉到了。4个沿海地区生产了出口纺织品的大半以上：古吉拉特以苏拉特为中心的地区；科罗曼德尔北部介于克里希纳河和戈达瓦里河之间毗邻默吉利伯德讷姆的地区；介于布利格德和马德拉斯之间的科罗曼德尔南部地区；以及 201

作为孟加拉胡格利河港腹地的恒河三角洲地区。[1]在每个地区内，输入的金银在转化成帝国货币后用于支付关税、代理商的地方费用、给官员的贿赂和礼品，并形成织工手中的新收入和印度批发商和中间人钱柜中的利润。

在这些地区，欧洲人的活动深入到乡村。在科罗曼德尔北部，在该世纪后半叶，默吉利伯德讷姆的荷兰人扩大了他们的购买范围，不再仅限于传统上从克里希纳河和戈达瓦里河之间地区输出的贵重花布。他们还开辟了一个销售纯白棉布（calicoes）的新市场。[2] 以长布即“吉尼”（guinees）闻名的品种是35码长的布匹，主要用于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荷属东印度公司每年购买四五百万码的纯白棉布。这些布匹的半数直接运往荷兰，半数托运到巴达维亚，然后在东南亚转售。默吉利伯德讷姆的英国商站也载运几乎同样数量的纯白棉布到欧洲市场。

“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在位于默吉利伯德讷姆港的总商站和3个内地的分商站派驻了常驻荷兰代理。这些商站实际上是欧洲代理商和泰卢固科马提（Komati）种姓商人每年两次会面的市场。从6月到8月，他们向这些中间商订购货物，预付定金。然后，科马提批发商又同织工工头订立合同，后者控制着数十名同行的产品，负责保证交付合格的布匹。在9月至11月之间的适航季节，荷兰代理商收取交付的布匹，而这些布匹必须通过一般质量、标准尺寸和棉线数量方面的检验。

在这个地区，织工并没有聚集在城镇，而是分散在遍布沿海各县的工业村中。在东戈达瓦里河三角洲的东部，位于德拉克沙拉马（Draksharama）

202

村的荷兰商站从下游区的16个村庄中得到（产品）供给。荷兰人在1682年做的一项人口调查显示，这16个村庄的5 960家住户使用着6 930台织机，平均每个村庄有373家织户。在典型的科罗曼德尔北部工业村，织工、漂洗工和染工多达住户的半数以上，远远超过耕作者的人数。[3] 每个由成年男性织工劳作的住户平均每年生产1 300—1 500码布。在17世纪80年代通行的价格水平下，一个挣取现金的织工能够在购买食物和满足其他生计需要之外，在年终

① Chaudhuri, *Trading World*, “India: Main Textile Weaving Areas 1600-1750,” p. 244.

② 关于科罗曼德尔北部的数据来自：Joseph J. Brennig, “The Textile Trade of Seventeenth Century Northern Coromandel: A Study of a Pre-Modern Asian Export Industr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 D. dissertation, 1975.

③ Brennig, “Textile Trade,” p. 292.

攒下一些盈余。织工工头和那些拥有两台以上织机的织户甚至做得更好。

付给织工的预付款顺着社会等级阶梯向下流动到低等种姓妇女手中。她们从事纺纱，并直接向这些织工出售纱线。此外，荷兰人的预付款还流到该地区以外，用来支付班贾雅（*banjara*）种姓批发商/运输商的货款。他们用数千头牛为这里的织工驮运原棉。质量最佳的棉花并不是在科罗曼德尔北部地区种植的，而是来自西面500千米之外的康德什和贝拉尔这样的黑土植棉带。在戈尔康达国王治下，后在莫卧儿王朝治下，这些运货人被免除了赋税。

毫无疑问，各个东印度公司的活动直接促进了每个沿海地区乃至整个莫卧儿帝国的经济。孟加拉提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最引人瞩目的实例。在沙・贾汗于1631年把葡萄牙人从他们在胡格利的商站逐走之后，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在那个港口派驻他们的代理的道路就打通了。荷兰人在孟加拉的活动迅速增长。1663年，VOC输入了价值903 953弗罗林的金银到孟加拉，用于支付货款；到1707年，金银的输入量增加到320万弗罗林。[①] 出口总值也呈现出类似的上升趋势。[②] 从孟加拉，荷兰人购买了数量日益增多的硝石，主要运往欧洲；鸦片，销往印度尼西亚；生丝，分别销往日本和荷兰；棉布和丝绸制品，分别销往欧洲、印度尼西亚和日本。这些都是孟加拉生产者扩大或新兴的市场。

最近一项分析的结论是，荷兰人的贸易——主要是输入贵金属——带来了孟加拉产出和收入的实际增长。出口盈余的产生是由于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为满足欧洲需求而进行的资源再分配。到该世纪末，荷兰人和英国人对纺织品的采购几乎占用了孟加拉纺织部门10%的全职织工及其他工人。[③] 对孟加拉来说，日益增长的欧洲出口市场构成了地区经济稳步扩大的另一个推动力。这个已经步入坦途的长期趋势一直持续到英国殖民时期。

203

贸易公司在孟加拉的投资直接惠及帝国财政部，也间接提高了高级莫卧儿官员的收入。滚滚流入孟加拉的白银是位于拉杰默哈尔、达卡（Dacca）、巴特那和巴拉索尔（Balasore）的帝国铸币厂保持高产的支

---

① 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630–17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66–67.

②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70.

③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242.

柱。[1] 罂粟和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也繁盛起来。作为对市场刺激的回应，孟加拉农民为了丝绸生产把大片稻田改种桑树。每比加桑田（3/5英亩）的年收益是3卢比，而每比加稻田的年收益是0.75卢比。当1706年莫卧儿政府禁止同荷兰人贸易几近一年后，随着农民转向水稻生产，省财政受到了损害。[2] 莫卧儿卡里萨（王田）从比哈尔28个乡中的11个乡征收赋税。这些乡是硝石的主产区。包括瓦兹尔阿萨夫·汗在内的许多埃米尔，以扎吉尔的形式占有其他乡。在17世纪80年代晚期，VOC代理商购买了1 310吨硝石，相当于精炼硝石总产量的30%。[3] 但皇帝和显贵们却对比哈尔的鸦片产区有着类似的兴趣。[4]

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莫卧儿帝国在孟加拉积极鼓励同欧洲人的贸易。从17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荷兰人从沙·贾汗那里得到了在孟加拉免交过境税（这是地方扎吉尔占有者的额外收入来源）的特许。[5] 税率为3%—4%的关税依旧有效，因为这是帝国财库征收的赋税。在17世纪60年代早期，一名派往奥朗则布那里的荷兰大使成功地维护了这些特权。英国人享有类似的优惠。英国人以及荷兰人和法国人都定期向地方官员馈赠现金和实物，以维系他们的同情，确保皇帝的豁免令得到遵守。

204

当前的证据虽然还不完备，但有力地证明了莫卧儿印度的长期趋势是经济增长和富有活力。国家对经济活动鲜有限制。国家提供了许多服务和鼓励措施来培育各个层次的国内贸易。甚至欧洲贸易公司也得到了恩准，可以自由地从事稳步增长的出口贸易和自由地输入贵金属。在许多省里，耕作面积都有显著扩大。帝国税收也相应提高了。莫卧儿帝国对农业生产的课税在某些地区和时期可能显得苛重，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课税数量，还是课税形式，都不足以阻止增长的持续。至于是哪些阶级和集团从哪种增长中获益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回答。

---

① Om Prakash, "Foreign Merchants and Indian Mint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n Richards, ed.,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p. 171-192.

② Prakash,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238n.

③ Ibid., pp. 58-60.

④ Ibid., pp. 5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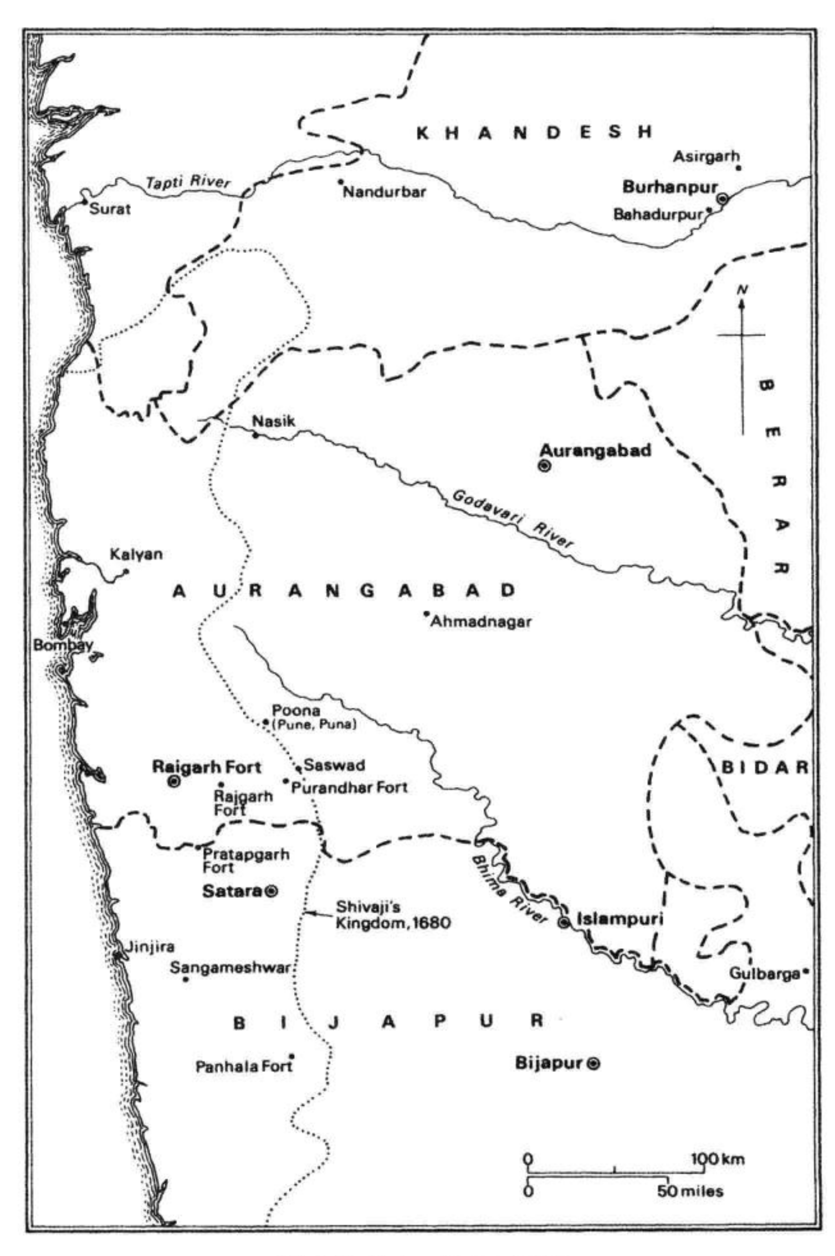
⑤ Ibid., p. 42.

第十章 德干的马拉塔人叛乱和莫卧儿人征服 205

奥朗则布刚一即位，一个令人惊异的抵制莫卧儿政治控制的新来源就出现了。在浦那（Puna）附近的德干西部山区，马拉塔人首领西瓦吉·朋斯拉（Shivaji Bhonsla, 1627—1680年）在比贾布尔苏丹国柔弱的壳体内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朋斯拉的政权为马拉塔武士种姓和有文化的马拉塔婆罗门种姓中雄心勃勃和富于进取的人提供了一个新选项。西瓦吉是如此成功，以致到17世纪60年代，他严重威胁到了莫卧儿人在南方的声望和霸权。

西瓦吉是马拉塔将军和贵族沙吉·朋斯拉同艾哈迈德讷格尔苏丹国的一位大马拉塔贵族之女吉佳·巴伊（Jija Bai）生的第二个儿子。17世纪30年代早期，沙吉曾试图把一位年轻的尼扎姆·沙王朝统治者变为他的傀儡，但最终失败。当艾哈迈德讷格尔遭帖木儿王朝鲸吞之后，沙吉参加了比贾布尔苏丹的卡纳塔克之役。沙吉继续控制着他在浦那附近西高止山中的大片采邑。比贾布尔苏丹事实上把西高止山许多地区的政治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在那个偏远地区势力强大的马拉塔酋长，即德什穆克们（deshmukhs）。

西瓦吉是由沙吉的妻子吉佳·巴伊（备受沙吉冷落）在浦那作为一名乡下马拉塔贵族养育成人的。和沙吉别的儿子不同，西瓦吉并未受到比贾布尔宫廷中波斯化高级文化的熏陶。18岁时，西瓦吉夺取了其远在异地的父亲的采邑。他吸纳了一些能干的年轻马拉塔山区酋长及其扈从为他效劳。部分是利用了比贾布尔的软弱，部分是出于对他父亲的叛逆，西瓦吉开始扩张他在西部山区的领地。



MAP 4. The Western Deccan in 1707
Source: I.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 1982), 14A.

地图4　1707年的德干西部

KHANDESH	康德什	Asirgarh	阿西尔格尔
Burhanpur	布尔汉布尔	Bahadurpur	巴哈杜尔普尔
Surat	苏拉特	Tapti River	达布蒂河
Nandurbar	嫩杜巴尔	Nasik	纳西克
Aurangabad	奥兰加巴德	BERAR	贝拉尔
Godavari River	戈达瓦里河	Kalyan	格利扬
Bombay	孟买	AURANGABAD	奥兰加巴德
Ahmadnagar	艾哈迈德讷格尔	Poona (Pune Puna)	浦那
BIDAR	比德尔	Raigarh Fort	赖格尔要塞
Rajgarh Fort	拉吉加尔要塞	Saswad	萨斯瓦德
Purandhar Fort	布伦特尔要塞	Pratapgarh Fort	普拉塔普加尔要塞
Satara	萨达拉	Bhima River	皮马河
Islampuri	伊斯拉姆普里	Gulbarga	古尔伯加
Shivaji's Kingdom, 1680	1680年的西瓦吉王国	Jinjira	金吉拉
Sangameshwar	桑格莫什沃尔	BIJAPUR	比贾布尔
Panhala Fort	潘哈拉要塞	Bijapur	比贾布尔

1646年，比贾布尔苏丹穆罕默德·阿迪尔·沙（Muhammad Adil Shah）染病，不能理事长达10年之久。西瓦吉乘机扩大他的势力。到17世纪50年代晚期，这位年轻的马拉塔首领脱离比贾布尔独立。他已经抛弃了马拉塔德什穆克（即乡村贵族）短浅的政治视野。他不再囿于比贾布尔界定的印度穆斯林政治文化。他已经变成了一名自由选择他自己的归属和行动路线的统治者。 207

西瓦吉在这些早期岁月中取得的显著成就经常为人忽略。通过不断的谈判、威胁和偶尔为之的暴力，这位年轻的朋斯拉首领建立起对本地区其他资深马拉塔德什穆克的控制。利用同样的方式，他从比贾布尔任命的守将那里夺取了近40座山堡，并用效忠于他的将领和部队来守卫这些山堡。一个由年轻的马拉塔武士和婆罗门行政官组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核心，组织和运转着他那日益成长的王国军队和政府。到17世纪60年代，他直接雇佣的步兵和骑兵队总数已达到了10 000名骑兵和50 000名步兵。

对政府财库精心谋划的抢掠、勒索以及对本地区人民日益增加的课税，为西瓦吉征募追随者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财富，西瓦吉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atra）建立了一个由互为犄角、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要塞构成的网络。由他设计和修建的拉吉加尔（Rajgarh）成为朋斯拉王朝的都城。在另一座巨大的山间要塞——普拉塔普加尔（Pratapgarh），他修建了一座宏伟的神庙，供奉着他的庇护神——巴瓦尼（Bhawani）女神。

西瓦吉把他的领土扩展到孔坎（Konkan）北部肥沃的沿海诸县。他的军

队攻占了一座富裕的商镇——格利扬（Kalian）[1]，驱逐了在那里拥有扎吉尔的比贾布尔贵族的管事。在获得入海口后，西瓦吉弄到几条船，开始了同波斯湾和红海的贸易。他雇用的其他海防武装船扬帆驶进阿拉伯海，从事掠夺性远征。他派兵驻守孔坎的几处沿海或岛上要塞。在这整个时期，这位年轻的拉贾（王公）为获取枪炮、海军装备和技术资助而同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谈判。

在这个早期阶段，沙吉在比贾布尔朝廷的声望和影响有助于阻止针对他儿子的惩罚性行动。甚至在1649年，当比贾布尔苏丹抓捕和囚禁了沙吉以迫使这位将军约束他儿子的活动时，几位有力的朋友还是促成了他的开释。在此后的数年里，西瓦吉相对沉寂。而在1656年奥朗则布入侵期间，这位苏丹还能够吁请他那位业已反叛的柴明达尔，命他前去掠夺莫卧儿人的土地，以牵制莫卧儿军队。但这种宽容随着穆罕默德·阿迪尔·沙苏丹的去世而终止了。

208 1657年，新苏丹阿里·阿迪尔·沙（Ali Adil Shah）派遣他一个最得力的将领阿福扎尔·汗（Afzal Khan）率领一支10 000人的军队前去征讨西瓦吉。在沿途，这支比贾布尔部队亵渎了图尔贾布尔（Tuljapur）的巴瓦尼神庙以及马哈拉施特拉的其他几座重要的印度教神庙。在经过了一系列双方都满腹狐疑的谈判后，阿福扎尔·汗说服西瓦吉同苏丹会面洽谈一项协议。在邻近普拉塔普加尔堡的一个地方，西瓦吉和阿福扎尔·汗在这位比贾布尔将军的中军帐中会面。在这座大帐中，两位首领最初的拥抱致意突然演变成一场生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阿福扎尔·汗力图掐死西瓦吉。但后者却利用他隐藏的铁“虎爪”划开了他那位劲敌的肚子。在收到他们将军的信号后，埋伏在周围的马拉塔部队发动进攻，屠杀陷入混乱的比贾布尔兵士。

阿福扎尔·汗的殒命和比贾布尔军队的溃退在马拉塔地区得到了广泛庆祝。[2] 被激怒的比贾布尔苏丹亲率一支新军进入西部地区，重新占领了南部沿海各县，但后来别处的困难迫使他撤军了。这个臭名远扬的事变终结了西瓦吉对比贾布尔苏丹本已三心二意的臣服。作为一名孤立无靠的马拉塔人首

① 原文如此，一般拉丁拼写形式为“Kalyan”。——译者注

② Harry A. Acworth, *Ballads of the Marathas,* “The Death of Abdul Khan at the Hands of Shiwaji Maharaha”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94).

领，他在那时不得不对莫卧儿人的提议做出让步，而这种提议长久以来削弱了德干上的各个苏丹国。

反叛国家的建立：第二阶段

在他生涯的第二阶段，即1660—1674年间，西瓦吉摇摆于接受和拒斥帝国权威之间。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第一次面对莫卧儿政权的全部压力。1660年，莫卧儿德干的新任总督沙伊斯塔·汗清除了马拉塔人的抵抗力量，占领了浦那，并派兵驻守西瓦吉的北部领土。在经过4个月的围攻和付出惨重代价后，莫卧儿军队占领了西瓦吉位于浦那附近的一座山堡——查坎。仅仅为攻取一座西瓦吉设防严密的山堡就要付出如此的代价，这促使沙伊斯塔·汗放弃了进一步的围攻行动。取而代之的是，他部署了由莫卧儿骑兵组成的飞虎团四处蹂躏（马拉塔）乡村。奥朗则布增派了援军，包括由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统领的一支10 000人的拉杰普特部队。沙伊斯塔·汗就在浦那建立辕垣，既作为中心要塞，又作为战地指挥所。 209

1663年4月5日夜，西瓦吉带领400人潜入浦那的防区。他和一支奇袭队进入沙伊斯塔·汗的府邸，摸进这位贵族的寝室，打伤了他，但未能将其杀死。沙伊斯塔·汗的儿子、他的数名妻妾以及数十名奴仆和士兵在混战中死去。西瓦吉和他的部队成功逃脱，仅有微不足道的伤亡。这次壮举令马拉塔人欢欣鼓舞，他们讴歌他们的英雄近乎超人般的事迹。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被怀疑同情马拉塔人，因为他的拉杰普特人部队防守着这座城市的外围。沙伊斯塔·汗声名扫地、含垢忍辱，（被奥朗则布）召回，由穆阿扎姆亲王接任德干总督。

数月之后，1664年1月，西瓦吉率领4 000名骑兵北上，奇袭了印度西部最繁忙的商业港口苏拉特。那里的莫卧儿总督撇下这座未设防城市中200 000名手无寸铁的市民，逃到苏拉特堡避难。西瓦吉置这座城堡于不顾，而是从容不迫地对城镇进行了6天掠夺。在他的受害者中就有巴哈尔吉·博拉（Baharji Borah），一名号称世界上最富裕商人的伊斯玛仪派商人。他的宅邸在（西瓦吉的）搜宝活动中几近毁灭。只有荷兰和英国商人用火绳枪奋力保卫他们的房舍，才得以幸免这场浩劫。最后，西瓦吉的部队带着价值超过1 000万卢比

的现金和贵重物品绝尘而去。在这次掠夺后，西瓦吉的武装舰船又捕获了驶往麦加的船只，从船上的香客身上勒索了大量赎金。他的骑兵还掠夺了莫卧儿德干的都城奥兰加巴德的周围地区，而素有懒散恶名的穆阿扎姆亲王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他。在同一时期，西瓦吉的部队击退了比贾布尔军队的一次进攻，并继续在那个王国肆意劫掠。

奥朗则布对遭受的这些耻辱愤恨不已，寝食难安。他派出了他最能干的将军，命令他首先消灭西瓦吉，然后入侵和吞并比贾布尔。1665年3月，米尔扎・拉贾・贾伊・辛格・卡赤瓦哈（Mirza Raja Jai Singh Kachhwaha），一位年届六十、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集合起一支大军，前去援救浦那的贾斯万特・辛格・拉索尔。由他的私人秘书保存下来的贾伊・辛格的急件差不多就像教科书那样，展示了一名高级莫卧儿战地指挥官运用的技能和资源。[①]
210 在最初的外交攻势中，贾伊・辛格（首先）派特使到比贾布尔，警告苏丹不要同西瓦吉沆瀣一气，又派代表到欧洲人的沿海据点，坚持要求他们阻止马拉塔舰队的一切海上活动，（最后）再派婆罗门使者出使那些对西瓦吉嫉恨已久的众多马拉塔德什穆克。从后者那里，他征召了马拉塔后备军队中的精锐部分。他向西瓦吉的所有主要官员许以高官厚禄，以破坏他们的忠诚。

军事行动立即开始了。贾伊・辛格从浦那出发，径直向南进军，并在萨斯瓦德（Saswad）镇建立了他的基地，布置前哨，然后披荆斩棘，进逼坚固的山间要塞——布伦特尔（Purandhar）。两个月里，围攻部队不屈不挠地越过重重壕沟，调来他们的大炮，然后对一道又一道防线发起攻击。贾伊・辛格派出骑兵同马拉塔人交战，劫掠和焚毁这里的乡村。西瓦吉无力解除要塞之围，也无力阻止他的王国覆亡。巴瓦尼女神在梦中警告他不会成功地对抗一位印度教国王。[②] 在士气受挫的情况下，西瓦吉同贾伊・辛格举行了谈判。在得到贾伊・辛格对他人身安全的庄严承诺后，西瓦吉仅带了6名婆罗门，来到贾伊・辛格就在围困线后面设立的中军大帐。

由于确信他无力挽救普兰达尔和驱逐莫卧儿军队，西瓦吉投降了。根据普兰达尔和约，西瓦吉把23座城堡连同它们控制的土地割让给帝国，但保留

---

① Jagadish N. Sarkar, *The Military Despatches of a Seventeenth Century Indian* General（Calcutta: Scientific Book Agency, 1969）.

② James Grant Duff, *History of the Mahrattas*（New Delhi, 2 vols. in one, reprint edition, 1971），Ⅰ, 110.

了12座城堡及其土地作为他的领地。他成了莫卧儿皇帝的附庸，交纳贡赋，但免于以曼萨卜达尔的身份亲身侍主。作为替代，他年轻的儿子沙姆巴吉（Shambhaji）在获得5 000扎特的爵位后将被送往帝国宫廷。最后，西瓦吉同意率领他的部队，参加受命入侵比贾布尔的莫卧儿军队。作为回报，他被许以从比贾布尔夺来的土地。西瓦吉则放弃他的独立，作为一名酋长（或用帝国的术语，作为一名柴明达尔）进入帝国体系。这也是他之前的数十名地区酋长和国王的命运。

1665年11月中旬至1666年2月间，在莫卧儿人对比贾布尔发动的失败战役中，西瓦吉带着11 000人的部队同贾伊·辛格并肩作战。在这场战争以谈判结束之前，西瓦吉被贾伊·辛格说服，北上前往帝国朝廷。在留下他的母亲摄政后，西瓦吉、他的儿子沙姆巴吉、他的7名高官以及4 000兵士启程北上。为了这趟行程，他从帝国的德干财库中预借了100 000卢比。

211

在阿格拉，他的东道主和庇护人是库马尔·拉姆·辛格（Kumar Ram Singh）——此公是贾伊·辛格的儿子和其在朝廷的代理人。1666年5月12日，亦即奥朗则布的第50个阴历生日这天，西瓦吉进献了象征臣服的礼物，并在这位帖木儿皇帝的御座脚下鞠躬致敬。奥朗则布对他的觐见草草地表示了谢意，但直到这场仪式临近结束时才迟迟回赠礼物和做出其他表示。在繁杂的朝觐仪式进行过程中，西瓦吉猛然发现他自己站在各排贵族的后面。义愤难平的西瓦吉大声抗议，然后晕厥过去，跌倒在地。他被架出觐见厅，送到库马尔·辛格的府邸。多疑的皇帝不顾西瓦吉恩准他返回故里的请求，把他软禁起来，但允许西瓦吉的部队离开阿格拉前往德干。奥朗则布拒绝私下接见他，还扣留了本要赏给西瓦吉的大象、宝石和锦袍。

西瓦吉假装生病，躺到床上，唤来医生。在数周之内，他设法找到了逃跑的方法。这很可能是在库马尔·拉姆·辛格的默许下或通过贿赂他的卫兵做到的。西瓦吉潜出府邸，在他的出逃被发现并报告给莫卧儿巡警、市政官、法乌吉达尔和其他帝国官吏之前，就已经逃之夭夭了。在次日安全抵达马图拉后，西瓦吉托庇于一个马拉塔婆罗门家族，后者帮助他装扮成一名云游印度教僧侣，以躲避莫卧儿的巡逻队。他和沙姆巴吉向东迂回，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1666年12月徒步赶回赖格尔（Raigarh）。

不知何故，奥朗则布出人意料地没有派军队追剿西瓦吉。显然，西北山

区的优素福贾伊起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两年后的1668年，西瓦吉在经过多次乞求奥朗则布宽恕后终于得到了回应。这位皇帝承认他拥有“拉贾”的头衔，并归还了查坎要塞，但没有把莫卧儿军队占领的另外22座城堡中的任何一座归还给西瓦吉。沙姆巴吉的5 000扎特爵位得到恢复。他前往穆阿扎姆亲王在德干都城奥兰加巴德的王府，统领1 000名马拉塔骑兵。后者由贝拉尔省的扎吉尔供养。在沙姆巴吉效命莫卧儿王朝的两年中，这位年轻的马拉塔嗣子和穆阿扎姆王子相处融洽。

212

然而，裂隙很快就出现了。莫卧儿财政官试图从沙姆巴吉的扎吉尔上收回西瓦吉前往阿格拉时预借的100 000卢比费用。西瓦吉被激怒了，他召回他的儿子，攻占了许多他从前拥有的据点。由于穆阿扎姆王子和他最强大的属僚——阿富汗裔贵族迪利尔·汗（Dilir Khan）之间的内斗，莫卧儿人的惩戒行动受到了阻碍。迪利尔·汗指责穆阿扎姆亲王和西瓦吉串通一气，密谋夺取帝位。这场危机最终平息下来，穆阿扎姆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不过，对西瓦吉的即期压力却升高了。

1670年10月，西瓦吉集合了一支15 000人的军队，北上进逼苏拉特。那里的莫卧儿总督只在城墙上（根据奥朗则布的命令新近修建）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于是马拉塔人再次洗劫了这座城市。在经过数日抢劫后，这些劫匪带走了价值超过650万卢比——比上次少——的现金和物品。在接下去的数年里，苏拉特的贸易陷入衰落，因为已很明显，帝国再也无力保卫它的最富庶的海港了。[1] 在进一步掠夺莫卧儿帝国的康德什后，西瓦吉同一支5 000人的莫卧儿军队发生了激战，然后返回赖格尔。

在接下来的4年里，西瓦吉的马拉塔军队在东北方向奇袭和洗劫了莫卧儿帝国境内的康德什，在东南方向则突入了比贾布尔境内的卡纳拉（Kanara）。比贾布尔军队和帝国军队都对这些掠夺者进行了追击，还经常与他们交战，但胜败难分。西瓦吉的指挥官们发现他们能够在战场上同莫卧儿军队旗鼓相当。莫卧儿重装甲骑兵和野战炮兵的威力被马拉塔部队更大的机动性和更高的士气抵消掉了。

---

① M. N. Pearson, “Shivaji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ughal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 (1976), 221–235.

反叛国家的建立：君主国

受到这些胜利和流入他钱柜的掠夺品和赋税持续增加的鼓舞，西瓦吉迈出了重大的一步。1674年6月，他自立为一名独立的印度教君主。[①]在仪式举行前做了许多个月的准备。西瓦吉在一段时期专心于在众多神庙和圣殿中虔诚祈祷和膜拜。同时，他的婆罗门顾问们说服他那个时代首要的印度教神学家——瓦拉纳西的噶加·巴塔（Gagga Bhatta）宣布西瓦吉不只是马拉塔种姓中的一名首陀罗，还是一名失落的刹帝利，一名拉杰普特。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梅瓦尔拉纳家族中的太阳一支。噶加·巴塔赶到马拉塔人的都城。在那里，他首先为西瓦吉举行了洁净仪式，然后授予他再生种姓的圣线和吠陀诗篇。

1674年6月6日，在经过一夜的斋戒后，西瓦吉举行了印度国王的献祭（*abisheka*）仪式。他端坐在一张金凳上，他的妻子索娅·巴伊（Sorya Bai）坐在他身边。他接受了从金罐中倒出的恒河水的沐浴。在换上一件国王用的猩红锦袍后，他立即坐到一张新造的覆金宝座上。在婆罗门赞歌和礼炮齐鸣声中，噶加·巴塔在他的头顶上方撑起一柄黄罗伞，然后向他山呼“湿婆—查特拉帕提”（Siva Chhatrapati）。[②]此后便是向数千名婆罗门、官吏和其他显贵慷慨赏赐以及举行国王巡城典礼。整个仪式估计耗费了500万卢比。

西瓦吉的加冕礼是17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举动之一，在整个次大陆得到了广泛传扬。在他的王国的边境内，这场加冕仪式让他的合法权威甚至超过了最古老的马拉塔贵族世系。在他的王国的边境之外，它把这位朋斯拉家族的统治者及其后裔树立为一个可与任何其他王族比肩的统治家族。然而，更令人震撼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数代以来首个地区君主在没有提请帖木儿皇帝恩准的情况下宣布拥有国王的权威。与他的父亲不同，西瓦吉通过这场戏

① 加冕仪式的详细描述见：Jadunath Sarkar, *Shivaji and His Times* （Calcutta: M. C. Sarkar & Sons, Six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1961）, pp. 201–215.

② 在马拉提语中，“Chhatrapati”（也拼写为“kshetra-pati”）相当于“皇帝”的称谓。因此，西瓦吉的头衔“湿婆—查特拉帕提”（意为“湿婆大帝”）表明西瓦吉不仅被尊奉为皇帝，还被神化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神的化身。——译者注

剧性的举动，重申了他独立于印度穆斯林权威和政治文化之外。在一次公开的复古主义仪式上，他建立了一个好战的印度教王国。这位新统治者是一名“查特拉帕提”（*Chhatrapati*）[1]，而不是一名“帕德沙”（*Padshah*）。针对莫卧儿统治的叛乱获得了新的凝聚点。

库特卜·沙/朋斯拉联盟

在两年内，这位新君主展示了一种大胆的新战略。西瓦吉先是同疲惫不堪的莫卧儿德干诸省总督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然后，他又同意和担任戈尔康达王国首相的泰卢固人婆罗门马丹纳·潘迪特（Madanna Pandit）建立一个防御联盟，共同抗击莫卧儿军队。根据这项协议的条款，戈尔康达这个最富裕和最稳定的德干国家同意每年都资助西瓦吉同帖木儿王朝作战。受此鼓舞，1677年1月，西瓦吉率领一支60 000人的军队向东开进到戈尔康达的首都海得拉巴。在这里，他同库特卜·沙王朝苏丹阿布尔·哈桑（Abul Hasan）、马丹纳·潘迪特及其统率着库特卜·沙王朝军队的兄弟阿坎纳（Akkanna）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这两位统治者商谈建立一个致力于征服和联合吞并比贾布尔所属卡纳塔克土地的军事联盟。当下，这片位于东南科罗曼德尔沿岸的富饶而繁荣的土地由近乎独立的比贾布尔总督或纳贡统治者统治。后者当中就包括了西瓦吉的同父异母兄弟乌阎柯基·朋斯拉（Vyankoji Bhonsla）。他在科佛里河上的坦焦尔（Tanjore）周围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位库特卜·沙王朝苏丹深受他的两位婆罗门官员的影响，同意按月提供大笔现金资助，同意派遣一支5 000人的辅助部队携带大炮跟随马拉塔军队作战。

在进军卡纳塔克的途中，西瓦吉把他的部队留在阿南塔普尔（Anantapur），动身前去朝觐克里希纳河边的著名湿婆神庙——什丽—沙伊拉（Shri Shaila）。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这位前来朝拜的国王花了10天时间在湿婆配偶的肖像前祷告。西瓦吉一度试图在这位女神面前自杀，但被他的侍从阻止了。在离开时，他捐献了足够为朝圣者修建一所河滨浴室、一座寺

① 字面意思为“刹帝利君主”。——译者注

庙和一处客栈的资金。[①]

一年的征战足以让这位马拉塔统治者占领比贾布尔所属卡纳塔克的两座地势险要的要塞——金吉（Jinji）和韦洛尔（Vellore）。韦洛尔直到被围困了14个月后才投降。胜利使得西瓦吉的官吏占领和吞并了大片领土。这些领土带来的税收每年高达200万金胡恩。然而，在坦焦尔，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乌阎柯基拒绝了西瓦吉提出的分享半数祖产的要求，并用他的军队自己的立场，但最终还是为了息事宁人向西瓦吉支付了600 000卢比。事实证明，西瓦吉不愿意把他新占领的土地的任何部分交给戈尔康达。不过，这个症结并没有造成他和库特卜·沙王朝防御联盟的破裂。

王朝继承

215

1678年初，当他返回赖格尔后，西瓦吉面临着一个为朋斯拉王位设计一种继承秩序的问题。这位马拉塔统治者和他的大臣会议正式建议在西瓦吉死后，在他的两个儿子间分割王国。幼子拉贾拉姆（Rajaram）将获得故乡的土地进行统治，而沙姆巴吉——当时正是一个19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将获得迈索尔和金吉的新占土地。

沙姆巴吉对这种安排公开表达的不满是广为人知的。莫卧儿的德干总督迪利尔·汗给这位年轻的王子发去密函，表示莫卧儿军队愿意帮助他赢得遗产，如果他同意结盟的话。1678年12月，沙姆巴吉在有失体统地强奸了一名受人尊重的婆罗门妇女后，躲过他父亲的监视逃走了。在他那位看来十分大度的妻子耶苏·巴伊（Yesu Bai）的陪同下，他骑马前往比贾布尔边境上的迪利尔·汗大营。在得到奏报后，欣喜万分的奥朗则布封这位年轻的亡命王子为莫卧儿贵族，授"拉贾"头衔和7 000扎特的极高爵位。

在几近一年的时间里，沙姆巴吉和迪利尔·汗一起参加了一系列反对比贾布尔和西瓦吉联军的战役。这个苏丹国中央政治权威的逐步瓦解，招致了莫卧儿王朝和西瓦吉双方的干涉。然而，沙姆巴吉对他的莫卧儿同僚越来越失望和不满。1679年11月，沙姆巴吉和耶苏·巴伊对时常收到的提议做出反

① Sarkar, *Shivaji*, pp. 291–292.

应，返回了朋斯拉朝廷。

在此间歇，西瓦吉向奥朗则布皇帝发出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滔滔不绝地指斥他违反阿克巴和贾汗吉尔的英明政策，对印度教徒征收吉齐亚（人头税）。西瓦吉责骂奥朗则布向他本已负担过重的臣民加征这项苛税。此外，他还指出，在《古兰经》中上帝被称为所有人的“主”，而不只是穆斯林的主，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崇拜上帝。[①]

西瓦吉从对莫卧儿疆域康德什和奥兰加巴德展开的一场大规模剽掠中返回，同他迷途知返的儿子会面。1680年3月末，这位朋斯拉家族统治者的健康状况已每况愈下，患上了高烧和痢疾，最终于数日后死亡，时年53岁。

216 西瓦吉驾崩三日后，他的大夫人索娅·巴伊在赖格尔堡宣布她的儿子拉贾拉姆为王。沙姆巴吉拒绝这种安排，公然僭取王权。在迅速获得大多数马拉塔官员的支持后，他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都城赖格尔。遭到废黜的拉贾拉姆未受伤害，但他的母亲及其200名左右的追随者都被处决。1681年2月，沙姆巴吉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加冕仪式，以为他作为西瓦吉继承人的身份取得完全的合法地位。朋斯拉王朝通过了它的第一次考验：西瓦吉的一个儿子成为马拉塔王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遗　产

西瓦吉的遗产包括了一个紧密的统一国家。在西高止山区和孔坎的沿海各县，西瓦吉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民事政府（civil administration）。这个政府得到了一个由数十座山间巨堡和险要的岛屿海岸据点组成的控制严密的网络的支持。他对严格的纪律和责任、对现金支付（而非采邑）以及对高效而整齐的组织的坚持，给当时的观察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以令人吃惊的效率利用通往海洋的便利，从他的沿海港口出发开展贸易和掠夺。西瓦吉无可匹敌的战略和外交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及时获取信息的稳固基础上——也得到了广泛敬畏。在这方面，他和他最大的敌人奥朗则布难分伯仲。

西瓦吉的成功对印度穆斯林政权形成了一种新式的政治和军事挑战。

① Sarkar, *Shivaji*, pp. 320–323.

17世纪50年代莫卧儿王朝对各个德干苏丹国重新主张帝国权力，为西瓦吉在德干西部地区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他的反叛国家在挑战帝国权势的过程中获得了财富和自信。到17世纪60年代早期，马拉塔人已经对莫卧儿和比贾布尔地区发动了新式的大规模掠夺战争。到17世纪70年代，巴格拉纳的马拉塔部队已经严重阻碍了——如果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切断——那些从苏拉特通往康德什的布尔汉布尔的重要的陆上商队路线。这些突袭带来了稳定的战利品收入，在后来也带来了大量的敲诈所得。后者经常被称为“乔特”（*chauth*）[①]，相当于印度伊斯兰国家按惯例留给古吉拉特和康德什柴明达尔的税收的25%。正是每年从他的王国境外掠夺来的财富维持着本土的开销。西瓦吉能够付款，而且能够顺利付款，是因为他从西高止山周围远为广袤和更加富饶的河谷抽取了大量有用资源。 217

这个统一国家很快就灭亡了。不过，马拉塔人积极掠夺莫卧儿帝国的传统依旧长盛不衰。一旦得到释放，马拉塔山民的组织和军事能量就泛滥到莫卧儿德干的更大世界。不再只是柴明达尔或穆斯林苏丹雇佣的领薪兵头从事这种小型的地方冲突，马拉塔将领也开始以朋斯拉王朝的名义攻伐和征服。德干的帖木儿官员碰到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抵抗形式——这种类型的抵抗不能用莫卧儿人通常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来加以清除。莫卧儿行政官发现，他们自己统治的土地被马拉塔人持续不断的袭击和掠夺弄得赤地千里和混乱不堪。马拉塔德什穆克们能够在宾服帝国之外找到另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进军德干

在阿杰梅尔城外的荒漠，穆罕默德·阿克巴王子差一点就通过一次闪击行动废黜奥朗则布。在流亡朋斯拉朝廷期间，他对奥朗则布形成了一个较不紧迫但也绝非较不严重的威胁。阿克巴作为一名帖木儿王子而拥有的家族魅力给了他一种强大的政治感召力。阿克巴能够成为撮合沙姆巴吉、戈尔康达统治者阿布尔·哈桑·库特卜·沙、甚至比贾布尔的年轻国王希坎达尔·阿迪尔·沙（Sikandar Adil Shah）结盟的媒介。由于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伊斯兰

① “乔特”（chauth），系梵语单词，原意为“四分之一”，常用来指印度历史上马拉塔帝国征收的一种赋税或贡赋。它名义上征收收入或产品的四分之一，故名。——译者注

王国戈尔康达现在处在两位泰卢固婆罗门的有效掌控之下，而侵略成性的马拉塔王国又明显是一个复兴的国家，因而印度教徒恢复对德干的统治并不是那样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特别让人忧虑的是比贾布尔的希坎达尔·阿迪尔·沙苏丹政权的持续分裂和软弱。如果阿克巴率领马拉塔/苏丹国联军北上，马瓦尔和梅瓦尔反叛的拉杰普特人会对加入他们方面有所犹豫吗？还有，如果均势开始发生变化，那么，其他莫卧儿贵族还会等待多久才会把他们的忠诚转向一位较为年轻、也更加强健的统治者呢？

218 阿克巴还对他父亲倍加珍视的那些政策形成了更大的挑战。部分由于情势，部分由于个人倾向，阿克巴对那些不满奥朗则布对待非穆斯林特别是对他恢复吉齐亚（政策）的人来说形成了一面旗帜。许多贵族恼于穆斯林乌里玛的权力膨胀和对阿克巴和贾汗吉尔开放的政治文化的压制。这些看法同对奥朗则布在德干摆出的顽固好战姿态日益增加的不安汇聚在一起。对奥朗则布的许多贵族来说，容纳比贾布尔、戈尔康达和新的马拉塔国家似乎是更好的策略。正像在一代人以前达拉·舒科是类似政策的象征和代言人一样，阿克巴在17世纪80年代成了反对派的核心。无论是在帝国内的核心集团看来，还是在外部的观察者看来，奥朗则布政策的代价正开始显现出来。因此，对奥朗则布来说，阿克巴在德干形成的威胁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一听到阿克巴自立为帝的消息，沙姆巴吉就在1681年1月末率领20 000名马拉塔骑兵深入康德什。在巴哈杜尔普尔（Bahadurpur），布尔汉布尔的一个繁荣的商业郊区，这些劫匪抓住了莫卧儿的吉齐亚收税官，从容不迫地洗劫这个镇长达3天时间。由于生活在这个镇的银行家和商人众多，巴哈杜尔普尔拥有“属于7个地区的巨额贵金属和各式各样的商品，来自各海港的其他大量物品，（这些财物）价值数十万卢比……存放在店铺中”。[1] 与他父亲的做法形成对照的是，沙姆巴吉放纵他的士兵偶尔为之的强奸和暴力。当这些劫匪放火、掳掠、强奸和滥施酷刑时，人数已经削减的布尔汉布尔守军一直龟缩在这座城堡中。这些马拉塔人“从各个普拉〔街区〕的银行家和商人那里掠夺了数十万卢比现金，还纵火焚烧这些街区。一些出身高贵的人

① S. Moinul Haq, *Khafi Khan's History of Alamgir* （Karachi: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1975）, p. 277.

在战斗中倒下时杀死他们的女人，然后杀身成仁……”[1]

当沙姆巴吉的军队撤往巴格拉纳时，德干诸省总督汗·贾汗·巴哈杜尔只差数千米就可拦截到这些马拉塔人了。而广为流传的谣言却说汗·贾汗·巴哈杜尔曾接受了沙姆巴吉特使的贿赂，故意避免与马拉塔军队遭遇。公众怒气冲天。这样大规模的掠夺将危及这条长途陆上贸易和汇兑路线，而布尔汉布尔是这条路线上十分重要的一个节点。不过，上达给莫卧儿皇帝的抗议书却采取了一种较为狭隘和宗派主义的观点：[2]

219

> 博学而虔诚的人（即乌里玛）和布尔汉布尔的贵族向朝廷上了一份陈情表，描述了异教徒的猖狂，穆斯林财产和荣誉的毁灭，以及今后主麻拜（*Jum´ah* prayers）的中断。

对布尔汉布尔的大贵族来说，沙姆巴吉的掳掠不只是对公共秩序的伤害，而是异教徒对穆斯林共同体的打击。如果莫卧儿帝国不能保护穆斯林的生命和财产，参加礼拜五聚礼的祈祷者就不会再把奥朗则布作为统治者而称颂他的名号。

在这份陈情表的刺激下，也出于对他儿子反叛的不安，奥朗则布一与梅瓦尔缔结和约，就立即起兵南下。奥朗则布从北印度带来了他直接统领下的全部中央军，其他3位王子的部队和他最好的将军们的分遣队。跟随这支部队而来的有皇帝的后宫和家人以及包括勤务、干事和官吏在内的（整个）中央政府。数万炮兵、火枪兵和先遣队，艺术家和工匠，干事和书记员，医生、艺术家和乐师，以及数量惊人的奴仆每夜都要行进到为他们划定的地方，在大营里面或旁边栖身。一个组织良好的集市连同它的商人及其属员，尾随在这些官方机构的后面。

自即位以来，这位皇帝还是首次为了稳定帝国的南部边疆而倾其所有。这个重大的决定把帝国势力的中心从沙贾汗阿巴德向南移到了德干上流动的营帐都城。

尽管阿克巴的逃亡和奥朗则布的追捕极富戏剧性，接下去的几年却陷入了不同寻常的僵局。沙姆巴吉支吾搪塞，力免（同阿克巴）联合北上，恢复阿克巴的帝位。随着沙姆巴吉对他联合行动的请求一再置若罔闻，阿克巴变

---

① Ibid.

② Ibid., p. 279.

得越来越沮丧。谨慎、犹豫或恐惧阻止了沙姆巴吉对德干上的任何一支莫卧儿军队发动一次大胆的进攻。阿克巴争辩说，在这种遭遇战中取得的胜利将为乘胜进取德里开辟道路。然而，沙姆巴吉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沿海地区。220 在那里，他在4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两场激烈的小战役：第一次是同金吉拉（Janjira）的希迪王朝（Siddis）（一个由海盗组成的臣服于莫卧儿王朝的海上弹丸小国）和孟买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第二次是同果阿的葡萄牙人。每次冲突都以令人厌倦的僵局结束。在万分沮丧之下，阿克巴曾数度打算租赁或建造一艘舰船，送他到波斯避难。

奥朗则布把防守严密的军队配置在莫卧儿德干的许多战略要点上，以阻挡马拉塔人的攻略。在接下去的4年里，他每年都要派遣两支甚至更多的野战部队侵入马拉塔王国。他的将领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他们可以自由驰骋、掠夺和焚烧村镇，然后返回。莫卧儿将军们发现进攻这个王国的数十座山间和海岛要塞过于靡费。沙姆巴吉仰仗他父亲分散配置的坚城要塞网络来保护他的众多人口，抵御差不多是最坚毅的帝国军队的围困。他们也不能吸引沙姆巴吉进行决战，以分胜负。简言之，这位皇帝能够通过在沙姆巴吉的本土施加持续的军事压力，阻止他随同阿克巴北上进行军事冒险。通过在原野上布置大军，他能够阻止马拉塔人大规模掠夺莫（卧儿）属德干。不过，完全征服马拉塔王国所必需的帝国资源和决心，比奥朗则布原先预计的要大得多。

征服德干

在受挫于马拉塔诸役后，奥朗则布转向了一个他久已无力顾及的目标：最后征服那两个德干苏丹国。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比贾布尔。尽管受到莫卧儿帝国的压力，那位年轻的苏丹希坎达尔·阿迪尔·沙还是继续向沙姆巴吉提供秘密军事援助。在1685年的前几个月里，一支近80 000人的军队在阿扎姆（Azam）亲王和沙·阿拉姆（Shah Alam）亲王的指挥下围攻比贾布尔的坚固城墙。希坎达尔·阿迪尔·沙指挥30 000人的守军奋勇抵抗莫卧儿人的堑壕和大炮达15个月之久。尽管受到乡村物资匮乏和帝国军中瘟疫和准饥荒的困扰，莫卧儿军队还是坚持不懈。奥朗则布通过派遣沙·阿拉姆亲王入侵戈

尔康达，对来自那个王国的增援威胁做出了反击。最后，到1685年9月，当莫卧儿军队的堑壕挖到城墙下时，希坎达尔·阿迪尔·沙命令他那疲惫不堪的守军投降。

奥朗则布吞并了比贾布尔，把它设为莫卧儿帝国内的一个行省。遭到废黜的苏丹被囚禁在帝国大营。比贾布尔幸存下来的主要阿富汗裔和印度穆斯林贵族，大多融入了莫卧儿贵族集团。皇帝任命了一名总督、一名省财政官、数名法乌吉达尔和要塞守备，以便在这个新省建立一个标准的莫卧儿行省政府。

戈尔康达是下一个目标。1685年，在围困比贾布尔期间，奥朗则布已经派沙·阿拉姆亲王指挥一支大军入侵戈尔康达。这些入侵者在击退无数库特卜·沙王朝骑兵的阻拦后，来到海得拉巴近郊。当指挥守军的波斯贵族米尔·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ir Muhammad Ibrahim）向莫卧儿人投诚后，库特卜·沙军队的抵抗崩溃了。阿布尔·哈桑·库特卜·沙、王室人员、军队和数千名惶惶不可终日的海得拉巴居民，逃往位于这座城市数千米之外的宏伟的戈尔康达城堡。莫卧儿人还没有进入海得拉巴，这座城市的秩序就荡然无存了，城市暴民肆意抢劫和奸污。

谈判立即在困守戈尔康达城堡的阿布尔·哈桑·库特卜·沙、统帅着海得拉巴占领军的沙·阿拉姆亲王以及在比贾布尔附近的奥朗则布之间展开。无助的苏丹答应贬谪他的两位婆罗门大臣，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割让一些边境领土给莫卧儿王朝。然而，在阿布尔·哈桑还没来得及罢免马丹纳和阿卡纳的职务时，朝中的一个穆斯林派别就安排一队武装的宫廷奴隶杀害了这两位婆罗门。他们的侄儿鲁斯塔姆·拉奥（Rustam Rao）（也是一名高级军事将领）和其他无数泰卢固婆罗门及其仆役，也遭杀害。这些密谋者斩下受到憎恨的婆罗门的首级，直接送给了奥朗则布。在他心满意足后，莫卧儿军队退回了比贾布尔。

在攻陷比贾布尔后，奥朗则布花了一周时间在德干地区深受敬重的苏菲派圣人谢赫·赛义德·穆罕默德·葛苏·达拉兹（Shaikh Sayyid Muhammad Gesu Daraz）位于古尔伯加（Gulbarga）的墓前祈祷。1687年1月中旬，奥朗则布率领他的庞大部队直取海得拉巴。阿布尔·哈桑和他的朝廷及军队再次退往戈尔康达城堡。莫卧儿把这座坚固城堡长达4英里的外层城墙团团围

住。奥朗则布决心已下，猛烈围攻物资充足和装备良好的守军。两颗运到城墙底下的地雷提前爆炸，炸死了数千名帝国士兵。奥朗则布发布吞并整个戈尔康达王国的圣谕。其时，这个王国已基本上处于莫卧儿人的控制之下。

222

城堡最终是从内部攻破的。1687年9月21日，城门洞开，使得莫卧儿人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在被俘后，阿布尔·哈桑和他的老伙计希坎达尔·阿迪尔·沙一样被关进了帝国大营。传说中的库特卜·沙王朝的宝库现在被洗劫一空，（给莫卧儿人）带来了价值超过6 000万卢比的金银币以及大量的珠宝、金银器皿和其他贵重物品。[①]

奥朗则布反复申明他不能原谅这两位苏丹执意同背信弃义的异教徒结成联盟。在回应比贾布尔穆斯林乌里玛代表团提出的他如何解释同穆斯林兄弟的战争的质询时，奥朗则布回答说，（比贾布尔）苏丹包庇和资助沙姆巴吉，而后者在四处戕害穆斯林。这同一个严厉指控也用到了阿布尔·哈桑身上，他还犯有另一项罪行，即他把他的国家拱手让给了他的两位婆罗门大臣。在围攻戈尔康达期间，奥朗则布在海得拉巴任命了一名“穆塔希布”，命令他拆毁印度教神庙，修建清真寺，镇压一切有悖于伊斯兰正统的乖谬之举。

奥朗则布的狂热甚至开始在他最强大的支持者中间激起抗议。大萨德尔加齐·阿卜杜拉（Qazi Abdullah）祈求皇帝在吞并海得拉巴后接受阿布尔·哈桑的投降，允许他恢复戈尔康达的附庸地位。其他高级乌里玛抗议继续攻击穆斯林兄弟。

正像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上那样，抗议的中心人物是沙·阿拉姆王子。众所周知，他支持对两位德干苏丹采取和解的态度。在比贾布尔，沙·阿拉姆同希坎达尔·阿迪尔·沙秘密谈判，安排用投降换取（对后者的）承认。奥朗则布在发现后严厉申斥了他的儿子，加紧了进攻行动。当沙·阿拉姆在围困戈尔康达时同阿布尔·哈桑·库特卜·沙举行了类似的谈判后，奥朗则布立即逮捕了沙·阿拉姆，把他、他的妻子和4个儿子囚禁在帝国大营中。事后证明，这次囚禁长达7年之久。在帝国精英中间对德干政策进行公开讨论的一切可能性消失了。如果连神学家和王子们都被禁口，那么，普通贵族更

① Moinul Haq, *Khafi Khan*, p. 366.

没有什么指望了。

随着两个德干苏丹国的覆灭，奥朗则布于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马拉塔人。他的儿子阿克巴再也不是一个威胁了。由于得不到沙姆巴吉的支持，这位反叛的王子和数十名随从租赁了一条船前往波斯。在那里，他们托庇于萨法维宫廷。在这个时期，沙姆巴吉专注于国内政治而非国外掠夺。他严酷的统治风格、无耻地玩弄女性和疏于政务，激起了马拉塔德什穆克们的很大敌意。根据广为流行的说法，他耽于酗酒和淫乐，而罔顾国政。 223

就在攻陷戈尔康达城堡后，奥朗则布派了他的一名埃米尔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姆卡拉布·汗（Muqarrab Khan），一名其才干得到公认的戈尔康达贵族，已经投向莫卧儿军队，以报答其受封为莫卧儿贵族。姆卡拉布·汗将要带领他的25 000骑兵奔袭马拉塔王国。表面上，他是要围攻潘哈拉（Panhala）要塞，但他的实际任务是擒拿沙姆巴吉。1688年末，莫卧儿间谍发现沙姆巴吉正在他位于桑格莫什沃尔（Sangameshwar）游乐宫的花园豪宅中休憩。这座游乐宫地处深山，在勒德纳吉里（Ratnagiri）东北5千米处。姆卡拉布·汗立即强行军穿过西高止山，生擒了沙姆巴吉和他的婆罗门首相。

这两位俘虏被带至皮马河（Bhima river）岸边的帝国大营。沙姆巴吉尽管是一位君王，但并没有受到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统治者那样的礼遇。他和他的首相被穿上小丑的衣服押解到正跪着做感恩祈祷的奥朗则布面前。在莫卧儿官员讯问期间，沙姆巴吉既侮辱皇帝，也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从而铸就了自己的命运。乌里玛陪审团以戕害和滥捕良善穆斯林的罪名判处他死刑。在经过两周的折磨后，沙姆巴吉和他的同伴被乱刃分尸，残骸则被拿去喂狗。

1689年，奥朗则布已经克服了7年前阿克巴反叛造成的危机。他的儿子沦为萨法维宫廷中的避难者。比贾布尔、戈尔康达和马拉塔国家都已被彻底征服和吞并。莫卧儿军队无往而不胜。新的兼并给帝国增加了221 107平方英里的土地——增长了1/4还多。添加了4个新省：比贾布尔、比贾布尔属下的卡纳塔克（Bijapur Karnatak）、海得拉巴以及海得拉巴属下的卡纳塔克。马拉塔人的土地被分割给北面属于奥朗则布的行省和南面的比贾布尔。现在，莫卧儿帝国的南部边疆伸展到了印度穆斯林在次大陆上控制的最远范围。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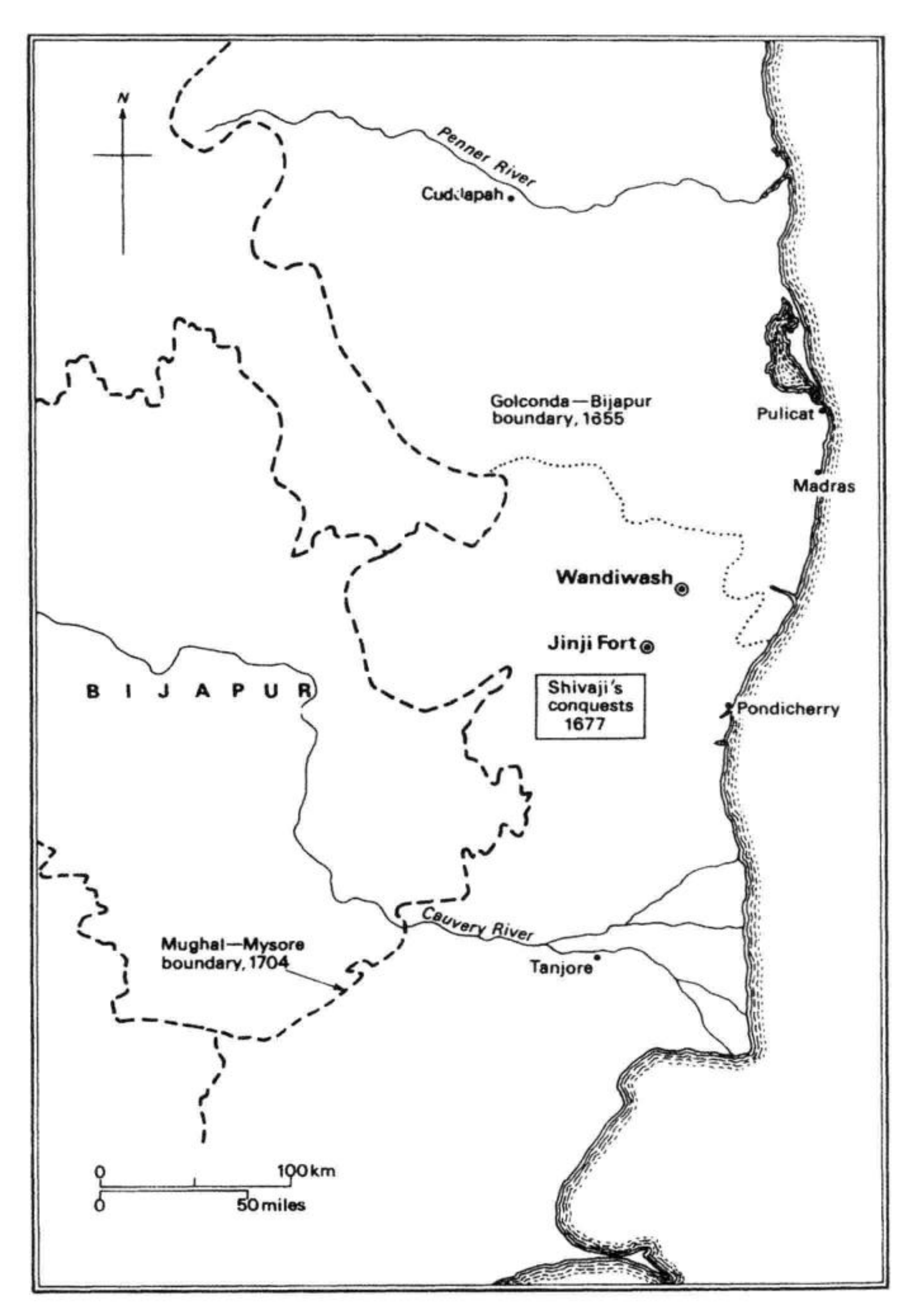
225

第十一章　德干战争

奥朗则布的三大胜利——比贾布尔、戈尔康达和马拉塔王国——本应成为德干和南印度和平、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新时代的前奏。除了新近在17世纪40年代征服的泰米尔人地区即戈尔康达和比贾布尔属下的卡纳塔克那样的例外，马拉塔人的德干西部和泰卢固人的德干东部久已习惯于印度穆斯林的统治。在对最初的安排进行短暂的监督后，这位皇帝应当率领他的大营和中央军胜利北还，返回沙贾汗阿巴德。如同他们在过去数十次做过的那样，帝国行政官精英们可以在所有这三个王国承担起被他们打败的同行所行使的那些权力。新行省的剩余收入将向北流动，充实德里和阿格拉的财库。然而，实际发生的刚好相反。奥朗则布继续留在德干，年复一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战争，希望扭转那个地区公共秩序和帝国权力的螺旋式下降。

反叛的马拉塔国家并没有和沙姆巴吉一同死去。他年轻的弟弟拉贾拉姆匆匆加冕，然后逃往最南边的地方，避难于金吉要塞。留在北方的马拉塔军官加紧了对莫卧儿人的掠夺性袭扰。帝国官吏在防守他们的郡县和征收赋税方面面临着极大困难。

在倔强地决定扑灭这场叛乱后，奥朗则布把帝国大营变成了他的都城。在6年的时间里，这位皇帝的营地曾安扎在浦那和比贾布尔城之间的数个地方。1695年，他在皮马河东南岸边的布拉马普里（Brahmapuri）选定了一个永久性驻地并将这里改称伊斯拉姆普里（Islampuri）。在这个地方，奥朗则布不间断地在营帐中生活了近5年。1699年，这位皇帝下令在伊斯拉姆普里四周修筑土墙防御工事。他留下他的首相（瓦兹尔）阿萨德·汗（Asad Khan）照看



MAP 5. South India, 1707

Source: I.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 1982), 14A.

226

地图5 1707年的南印度

Penner River	本内尔河	Cuddapah	古德伯
Pulicat	布利格德	Madras	马德拉斯
Wandiwash	文迪瓦什	Jinji Fort	金吉堡
Pondicherry	本地治里	Cauvery River	高韦里河
Tanjore	坦焦尔		
Golconda-Bijapur boundary, 1655	1655年的戈尔康达—比贾布尔边界		
Shivaji's conquests 1677	1677年西瓦吉的征服		
Mughal-Mysore boundary 1704	1704年莫卧儿—迈索尔边界		

朝廷、皇室及其显贵们的家室。奥朗则布离开大营，率领他的疲敝之师进行227了长达6年的苦战，力图攻取马哈拉施特拉的山中要塞。最后，身患重疾和疲惫不堪的他退回艾哈迈德讷格尔，一年后，于1707年初溘然长逝。

莫卧儿统治下的德干东部：1687—1700年

在征服后的最初岁月里，莫卧儿人对戈尔康达的兼并和治理进展顺利。对戈尔康达的大多数人来说，被莫卧儿王朝合并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在戈尔康达要塞陷落和国王被擒后，几乎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抵抗。在戈尔康达堡举行的庆祝大典上，这位皇帝向他的两个儿子——阿扎姆亲王和比德尔·巴克特（Bidar Bakht）亲王以及参加了这次围攻的埃米尔们赐予锦袍、加官晋爵和给予其他奖赏。此后不久，帝国官吏就开始清点和包装库特卜·沙王朝的无数财宝，准备向北运往德里的帝国金库。

阿布尔·哈桑没有遭到杀害，但作为一名国家囚犯受到冷落。他的3个女儿被体面地嫁给了莫卧儿贵族。他的养子阿卜杜拉和其他男性亲属以及至少24名穆斯林贵族（大多具有突厥—波斯血统）变成了莫卧儿贵族。[1] 其他中层穆斯林职员、艺术家和工匠以及军事官僚，都被以低等曼萨卜达尔的身份准予在帝国政府中担任类似职务。

戈尔康达的印度教官员则没有那么幸运。几名暂且在任的婆罗门总督未能晋升为莫卧儿显贵，走上了穷途末路。库特卜·沙王朝从卡玛（Kamma）、瓦拉玛（Valama）、卡普（Kapu）和拉祖（Razu）等武士—农民种姓中征召的那些泰卢固纳亚克，过去担任军事将领，1687年后则发现自

① 对征服后戈尔康达的描述来自：J. F. 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in Golco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 52–214.

己变得多余了。只有一位官员，即同金吉的莫卧儿野战部队一起在卡纳塔克效命的亚查姆·纳伊尔（Yacham Na'ir），在被他的新雇主以通敌罪斩首前曾担任过莫卧儿埃米尔。[①]

戈尔康达已被兼并，并改称海得拉巴的“达拉尔-吉哈德（*Dar-al Jihad*）”。其南面的土地被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行省，称为“海得拉巴属卡纳塔克”（Hyderabad Karnatak）。1688年，奥朗则布把一支精干而老练的莫卧儿官僚调到这些新的行省。莫卧儿总督詹·西帕尔·汗（Jan Sipar Khan）和他的儿子鲁斯塔姆·迪尔·汗（Rustam Dil Khan）是伊朗裔埃米尔，其家族很久以来就为帝国效劳。9名曼萨卜达尔作为法乌吉达尔即督军和他们所属的部队分驻在海得拉巴各地。12名曼萨卜达尔各自独立驻守前王国各个最大的要塞。一批类似的官员掌管新成立的海得拉巴属卡纳塔克。 228

在征服前，朋斯拉统治者和戈尔康达之间结成的联盟保证了德干东部免遭马拉塔人的劫掠。但这种免疫力随着莫卧儿人的吞并而消失了。在1688—1692年间，马拉塔人数度大规模长途奔袭和掠夺海得拉巴。马拉塔劫匪通常在人数上超过詹·西帕尔·汗的行省分遣队。后者在抗拒或驱逐这些入侵者方面无能为力。马拉塔军队拦截路上的商旅，自由闯入较小的集镇进行抢劫，但没有对主要的沿海港口海得拉巴或默吉利伯德讷姆发动全面的进攻或围困。1692年后，莫卧儿军队对位于遥远的南方的金吉的围困，把马拉塔人的注意力从海得拉巴转移开了。

尽管莫卧儿人的反击软弱无力，却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当地的泰卢固武士贵族与马拉塔人同流合污，或是为虎作伥。这些纳亚克并没有德干西部马拉塔朋斯拉王朝的那种反叛传统。

尽管时而受到马拉塔人的侵略，新政权还是立即着手按照莫卧儿人的体制改造戈尔康达的税收体系。一名在技术上颇能胜任的曼萨卜达尔，穆罕默德·莎菲（Muhammad Shafi），成为海得拉巴的第一任莫卧儿迪万，即省财政官。这位新迪万同泰卢固武士酋长和婆罗门缔结了书面协议：前者曾作为乡里的头人为戈尔康达国家效劳，后者则在这个新的行省充任地方会计。几

① 参看：J. F. Richards, “The Hyderabad Karnatak, 1687–1707”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IX（1975）, 241–260.

乎是没有片刻的延误，税收就开始流向省财库。

一项系统的评估显示，征服前海得拉巴本地的税收是每年1 370万卢比，而卡纳塔克是830万卢比。没有对这些新的田产做全面的正式丈量和扎巴特[1]重估。相反，莫卧儿人对旧的库特卜·沙王朝的课征总额原封未动，因为单单这些赋税就让帝国的总税收增加了12%。新增的唯一一项税负是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吉齐亚）。从这项赋税所得的收入每年约达100万卢比。其他收入来自位于卡纳塔克的著名的戈尔康达钻石矿——偶尔会发现一颗轰动一时的大钻石。现在，这个钻石矿的经营已为帝国而非库特卜·沙王朝所垄断。

229

这个政权把帝国的货币体系强加给了戈尔康达。迪万在海得拉巴建立了一座中心铸币厂，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建立了分支铸币厂，铸造铜币、银币和金币。德干东部开始转向银本位，从而取代了德干从前以金胡恩（即金宝塔）为基础的金本位。

马拉塔人的叛乱：争夺金吉

在西面的比贾布尔，这个核心国家遭受派系斗争和君权软弱之害已几达20年之久。德干西部的整个政治结构一片混乱，需要莫卧儿人全面重建。这正是奥朗则布试图做的。正像他对戈尔康达所做的那样，这位皇帝派遣可靠的贵族和曼萨卜达尔充任省督、法乌吉达尔以及要塞司令和他们的兵士。一名迪万及其属员恢复了比贾布尔的财政体系。为了供养他们，向他们分配了扎吉尔。不幸的是，要在新政权和比贾布尔的乡村柴明达尔之间建立政治联系很不容易。比贾布尔的马拉塔人德什穆克要比他们东面的泰卢固同侪面临着更加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朋斯拉的权力和权威仍在挑战帖木儿王朝的权力和权威。

一接到沙姆巴吉被擒的消息，马拉塔首都赖格尔堡的高级将领们就转投沙姆巴吉的弟弟，而非他年幼的儿子。1689年2月，他们为第三位朋斯拉统治者拉贾拉姆草草举行了加冕典礼。当莫卧儿军队在数日内抵达和包围这座都城时，拉贾拉姆已经秘密逃走了。莫卧儿人确实抓到了沙姆巴吉的

[1] 即赋税。——译者注

王后耶苏·巴伊和她9岁的儿子沙胡吉（Shahuji）——公认的朋斯拉王位继承人。另外3名王妃和另外4名孩子也被捉住。[1] 奥朗则布决定把沙姆巴吉的嗣子作为他自己家庭的一员来抚养。红色帆布纱窗是他的生活区和宫闱（*gulalbar*）的标记。皇帝对他的这位年轻战俘严加看管，但待之优厚，还不逼迫他皈依伊斯兰教。沙胡吉将被作为一位马拉塔王子来抚养，同时也作为一名哈纳扎德来抚养。 230

朋斯拉君位有一个不受莫卧儿人控制的竞争者。沙胡吉的叔父拉贾拉姆乔装成一名印度教托钵僧（*yogi*），在区区数名近臣的陪同下逃走了。这一小伙人在徒步行走800千米后抵达东南沿海的一个由三座城堡构成的巨大山间要塞金吉。在这里，一名马拉塔总督依旧控制着朋斯拉王朝位于比贾布尔治下卡纳塔克南部边界上的部分领土。

在接下去的8年里，东南沿海变成了莫卧儿—马拉塔争夺的主要战场。[2] 在金吉，拉贾拉姆完全接管了依旧在朋斯拉王朝控制下的马拉塔各县，鼓励在卡纳塔克各县发动一次反对莫卧儿政权的全面起义。奥朗则布派遣他的首相的儿子祖儿菲卡尔·汗（Zulfikar Khan）带领一支大军南下，追击拉贾拉姆。

对金吉的围攻一直持续到这座要塞在1698年最终被莫卧儿人攻克。在围攻期间，皇帝始终用财宝、新兵和军火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供给线从比贾布尔附近的帝国大营出发，经过古德伯（Cuddapah）基地，抵达金吉城外的莫卧儿军围攻营地。拉贾拉姆从他的堂兄弟即坦贾武尔的拉贾——沙吉二世（Shahji Ⅱ）那里得到了巨额资助。更重要的是来自朋斯拉王国的援军。随着马拉塔匪帮在德干日益壮大和越来越有信心，他们被定期召回攻击卡纳塔克的莫卧儿人。

当围攻的第一个年头结束时，皇帝最小的（也是最受宠爱的）儿子卡姆·巴克什（Kam Bakhsh）亲王和帝国瓦兹尔阿萨德·汗，率领另一支大军加入了祖儿菲卡尔·汗一边作战。尽管加入了这些援兵，帝国军队还是不能完全困住这座负隅顽抗的要塞。第二年岁末时，两位著名的马拉塔将军达纳·辛格·贾德夫（Dhana Singh Jadev）和桑塔·高帕里（Santa

---

①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Calcutta, 5 vols., 1912–1924），Ⅴ, pp. 203–207.

② 下文基本上根据：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50–109 and G. T. Kulkarni, *The Mughal–Maratha Relations: Twenty - Five Fateful Years（1682–1707）*（Pune: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Research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83.）

Ghorpare），率领3万骑兵从德干赶来。这些部队在抓获和扣留本地莫卧儿法乌吉达尔和勒索赎金后，截断了莫卧儿攻城部队的所有供给和交通路线。原来经由活跃的沿岸贸易大批运输的粮食低廉而充足，从马德拉斯和纳加帕蒂南（Negapatnam）的欧洲人口岸供给围城部队。① 现在这股物流中断了。所有来自皇帝大营的信息和资金也被切断了。

231

在此关头，熟悉的一幕又上演了。由于相信了奥朗则布已死的谣言，卡姆·巴克什亲王试图秘密同拉贾拉姆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他还密谋夺取莫卧儿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以便为不可避免的继位战争预做准备。当瓦兹尔和祖儿菲卡尔·汗洞悉这项阴谋时，他们已经发现莫卧儿军队的处境岌岌可危并炸毁了他们的大炮，开始从围攻前线撤退。他们逮捕了卡姆·巴克什，向北且战且退，退至50千米外的莫卧儿人控制的要塞文迪瓦什（Wandiwash）。最终，一支强大的援军带着供给和信函从北方赶来了。

在金吉战役的第二阶段，阿萨德·汗带着卡姆·巴克什返回京师。在京师，奥朗则布不情愿地在后宫举行的非正式朝会上接见了这位误入歧途的王子。他是在他的女儿——也是卡姆·巴克什的党羽的兹纳特-乌恩-妮萨（Zinat-un-nissa）——的请求下这么做的。这位皇帝一反常态地原谅了他的幼子在围攻金吉期间的图谋不轨，没有把他关进军营。

在接下去的4年里，祖儿菲卡尔·汗利用文迪瓦什作基地，强行恢复了莫卧儿王朝在金吉周围地区的权威。对坦焦尔发动的一次战役迫使沙吉二世交纳贡赋和至少暂时答应停止对拉贾拉姆的资助。奥朗则布送去兵士和财宝支持祖儿菲卡尔·汗，但经常相隔很长时期才运送一次。由于资金短缺，祖儿菲卡尔·汗用几乎同马拉塔军队一样的方法四处搜掠，榨取税收和贡赋。不幸的东南沿海各县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个征战不息的区域。许多难民逃到欧洲人在沿海建立的设防城邦躲避。

1694—1695年祖儿菲卡尔·汗对金吉发动的下一次袭击是如此三心二意，以致大家认为这位莫卧儿将军同拉贾拉姆暗中勾结。有流言说，祖儿菲卡尔·汗预计到奥朗则布由于年迈而将不久于人世，因而打算于继位战争期间在南部沿海为他自己分割出一个独立王国。

---

① “纳加帕蒂南”现在的英文拼写为Nagapattinam，Negapatnam / Nagapatnam是以前的拼写方法。——译者注

奥朗则布拒绝了拉贾拉姆和谈的提议，在1697年最终下令祖儿菲卡尔·汗倾全力攻打拉贾拉姆。被迫发动进攻的莫卧儿军队爬上一处城墙，攻占了较低的城堡，然后向这座要塞中地势最高的城堡推进。至少根据流言，拉贾拉姆显然收到了祖儿菲卡尔·汗的警告，在（莫卧儿人发动）最后攻击前匆匆逃离了金吉。1698年2月，当折损严重的城堡守军投降后，莫卧儿军队擒获了拉贾拉姆幸存的4位嫔妃、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把他们押至奥朗则布的大营，和沙胡吉关在一起。

232

德干战争：1689—1698年

在马拉塔人的故乡，赖格尔和大多数马拉塔要塞很快就被莫卧儿驻军攻取和控制。[①] 从金吉，拉贾拉姆送出了一系列信函、锦袍和金镯给他残余的要塞守将、其他官员以及马拉塔王国各地的德什穆克。他要求他们拒斥莫卧儿王朝的权威，并蹂躏和劫掠帝国领土。

马拉塔人在德干西部对莫卧儿军队的抵抗采取了各自为阵的策略。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极其有效。桑塔·高帕里、沙纳·辛格·贾德夫（Shana Singh Jadev）和其他几位极为能干和久经沙场的马拉塔将领，迅速建立起人数经常高达30 000人的部队。他们的部队是轻装上阵的马拉塔轻骑兵，配备矛和剑，有时也配备火枪。由“卡纳塔克”火枪手组成的庞大分队拥有几乎相等的人数。他们以神枪手著称。除了雨季，每支马拉塔团队都在持续不断地劫掠或同莫卧儿军队作战。

由于失去了朋斯拉王朝的资助，这些将领们就从事掠夺或从每个地方上索取一种称为“乔特”的保护费。乔特即四分之一税是古吉拉特和德干西部的柴明达尔从地税中截留的习惯份额。马拉塔兵头领从村庄或乡首那里征收乔特，或从集镇贵族那里征收，以替代对他们的劫掠。定期交纳这种勒索金——它的计算以过去莫卧儿人的评税额（jama）为基础——为非正规的马拉塔劫掠部队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事实上，这样一种安排变成了一种初级的税收体系，虽然它是在同莫卧儿政权分享。

① 下面的描述根据：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20–49, 110–137; and Kalkarni, *Mughal–Maratha Relations*, pp. 135–166.

单个的马拉塔骑手决不是勇毅的莫卧儿骑兵的对手，后者的锁子甲、233 长矛、火绳枪和重装甲战马使他们成为可畏的战斗单元。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莫卧儿重装甲骑兵在令人震骇的野战炮的支援下胜过马拉塔骑兵。不过，在机动性、统帅和供给方面，马拉塔非正规部队同帝国军队旗鼓相当。当然，在士气方面，也是如此。像桑塔·高帕里那样能干的将领在机动制胜上高出一筹，曾擒获了数名高等莫卧儿贵族和他们的许多兵士。这些不幸的埃米尔为了他们能最终获释而从他们自己的钱袋中支付了大笔赎金。[①]

在整个金吉被围期间，这些马拉塔将领们时而向南远征以协助拉贾拉姆，时而在德干西部地区作战。1689—1690年，一个极善征战的莫卧儿朝法乌吉达尔玛塔巴尔·汗（Matabar Khan），成功地夺取了孔坎这片肥沃的沿海地带中的马拉塔人山寨。[②] 此后，玛塔巴尔·汗成功地驱逐了马拉塔兵匪，直至他于1704年去世。不过，在马拉塔人家乡的内地各县，在比贾布尔和康德什，莫卧儿帝国军队并未成功地制止住这些兵匪。马拉塔部队的机动性、分散的权力和日益成长的平行政府或影子政府系统，使奥朗则布不能设计出一种有效的战略遏制这些叛军。

德干战役的最后阶段：1698—1707年

逃离金吉后，拉贾拉姆安然无恙地返回了马拉塔人的故乡，在坚固的山间要塞萨达拉（Satara）建立起他的朝廷和居所。在伊斯拉姆普里的帝国大营中，奥朗则布不安地收到了关于他的讯息，然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③]

> 当关于敌人在帝国疆土上大胆掠夺和蹂躏以及他们日益做大的报告源源不断地送达后，皇帝决心对他们发起圣战，攻取他们匿身其中的城堡，从而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那些受到诅咒的人。

---

① S. Moinul Haq, *Khafi Khan's History of Alamgir* （Karachi: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1975）, p. 414.

②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pp. 138–158.

③ Moinul Haq, *Khafi Khan*, p. 453. Khafi Khan, *Muntakhab al-Lubub* （Calcutta: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Bibliotheca Indica, 1874）, Part Ⅱ, 459. “卡菲·汗”在原文中使用的是jihad（圣战）这个词。

在81岁高龄之际，奥朗则布宣布对马拉塔人进行圣战。他亲自统率大军对马哈拉施特拉的山间要塞发动持续的进攻。各个王子、所有的高级官员和贵族都奉命离开他们在伊斯拉姆普里（现在四周已筑起城墙）的家人和府邸，奔赴前线作战。[①]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攻下瓦桑特加尔（Vasantgarh）要塞，萨达拉是紧随其后的下一个目标。 234

拉贾拉姆离开萨达拉，率领一支庞大的马拉塔野战部队进入康德什和贝拉尔，进行扫荡战役。在后一个省份，他打算和现在已背离莫卧儿王朝的德奥加尔（Deogarh）的冈德王公兵合一处。莫卧儿间谍十分及时地给奥朗则布通风报信，使他能够派遣比德尔·巴克特亲王率领一支大军截击拉贾拉姆。在艾哈迈德讷格尔附近，一场血战使马拉塔部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拉贾拉姆侥幸活命，带着他的残余部队一路狂奔到辛古加尔（Singugarh）要塞据守。数月之后，这第三位来自朋斯拉家族的统治者身染重疾，于1700年3月2日死去。

从1699年12月起，奥朗则布倾全力围困和攻打马拉塔人的都城萨达拉。奥朗则布不计一切困难，（督促部队）奋勇推进，以便能用地雷炸开这座城堡。最后，在4月中，当地雷在城墙上炸开一道豁口后，进攻却失败了。第一颗地雷爆炸后，殃及地面攻城部队，炸死了2 000名等待进攻的莫卧儿将士。当拉贾拉姆的死讯传来后，这座马拉塔要塞的守将苏班吉（Subhanji）选择了有条件投降。苏班吉和他的属员和亲属被整编进莫卧儿军队。

几乎没有片刻停顿，皇帝就率领他的军队径直对附近的帕里加尔（Parligarh）要塞发动了进攻。在围攻进入第六周后，马拉塔要塞守将献出了这座城堡，以换取他的妻子和一大笔酬金。奥朗则布在这座要塞驻扎了一支守军，然后带领莫卧儿大军进行早该到来的雨季休整。

拉贾拉姆死后不久，他的大夫人塔拉·巴伊（Tara Bai）成功地把她年仅4岁的儿子沙姆巴吉二世（Shambhaji Ⅱ）扶上王位。塔拉·巴伊将作为摄政王理事。以这种身份，她向在萨达拉城前安营的奥朗则布发出了和平倡议。[②] 这位马拉塔王后提议正式向莫卧儿政权称臣。她愿意割让萨达

①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v, 159–235) and Kulkarni, *Mughal–Maratha Relations*, pp. 169–259.

②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136.

拉、潘哈拉和另外5座最雄伟的山间要塞，愿意派5 000马拉塔骑兵为德干总督效劳。作为回报，她的儿子要被承认为马拉塔之主，作为莫卧儿埃米尔受封7 000扎特爵位，免于像他的曾祖父西瓦吉那样亲自到帝国朝廷侍

235 主。塔拉·巴伊还要求册立沙姆巴吉二世为莫卧儿德干各省的大德什穆克（*sardeshmukh*）。实际上，这是一个将使马拉塔统治者获得10%帝国税收以换取他协助收税和维持治安的新职位。这项建议将使沙吉[1]同时成为莫卧儿贵族和全德干最大的柴明达尔。如果能够达成协议，这项提议将在帖木儿政权的两级结构中再次嵌入朋斯拉君主政体。奥朗则布一如既往地充满疑虑。他断然拒绝了塔拉·巴伊的提议，倾全力攻打这座山间要塞。

在1700—1705年间，另外11座据点落入帝国军队之手，其中就包括了塔拉·巴伊愿意割让的那些要塞。奥朗则布在每个雨季过后都亲自率领他的疲劳之师投入战场，并亲自指挥大多数围攻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位皇帝都求助于贿赂来说服马拉塔守将有条件投降。数量庞大的马拉塔部队在帝国战线以外的地方逗留，袭扰莫卧儿骑兵，偶尔还打败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强大到能够在一次阵地战中打败莫卧儿大军或驱逐奥朗则布的围城部队。奥朗则布每年都会由于战斗伤亡和病疫而损失很多人员和牲畜。他从帝国各地的行省总督那里抽调兵力，从喀布尔和苏拉特引进马匹，接收从北方定期运来的财宝。

在这个最后阶段，奥朗则布维持着两支高度机动和进攻性的野战部队。每支都由经验丰富的贵族统领，他们经常追击和打败哪怕是最强悍的马拉塔部队。第一战斗群由从南方的金吉凯旋的祖儿菲卡尔·汗·努斯拉特·江（Zulfikar Khan Nusrat Jang）伙同前阿富汗裔比贾布尔军官达乌德·汗·潘尼以及两名拉杰普特将领达尔帕特·拉奥·布恩德拉（Dalpat Rao Bundela）和拉姆·辛格·哈拉（Ram Singh Hara）指挥。在1701—1702年，祖儿菲卡尔·汗的部队在长达6个月的运动战中，同马拉塔人进行了19次重大战斗。[2] 1702年后，祖儿菲卡尔·汗被任命为帝国的巴克什，同其担任帝国瓦兹尔的父亲阿萨德·汗更加密切地协同工作。他和他的将军们辗转于攻城和搜剿马

① 原文如此，疑为“沙姆巴吉二世”之误。——译者注

② V. G. Khobrekar, 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rik - i Dilkasha*（Bombay: Govt. of Maharashtra, 1972）, p. 233.

拉塔匪兵之间。这些部队经常护送从北印度来的运宝队和从布尔汉布尔来的 236
运货队至帝国大营。

图兰裔贵族加兹–乌德–丁·汗·菲鲁兹·江（Ghazi-ud-din Khan Firuz Jang）指挥第二战斗群。围绕在他周围的是一群子弟兵，包括他的儿子钦·奇立赤·汗（Chin Qilich Khan）、哈米德·汗（Hamid Khan）和拉希姆–乌德–丁·汗（Rahim-ud-din Khan）以及侄儿穆罕默德·阿明·汗和他们的扈从。菲鲁兹·江任贝拉尔省总督，在防备马拉塔人从那个省发动入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两个战斗群中的每位埃米尔和属僚，都对他们保持着骑兵团队的满员甚感自豪。

至少有两次，皇帝曾半心半意地试图利用那位尚拘禁在帝国大营中的马拉塔王子沙胡吉·朋斯拉进行和谈。现在已长大成人、年方21岁的沙胡吉至少同拉贾拉姆的幼子一样拥有要求承袭马拉塔王位的无可争辩的权利。

1703年，奥朗则布首先提议给沙胡吉·朋斯拉自由，以换取他皈依伊斯兰教。当他拒绝后，奥朗则布又试图同主要的马拉塔将军达成协议。他把西瓦吉的兄弟乌阁柯基（曾为坦贾武尔的拉贾）的儿子赖班·朋斯拉（Raibhan Bhonsla）收入莫卧儿军中，担任高等埃米尔。赖班将充当沙胡吉和马拉塔将军们的中间人。沙胡吉将在获释后担任马拉塔人的统治者，授予从莫卧儿帝国的德干赋税中收取乔特即25%份额的权利。由于双方互不信任，这些谈判失败了。皇帝害怕受到马拉塔人的欺骗。马拉塔人自己也不能从缔结协议中获得那么多的好处。1706年，即他临死的前一年，这位皇帝再次企图通过重新提议释放沙胡吉达成一项和约。这次尝试同样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德干西部的平行政府

奥朗则布的最后征战进一步削弱了在德干诸省其他地方的帝国权威。个人和团体安全状况的恶化，伤害了贸易和农业的生产率。这些问题又由于1702—1704年间遍布整个德干的季风雨失调而更显突出了。整个地区在饥荒中受到物资匮乏和物价飞涨的打击。瘟疫和其他流行病的频繁爆发增加了 237
死亡人数。

在她的外交倡议遭到拒绝后，塔拉·巴伊立即做出了有力的军事反应。莫卧儿史学家卡菲·汗对此写道：[1]

> （塔拉·巴伊）开始努力蹂躏帝国领土。她致力于在直抵马尔瓦……边境的德干上的6个（行省）中调遣和部署她的部队，目标是蹂躏这些地区。她还致力于赢得其官员们的忠心，以使阿拉姆吉尔的一切努力和对城堡的征服不能轻易得逞；在她的统治结束以前，马拉塔人反叛的气焰一直是日甚一日。

在塔拉·巴伊的进攻政策下，马拉塔人的攻击行动也在东方恢复了。1702年，一支估计由50 000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大军攻击和洗劫了海得拉巴城。莫卧儿总督只是躲避在他那深沟高垒的府邸中。[2] 1704年，在饥荒和匮乏盛行的情况下，马拉塔人暂停了对海得拉巴城的劫掠，转而向远在海边的默吉利伯德讷姆方向肆虐。一些泰卢固人柴明达尔要么加入了入侵者的队伍，要么自行劫掠。大多数柴明达尔安分守己，静静地等待入侵者离开。另有一些并非柴明达尔的冷酷无情的野心家乘劫掠造成的混乱之机，召集武装扈从，自行劫掠。[3]

在1702—1704年间，从海得拉巴城出发的通往古吉拉特或北印度的长途商队贸易被完全切断了。[4] 从海得拉巴通向默吉利伯德讷姆的主动脉也被阻塞了。令莫卧儿人扎吉尔达尔感到惶惶不安的是，农民和柴明达尔由于受到混乱和饥荒的轮番夹击，不再向莫卧儿人交纳赋税。[5]

在德干西部，帝国权威面临着一种不同的、但说到底却是一个更加严重的威胁。就在他死前发动的1699年战役中，拉贾拉姆和他的主要将领信心满满地进军康德什和贝拉尔。与（以往）劫掠不同，他们要求定期交纳帝国税收的25%作为“乔特”，另外再根据这位马拉塔统治者是所有德干诸省的世

---

① Moinual Haq, *Khafi Khan*, p. 508.

② 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p. 218.

③ 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pp. 219–220; and J. F. Richards with Velchuru Narayana Ras, “Banditry in Mughal India: Historical and Folk Perceptions,”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7 （1980）, 95–120.

④ Ibid., pp. 225–229.

⑤ Ibid., p. 221.

袭大德什穆克的传说加征10%。这已不再是一次简单的掠夺性远征：[1] 238

> 所有那些甘愿向（拉贾拉姆）交钱的人受到了保护，在一旁保持袖手旁观的莫卧儿卫戍部队也没有受到骚扰，而不成功的（就像实际中发生的那样）抵抗者则加以刀剑。在这种场合，马拉塔人在勒索方面比他们以前所做的更加系统；在他们无法获得现款的地方，他们从帕特尔（村长）那里索取期票……

塔拉·巴伊把这些安排正规化了，从而创建了一种二元的或平行的行政结构。她在每个省都任命了一名马拉塔将军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7 000或8 000骑兵组成的野战部队。马拉塔总督修建小型要塞充作他的总部，配置收税官收取乔特，还在行省各地派驻大德什穆克。如果由于帝国法乌吉达尔或地方上仍旧忠于莫卧儿王朝的柴明达尔的反对而无法收取乔特，马拉塔总督就会“急速赶去帮助他们，对那个地方进行包围和掠夺”。[2] 总督还委派官吏守卫主要路线。任何希望路途安全的商人都不得不为每辆货车或每头驮牛缴纳一笔固定的金钱。马拉塔人的道路税是莫卧儿人对商人课税额的3—4倍。在一些村庄，同情马拉塔人的头人修建了小型堡垒。在马拉塔人的支撑下，他们在莫卧儿人前来征收税款时对他们进行了抵制。

莫卧儿总督、法乌吉达尔和许多柴明达尔依旧坚决对抗马拉塔人。不过，人数日益增多的柴明达尔、城镇贵族和村长已公开同劫掠者站在一起。1702年，当一支莫卧儿野战部队在努斯拉特·江的率领下出现在康德什和贝拉尔时，马拉塔总督们在柴明达尔税款的资助下集合了60 000骑兵。[3] 随着这种缓慢渗透过程的进行，马拉塔人劫掠的前沿向北移动了。1700年，马拉塔人跨过了德干和北印度之间的传统分界线：讷尔默达河。很快，他们就进入古吉拉特（艾哈迈达巴德）和马尔瓦各省从事武装掠夺。

---

① James Grant Duff, *History of the Mahrattas*, as quoted in John F. Richards, “Official Revenues and Money Flows in a Mughal Province,” in John F. Richards, ed. *Th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of Mughal India*（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22）

② Moinul Haq, *Khafi Khan*, p. 508.

③ Khobrekar, *Dilkasha*, p. 228.

239

欧洲人政治势力的崛起

慢慢地，经过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随着帖木儿政权卷入德干战争的旋涡，英属、荷属和法属东印度公司逐渐具有了利用不断增强的实力地位挑战莫卧儿皇帝的权威和同帝国政权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欧洲人的信心既来自从合意的莫卧儿官吏中精心培育的支持者，也来自同莫卧儿人打交道过程中信息和经验的增加。但还远不止于此。各东印度公司一直关注着它们的海上优势。印度各种类型的船舶都易于遭到装备良好的荷兰、英国或法国商船的劫持。在极端情况下，各东印度公司能够对任何一处莫卧儿港口进行海上封锁。或者，他们可以劫持海上的印度船只，作为对在次大陆遭受虐待的报复。

在沿海一带，在强大的本地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的任何地方，欧洲贸易公司都会建立像葡属果阿那样独立的城市国家。早在17世纪20年代，苏拉特的英国代理商已经要求把孟买岛及其天然良港——当时基本上尚未启用——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过来，用来修建一座安全的运营基地。最后，在经过漫长的谈判后，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根据英格兰查理二世（Charles Ⅱ of England）和阿拉冈凯瑟琳（Catharine of Aragon）之间的婚约把孟买作为赠礼接收了过来。[①] 在接下来30年的时间里，连续几任孟买总督都鼓励贸易和定居，并在岛上修建防御设施。

1689—1690年，孟买的独立受到了严峻考验。由于孟买总督约翰·柴尔德（John Child）的误判，英国东印度公司卷入了同莫卧儿人的一场短暂战争。柴尔德是想要在印度采取更加进取的英国政策的首要代言人。面对非法的英国私商在印度从事经营带来的困扰，柴尔德力图迫使苏拉特的帝国当局禁止他们的贸易。由此，东印度公司的舰船抓获和扣留了驶往苏拉特的80条印度商船。奥朗则布对此深感恼火，停止了英国人的一切贸易，并命令他的各地官员拘禁所有英国贸易使团。在孟加拉的胡格利（Hughli），英国代理商顺河而下，逃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后来）变成了加尔各答镇

① M. D. David, *History of Bombay, 1661–1708*（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1973）, p. 26.

（Calcutta）。在孟买，莫卧儿人下令已经臣服于莫卧儿皇帝的阿比西尼亚人海军大臣“辛吉”（Siddi）进攻孟买。[①] 这位辛吉的部队成功地攻占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未能占领这座城市及其堡垒。最后，疯狂的谈判和英国人同意赔偿才结束了这场纠葛。 240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孟买的防御变得更加强固，而那里的人口和贸易也在稳步增长。久已形成的内部秩序、宗教宽容、关税和其他赋税轻微以及别的一些有利条件，吸引了数千移民来到孟买。到18世纪早期，孟买已开始作为西印度首屈一指的贸易大港在挑战苏拉特的地位。[②]

在印度的东南沿海一带，在海得拉巴和比贾布尔所属的卡纳塔克地区（一个以政治权威四分五裂和变幻无常为特征的地区），3个东印度公司建立和培育了几处飞地。到17世纪80年代，这些城邦便充当了它们各自公司同北面的戈尔康达进行贸易活动的总部。荷兰人控制了布利格德港，并用戈尔德利亚堡（Fort Geldria）的枪炮加以保护。而在南面40千米的地方，英国人已经在马德拉斯的露天碇泊处修建了一座繁忙的港口，且由圣乔治堡加以护卫。在更加靠南的地方，法国人占领了本地治里（Pondicherry）。这是另一个繁忙的贸易中心，它由顶尖的堡垒和法国守军加以保护。

在莫卧儿征服戈尔康达时，法国和荷兰代理商同奥朗则布达成了协议，获准一如既往地在戈尔康达以前的领土上进行贸易。1689—1690年，马德拉斯遭到莫卧儿人进攻的威胁，但支援同金吉的马拉塔人作战的迫切需要转移了莫卧儿将领们的注意力。马德拉斯向围攻马拉塔人城堡的莫卧儿军队提供了军火、粮食甚至炮手。[③] 随着数千移民逃到本地治里和马德拉斯以获得这些飞地在该地区的毁灭性战争中提供的安全，这些飞地繁荣起来了。到世纪交替之际，前者容纳了大约60 000名居民，后者容纳的居民数则超过了

---

① 辛吉人（the Siddi），是现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洲—阿拉伯裔和/或非洲裔种族集团。据认为，首批辛吉人是在公元628年抵达印度的布罗奇港的。一种理论认为“辛吉（Siddi）”这个名称就来自运送这批辛吉人的阿拉伯船长的头衔。不过，大部分辛吉人系在1200—1900年间来到次大陆定居的东非班图语地区的奴隶、水手、仆役和商人的后裔。在中国的文献中，这些人被称为“辛吉”或“津芝”。——译者注

② Ashin Das Gupta,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rat c. 1700–1750*（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pp. 7–8.

③ J. F. Richards, “European City-*States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in P. M. Joshi and M. A. Nayeem, eds., *Studies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India*（Hyderabad: Government of Andhra Pradesh, State Archives, 1975）, p. 511.

100 000名。

到17世纪90年代，莫卧儿皇帝对这些东印度公司的关注开始极大地加强了。主要问题是欧洲人在印度洋上无法无天的海盗活动，而皇帝则力图要让各东印度公司对此负责。在苏拉特商船队中最大的商船“甘季—萨瓦伊号”（*Ganj-i Sawai*）遭到劫持后，紧张关系急剧升温。每年，在其80门大炮的保护下，这艘巨型船舶都要运送上流社会的香客前往麦加，然后驶往穆哈（Mokha）出售印度货物。1695年，当这艘船满载着旅客和价值520万卢比的财物从穆哈返回苏拉特时，“想望号”（Fancy）船上的亨利·布里奇曼（Henry Bridgeman）和另一条海盗船却在印度海面上攻击了甘季—萨瓦伊号商船，打断了它的桅杆，在遭到轻微抵抗后登上了这艘船。这些海盗强奸妇女和洗劫这艘船长达3天之久。当这艘船最终驶抵苏拉特后，公众怒不可遏。苏拉特总督占据了东印度公司的货栈，囚禁了所有的货主。对高贵的穆斯林妇女和朝觐归来的香客犯下的暴行让人刻骨铭心，也招致了对英国人的谴责和憎恨。[①]

241

恰值此时，皇帝的注意力转到了英国人在孟买的卢比铸造厂。这些铸币在成色和重量上坚持了莫卧儿帝国的标准，但上面印的却是英国君主的徽章。当海盗袭击的某些幸存者和一些犯禁的卢比出现在公开法庭上后，奥朗则布便授权身为莫卧儿附庸和岸防司令的辛吉·雅库特·汗（Siddi Yaqut Khan）和他的舰队进攻孟买。但在孟买的坚固城防面前，这次进攻寸步难行。

尽管荷兰人和英国人极力辩白和承诺协助镇压海盗，海盗活动还是依旧存在。1702年，奥朗则布对欧洲海盗的劫掠做出了反应，禁止荷兰、英国和法国公司在帝国内从事任何贸易。海得拉巴属卡纳塔克的莫卧儿王朝的法乌吉达尔达乌德·汗·潘尼（Daud Khan Panni），一名深受祖儿菲卡尔·汗信任的埃米尔，乘机要求马德拉斯的英国人支付大笔假想的拖欠税款。他还扬言他的官吏将清查和测量东印度公司在这座城市里面及其周围地区的地产，派军队占据马德拉斯城中未设防的印度人社区。英国人进行了抵制，围困随后就开始了。经过持续不断的谈判，围困终于在3个月后解

①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343–351.

除。达乌德·汗·潘尼从英国人手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作为回报，他公开宣布马德拉斯独立和自治。[1]在弗朗索瓦·马丁（François Martin）任总督 242 期间，本地治里也经历了一系列类似的威胁，而且也同这位法乌吉达尔达成了类似的协议。[2]

莫卧儿人未能占领孟买和马德拉斯，是奥朗则布全神贯注于马拉塔问题的直接结果。这位皇帝不愿意而且也日渐无力去为占领这些港口施加足够的军事压力。在奥朗则布死后，他的最近继承人中没有谁再准备去解决这件事情。在苏拉特和默吉利伯德讷姆陷入衰落的岁月里，孟买和马德拉斯却作为自治的贸易中心继续繁荣。

德干战争中的帝国精英

从未结束的德干战争不断消耗着帝国精英的凝聚力和士气。长期服役的莫卧儿埃米尔和曼萨卜达尔，对帝国军队变得灰心丧气。奥朗则布在德干的军事颓势一年比一年显著。德干帝国军营生活的艰辛和危险一成不变。在围攻期间，马拉塔突击队在营地附近大胆驰骋，切断粮食供给。正像比姆森（Bhimsen）根据个人经历所评论的那样：[3]

> 自陛下登基以来，他一直未在城市中生活，而是选择了所有这些战争和鞍马劳顿，以致和他一起在营中居住的人在厌倦了长期分离之苦后，把他们的家人召到营中生活。新的一代就这样出生（在军营中）。

1689年后，莫卧儿精英就分为在德干效命的人和幸运地被派往其他地方的人。正像比姆森的记述反映出来的那样，身在德干的贵族们很少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同时，在北方省份任上证明是可靠和胜任的官员通常也都留任原职。

奥朗则布切断了那个让帝国负责官员直接从皇帝那里接受奖惩的极其重要的过程。在北方任职的埃米尔很少能参加承认皇帝权威的朝会仪式。而那

---

① Richards, "*European City - States*," p. 516.

② Ibid., p. 512.

③ Khobrekar, *Dilkasha*, p.233.

些德干的官员尽管能够参加在皇帝大营中举行的朝会，却又不得不面对营地中依旧盛大的仪式和营地外帝国势力空虚之间的不协调。

243 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变化是，德干的许多莫卧儿曼萨卜达尔逃避他们的武士职责。各个行省的总督和法乌吉达尔经常让他们的部队安全地待在他们的城堡中，而不是向大批的马拉塔突击队发起挑战。奥朗则布日益不能惩罚甚或训诫那些不与敌人交战的军官。

鉴于其漫长和难分胜负，德干战争使莫卧儿和马拉塔将领之间有了许多交往。许多莫卧儿军官在马拉塔军营中等候领取赎金。一些马拉塔将领曾在帝国军队中效劳。暴烈而血腥的战斗当然发生过，但同样（如果不是更大）数量的冲突经过频繁的非正式谈判和秘密协议而得以避免。由于对他们在奥朗则布暮年的前途越来越感到忧虑，许多帝国总督和法乌吉达尔开始为他们自己、他们的追随者和他们管理的地区（或他们的扎吉尔土地）谋求出路。一些人径直用现金打点，另一些人则卖身投靠。

日益增多的莫卧儿将领表现出来的不愿作战，可以部分地归结到他们部队的缺员。在德干任职的莫卧儿曼萨卜达尔们已越来越不能维持帝国条例所规定的配备适当战马和武备的骑兵齐装满员。这种弊端是如此普遍，而帝国的监督又是如此无能，以至于这种现象在所有集市上都变得司空见惯了。

奥朗则布通过滥赏莫卧儿爵位和荣衔而加剧了纪律的松弛。在攻陷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后，奥朗则布从这些国家中征召了64名穆斯林贵族担任高等埃米尔。这些被称为“德干伊”贵族的人中有32人被授予5 000扎特或以上的爵位。他们占拥有最高爵位的贵族总数的40%。[①] 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人是能干的武士和行政官，完全熟悉共同的印度—波斯宫廷文化，他们还是招致身为哈纳扎德的莫卧儿贵族们的极大嫉恨。

由于政治原因而得到奥朗则布任命的马拉塔人，构成了德干伊贵族中的244 另一个群体。在他统治的后半期，96名马拉塔人被晋升为莫卧儿埃米尔。[②] 他们占了全部贵族的16.7%。与德干伊穆斯林贵族相对照，他们中的大多数（62人）仅拥有3 000扎特以下的爵位。不过，这仍是侵入莫卧儿贵族集团

① M. Athar Ali, *The Apparatus of Empire: Awards of Ranks, Offices and Titles to the Mughal Nobility 1574–1658*（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6–27.

② Athar Ali, Apparatus, pp. 29–30.

的一个巨大而令人不安的要素。一些马拉塔人是出于对朋斯拉王朝的敌视才加入莫卧儿军队的。[①] 坎霍吉·舍克（Kanhoji Shirke）就是在受到沙姆巴吉的虐待后才带领他的家人加入了莫卧儿军队，而后即升至6 000扎特爵位。其他人则受私利的驱使，在他们的效忠问题上摇摆不定。几乎所有的马拉塔贵族都只是被任命为副战地指挥官统领他们的部队，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确实很成问题。作为政治奖赏授予马拉塔人的爵位和荣衔，受到长期在德干服役的莫卧儿贵族们的冷嘲热讽。

奥朗则布不能像一个世纪前的阿克巴设计出“拉杰普特政策”那样设计出一项新的“马拉塔政策”。无论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虔诚的声誉，都不会受到马拉塔酋长们的热烈欢迎。这些马拉塔将领中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曾受到过印度—波斯高级文化的显著影响，或者能够用波斯语自由交流。要让他们完全融入帝国精英当中需要全面而自觉的努力，而奥朗则布自然没有准备好这样做。就改善与马拉塔贵族的关系而言，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像在拉杰普特和帖木儿世族之间缔结政治婚姻那样的办法更切实可行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位皇帝也只能希冀通过对年幼的沙胡施以多年养育和教化从而有望得到把他扶上朋斯拉王位的报偿。还有，只要西瓦吉的其他后裔占据着那个王位，莫卧儿人就难以消除叛乱者发动侵掠的诱因。

收容德干伊穆斯林和马拉塔人贵族，对帝国资源形成了很大压力。在德干上服役的哈纳扎德们强烈抱怨正在出现的扎吉尔短缺：[②]

> 最后，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至整个国家都分配给了来自德干的新贵族，而他们的代理人通过贿赂为那些德干伊获得了收益最高的上等（扎吉尔）。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新的不知名的曼萨卜达尔的爵位和人数正分别得到晋升和增加，而原来曼萨卜达尔的曼萨卜却正在减少。

要求获得扎吉尔的人数开始超过了临时储备池（paibaqi）中等待分配的土地。[③] 245

对这种形势最直观的反应本该是把戈尔康达和比贾布尔肥沃的土地直接

①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pp. 207–213.

② Abul Fazl Mamuri, *Tarikh-i Aurangzeb*, ff. 156b–157a, translated excerpt from Athar Ali, *Mughal Nobility*, p. 29.

③ Athar Ali, *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angzeb*.（Aligarh, 1966）, pp.92–94.

分配给扎吉尔达尔们。然而，奥朗则布看来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更多地照顾中央财库的需要而不是去满足那些谋取自己薪俸的曼萨卜达尔的需要。海得拉巴省（前戈尔康达）的大部分土地被留作专门供给中央财库收入的卡里萨（王室土地）。其他土地留在临时储备池中的时期也延长了。① 类似的政策看来也在比贾布尔和马拉塔人的土地上得到了广泛实行。

事实证明，德干地区扎吉尔的短缺不止是一个人为造成的问题。随着德干战争的持续，马拉塔式的烧杀掳掠和莫卧儿人的报复把越来越多的农民驱离了他们的土地。对村镇的焚毁和对商人和旅行队的屠杀阻碍了生产。由于公共秩序的崩坏，遭受煎熬的人们加入了马拉塔人的军队或匪帮。② 在这种背景下，在德干诸省持有土地的扎吉尔达尔发现，即便是收取数量已经减少的赋税也变得更加困难。莫卧儿官员们为了获得那些能够可靠地征收赋税的地段而彼此倾轧。到18世纪早期，南方的许多莫卧儿官员由于未能获得可以完税的扎吉尔而经受了实实在在的贫困化。

怀疑、不安和挫折感引起了对奥朗则布政策的广泛不满。在最高等贵族中，一个贵族集团与祖儿菲卡尔·汗·努斯拉特·江及其任瓦兹尔（宰相）的父亲阿萨德·汗站在了一边，后者领导着一个混杂的贵族小圈圈（见上文）。这些人支持同马拉塔人举行某种形式的谈判，而这一举措将结束帝国资源在德干的消耗。祖儿菲卡尔·汗直接参与了奥朗则布和朋斯拉统治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尽管他在军事上咄咄逼人，祖儿菲卡尔·汗在这整个时期还是同他的对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另外一些人则支持加兹-乌德-丁·菲鲁兹·江和他的儿子钦·奇立赤·汗，他们领导着一个由图兰裔穆斯林埃米尔构成的家族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一个成员——穆罕默德·阿明·汗，曾短期担任奥朗则布的首席宗教官（萨德尔）。这个派别的成员坚持强硬路线。他们感到为了结束这场战争，应把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用来对付马拉塔人，而同这些异教徒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③

246

① J. F. 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in Golco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 157–162.

② 关于这些年海得拉巴省的详情，参见：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pp. 215–235.

③ Athar Ali, *Mughal Nobility*, pp. 106–111； Satish Chandra, *Parties and Politics at the Mughal Court*, （New Delh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2nd. edn., 1972）, pp. 1–10.

所有这些人都曾在德干服役20年以上。所有的人都深深地卷入了力图在南方稳定帝国统治的行动中。他们可能在手段上有分歧，但目标是毫无争议的。对那些在他晚年围绕在其身边的官员们来说，奥朗则布在德干的长期据守成功地颠倒了帝国的轻重缓急。德干，而非北方，才是他们世界的中心。

北方诸省

1680年后，北方的帝国行政从属于皇帝在南方的战事。奥朗则布在他自己与他在北方的行政官员和将领们之间保持着迅捷的情报交流和命令传达。不过，他的缺席使得细心安排（各项事务）成为必要。总的来说，通过任用他的儿孙和他最为得力的贵族，这位皇帝维持住了北方平原上的帝国机构和秩序。危机确实发生过，但得到了有效应对。帝国核心军力向南方的转移的确让边疆、税务和供给线易于遭受破坏。

在西北方向，17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人反叛已经表明了实行稳健、独特而灵活的帝国政策的重要性。埃米尔·汗，一名极其干练的什叶派伊朗裔官员，在阿富汗战事结束时担任了喀布尔总督。在20年里，埃米尔·汗对优素福贾伊、阿弗里迪及其他阿富汗世族内部政治和竞争的精明干预，维持了西北地区的相对和平。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稳定是通过从喀布尔财库中支出现金对各个酋长和派系给予巨额津贴才得到保证的。贸易车队继续经过各个山口运输大量货物，而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1698年，当埃米尔·汗死后，他的妻子萨希布吉（Sahibji）——一名莫卧儿贵妇，曾屡屡向他建言——开始全面执掌边疆行政，几达两年之久。最后，奥朗则布的新任总督，即他的儿子沙·阿拉姆亲王（Prince Shah Alam）抵达喀布尔。只是在此时，这位备受尊敬的贵妇才返回南方，送埃米尔·汗的诸子到朝廷受封，然后又动身前往麦加朝圣。[1] 那位王子则在他的父亲于1707年去世以前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这块边疆。

247

在东北边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噶达德哈尔·辛格（Gadadhar Singh），阿霍姆印度教王国的一位生气勃勃的新君主，于1681年初登上王

---

① Shah Nawaz Khan and Abdul Hayy, *The Maathir - ul - Umara* （New Delhi, 1st reprint edition, 1979）,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and Baini Prashad, 3 vols., Ⅰ, pp. 246–253.

位宝座。在1682年的一次贵族会议上，这位阿霍姆统治者宣布了他顺流而下收复高哈蒂和击退莫卧儿人的计划。阿霍姆舰队驱逐了莫卧儿的边境前哨（thanas），并同据守在一座岛上要塞（与高哈蒂隔河相望）的法乌吉达尔曼苏尔·汗（Mansur Khan）交战。在1682年9月的伊塔克胡里（Itakhuli）之战中，阿霍姆军队追击溃败的莫卧儿人差不多100千米，直至马纳斯（Manas）河。此后，马纳斯河就变成了莫卧儿—阿霍姆边界，直至英国人占领这一地区为止。[①] 从败北的莫卧儿人手中抢到的战利品包括大量财宝、战船、武器、军火和大象。

伊塔克胡里之战是东北地区两大势力之间发生的最后一次主力会战。此后，噶达德哈尔·辛格和他的嗣子鲁德拉·辛格（Rudra Singh, 1696—1714年）集中他们的精力，利用新近宣布的官方印度教形式——性力派（*Sakti*）巩固王权。莫卧儿人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已陷入停滞，而阿霍姆统治者却变得如此自信，以至于到奥朗则布统治结束时，他们已开始准备入侵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孟加拉。

奥朗则布依赖北方的和平和秩序供给的剩余税收，以资助他那连绵不断的战事。孟加拉也由于经常能够在支出之外输送大量的税收剩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地区。1696—1697年，一次戏剧性的反叛突显了从德干实行遥控统治的困难。孟加拉总督易卜拉欣·汗在应对一系列反叛时弄得焦头烂额。索瓦·辛格（Sova Singh）是地处孟加拉西南角的米德纳布尔县的一名柴明达尔。他同奥里萨的那些不满莫卧儿统治的阿富汗裔柴明达尔的首领拉希姆·汗（Rahim Khan）结成同盟。这些联合起来的反叛势力杀死了该县的卡特利种姓收税官拉贾·克里希纳·拉姆（Raja Krishna Ram），抓获了他的

248 家人，没收了他家的财物，还占领了布德万（Burdwan）镇。接下来，这些叛逆击退了莫卧儿王朝的西孟加拉法乌吉达尔，阿富汗裔酋长拉希姆·汗还带领部队攻占了纳迪亚（Nadia）和穆尔希达巴德（Murshidabad）。当恒河以西的孟加拉地区正遭受日益增多的逆匪劫掠时，易卜拉欣·汗却待在达卡按兵不动。

恰值此时，拉贾·克里希纳·拉姆的女儿在索瓦·辛格试图欺凌她时用

---

① S. C. Dutta, *The North East and the Mughals (1661–1714)* （Delhi: D. K. Publications, 1984）, pp. 154–156.

一把匕首杀死了他。新首领拉希姆·汗自封拉希姆·沙（Rahim Shah），显露出他意欲称王的野心。他迅速扩张的部队达到了10万骑兵和5—6倍于此的步兵。奥朗则布解除了易卜拉欣·汗的职务，任命帖木儿王子阿兹姆-乌德-丁（Azim-ud-din）——他自己的孙儿——为总督，又命令已遭罢黜的孟加拉总督的儿子扎巴尔达斯特·汗（Zabardast Khan）立即开始作战。扎巴尔达斯特·汗有效地利用他的骑兵和野战炮兵，迫使叛乱者在雨季退兵。到1698年初，阿兹姆-乌德-丁亲王赶来，在布德万附近同拉希姆·沙及其重整旗鼓后的叛军对阵。在经过短暂的激战后，帝国军队杀死了拉希姆·沙，平息了这场叛乱。

奥朗则布主要关心的是恢复孟加拉的税收。那里的税收已在叛乱期间直线下降，在他孙儿的管理下也没有恢复起来。由于阿兹姆-乌德-丁要为即将到来的继位战争做准备，他一心一意致力于为他自己和他在孟加拉的追随者侵吞一切可能的税收。定期从孟加拉运往德干的剩余资金中断了。1701年，奥朗则布从他的最能干的财政官员中挑选了一人担任孟加拉的首席财政官。卡塔拉布·汗（Kartalab Khan）是由担任奥朗则布德干诸省迪万的著名伊朗裔莫卧儿官员哈吉·莎菲·易卜拉西米（Haji Shafi Ibrahimi）购得的一名年轻婆罗门奴隶。在皈依伊斯兰教后，这个男孩被他的恩主作为儿子来培育，含辛茹苦地教给他在莫卧儿政府任职必需的文书和财政技艺。[①] 1701年，卡塔拉布·汗从他担任迪万的海得拉巴转调到达卡。在那里，他担任帝国在孟加拉和奥里萨的迪万。

这位新迪万立即从阿兹姆-乌德-丁的手中夺回了财政控制权（在莫卧儿体制中，迪万拥有几乎同总督一样大的独立权力）。在编订最新的孟加拉赋税簿后，他发现皇室收入已经减少，扎吉尔达尔的豪夺超过了他们规定的薪俸，只有相对有限的关税流入了行省财库。帝国官员贪污税收的现象十分普遍。卡塔拉布·汗通过没收一些扎吉尔和把另外一些扎吉尔从孟加拉转移到奥里萨较不肥沃的地区，增加了卡里萨土地。他还雇佣了许多信奉印度教的低级收税官（基本上来自旁遮普的卡特利种姓），以包税制的方式掌管该省的各个地区。也就是说，他们要为在分派给他们的地区征税提供保证金　249

① Abdul Karim, *Murshid Quli Khan and His Times* （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 1963）, pp. 15–26.

（security bonds），然后从税收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作为薪酬。[1]

对收据的严格审查和对玩忽职守的柴明达尔、乔杜里及其他地方官吏乃至收税官本人的无情监禁和拷打，很快产生了结果。卡塔拉布·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在第一年就产生了1 000万卢比的剩余。1702年，这名迪万把这些钱财解送到南方，填充奥朗则布近乎空空如也的财库。到这个时候，那位王子的嫉妒和愤恨已发展到意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这名迪万躲过了这一劫，而后把他的官署从达卡迁到了恒河上的一个贸易中心——马克苏达巴德（Makhsudabad）。之前，他已被加封为那里的法乌吉达尔。当关于这场纷争的报告呈递给奥朗则布后，这位皇帝申斥了他的孙子，强迫这位王子离开孟加拉，作为比哈尔省总督驻节巴特那。

阿兹姆-乌德-丁继续担任孟加拉的在外总督，但卡塔拉布·汗才是该省最有权势的帝国官员。这个年轻的婆罗门奴隶迅速成为一名帝国显贵。1703年，这位孟加拉迪万来到奥朗则布的德干朝廷，献上了另一笔巨额款项和他的账目，还向他的君主和上峰们进献了大量礼品。就在那次朝觐中，奥朗则布赏给了他这名心爱的官员一件完整的锦袍、一面铜鼓和一面旌旗，晋封2 000扎特和1 000苏瓦尔爵位，还赐给一个新名号：穆尔希德·库里·汗（Murshid Quli Khan）。这个称号直接借自大约在50年前实施德干税收安排的已逝穆尔希德·库里·汗的名字。奥朗则布允许穆尔希德·库里·汗把他的总部改名为穆尔希达巴德和在那座城市中开设一座帝国铸币厂。穆尔希德·库里·汗还承担起（从阿兹姆-乌德-丁身上卸下的）奥里萨总督以及奥里萨锡莱特（Sylhet）、米德纳布尔、布德万和库塔克等县法乌吉达尔的职责。在他返回后，他还成了比哈尔的迪万。这位皇帝允许穆尔希德·库里·汗为这些职位挑选他自己的代理官员。这样，在1704年，他选中的14名伊朗亲戚来到孟加拉，被授以他掌控下的曼萨卜和官职。穆尔希德·库里·汗连续任职，并连年不断地向奥朗则布及其在德里的继承人运送财宝长达二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帝国结构的崩溃，他变成了孟加拉事实上的统治者。

250

① Jadunath Sarkar, ed., *History of Bengal: Muslim Period 1200–1757*, （Patna, 1973）, pp. 408–410.

阿格拉附近的查特人叛乱

奥朗则布依靠从德里到阿格拉、穿过多普尔（Dholpur）、再经瓜廖尔的大监狱要塞至布尔汉布尔的著名皇家大道，作为输送新的财宝、供给、牲畜和军队的核心通道。不幸的是，这条线路途经昌巴尔河谷和其他更加荒凉的山地和森林地带。年复一年，随着沿这条路线输送的巨额财物数量的扩大，对盗贼和劫匪的诱惑也相应地增加了。

在横跨亚穆纳河的科尔〔Kol，现在的阿里格尔（Aligarh）〕、阿格拉和萨哈尔（Sahar）等县，事实证明查特农民和柴明达尔造成了特别大的麻烦。[1] 1685年，在位于阿格拉西面80千米处的辛西尼（Sinsini），一个名为拉贾拉姆（Rajaram）的查特（种姓）柴明达尔加固了一座由硬土筑成的设防严密的要塞。在险要地形和竹林/丛林的保护下，这些城堡几乎能够击退最坚决的进攻。拉贾拉姆已经拒绝纳税，他带领他的查特族人劫掠皇家大道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他们甚至试图进入锡根德拉洗劫阿克巴的陵墓，不过被这里的法乌吉达尔击退了。很快，这条通往德干的陆上通道就几近关闭。即便是那些带着他们的随从旅行的大贵族也不安全。1686年，一位名为阿格哈尔·汗（Aghar Khan）的图兰裔埃米尔在带领他的部队和家室从喀布尔赶往比贾布尔时，力图追歼查特人，因为这些查特人劫掠了他的行李车。然而就在那座查特人的城堡外面，他和他的女婿及80名随从都一同被杀害了。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威胁，帝国收税官和其他官吏要么逃离这些县境，要么躲进城中不出。

1687年末，奥朗则布派遣他年轻的孙子比德尔·巴克特（Bidar Bkht）率军北上，前往镇压这些查特人。就在此时，曾在海得拉巴任官的新任旁遮普总督马哈巴特·汗已在亚穆纳河边的锡根德拉附近安营扎寨。查特人悍然大举进攻他的营寨，直到在遭受了400人的伤亡后方才退去。

251

拉贾拉姆的查特部队在机动性上胜过当地的帝国军队，得以占领锡根德

①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Ⅴ, pp. 296–303.

拉。在那里，他们成功地洗劫了阿克巴的陵墓。根据马努西的记述：[1]

> 在被总督和法乌吉达尔征收赋税的要求激怒后，他们（查特人）中的许多人集合起来，向大征服者阿克巴的陵墓进发。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们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他们对他的坟墓进行了报复。在闯入陵墓的青铜大门后开始了他们的掳掠，卷走了珍贵的宝石和金银……碟盘，还捣毁了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他们拖出阿克巴的尸骨，愤怒地投入火中焚烧。

无论这些查特人是否真的挖出过阿克巴的尸骸，但对这座陵墓的冒犯都像马努西指出的那样，是“跛子帖木儿皇室和世系可能遭受的最大侮辱”。在这次事件发生后，查特人首领拉贾拉姆在后来的一次冲突中被一名莫卧儿火枪手射杀，但查特人在辛西尼的据点并未被撼动。

奥朗则布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任命年轻的安伯（斋浦尔）拉贾比顺·辛格·卡赤瓦哈（Bishun Singh Kachhwaha）为马图拉的法乌吉达尔和查特人据点辛西尼的扎吉尔达尔。这位新统帅和他的拉杰普特部队直取查特人据点，将其团团围住。在经过4个月的围攻后，莫卧儿军成功地安放了一颗地雷，炸开一道缺口，最终攻陷了这座小要塞。1 500名查特守军战死，近1 000名帝国士兵或伤或亡。在索加尔（Sogar）的另一座小要塞也被莫卧儿军攻陷。到1691年1月，阿格拉周围的查特人叛乱暂时被镇压下去了。

赐予这位卡赤瓦哈族拉贾的扎吉尔领地众多，超过了查特人的疆域。他还受命恢复正常的行政管理。但这却是他无力完成的。在接下去的15年里，查特人的抵抗断断续续，继续存在。在经过短暂的间隔后，已逝拉贾拉姆的侄子楚拉曼·查特（Churaman Jat）成为新的好战首领。事实证明他是卓有才干的。他抵制一切课税要求。查特农民和他们的同种姓柴明达尔表现出显著的团结一致。在科尔、阿格拉和萨哈尔诸县，一个囊括了近40个乡的区域，每个村的村长和统治精英都积极在人力和物资上支持楚拉曼·查特。[2]

252

在附近的阿尔瓦（Alwar）、阿杰梅尔和兰桑波尔诸县，楚拉曼·查特还同来自纳卢卡（Naruka）、吉拉诺特（Kilanot）和乔汗（Chauhan）等部

①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 (Calcutta, 4 vols., 1907–8), translated by William Irvine, II, 320.

② R. P. Rana, “Agrarian Revolts in Northern India during the Late 17th and Early 18th Century,”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8 (1981), 287–326.

族的拉杰普特人柴明达尔联合作战。这些拉杰普特人正在努力抵制那位卡赤瓦哈拉贾要把他们从他们的领地上赶走，以便为他自己的部族成员谋取利益的企图。这些反叛的柴明达尔同这些县的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共同的种姓认同，也没有得到查特人获得的那种支持。在许多地区，拉杰普特柴明达尔正违反帝国条例，力图扩充他们有限的土地，控制原本不受柴明达尔控制的农民村庄。不管怎样，在奥朗则布剩下的统治期间，针对莫卧儿王朝和卡赤瓦哈政权结成的联合阵线还是成功地拒绝了赋税和对这些县的任何一种控制。

尽管年事日高，在奥朗则布统治的最后18年中，他依旧是一位积极进取、精力充沛的莫卧儿帝国最高统帅。帝国的中央集权结构在继续运转。不过，奥朗则布长期远离帝国位于北印度的心脏地带和他沉湎于无休止的德干战争，对帝国机构和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财富和人力涌入南方，延长而不是结束了同马拉塔人的战争。一场政策争论受到制止。由于受到他们那不屈不挠的父亲的威吓，奥朗则布的儿子们发现他们既无手段也无勇气去挑战这位皇帝的计划。1689年后，无论是在新近征服的省份，还是在原来的德干省份，公共秩序、政治稳定和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螺旋式的衰退。

253 第十二章　帝国的衰落和瓦解：1707—1720年

1707年3月3日，奥朗则布死于他在德干的艾哈迈德讷格尔的大营中。在一份书面遗嘱中，这位皇帝枉费心机地试图在他3个活着的儿子中间分割帝国。然而，司空见惯已被延宕了很久的继位战争——（在奥朗则布死后）几乎立即就爆发了。在帝国大营，阿扎姆·沙亲王（Prince Azam Shah）在帝国瓦兹尔阿萨德·汗的支持下，承袭帝位，铸造货币，然后北上进军阿格拉。在位于兴都库什山区的边境要塞贾姆鲁德，他的哥哥穆阿扎姆20天后才收到他父亲驾崩的消息。帝国信使以平均每日70英里的速度驰骋1400多英里传送这些急件。[1] 为了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穆阿扎姆早已操练他的军队一年有余，（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开始强行军，南下进逼阿格拉。

在拉合尔正北面的一个地方，穆阿扎姆宣布他承袭帝位，取尊号为"巴哈杜尔·沙"。到6月1日，这位新加冕的皇帝占领了德里。到6月12日，他抵达阿格拉。在那里，他碰到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阿兹姆亲王，后者已从孟加拉赶来并占领了阿格拉城堡和中央财库。事实证明，阿格拉的帝国储备受德干战争的影响甚微。巴哈杜尔·沙的官员发现已铸成硬币和未铸成硬币的金银共价值2.4亿卢比——大大超过了阿克巴去世时的储备。[2] 穆罕默德·阿兹姆又从孟加拉财库带来了一些资金，这些资金进一步增强了他父亲的事业。

① 对这场继位战争的描述来自：William Irvine, *Later Mughals* （New Delhi: 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oration, 1971），2 vols. in one; Ⅰ, 1–66.

② J. F. Richards, "Mughal State Finance and the Premodern World Econom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293.

1707年6月中旬，这两位竞争者在杰焦（Jajau）相遇。杰焦位于阿格拉的正南面，临近奥朗则布和达拉·舒科进行决战的萨姆加尔。在杰焦，阿扎姆·沙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被杀，他的部队溃败而去。在胜利者返回阿格拉后，所有表示宾服的贵族都受到欢迎，被授以适当的官职。

当巴哈杜尔·沙在1707年间忙于对付拉杰普特人时（见下文），传来了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卡姆·巴克什（Muhammad Kam Bakhsh）已经在比贾布尔自立为一名独立统治者的消息。作为对这种直接挑战的回应，到1708年5月，巴哈杜尔·沙带领一支人数超过30万人的军队南下。同日益失望和多变的卡姆·巴克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失败了。1709年1月，在海得拉巴城外，巴哈杜尔·沙的部队包围了卡姆·巴克什，后者只剩下了一些残兵败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

254

巴哈杜尔·沙和他的两位兄弟之间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分野，而这位新皇帝也很快原谅和接纳了所有曾支持过他的两个已亡兄弟的贵族。尽管奥朗则布晚年的那些问题依旧存在，这个帝国表面上还是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然而，巴哈杜尔·沙虽然在对待教义纯洁性的问题上态度要温和得多，却依然受到奥朗则布始终坚持以伊斯兰教为忠诚的唯一试金石所产生的滞后效应的阻碍。他从来没有正式废除过吉齐亚（人头税），但征收赋税的努力却变得劳而无功和令人气馁。

这位新皇帝面对着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德干上的税收工作由于马拉塔人的活动而受到压制。在北方诸省，被1707—1709年战争中断的税收并没有恢复到其评定的水平。主要的资金来源依旧是孟加拉。运宝车和汇票继续从达卡送至都城。对生产未受损害的扎吉尔的分配失败又削弱了贵族成员和曼萨卜达尔军团的忠诚，降低了他们的效率。政权无力在乡村地区维持秩序，结果破坏了国家和柴明达尔之间久已存在的协议。如果国家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地方贵族也就不再愿意交纳田赋。帝国结构中的这些压力在困扰巴哈杜尔·沙的那些最重要政治危机中得到了体现：拉杰普特人的愤懑不平、北方锡克人和查特人中间日益增长的好斗性，以及继续存在的南方马拉塔人的叛乱。

拉杰普特人和查特人

自从他在襁褓之中奇迹般逃跑以来，拉索尔王子阿吉特·辛格不仅已经生存下来，还成为马瓦尔公认的统治者和一名拥有3 500/3 000爵位的桀骜不驯的莫卧儿埃米尔。阿吉特·辛格乘他的夙敌奥朗则布去世之机，从焦特布尔赶走了莫卧儿占领军，完全控制了他的都城。他毁掉了自莫卧儿人占领以来修建的那些清真寺，禁止在该城举行伊斯兰祈祷会。[①] 在杰焦决战后，阿吉特·辛格没有承认巴哈杜尔·沙的权威。在这场持续的对抗中，据说他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安伯（王国）的贾伊·辛格·卡赤瓦哈（Jai Singh Kachhwaha）和年轻的阿马尔·辛格·西索迪亚（Amar Singh Sisodia）拉纳的支持：前者起初同阿扎姆·沙结盟，后又在决战中背他而去，后者从乌代布尔统治着梅瓦尔。

255

巴哈杜尔·沙亲领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于1708年1月占领了卡赤瓦哈的都城安伯。这位皇帝把卡赤瓦哈王位授予贾伊·辛格的兄弟维贾伊·辛格（Vijai Singh）。早年，他曾积极为巴哈杜尔·沙效命。然而，在帝国军队开拔后，一名莫卧儿法乌吉达尔和他的部队继续驻守该城。乌代布尔拉纳通过遣使馈送大量礼物而阻止了莫卧儿人的入侵。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家人逃到梅瓦尔山中的避难所躲藏。

莫卧儿军队轻而易举地扫荡了阿吉特·辛格的族人，占领了马瓦尔的都城焦特布尔。此后不久，阿吉特·辛格投降，并亲身出现在巴哈杜尔·沙的觐见厅前。这位皇帝恢复了阿吉特·辛格的贵族爵位，赐予他"大王"（Maharaja）的称号，还慷慨地赏给他的两个儿子曼萨卜。就他这方面来说，阿吉特·辛格必须屈辱地接受一名帝国加齐和穆夫提（mufti）在焦特布尔任职。[②] 这些官吏还要"重建清真寺，拆除崇拜偶像的神庙，实施伊斯兰教法中有关召集祈祷大会和宰牛的条款，任命治安官和委派收取吉齐亚的官吏。"[③] 莫卧儿人对焦特布尔和安伯的占领进一步增强了帝国对拉贾斯坦

① Satish Chandra, *Parties and Politics at the Mughal Court 1707–1740*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nd. ed., 1972), p. 29.

② 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解释者。——译者注

③ *Khafi Khan*, pp. 606–607 quoted in Chandra, *Parties and Politics*, p. 33.

的控制。

阿吉特·辛格·拉索尔和贾伊·辛格·卡赤瓦哈被迫跟随疑心重重的皇帝前往德干同卡姆·巴克什作战，但他们成功逃脱，返回了拉贾斯坦。在梅瓦尔拉纳的帮助下，这两位反叛王公都各自恢复了对其都城的控制。他们合兵围攻阿杰梅尔的莫卧儿堡垒，但又被那里的帝国法乌吉达尔击退。在一项得到了许多贵族支持的安抚措施中，皇帝保留了那两位行为不轨的王公的曼萨卜，但拒绝把他们的都城依照世袭扎吉尔制度授给他们。是同这些拉杰普特人商谈进一步的和解协议，还是无情地镇压他们，是皇帝的顾问和贵族们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最终，这个问题由1709年末的锡克人反叛而得到了解决。一份草草拟就的协议把他们的故土和都城作为世袭扎吉尔授予阿吉特·辛格和贾伊·辛格，并给予6个月的假期以便他们返回他们的王国。 256

然而，这项匆匆做出的妥协并没有完全让拉索尔部族和卡赤瓦哈部族重新成为对帖木儿事业十分忠诚和热心的武士，虽然他们曾经如此。要把皇帝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从前那样的紧密程度，一项连贯、稳固而且获得谅解的政策是必需的。不幸的是，巴哈杜尔·沙和他的继承者从未得到重建这份帝国资产的机会。

锡克人起义

第10代锡克人古鲁戈文德·辛格曾在继位战争中支持巴哈杜尔·沙。当这位皇帝率军前往德干迎战卡姆·巴克什时，他加入了皇帝的随行团。戈文德·辛格的使命是要向锡尔欣德（Sirhind）的法乌吉达尔瓦兹尔·汗（Wazir Khan）讨还公道。瓦兹尔·汗曾野蛮地处决戈文德·辛格的两名幼子，是莫卧儿人最近制造的一起锡克人殉教事件。由于对司法感到失望，这位古鲁派遣一名使者返回旁遮普，以便在他的使命失败时能号召查特农民起义反对暴政。那位使者，拉赫曼·达斯（Lachman Das），是一个改名“班达”（Banda）的苦行者，意思是戈文德·辛格的奴隶。他带着那位古鲁的旌旗和铜鼓。当班达和他的一小群随从在德里逗留时，戈文德·辛格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到了都城。对这次袭击最可信的解释是那些年经的帕坦人刺客是瓦兹尔·汗雇来的。戈文德的控告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在临死前，戈文

德·辛格告诉他的追随者他是最后一位真正的古鲁，今后他们就要把Granth Sahib即《圣典》作为他们可靠的永恒的指南。[①]

班达立即开始召集他营中的数百名锡克人，站到那位已逝古鲁的旌旗下。在迅速形成的千年抵抗运动中，他布道，赐福，欢迎锡克教的皈依者，还免费分发他收到的所有献礼。班达宣扬要为任何“受到窃贼、土匪或劫道盗贼威胁，受到穆罕默德盲信者骚扰，或以任何方式遭受不义或虐待”的人提供庇护。[②] 班达的主要吸引力存在于旁遮普和德里诸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河间地区。在那里，从前的游牧民最近定居下来，成为查特农民。他们急于得到承认，对班达的平等主义呼吁做出了回应。他们和无数的低种姓人或不可接触者——清扫工和皮革工人——来到班达的营地，皈依（锡克教），取名“辛格”，成为卡尔萨（Khalsa）[③] 的成员。[④] 所有人都准备为新信仰战斗。

257

1709年11月，班达的军队袭击和夷平了一座繁荣的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城镇——萨马纳（Samana），对城中居民进行了屠杀。在这些锡克人抵达锡尔欣德以便亲自向瓦兹尔·汗复仇前，6座旁遮普城镇已经遭到了类似的命运。在双方经过一个冬季的准备后，1710年5月，班达率领数千装备很差的农民向瓦兹尔·汗的炮兵、莫卧儿骑兵和由志愿的穆斯林圣战士（ghazis）组成的步兵队发起了攻击。尽管他们缺少火器和战马，锡克军队还是打垮了莫卧儿部队，在拼死的肉搏战中将他们大部杀死。两天后，锡克人又袭击了锡尔欣德，屠杀了那些没有匆忙皈依锡克教的居民，洗劫了这座城市，摧毁了城中的建筑。在锡尔欣德之役后，班达采用帕德沙的称号，启用新的历法，发行印有“那纳克和戈文德古鲁”（Gurus Nanak and Govind）名字的硬币。每枚硬币上都展示了锡克人公共食堂的大锅和卡尔萨的宝剑。截至此时，仿照千禧年领袖的样板，班达被认为能够偏转飞来的子弹，用他的符咒保护他的人不受剑矛的伤害。

① Khushwant Singh, *A History of the Sikh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 vols., Ⅰ, 95.

② Singh, *Sikhs,* Ⅰ, 103.）

③ 虔诚的正统锡克教徒在青年时代正式加入的新锡克教徒团体，由锡克教的最后一位古鲁戈文德·辛格于1699年创立。——译者注

④ Muzaffar Alam, *The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4–14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班达的军队蹂躏了亚穆纳河和拉维河之间及其以外的旁遮普平原。只有拉合尔、德里和少数几座阿富汗人城镇屹立不倒：[1]

> 在八九个月里，从两三日行程内的德里郊区到拉合尔郊外，所有城镇和圣地都被这些邪恶的歹人洗劫一空，踩在脚下，彻底摧毁。不计其数的人遭到杀害，整个乡村一片荒芜，而清真寺和陵墓被夷为平地。

巴哈杜尔·沙匆匆北上，奔赴旁遮普，以便对反叛者展开快速反击。到1710年末，莫卧儿将领们已经把班达的农民部队从平原赶到山间的一座设防庇护所——穆克里斯加尔（Mukhlisgarh）。班达在最后的总攻中逃脱，依旧能够自由地召集新的追随者，在1711年初在旁遮普平原上组织了另一次进攻。巴哈杜尔·沙为了更好地指挥这场战役而转往拉合尔，但由于班达逍遥法外，仍旧屡受挫折。1712年2月，巴哈杜尔·沙由于自然原因死亡，随即就爆发了一场新的继位战争。 258

锡克人的叛乱生动地表明北印度诸省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装备精良的莫卧儿军队被装备很差的农民步兵队击溃，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和几乎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只有扎根于阶级仇恨的宗教吁求，才能唤醒这些各自迥然相异的反叛集团。班达的千禧年福音集中关注农民和低等种姓长久以来对政权及其盟友——在这个政权下占有赠地的加齐和其他富裕的穆斯林乡绅以及阿富汗裔、拉杰普特族和其他非查特（种姓的）柴明达尔——的愤恨。在残酷战斗的数年中，以武装圣战士的出现为标志的穆斯林团结是抗击锡克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旁遮普城镇中的这些穆斯林民众为了自救而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另一方面，班达求助于锡克教版本的殉道士，他们将在战斗中受到他本人的超能力的保护。所有穆斯林编年史家都对低种姓的甚至是不可接触种姓的印度教徒在锡克教政权下晋升到掌权地位进行了谴责。

在巴哈杜尔·沙的率领下，帝国军队把锡克部队从平原赶回山区。不过，他们在粉碎在广泛的民众支持下的业已强大起来的游击战运动方面却没有那样成功。与平原上的拉杰普特柴明达尔不同，山区的许多拉杰普特酋长暗地里都同情任何反抗莫卧儿政权的活动，在必要时向班达提供消息、物资

① Khafi Khan quoted in Singh, *Sikhs*, Ⅰ, 109 n.

和庇护。[1] 直到1715年，在法鲁克西亚尔（Farrukhsiyar）统治时期，旁遮普总督才得以把班达和他的追随者包围在他的山堡中。在经过8个月围攻后，莫卧儿军队生擒了班达及其饥饿难耐的守军。随后，班达这位自封的统治者及其数百名追随者就被残忍地公开处决了。

259

德干的马拉塔人

1707年10月，在围绕着奥朗则布去世的混乱中，一个重要事件发生了。阿扎姆·沙亲王允许沙姆巴吉·朋斯拉的儿子沙胡吉离开帝国大营。自襁褓时起，他就一直被幽禁在那里。现在这位年轻的马拉塔王子可以不受阻碍地去夺取那些已变成一盘散沙的马拉塔酋长和将军们的领导权了。他的对手是拉贾拉姆（死于1701年）的遗孀塔拉·巴伊。她代表拉贾拉姆的儿子西瓦吉二世要求获得朋斯拉王位。通过释放沙胡吉，阿扎姆亲王选择了一种同马拉塔人和解的政策。奥朗则布无休止的战争已经失败了。

如果沙胡吉能够在莫卧儿人的帮助下登上朋斯拉王位，他将是第一个完全在帝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马拉塔统治者。奥朗则布一直对沙胡吉十分盛情和慷慨，希望他能在将来派上用场。沙胡吉没有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而是被给予婆罗门所受的印度教信仰教育。他对帖木儿帝国的态度远比大多数马拉塔人友善。在继位战争的最后阶段，巴哈杜尔·沙授予这位获释的朋斯拉王子高等莫卧儿爵位，从而在同卡姆·巴克什作战时得到了尼马吉·辛迪亚（Nimaji Sindhia）及其率领的一支马拉塔大军的帮助。

在卡姆·巴克什死后，缔结德干协议的问题立即出现了。祖儿菲卡尔·汗通过在杰焦战役的关键时刻投奔巴哈杜尔·沙而安然度过继位战争后，担任了德干诸省的在外总督和帝国的大巴克什。达乌德·汗·潘尼则担任祖儿菲卡尔·汗在南方的代理官，其总部设在奥兰加巴德。祖儿菲卡尔·汗继续赞同对马拉塔人持温和路线，因而没浪费什么时间就打发沙胡吉的特使带着提议前去觐见巴哈杜尔·沙。沙胡吉要求让他担任德干诸省的大德什穆克，以帝国税收的10%作为（对他的）补助。他还应有权以乔特名义

[1] Alam, *Crisis of Empire*, pp. 155–164.

调拨另外25%的德干税收。作为回报，沙胡吉将恢复受战争蹂躏的各省的秩序和繁荣。与此同时，既是巴哈杜尔·沙的瓦兹尔，也是祖儿菲卡尔·汗的对手的穆尼姆·汗（Munim Khan）提出了一项反建议。塔拉·巴伊派来的一名特使称其只要求分享10%的帝国税收和被任命为德干的大德什穆克。她也愿意平息叛乱和恢复繁荣。

至少在形式上，两种提议——如果被接受——都通过寻求担任德什穆克和柴明达尔而把朋斯拉统治者放到依附莫卧儿皇帝的地位上。沙胡吉和塔拉·巴伊由此希望增强他们对四分五裂的马拉特酋长和军队拥有最高权力的主张。过去，西瓦吉已经通过拒斥帝国权威而创建了他的王朝，现在，他的两位后裔却正在寻求皇帝承认（他们）为地方统治者。 260

最终，巴哈杜尔·沙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政策，向每一要求方都颁发了一纸大德什穆克的任命状，但没有授权他们征收乔特。这个乌七八糟的政策只是激起了两大马拉塔派别对最高权力的争夺——这只能是一种有损帝国领土的政策。

在巴哈杜尔·沙统治的最后两年中，仅仅同沙胡吉或塔拉·巴伊保持着松散联系的大群马拉塔军队在莫卧儿帝国的所有南方行省肆虐和掠夺，其冒险范围在北面远至马尔瓦。这些肆虐是如此具有毁灭性，莫卧儿军队的抵抗又是如此乏力，以致祖儿菲卡尔·汗在德干的代理官达乌德·汗·潘尼只好同沙胡吉达成了一项私人协议，把他从皇帝那里恳求来的35%的赋税份额全部转让给这位朋斯拉王子。作为回报，沙胡吉答应约束肆意掳掠的马拉塔酋长和恢复秩序。这项本质上是临时和私人的协议在帮助沙胡吉收服众多马拉塔酋长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在巴哈杜尔·沙统治时期，帝国政权在德干的保护伞甚至变得比奥朗则布最后攻打马拉塔人山间要塞时更加污秽和破烂不堪。

继位战争

1712年1月初，时年70岁的巴哈杜尔·沙在拉合尔病倒在床榻上，奄奄一息。恰如他的一贯作风，他居住在帝国营地的营帐中，而不是拉合尔城堡的皇家行宫。和他的父亲不同，巴哈杜尔·沙让他的4位成年儿子一直陪

侍在他周围，而不是使他们作为行省总督建立地区权力基地。每位王子都在他们各自位于城郊的营地里率兵警戒。皇位的最有力竞争者是巴哈杜尔・沙的次子阿兹姆-乌什-善亲王（Prince Azim-ush-Shan）。他在1695—1706年间担任孟加拉和比哈尔总督时积累了巨额财富，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还是他父亲的首席顾问。然而，在新起点上，他的反对派却是以埃米尔祖儿菲卡尔・汗为中心的，后者作为帝国的大巴克什和德干副王是巴哈杜尔・沙朝中最有权势的贵族。

261

在巴哈杜尔・沙驾崩前，祖儿菲卡尔・汗同其余3位王子达成了一份异乎寻常的协议——这3位王子都认为他们的幸存几率近乎为零。祖儿菲卡尔・汗建议这3位王子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如果取胜，他们将三分帝国：贾汗达尔・沙（Jahandar Shah）将成为印度斯坦的皇帝，拉菲-乌什・善（Rafi-ush Shan）从喀布尔统治西北地区，而贾汗・沙（Jahan Shah）将占据德干。祖儿菲卡尔・汗将成为驻德里的帝国瓦兹尔，他的副官将在其余兄弟的朝中任首辅。这项经过在《古兰经》前庄严起誓的提议把象征性的统一集中到最长的王子贾汗达尔・沙身上，他的头衔将出现在共同的铸币上。然而，实际统治权将落到担任瓦兹尔的祖儿菲卡尔・汗身上。

夺权之战甚至在皇帝于1712年1月12日去世前就已经爆发了。在拉合尔历时3个月的战斗中，帝国中最有权势的贵族在将才上略胜一筹，打败了最有权势的王子。阿兹姆-乌什-善在试图从获胜联军那里逃走时陷入拉维河流沙中身亡。之后，并不奇怪的是，祖儿菲卡尔・沙转而支持在3位王子中可能是最温顺的贾汗达尔・沙。在一个月内，他打败和杀死了拉菲-乌什-善和贾汗・沙。1712年3月29日，贾汗达尔・沙在拉合尔城外的战场上自立为皇帝。

新皇帝发现他无力奖赏他多年的心腹和助手，亦即他的奶兄弟科卡尔塔什・汗（Kokaltash Khan）。他被晾到了一边。另一方面，祖儿菲卡尔・汗变成了瓦兹尔，史无前例地被授予10 000/10 000的爵位。他的副手达乌德・汗・潘尼依旧以副王身份掌管德干。祖儿菲卡尔・汗的私人财务官萨巴・昌德（Sabha Chand）成为皇家卡里萨的迪万。

在加冕礼结束后，祖儿菲卡尔・汗积极迫害数十名支持过已逝王子的贵族。大多数被投入德里的监狱，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不过，两名埃米尔被

公开处决了。这是首次失败一方的贵族受到惩处。在过去，只有皇位竞争者和他们的后裔遭到杀害，他们的财产被罚没。（莫卧儿帝国）体系中出现的新扭曲预示着5年内将发生第二次嗣位战争。

贾汗达尔·沙：1712—1713年

贾汗达尔·沙把他的都城从拉合尔迁回沙贾汗阿巴德—德里，以占据那里的城堡和宫殿。这本应增强这位新皇帝的权威。然而，在他统治的短短数月里，莫卧儿帝国中央集权（centralized power）（体制）中最有力的因素却经历了急剧的弱化，这些变化必须迅速纠正，如果帝国还要生存的话。首先，长久以来帖木儿君主拥有的权力和权威本身被削弱了。新任瓦兹尔凭借他在继位战争中的地位、他的声誉和他的政治军事资源，僭取了对帝国的行政管理权。祖儿菲卡尔·汗而非皇帝决定（官职）任命和帝国政策。自阿克巴早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端坐在御座上的帖木儿君主允许日常职权旁落到一名权臣手中。

正是祖儿菲卡尔·汗遵照他一贯的立场，极力要求皇帝公布一种更广泛的绥靖政策。首先，仅仅在加冕礼结束9天后，吉齐亚就被废除了。其次，随后对拉杰普特人做出了重要让步。阿吉特·辛格·拉索尔被授以更高的爵位——“马哈拉贾”（“大王”）头衔，还被委任为古吉拉特总督。贾伊·辛格·卡赤瓦哈被授以同样的爵位——“米尔扎-拉贾”头衔和马尔瓦总督之职。在他们的世袭王国之外追封别的领地，引起了这两位前叛逆的热烈回应。第三，作为部分解决马拉塔问题的方案，皇帝授予塔拉·巴伊和拉贾拉姆之子西瓦吉二世中等贵族爵位〔“阿努普-辛格”（Anup Singh）头衔〕和海得拉巴省德什穆克希（deshmukhi）一职。这是一次在沙胡和他的堂兄弟之间划分马拉塔疆域和把这两个人作为正式承认的封臣纳入莫卧儿帝国体系的尝试。[1]

由于无力直接挑战祖儿菲卡尔·汗的权威，贾汗达尔·沙遂通过同科卡尔塔什·汗及其私党的密谋来削弱瓦兹尔的地位。[2] 这更激起了对祖儿菲卡

---

① Chandra, *Parties and Politics*, pp. 74–75.

② Chandra, 在*Parties and Politics*（pp. 67–82）一书中强烈地持这种观点。

尔・汗的派系抵制，但也损害了皇帝的声誉。

通过他自己的行为，贾汗达尔・沙降低了君主的尊严。在他即位后，这位皇帝晋封他宠爱的嫔妃拉尔・昆瓦尔（Lal Kunwar）为皇后。新皇后是一名著名的宫廷乐师的女儿。这位乐师尽管才华卓著，却和所有乐师一样具有莫卧儿贵族文化赋予的低贱身份。由于她的出身和她对皇帝的影响，拉尔・昆瓦尔遭到许多人的憎恶。她和贾汗达尔・沙违反礼制，公开醉酒和亲昵。由于拉尔・昆瓦尔和皇帝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筹划和安排奢华靡费的公共节日，皇家琐事让朝堂上的许多人不胜其烦。德里每月3次的全城彩灯会变得过分靡费了。无端赏给拉尔・昆瓦尔的父亲和兄弟们荣誉、爵位和头衔，进一步得罪了诸位显贵和他们的追随者。

263

皇帝权威的迅速旁落和一场严重的行政和财政危机同时发生。始于奥朗则布时期的肥沃扎吉尔土地的短缺状况没有缓和，而是继续困扰着曼萨卜达尔集团。与此同时，从扎吉尔上获得的真实收入和账面收入之间的差额扩大了。巴哈杜尔・沙和贾汗达尔・沙在每次政治斗争后的大肆封赏，只是增加了对日益减少的财富的需求。

在争夺北印度乡村税收（哪怕只是部分税收）的过程中，扎巴特税收体系的精密程序瓦解了。祖儿菲卡尔・汗和他的官吏对盛行的违犯帝国条例的行为视而不见。各级官吏变得公开受贿和以各种名目盗用公款。中间人抓住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在各个地方，包税制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做法。卡里萨上的官吏和扎吉尔达尔的代理人不再根据相对肥力和市场价格仔细计算评税额，而是满足于私家包税人的出价。大打折扣的税收立即就从成功的赋税投标人和他们的银行家那里收取上来。

帝国财政破产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贾汗达尔・沙自己的部队自他即位以来就一直没有领过薪饷。唯一多少可以依靠的财政收入是定期从孟加拉运来的钱财。随着阿格拉和德里市场上供给的减少，粮食、植物油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涨到了新的高度。当税收不再流到都城后，在城市出售粮食的动力下降了。地区和地方经济吸纳了莫卧儿人财政体系赖以存在的税收、产品和信贷。

1713年的成功政变

264

当继位战争开始后，遇害亲王阿兹姆-乌什-善的次子法鲁克西亚尔开始从他的孟加拉总督任上起兵。在听到他父亲失败和死亡的消息后，法鲁克西亚尔经过犹豫，在巴特那自立为帝，成为帝位的争夺者。基本上，他仅有的主要支持者是两兄弟：赛义德・侯赛因・阿里・巴拉哈（Sayyid Husain Ali Baraha）和赛义德・阿卜杜拉・汗・巴拉哈（Sayyid Abdullah Khan Baraha），前者把他的比哈尔总督职位归功于阿兹姆-乌什-善，后者受惠于同一人的庇护而成为安拉阿巴德总督。

赛义德兄弟从他们居住在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上河间地区的巴拉哈部族中寻求（支持）力量。巴拉哈部族能够动员数千名战士，其显著特征是他们令人侧目的勇猛、部族团结和对帖木儿皇室的忠诚。作为定居在这块土地上并联合为4个近亲父系家族的印度穆斯林，他们在其地方和帝国的双重联系上十分类似于拉杰普特人。他们能够回忆起其先祖在扶助萨利姆亲王（后来的贾汗吉尔）登基的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家族传统（见上文）。为了报答巴拉哈人在一场冒险甚至鲁莽的赌斗中给予的支持，法鲁克西亚尔承诺如果他获胜，将任命这对兄弟为瓦兹尔和米尔-巴克什（mir bakhshi），即品级最高的两个职位。

1712年11月，贾汗达尔・沙的儿子阿兹-乌德-丁亲王（Prince Azz-ud-din）和皇帝的两名主要将领（3人皆不谙军务）率领一支大军，试图阻止东方叛军的前进。在安拉阿巴德附近，这位王子和他的幕僚由于对他们的部队没有信心，在开战前就夺路而逃了。在这次溃退后，有更多贵族和柴明达尔带着部队加入法鲁克西亚尔一方作战。在德里，贾汗达尔・沙和祖儿菲卡尔・汗疯狂地试图集合起一支军队，来应战正在步步紧逼的叛军。最大的问题是缺钱。最后的帝国储备已经在组织一支由阿兹-乌德-丁亲王率领东进的大军时消耗一空。停饷的皇家士兵拒绝在没有薪俸的情况下开拔。在绝望之余，贾汗达尔・沙的官员们打碎宫廷中的金银器皿，从国库中清理出价值连城的珠宝和珠宝饰品，甚至还从宫廷的墙壁和屋顶上剥取金银，以应付这场危急。从这些疯狂的行动可以看出，帖木儿帝国的破产已明显到令人痛心疾

首的程度。

265　最后，在12月初，贾汗达尔·沙和祖儿菲卡尔·汗带领40 000骑兵、同样多的火枪手和弓箭手以及炮兵向阿格拉挺进。皇帝的最高指挥官们钩心斗角、意志消沉。新近从钦·奇立赤· 汗和数位图兰裔贵族——他们自奥朗则布时期以来就已失宠——那里征召来的部队，受到贾汗达尔·沙的将领们的极度（和合理的）怀疑。1713年1月中旬，这两支军队在阿格拉遭遇，拼杀了一日。在（同法鲁克西亚尔）达成协议后，钦·奇立赤· 汗率领的图兰裔部队背叛了贾汗达尔· 沙，在一旁袖手旁观，没有参战。在战斗结束前，贾汗达尔·沙从御用大象上跌落下来，同拉尔·昆瓦尔一起逃进了阿格拉。情急之下，他们作为亡命徒只身逃往德里。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祖儿菲卡尔·汗也带着他的残部退往德里。

政治斗争的第一阶段：1713—1715年

在阿格拉，法鲁克西亚尔把自己安顿在同贾汗达尔·沙的宫帐一模一样的御用营帐中，命令在那座伟大的公共清真寺的礼拜五祈祷会上诵读他的名字和头衔。在这位新皇帝向德里进发时，他任命赛义德·阿卜杜拉·汗为瓦兹尔（即帝国的首席财政官），任命他的兄弟赛义德·侯赛因·阿里·汗（在战场上受伤后尚未痊愈）为帝国的大巴克什。

在德里，贾汗达尔·沙曾向祖儿菲卡尔·汗寻求庇护。后者囚禁了他从前的主上，愿意把贾汗达尔·沙转交给法鲁克西亚尔的官员。当法鲁克西亚尔抵达都城后，他在一次觐见中热情洋溢地向毫无戒备的祖儿菲卡尔·汗致意，然后却任其被一群皇家奴隶残忍地杀害。就在同一天，法鲁克西亚尔下令处决同拉尔·昆瓦尔一起关押在德里城堡中的贾汗达尔·沙。拉尔·昆瓦尔则被送往宫中先帝遗孀和家人居住的地方。另有几名贵族和高等行政官被处决。为了增加普遍的不安全感，这些诛杀都是在（这些人）同皇帝或他的最高官员正常甚至友好会面时执行的。突然，这些受害者就被宫廷奴隶抓住

266　血刃或扼死。法鲁克西亚尔还下令把3位最能干的帖木儿王子（包括他自己年方12岁的弟弟）弄盲和关押在德里城堡中的国家监狱，从而完成了这场最初的清洗。

法鲁克西亚尔依旧担忧他的帝位，在一个依赖于他的当朝贵族派别的催促下，他很快就开始密谋消灭赛义德兄弟。更大的问题涉及在多大程度上瓦兹尔或帖木儿统治者才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的密谋在法鲁克西亚尔和他的两位首要贵族间掀起了一场殊死的斗争。在1713—1719年间，朝中的派系之争是帝国中唯一重要的政治事实。几乎所有的其他政策和改革都让位于这场冲突。每一方都无法聚集起足够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支持来轻而易举地消灭对方。不仅如此，在接下去的6年里，皇帝和贵族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它塑造了莫卧儿精英的内部团结——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

皇帝和瓦兹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试图制定对拉杰普特人和马拉塔人的政策时显得特别有害。所有主要的拉杰普特拉贾都向法鲁克西亚尔发去了表示臣服和祝贺的信函，但也都拒绝亲自前往朝中觐见。法鲁克西亚尔试图离间拉杰普特人，于是把近在咫尺的马尔瓦的总督职位授给贾伊·辛格·卡赤瓦哈，后者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前去赴任。但到偏远行省塔塔（信德）任职的任命却被阿吉特·辛格·拉索尔断然拒绝了。

作为回应，法鲁克西亚尔派赛义德·侯赛因·阿里·巴拉哈指挥一支大军前去擒拿阿吉特·辛格回朝。当他出发后，这位皇帝又给阿吉特·辛格送去密函，许诺如果他能打败和杀死侯赛因·阿里·汗，他就能得到帝国的恩遇。但阿吉特·辛格却选择了同赛义德兄弟而非与皇帝达成协议。在长达4个月的战事中（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时断时续的谈判），阿吉特·辛格和侯赛因·阿里·汗达成了一项和议。这位拉贾承诺送他的女儿前去和皇帝完婚，送他的儿子阿巴伊·辛格（Abhai Singh）到朝中充当莫卧儿贵族，而且在他本人受到召唤时也会亲自前往朝谨。他还答应交纳贡赋，同意接受塔塔总督职位。在一项秘密的补充协议中，侯赛因·阿里·汗允诺一旦阿吉特·辛格表现出公开的顺从，动身前往塔塔（就职），他将被重新任命为古吉拉特总督。这是拉索尔统治者和赛义德兄弟之间形成联盟的第一步。

1714年中，侯赛因·阿里·汗一回到都城，宫廷斗争就公开爆发了。在官职任命和瓦兹尔副官拉坦·昌德（Ratan Chand）乱政问题上，双方的冲突爆发了。法鲁克西亚尔调拨资金以便他的两位朝臣卡尼·达乌兰（Khan-i Dauran）和米尔·朱姆拉能集中足够多的部队进攻赛义德兄弟。在赛义德兄弟一边，他们无法从自己的族人和依附者中召集到足够多的人去战胜皇帝。

267

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也不愿意违犯长久以来形成的尊重帖木儿统治者的规矩——即使这个法鲁克西亚尔是由他们扶上帝位的。

1714年中，对皇帝的计划洞若观火的阿卜杜拉和侯赛因·阿里·汗撤退到他们的德里官邸，其四周聚集着受他们指挥的近万名巴拉哈族人和士兵。从这座堡垒里面，他们发出信函，请求皇帝允许他们从帝国官职上退休。法鲁克西亚尔担心他们如果那样做就会引发叛乱，试图任命一名新瓦兹尔，但皇帝的亲信中没有人愿意在德里街头的直接战斗中去与令人敬畏的赛义德兄弟对垒。两大阵营经过为时数月的漫长谈判终于达成了一项妥协。皇帝同意派他的宠臣米尔·朱姆拉（被认为是最敌视赛义德兄弟的人）前往比哈尔就任行省总督。作为回报，侯赛因·阿里·汗愿意卸下他的帝国米尔-巴克什一职，亲任德干诸省总督。皇帝的心腹卡尼·达乌兰成为帝国巴克什。阿卜杜拉·汗将继续留在德里任瓦兹尔。

1715年5月，侯赛因·阿里·汗动身前往德干。侯赛因·阿里·汗赴任时迫使皇帝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位新德干总督带着大印，这给了他在德干任命和罢免所有官员以及分配扎吉尔的全权。侯赛因·阿里·汗史无前例地被授予任命、调换和罢免主要要塞守将的全权。在此以前，所有帖木儿统治者一直警惕地守护着这项权力，以制衡过分野心勃勃的行省大员。

在派侯赛因·阿里·汗奔赴德干后不久，法鲁克西亚尔就把达乌德·汗·潘尼从古吉拉特总督任上调到德干政府管辖下的6大行省之一——康德什。在一封密函中，皇帝命令达乌德·汗·潘尼进攻和——如果可能——杀死侯赛因·阿里·汗。如果他取得成功，达乌德·汗将成为德干诸省的总督。然而，在布尔汉布尔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侯赛因·阿里·汗轻松地打败和杀死了只拥有少量骑兵部队的达乌德·汗·潘尼，在后者被抄没的财物中发现了法鲁克西亚尔寄出的秘密信函。

268

政治斗争的第二阶段：1715—1718年

然而，在达成协议后，德里立即出现了短暂的解冻迹象。1715年12月，皇帝同阿吉特·辛格·拉索尔的女儿举行了早已议定的结婚大典，以解决沉积已久的拉杰普特忠诚问题。赛义德·阿卜杜拉·汗全程参与了围绕着这

个重大公共事件举行的各种精心准备的庆典。

达乌德·汗·潘尼战死的消息和皇帝的背信弃义很快就恢复了双方的相互敌对。在接下去的两年里，皇帝和瓦兹尔继续维持着令人沮丧的僵局。首都的政治气候依旧紧张而疑云重重。法鲁克西亚尔忙于设计抓捕阿卜杜拉·汗，但都失败了。皇帝选定一名又一名贵族作为可能战胜阿卜杜拉·汗的人选和假定的瓦兹尔。鉴于皇帝的支持并不可靠，没有人能被说服去冒同赛义德·阿卜杜拉·汗武力摊牌的风险。瓦兹尔命令他的数千巴拉哈族人枕戈待旦，日日戒备，以此保障自己的安全。在每日上朝时，他总是由三四千名武装骑士护卫着经过德里街道。

财政危机加深了。阿卜杜拉·汗的迪万拉坦·昌德把所有税收都租赁给了出价最高的竞标人。甚至连卡里萨（王田）也出租给了那些出价最高的收税人。拉坦·昌德从收税人的支持者那里强行索取承租文书和预付款项。下等和中等曼萨卜达尔发现不可能再从他们的俸地上收到赋税。国库开始向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每月支付50卢比现金的薪俸。但后来，甚至连这笔现金也不能保证及时和足额发放。较大的扎吉尔达尔只有通过向包税人或他们的银行家大打折扣才能收到预付税款。他们获得资金的最佳机会是在他们故土附近得到连续的扎吉尔俸地。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皇帝甚至还试图短暂恢复征收吉齐亚——这项措施激起了拉坦·昌德和其他在政府任职的印度教徒官员的强烈反对。

在此期间，皇帝甚至开始对他最忠诚的支持者失去信任。甚至德里的日常行政也恶化了。失意和忧郁的武人在大街上寻衅滋事成为家常便饭，莫卧儿贵族不得不单纯为了生存而越来越留心他们自己的武力和他们的外交和政治技巧——而非像在诸位先帝统治时期那样只需达到博得皇帝恩宠的目的就行了。 269

尽管在1716年中最终平息了锡克人叛乱和在德里公开处决了班达及其追随者，别的地方性抵抗又发生了。自奥朗则布晚年以来，德里和阿格拉及其周围地区的查特人已经武装和骚动起来。在1708—1709年继位战争的诸次战役期间，他们的首领楚拉曼·查特集合了大批族人从作战双方劫取武器、钱财和其他物品。但他反而得到巴哈杜尔·沙的宽恕，被赏以莫卧儿埃米尔的爵位和头衔。在1712—1713年的各次战斗中，查特人再次对每一方进行同样

的劫掠。为了制止查特人在沿阿格拉至德里的帝国大道上劫掠商旅，帝国瓦兹尔让楚拉曼担任官方的道路巡守（road guard），负责维持该路段的治安。这项任命只不过是让他得到了肆意掠夺的帝国授权。

皇帝强令贾伊·辛格·卡赤瓦哈率军惩戒查特人。一支主要由拉杰普特人组成的庞大的帝国军队披荆斩棘，穿过图恩（Thun）周围的丛林，包围了查特人的这座城堡。对这座物资充足、装备良好的要塞的围攻持续了20个月。在围攻期间，查特人在城堡外的掠夺和乡村游击活动增加了。最终，阿卜杜拉·汗把一项协议强加到贾伊·辛格头上。楚拉曼支付了巨额赔款，给予瓦兹尔贿赂，还献出他的城堡，同意到任何地方任职。

期间，在德干，侯赛因·阿里·汗否决了达乌德·汗·潘尼同马拉塔人达成的协定。这项协定把超过1/3的帝国税收让给他们，以换取他们维持秩序。结果，马拉塔人的掳掠和难分胜负的公开战争仍继续进行。侯赛因·阿里·汗的困难由于皇帝向沙胡吉·朋斯拉和其他马拉塔酋长发函，要求他们反对这位德干总督的势力而加重了。马拉塔部队在德干北部完全控制的领土正稳步地增多。在南部，这位德干总督在比贾布尔、海得拉巴和两个卡纳塔克行省的权威更是近乎不存在。

270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赛义德兄弟改变了他们试图拉拢马拉塔人为他们盟友的政策。1717年中，侯赛因·阿里·汗开始同沙胡吉谈判，最后到1718年2月达成了一项正式和约。这份和约承认莫卧儿人失败和马拉塔人取胜时的直言不讳是令人震惊的。赛义德兄弟准备同沙胡吉和马拉塔人在帝国南部进行合作，以换取对他们在中央的斗争中给予政治和军事支持。这项新协定让沙胡吉对当年西瓦吉在马哈拉施特拉和孔坎沿海地区最初的“自治”（*swaraj*）土地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此外还割让了马拉塔人最近在贝拉尔、冈德瓦纳和卡纳塔克征服的土地。一个极其重大的让步是承认沙胡吉有权雇佣马拉塔税吏自行在德干6省征收乔特和萨尔德什穆克伊（sardeshmukhi）[①]，即35%的帝国赋税。作为交换，沙胡吉同意交纳100万卢比贡赋，维持一支15 000名马拉塔骑兵供侯赛因·阿里·汗驱使。沙胡吉还答应维持秩序，禁止在帝国赋税之外另加课征。当法鲁克西亚尔拒

① 萨尔德什穆克伊（sardeshmukhi），指分配给大德什穆克或某一地区的10%的税收份额。——译者注

绝批准这项协议后，沙胡吉对此毫不介意，好像这项和约已经得到了批准似的，进而派出了他的收税官，又拨出10 000人的骑兵部队供侯赛因·阿里·汗调遣。

最后的危机

到1718年中，随着均势开始向赛义德兄弟一边倾斜，皇帝和大臣之间原本只是勉强隐藏在僵硬的莫卧儿宫廷礼仪下面的敌意终于喷薄而出了。当皇帝违反先前的协议数次在德干诸省任命官员时，瓦兹尔径直加以撤销。被激怒的皇帝在他求助帝国中另外3名最有权势的贵族前，曾参与了多次剪除阿卜杜拉·汗的密谋，但都失败了。图兰裔贵族阿吉特·辛格·拉索尔、莫拉达巴德（Moradabad）的尼扎姆-乌尔·姆尔克（Nizam - ul Mulk）和比哈尔的萨布兰德·汗（Sarbuland Khan），带领总数在70 000人以上的部队进入德里。由于他的见风使舵和含糊其辞，这位皇帝疏远了所有这3位埃米尔。他们要么离开了都城，要么站到了瓦兹尔一边。1718年临近岁末时，皇帝只能依靠贾伊·辛格·卡赤瓦哈及其20 000名拉杰普特人了。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该年结束。 271

稍早，阿卜杜拉·汗已经给他的兄弟侯赛因· 阿里· 汗写信，要他从德干带兵返回。10月，侯赛因· 阿里离开布尔汉布尔，率领15 000名骑兵、10 000名火枪兵和若干炮兵北上。沙胡吉的佩什瓦（Peshwa，首相）巴拉吉·韦施瓦纳特（Balaji Vishwanath）带领10 000名马拉塔骑兵（他们从莫卧儿的财库中每日得到1卢比的薪俸）也加入到他的队伍。在违反皇帝命令的情况下班师回朝的公开理由是沙胡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交换建议。朋斯拉统治者请求释放他的母亲耶苏·巴伊和他的弟弟。他们自1689年以来一直囚禁在莫卧儿宫中。作为交换，他同意交出已故莫卧儿反叛王子阿克巴的儿子。侯赛因·阿里·汗必须亲自护送这个男孩到德里。但这个所谓的帖木儿王子实际上是一个冒牌货。他只是一名加齐的儿子，长得很像帖木儿皇室的人。一路上，侯赛因·阿里·汗把他安置在猩红帐篷里，让他穿上长袍，戴上王冠，另外还配备了适当数量的奴婢。人人都能洞悉到其中的威胁：法鲁克西亚尔可被轻而易举地废黜掉，以支持此人对帖木儿帝位的要求。

1719年2月，侯赛因·阿里·汗违反帝国礼制，敲着鼓，打着旗，进入德里。急于抚慰赛义德兄弟的法鲁克西亚尔同意解散所有镇守德里城的皇家侍卫和所有控制着朝堂入口的兵士。皇帝还遣散了贾伊·辛格·卡赤瓦哈，后者带着他的拉杰普特骑兵不情愿地离开了都城。而当法鲁克西亚尔拖延让出宫城的控制权时，阿卜杜拉·汗便亲自到朝觐厅中与他会面。皇帝和大臣间相互怒斥和谩骂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礼仪都荡然无存，多年冲突郁积下来的愤怒和恐惧一股脑地释放了出来。瓦兹尔气冲冲地离开朝堂，法鲁克西亚尔则退至后宫。而后，阿卜杜拉·汗驱逐了所有御林军，控制了城堡和皇宫。

那一夜，关于宫中所发生事情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城市。皇帝拒绝步出后宫。在那里，他有武装女奴的保护。次日，亦即2月28日，仍旧忠于法鲁克西亚尔的数名贵族和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向城堡进逼。在途中，他们同侯赛因·阿里·汗的马拉塔骑兵发生了冲突。由于没有受过巷战方面的训练，近2 000名马拉塔人被杀，他们的衣衫和武器被一群市井之徒和没领到薪水的士兵拿走。

272

在城市暴民和仅在数英里之外的贾伊·辛格所率拉杰普特骑兵的威胁下，赛义德兄弟选择了直接行动。他们不能合理地废黜法鲁克西亚尔而代之以他们自己当中的某个人——对帖木儿统治者的效忠之情还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能够废黜法鲁克西亚尔，然后代之以一位温顺的年轻王子。最初，他们曾徒劳无功地试图抓住比德尔·巴克什的儿子比德尔·迪尔亲王（Prince Bidar Dil）——他被认为是帖木儿王子中最能干的。但他害怕遭到杀害，依旧藏匿不出。最终，阿卜杜拉·汗锁定拉菲-乌什-善的儿子也就是巴哈杜尔·沙的孙子——拉菲-乌德-达扎特亲王（Prince Rafi-ud-darjat）作为候选人。这个惊恐万状的青年被推到孔雀宝座上，宣布为皇帝。

一群人持械闯入后宫，抓住法鲁克西亚尔，然后把这位废帝带到瓦兹尔面前。阿卜杜拉·汗在他的笔盒里找到了一根用来给他自己的眼睛上药水的针。他随即命令将这位皇帝扳倒，刺瞎他的双眼，然后把法鲁克西亚尔囚禁在城堡中。新皇帝的公开宣布结束了城堡外面的骚乱。两个月后，赛义德兄弟下令在法鲁克西亚尔的囚室将其扼死，然后埋在胡马雍陵的一间地穴中。

赛义德兄弟的统治：1719—1720年

赛义德兄弟对新即位的傀儡皇帝实行严密控制。拉菲-乌德-达扎特日夜由一群精选的巴拉哈族士兵守卫。所有朝会都是按照瓦兹尔准备的剧本进行的。6月，这位命运多舛的帖木儿统治者死于肺结核。他的兄弟拉吉-乌德-达乌拉（Raji-ud-daulah）在取代他兄弟端坐在御座上仅仅数周后，也患同样的疾病去世了。最后，赛义德兄弟选中了年方18岁的罗珊·阿克塔尔亲王（Prince Roshan Akhtar）。他是贾汗·沙的儿子、巴哈杜尔·沙的孙子。1719年9月，罗珊·阿克塔尔取号"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成为新的帖木儿统治者。

在赛义德兄弟统治下，帝国政策转向包容政策。在帝国御玺确认了同沙胡吉的和约后，志满意得的马拉塔人离开了德里，返回德干。同时，为了抚慰阿吉特·辛格·拉索尔，赛义德兄弟又允许他那已经守寡的女儿——她由于嫁给了法鲁克西亚尔而改信伊斯兰教——放弃伊斯兰教，回到焦特布尔她父亲的身边。这是第一次一位拉杰普特公主被允许离开皇家宫闱，返回娘家。这种让步在都城的穆斯林中间激起了很大的义愤。此外，赛义德兄弟还对楚拉曼·查特做出了正式让步。 273

然而，赛义德兄弟仍不能博得意志低沉和沮丧不堪的帝国贵族的完全效忠。反对派发现被委任为马尔瓦总督的图兰裔埃米尔尼扎姆-乌尔·姆尔克可以作为他们的首领。在摆脱极其严密的监控后，那位年轻的皇帝请求尼扎姆-乌尔·姆尔克把他从赛义德兄弟的魔掌下解脱出来。当赛义德兄弟突然试图把他从马尔瓦调离后，这位尼扎姆只好出兵德里。他在呼吁贵族支持时，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帖木儿皇室和帝国的毁灭深表痛惜。他抗议赛义德兄弟决意殄灭帝国中所有古老的伊朗裔和图兰裔世家，抗议他们正在推行一种灾难性的亲印度教徒政策。这位尼扎姆把所有那些对废黜和杀害法鲁克西亚尔感到震惊的伊朗裔和图兰裔将领吸引到他的一边。他们对于帝国的全部权力正在转向一个印度穆斯林集团感到特别忧虑，哪怕他们[1] 原来对帖木儿王

① 指印度—穆斯林。——译者注

朝的世代服役是如何地光彩照人。从某个角度看，这种分裂也可以看作是那些外来的、较为世界性的官员们与由印度裔穆斯林、拉杰普特人、马拉塔人和查特人构成的土生土长的精英之间的分立。

1720年8月，在德干的沙卡尔科德拉（Shakarkhedla），尼扎姆对马拉塔/赛义德联军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战斗。当侯赛因·阿里·汗带着皇帝向德干进军时，一次成功的谋划确保了对他（侯赛因·阿里·汗）的暗杀。然后，穆罕默德·沙在同阿卜杜拉·汗作战时投向了叛军。1720年11月，后者在德里城外被打败和擒获。在被俘获两个月后，阿卜杜拉·汗被处决了。

北方诸省

从1707年到1720年穆罕默德·沙登基之间，朝廷的不稳定对帝国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总督、财务官、法乌吉达尔、巴克什（军队主计官兼领情报官）和扎吉尔达尔之间仔细划分的权限模糊起来了，在某些行省甚至消失了。在过去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帝国命令，现在被视若无物。送往中央的公开和秘密奏报在频次和质量上都下降了。有关扎巴特税收体系的条例，蜕变为或多或少公开的包税制。扎吉尔达尔发现，要从地方当局那里收取他们规定的赋税，他们必须拥有对他们领地的全部军事和政治权力。由于地方上的抵制，大多数行省中的税收减少和变得不稳定了。由于柴明达尔和农民的反叛，几乎所有地方内部暴力的水平都确凿无疑地提高了。

274

混乱年代中央权威的削弱为行省官员扩充势力创造了新的机会。在18世纪的前30年中，一些强大的早期王朝（protodynastic）人物在几个北方省份建立了初具雏形的地区王国。在地区权威下，政治形势稳定下来。这些拉贾、总督或是迪万、公认的统治者加强税收管理，镇压柴明达尔的叛乱，重组他们的政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口头上依旧承认皇帝权威的同时，增强他们的势力。北方诸省在一个松散的、非中央集权的帝国结构中趋向稳定。

在拉贾斯坦，主要的拉杰普特裔埃米尔起劲地破坏对该省施加的严密的帝国行政控制。在当前的安排下，这整个行省均受总部设在阿杰梅尔（总督驻节地）的帝国收税政府的管辖。土地要么按常规作为扎吉尔分配下去，要么留作其收入归属中央国库的卡里萨。只有相对有限的家乡领地即拉贾

世袭扎吉尔留在他们手中。当1708年第二次拉杰普特战争达成和解后（见上文），这些拉杰普特裔埃米尔便投入很大精力来拓展他们的世袭或私家领地，以便建立近乎自治的地区王国。

安伯的卡赤瓦哈族酋长贾伊·辛格·萨瓦伊（Jai Singh Sawai）使用两种方法和平地攫取了对毗邻安伯的土地的控制权。首先，他在朝中的党羽支持他增加薪俸的要求，（为他）游说并取得了临时性的可调换扎吉尔（regulation jagirs）。[1] 其次，贾伊·辛格的经纪人积极提议订立书面契约。根据这些契约，他们承诺向在拉贾斯坦东部领有扎吉尔的非拉杰普特族官员支付一定比例的官方税收。然后，各个部族的低等拉杰普特塔库尔们（thakurs）被授以包税文契，（据此）每年征收税金。对莫卧儿官员来说，在饱受法鲁克西亚尔统治时期派系冲突的困扰后，即便是打了折扣的税收，只要能按时交纳，也强于费力劳神地试图去从狂暴的拉杰普特布米亚那里征收赋税。那些试图在该地区收取他们自己赋税的扎吉尔达尔，发现他们的经纪人正受到卡赤瓦哈官吏的阻挠和骚扰。 275

随着法鲁克西亚尔权威的削弱，贾伊·辛格彻底掌握了对其全部扎吉尔和包税地（revenue farms）的永久权力。到1726年，与安伯毗邻的6个乡已被纳入到萨瓦伊控制下的安伯，成为这个18世纪新兴国家的核心领土。[2] 另外6个相连的乡也得到扩大，并加入到整体当中。自16世纪60年代巴拉马儿商议把他女儿嫁给阿克巴以来，莫卧儿皇帝第一次不再能控制拉贾斯坦东部的土地和税收了。

一些行省比另外一些经历了更大的动荡。13年间，恒河平原东部的阿瓦德总共更换了15任总督，有些总督压根就没有赴任。为了消除阿瓦德的动荡不安，后来的总督们被授予前所未有的权力，特别是对省迪万掌管的财政和税收机构的权力。1714年，埃米尔查伯乐·拉姆（Chabele Ram）接受了阿瓦德总督一职，条件是由他的一名亲属担任迪万。[3] 当1719年赛义德兄弟任命吉尔达尔·巴哈杜尔（Girdhar Bahadur）为总督时，这位曾经谋反的新总

① Satya Prakash Gupta, *The Agrarian System of Eastern Rajasthan*（c. 1650–c. 1750），（Delhi: Manohar, 1986），pp. 1–37.

② Ibid., p. 26.

③ Alam, *Crisis of Empire*, pp. 64–65.

督径直提出了他希望赴任的省份[1]，要求封他为迪万，结果他史无前例地获任整个行省的法乌吉达尔。[2] 在1722年，出现了一位卓越的早期王朝人物。截至那个时候，已有足够的先例可以让阿瓦德王国的创始人布尔罕·阿尔-姆尔克（Burhan al-Mulk）把该省的全部行政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和镇压来自柴明达尔的抵抗。

在阿瓦德，大多数柴明达尔，无论是拉杰普特裔的，还是阿富汗裔的，都参加了对莫卧儿政权和赋税征收的广泛抗议。白斯瓦拉（Baiswara）地区的白斯（Bais）族拉杰普特人自奥朗则布晚年起已陷入骚动，现在在一名战争领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他们的中心要塞同阿瓦德总督进行了3天战斗。在暂时受挫后，他们被迫屈服，但到1715年中，他们又发动了另一场协调一致的暴动。再一次，阿瓦德总督查伯乐·拉姆打败和遣散了这些叛乱者。在整个1714年，勒克瑙县的阿富汗裔柴明达尔一直对那位总督兼法乌吉达尔进行着武装抵抗。同一年，阿瓦德本县内的几乎所有拉杰普特酋长都加入了叛乱。[3]由于缺少来自德里的足够指导和支持，总督无力召集起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扑灭这些起义。

276

尽管后来的总督们掌握了税收权力，来自阿瓦德的税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还是不稳定且数量不大。该省的大部分土地已分配给了扎吉尔达尔，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驻节省外。地方上的抵抗活动使得征收规定的赋税很困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不可能。在法鲁克西亚尔统治时期，赛义德兄弟开始把阿瓦德的扎吉尔分配给该省土生土长的印度裔穆斯林官员。[4] 分配的这些土地位于每位官员故乡的领地上，他们把这些俸地作为世袭扎吉尔来接受。另外，他们的亲属和私吏中也有一些人获得了与其扎吉尔毗邻的扎吉尔。这些扎吉尔达尔有望能够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俸地，并利用他们的地方亲属和庇护关系来建立足以从柴明达尔和农民那里征收赋税的力量。最终结果是开启了把阿瓦德的扎吉尔转变为永久持有的采邑的进程。

孟加拉和奥里萨的行政和政治环境是不同的。在奥朗则布任命的得力

① 即阿瓦德。——译者注

② Alam, *Crisis of Empire*, p. 69.

③ Alam, *Crisis of Empire*, pp.96–97.

④ Ibid., pp. 124–129.

财政官穆尔希德·库里·汗的治理下，这两个行省在1707年后的显著特征是稳定和秩序。在被巴哈杜尔·沙重新任命为迪万（之前有两年调任他职）后，穆尔希德·库里·汗于1710年以2 000扎特的新爵位开始重新履行他的职务。[1]

1712年，当法鲁克西亚尔亲王准备争夺帝位时，他迫切要求取得孟加拉和奥里萨的财政积余。但穆尔希德·库里·汗以这位王子尚不是皇帝因而不能合法要求据有这些资金为由，予以断然回绝。法鲁克西亚尔派去了一支3 000人的部队，（命令他们）要么带回财宝，要么带回穆尔希德·库里·汗的项上人头。在穆尔希达巴德城外平原上的一场酣战中，顽强的迪万部队杀死了法鲁克西亚尔的将军，击退了他的军队。当1713年初法鲁克西亚尔在德里自立为帝后，穆尔希德·库里·汗没有片刻延误就把孟加拉的积余送给了他。穆尔希德·库里·汗由此得以保留其官职。[2] 法鲁克西亚尔还让穆尔希德·库里·汗担任孟加拉的代理总督（代皇帝幼子行总督职）和奥里萨总督。[3] 1717年，为了继续得到他的支持，法鲁克西亚尔又擢升穆尔希德·库里·汗为孟加拉总督。 277

穆尔希德·库里·汗的成功依靠的是他长期作为谨慎尽责的财政官表现出来的对帝国的忠诚和服从。在中央你死我活的派系政治旋涡中，穆尔希德·库里·汗通过准确无误地向亟须现金的君主输送孟加拉税收，保证了他对孟加拉的控制。从1712年到他1727年去世，穆尔希德·库里·汗在穆罕默德·沙在位时期平均每年向德里输送1 050万卢比。这些相当于孟加拉和奥里萨得自王田税收、柴明达尔贡赋和杂项进款的总和——所有这些项目都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和说明。[4]

这种每年的资金外流是否损害了孟加拉经济，难以确定。境内和平以及耕作和贸易的发展推动着孟加拉边境向东面和海洋的扩张。每年用车辆运送1 000万左右卢比出境，当然会使该省的货币供应紧缩。由荷属和英属贸易

① Abdul Karim, *Murshid Quli Khan and His Times*（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1963）, pp. 29–30.

②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Bengal: Muslim Period 1200–1757*（Patna, 1973）, I, 407.

③ Karim, *Murshid Quli Khan*, p. 48.

④ 见：Karim, *Murshid Quli Khan*, p. 85 n. 这是以15年9个月期间的1亿6 510万卢比总金额为基础计算的。起止日期从巴哈杜尔·沙5年到穆罕默德·沙9年。

公司从新世界输入的大量白银立即在该省的铸币厂转化为新硬币。从中间人那里征收赋税的严厉方法是否造成了对农民的压迫，也是难以确定的。穆尔希德·库里·汗的总税额是否相应地超过了从前政府的水平，是有疑问的。但以往的剩余资金都流入了17世纪连续数任孟加拉总督的口袋，让他们发财致富。

尽管他在必要时无情和高效地使用武力，穆尔希德·库里·汗还是把他的行省部队裁减到了2 000名骑兵和4 000名步兵。[①] 在他执政时期，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危及孟加拉和奥里萨。几乎全部官方税收都解运给了皇帝。穆尔希德·库里·汗把开支降到了最低限度，这受到了其同时代人们的关注和评论。他的个人财产尽管数额巨大——他死时为600万卢比，但并不过分。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当中央遭到削弱时，孟加拉总督变得更加独立了。更多的孟加拉裔印度教徒官员在他的政府中找到了职位，加入到由穆尔希德·库里·汗的亲属和那些业已跟随他到穆尔希达巴德任职的北印度官员的行列。到1727年，他的时任奥里萨代理总督的女婿舒贾-乌德-丁·穆罕默德·汗（Shuja-ud-din Muhammad Khan）无视穆尔希德·库里· 汗的意愿，以形同政变的方式完全夺取了对这两个行省的控制权。这届新政府适时得到了皇帝穆罕默德· 沙的认可。截至此时，孟加拉和奥里萨已经变成了一个向德里的莫卧儿统治者进献贡赋的地区国家。

278

德 干

正如在北方一样，德里的近乎瘫痪也侵蚀了德干诸省的行政管理。然而，在德干西部，并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威震一方的总督。相反，马拉塔人的侵袭削弱了康德什、奥兰加巴德、贝拉尔和比贾布尔的莫卧儿政府。在失去皇帝的支持后，行省总督和他们的核心属员要么龟缩进他们深沟高垒的都城坚守不出，要么干脆溜之大吉。马拉塔式的反复侵袭和掠夺及继之而起的比较正式的贡赋（乔特）索取颇具破坏性和瓦解作用。在马拉塔人扫荡过后，无依无靠的农民和吃了败仗的散兵游勇大群地转化为土匪。马拉塔入侵

① Sarkar, *History of Bengal*, Ⅰ, 412.

者和莫卧儿政权之间没头没脑的冲突和杂七杂八的要求和反要求，毁掉了许多从前繁荣的地区。在康德什省，解决莫卧儿扎吉尔达尔和马拉塔酋长及其收税员双重征税问题的过程，耗时多年才告完成。税收依旧很少，而且经常以实物支付。到18世纪20年代，许多村庄已被废弃。[①]

与这种冲突相伴随的危险和混乱，对远程陆上贸易特别有害。受到沉重打击的是像苏拉特那样的城市。这些城市曾是那种贸易最繁忙的中心。171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被迫关闭其在阿格拉的贸易站，因为该公司不再可能买到巴亚诺靛蓝（Bayano indigo）或专门的纺织品，并把这些货物经陆路可靠地运送到苏拉特。私商组织的车队，即便有雇佣卫兵的保护，也不再能安然从阿格拉抵达苏拉特。柴明达尔带领一群群武装农民甚至威胁和攻击莫卧儿官吏率领的全副武装的军团。关于在5 000人的（农民）队伍中就有2 000人携带火绳枪的报道，并非难得一闻。[②] 如果这些地方反叛者没有成功，成群的马拉塔骑兵就可能中途打劫商队。

279

1707年后，苏拉特的印度和欧洲商人不再能从通常的出产地获取充足的纺织品、靛蓝或其他出口品供给。他们也不再能够有利可图地转运穆哈咖啡或印度尼西亚香料之类的进口品到他们通常的市场。在阿格拉和苏拉特之间使用汇票的费用飙升至成交额的12%，而从前只需支付成交额的1%—2%。[③] 随着荷兰人在艾哈迈达巴德和布罗奇开设新的贸易站点，古吉拉特的生产曾一度可以满足这类需求的一部分。在古吉拉特，纺织品价格上升，供给下降，反映了马拉塔人劫掠所带来的该省不安全程度的上升。

从前繁荣的港口的货币供应枯竭了。帝国铸币厂关闭了数年，无数的货币兑换商走向破产。[④] 1710年后，获取进口物品所需的现金变得很困难。在苏拉特，出口的下降急剧减少了金银锭的流入。作为德干地区帝国军队薪俸外流的银币不再有回流的款项作为补偿。

到法鲁克西亚尔统治结束时，作为西部海岸莫卧儿首要港口的苏拉特被

① Stewart Gordon and John F. Richards, “Kinship and Pargana in eighteenth century Khandesh,”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2 （1985）, 384; and Richards, *Monetary System*, pp. 223–224.

② 关于1716年最后一批离开阿格拉的荷兰商人的旅程，参见：Gupta,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rat*, pp. 140–143.

③ Ibid., p. 152.

④ Ibid.

切断了同全帝国的贸易腹地的联系，衰落到仅仅同一个边界不超过古吉拉特的地区腹地进行贸易。英国控制下的孟买的相对安全使其成为一个与之竞争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并在重要性上迅速超过了苏拉特。

在巴哈杜尔·沙和他的直接继承者统治时期，德干东部地区遭受了和西部地区一样的境遇。1707—1713年间，马拉塔人的侵袭、抢劫和破坏在海得拉巴省是很普遍的。[1] 1708年，在争夺省财库的冲突中，才能卓著、任职多年的海得拉巴总督鲁斯塔姆·迪尔·汗被穆罕默德·卡姆·巴克什亲王诛

280 杀。在接下去的数年里，连续三任总督都无力应对普遍的混乱、破产和军队哗变。最后，在1713年，法鲁克西亚尔任命的一位新总督抵达海得拉巴。对地区政治生活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

既能干又果敢的穆巴利兹·汗（Mubariz Khan）立即着手恢复秩序。他沉重打击了所有的马拉塔入侵者，坚决把他们驱逐出其边界之外。在反复进行的惩罚性征讨中，穆巴利兹·汗率领数千莫卧儿重装骑兵不断奔袭反叛的泰卢固柴明达尔、匪首和变节的莫卧儿将领。

1715年，穆巴利兹·汗和赛义德·侯赛因·阿里·汗达成和解。后者是由法鲁克西亚尔派来担任德干总督的，他有权任命一切行省官员。在奥兰加巴德，穆巴利兹·汗站到赛义德兄弟一边，从而得以继任他在海得拉巴的职位。这次会见中，侯赛因·阿里·汗任命他的这位新支持者为行省迪万和总督，还批准穆巴利兹·汗的儿子担任该省最重要的要塞戈尔康达城堡的守将。这两地原本都是由皇帝分封的独立俸地。这次会面后，穆巴利兹·汗不再理睬1717和约中有关让出35%帝国税收由马拉塔任命的官吏收取的条款。在德干东部，这些条款并没有得到实施。马拉塔人在德干东部建立双重行政结构的努力受到了阻挠。

穆巴利兹·汗把他对皇帝的义务也弃置一旁。他仅象征性地从海得拉巴税收中提取少量钱款上缴中央财库。他肆意没收海得拉巴的卡里萨王家乡里，派他自己的官吏前去征收赋税。1713年后，几乎所有的官方任命或海得拉巴官员的调进调出都停止了。这位总督用他的6个儿子、他的叔父、他信任的阉奴及其扈从中的其他成员填充重要的行省职位。这变成了一种在海得

[1] J. F. 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in Golco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 264–305.

拉巴省内遴选地区官员的体制。

到法鲁克西亚尔统治结束时，穆巴利兹·汗恢复了总督或早先库特卜·沙王朝统治者对该省行使的权威。相对的和平和安定使得征收赋税和让该省居民较好地安居乐业成为可能。在这样做时，这位帝国总督事实上变成了一名地区国王——不是因为他不忠诚，而是因为他没有多少选择。皇帝和帝国瓦兹尔对地处偏远的总督们提供不了什么支持或鼓励。假如皇帝恢复了权力和力量，穆巴利兹·汗再次被融入一个复兴的帝国还是有可能的。但这并没有发生。1724年，正试图在德干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尼扎姆-乌尔·姆尔克，在沙卡尔科德拉之战中打败和杀死了穆巴利兹·汗。 281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残酷的帝位之争造成的动荡和衰弱吞噬着帝国的权威和效能。税收直线下降，整个帝国结构陷入螺旋式下降。或许，如果有一位强大的帖木儿君主，或就此而言，如果有一位能够创建新王朝的个人魅力型贵族占据君位，这种衰落还是有可能在18世纪20年代得到遏制的。当然，正像孟加拉的穆尔希德·库里·汗和海得拉巴的穆巴利兹·汗这两个实例所表明的，效忠帝国的习性和信仰可能已经在莫卧儿贵族和技术官僚中复活。然而事实却是，在穆罕默德·沙漫长的统治期间，帝国已经蜕化成一个由地区性后继国家构成的松散组合。

282

结 论

从1556年到1605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阿克巴接二连三的胜利使他能够在被打败王国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跨地区的帝国。他和他的顾问们创造性地设计出经久不衰的中央集权制度。不过，富有生气的扩张活动并没有随着阿克巴的去世而终止。相反，从1556年到1689年，莫卧儿帝国持续扩张和深化它的行政控制。

帝国机制的核心是军事。莫卧儿帝国是一个战争国家。这个王朝及其贵族是穷兵黩武的武夫。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被用于战争和备战。莫卧儿军队每年都忙于同外部敌人或国内叛军作战。莫卧儿皇帝不曾为进攻邻国表达些许歉意，更不对自己的挑衅致歉。和所有的帝国统治者一样，他们认为邻国要么是纳贡国，要么是敌国——不可能有其他类别。

在北方，只有当莫卧儿的兵锋抵达印度次大陆的极北端时，扩张的限度才会出现。在次大陆以外，自然和社会状况一起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北方的山区，莫卧儿军队发现他们自己危险地拉长了供给线。他们难以搜集柴薪和喂养战马的草料，也无法依靠印度的谷物商人。当他们在次大陆上作战时，这些商人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莫卧儿人遇到了可畏的统治者和民族的顽强抵抗。后者没有融入印度穆斯林的政治体系，对莫卧儿帝国的威势也没有产生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南方，帝国扩张缓慢，但稳步推进。这里的地形尽管也常常是崎岖难行的，但并没有阻绝军事行动。德干及其更南面的社会对印度穆斯林政权的残酷现实有着清晰的认识。然而，在这些地区，莫卧儿的外交压力削弱了德干诸国的中央集权。结果，莫卧儿的文臣武将们发现要征服和统治那些政治权力支离破碎的地区很困难。帝国政策也未能完全适应居统治地位的马拉

283

塔、泰卢固、卡纳达和泰米尔贵族的各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征服和政治控制变成了一种旷费时日而又经常令人沮丧的任务。正是在南方，1689年后莫卧儿人的扩张变得步履蹒跚，并最终寿终正寝。

大海阻断了向东方和西方的扩张。莫卧儿的军事力量是陆基的，而非海上的。与同时代的奥斯曼土耳其皇帝不一样，帖木儿诸帝从未想过或致力于海上扩张。航海文化对莫卧儿精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非常乐意投资海上贸易，甚至拥有海船，但这种兴趣并没促使他们自己登上他们全然不喜欢的海船。每年前往圣城朝觐的香客是这个规律仅有的例外。

断断续续的国内战争也是莫卧儿帝国的显著特征。众多不服从莫卧儿总督直接管理的王国和酋长国位于这个帝国中较为险瘠的地区。形式上的臣服、每年交纳贡赋和向皇帝提供军队或战象，这些最初足以让那些统治者留在他们祖传的宝座上。但巩固（帝国）的冲动，征服帝国内部边疆的冲动，是难以扼制的。大体而言，纳贡国王为了生存不断地进行政治斗争。停止交纳贡赋会引来警告和惩罚性战争，还随时有可能被完全吞并，置于（帝国）直接治理之下。

帝国的和平在征服和吞并之后到来。莫卧儿帝国维持了一种相对高水平的公共秩序。一般说来，城镇及其周边腹地不再遭受有组织的暴力掠夺。主要道路对商人和旅客而言是安全的。莫卧儿督军（faujdars）、市长或驿吏（*rahdars*）卖力地追逐和惩罚土匪和乱党。在别处，在山区或臭名昭著的昌巴尔河沙质峡谷中，就像同一时期的欧洲一样，有一些地方国王的律令形同虚设，甚至完全无人理会。冒险途经那里的旅客只能听天由命，自担风险。

在乡村地区，莫卧儿帝国的运转表现在同土地贵族——用莫卧儿人的话来说即柴明达尔——的持续斗争中。帝国官吏通过威逼利诱，驱使地方武士贵族或村庄地主协助征收帝国赋税。有时，使用武力是必要的。在某些地区，特别好斗的柴明达尔周期性地造反，饶有兴味地等待帝国军队的到来。更经常的是，谈判和规劝就足以让他们服从。 284

莫卧儿的税收体系被卷入了一场持续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中。其目标是把武装的、好斗的、褊狭的武士贵族转化为准官吏。通过把地方贵族纳入税收体系，帝国官吏也同时把柴明达尔（甚至边远地区的柴明达尔）融入了广为传布的帝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里，这项努力持续进行，并取得了显著成

功。随着新的领土并入帝国版图和纳贡王国被兼并，为了让地方贵族和首要的农民集团适应税收体系的要求而使用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法。然而，1689年后，行政能力逐渐减弱。莫卧儿官员未能在德干诸省维持帝国的和平局面产生了它的后果。士气和方向感的消退困扰着帝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吏。那些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被纳入了更大体系中的柴明达尔，现在面对着新的希望和新的危险。

1689年前的帝国扩张和巩固从阿克巴皇帝提出的激进政治取向中吸走了部分动能。在他的规划中，王朝和国家的利益优先于印度伊斯兰教的狭隘利益。对帝国体系的积极参与既向穆斯林开放，也向非穆斯林开放，这明显偏离了从前的实践。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这位皇帝力图使帝国体系更具包容性而非排他性。

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皈依和穆斯林迁入的现象，伊斯兰教在次大陆的各个地区依然是少数人的宗教。印度教种姓社会的僵化阻止了更多人皈依伊斯兰教。16世纪，印度穆斯林统治者面临着两难的政治选择。如果他们仅向穆斯林开放高级政治和军事职务，他们的支持基础将是十分狭窄的。如果他们向一切有才能和财富的人开放官职，正统的穆斯林团体将会做出强烈反应。阿克巴采取了坚决行动，力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局，其方法是创立一种对所有宗教和身份的臣民都有吸引力的新的王朝意识形态。

285

阿克巴的中央集权帝国在现代早期成功地利用了印度经济日益提高的生产力。新的世界经济联系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对印度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新世界的硬币开始滚滚流入次大陆——小部分途经果阿，大部分经过通往印度的正常海上和陆上路线。阿克巴政府利用这些充裕的金银供给来铸造货币，填充国库。随着1574年对古吉拉特的征服，帖木儿帝国变成了一个能够获得新流入的贵金属的沿海国家。在古吉拉特也能发现棉布的工业生产，这可以用来偿付金银进口。随着帝国的扩张，金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帝国经济的扩张同莫卧儿印度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如影随形。尽管缺少有力的定量数据，但有定性资料表明莫卧儿帝国促进了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和消费需求鼓励和塑造了印度多种多样和富有活力的地区和次大陆市场的成长。帝国坚持用官方铸币支付地税迫使（农民）向地方谷物商出售粮食和

其他作物，后者再供应城镇的消费需求。数百万依赖国家薪俸或赏赐生活的人的消费需求培育了多种制成品和加工品市场。

在比较专门的领域，皇帝们按例依靠私人市场和企业家活动来满足官方需求。一些奢侈品和主要产品在皇帝和贵族的豪宅中生产，但大多数货物和服务是由私人部门供给的。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培育了一个向行进中的莫卧儿军队提供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行商集市部门。皇帝及其军事将领们通过支付现金来动员部队，而不管对他们的区位、人数、技能和装备的需要如何。同样，对巨大的建筑工程来说，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得到足够数量的高技术工人。

一般说来，帝国的一体化看来培育了地区间贸易和联系的成长。这种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奢侈品贸易，但并非全是这样。在莫卧儿时期，粮食过剩的省份（如孟加拉）通过活跃的沿海船运业向缺乏粮食的地区（如古吉拉特）运送这类产品。帝国对陆上和海上贸易课税，但税率不高，而且通常是可预期的。匪患和横征暴敛的减少抵消了所征关税和其他赋税的成本。 286

世界联系

在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的航行后，印度的胡椒和其他香料及棉纺织品先是吸引了伊比利亚商人，然后是北欧商人来到次大陆。他们有着来自新世界的充足的金银供应。由于除了贵金属之外的大多数物产和商品能够自给自足，印度热切地接受黄金和白银，当作不断增长的对欧洲出口的收款。到1600年，荷属和英属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开发那条绕过好望角直接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路线的商业潜力。这条新的海上路线承载了莫卧儿印度和欧洲之间稳步扩大的货运量。欧洲的纺织品需求刺激了整个次大陆上印度布料的生产。尽管经常发生龃龉，莫卧儿帝国和东印度公司还是都从这种新联系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在这些经济效应之外，这种变化在欧洲和莫卧儿印度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影响呢？

到18世纪的前几十年，成百上千的欧洲商人、海员、外交官和冒险家已经不远万里，从海上来到印度。这些男人及少量女性踏遍了次大陆的万水千山。其中有许多人受雇于印度人，但更多地却是印度人受雇于他们。尽管间

隔很长，印度和欧洲之间还是保持着定期的信函往来。那些返回欧洲的人对家乡的人讲述他们在印度的所见所闻。无数的通信集和游记被刊印出来，在欧洲的广大读者中广泛传播。从这些激增的文献中，欧洲人获得了对现代早期莫卧儿印度的详细认识。

反过来，情况又怎样呢？莫卧儿印度对欧洲又有怎样的了解呢？最率直的回答就是，很少。尽管印度和欧洲港口之间有着定期航班，但除了少数海员，印度人并不乘船前往欧洲。向莫卧儿公众描述欧洲的游记和信函压根就不存在。

287

欧洲人能够在莫卧儿印度畅行无阻，是因为国家和社会明显地对此漠不关心。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所有外国人都受到帝国官员的严密控制。日本在德川时期从日本列岛驱逐了所有欧洲人。只有一小撮荷兰商人获得了在出岛（Dakshima）的一小块飞地，他们可以在那里经商。相反，莫卧儿印度对外国造访者完全开放。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社会对闯入印度格子状社会的人设置了障碍。当他们交纳关税后，所有外国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印度各地旅行和任意停留。这导致了一个在次大陆各主要城镇定居的欧洲人网络的形成。

具有较高地位或能力的移民偶尔同莫卧儿官员或印度商人建立起友谊，但这些关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印度人对欧洲的文化或社会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阿克巴对基督教的兴趣促使他在他的宫廷中接待耶稣会传教士——直至达拉·舒科去世前，他的更加好奇的后裔一直都在这样做。然而，在阿克巴之后，没有一个莫卧儿皇帝对欧洲有过明显的兴趣。贾汗吉尔、沙·贾汗和奥朗则布都接纳过来自贸易公司或它们的统治者的特使，并且对馈赠礼物的类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中，这些令人奇异的外国人基本上被忽略了——尽管他们曾出现在莫卧儿宫廷的绘画中。

欧洲人带来了种种技术进步。一些技术和装置被广泛接受、应用，而本地改装品也被生产出来。例如，用来起吊重物的绞盘（装在垂直轴承上的转盘和轮轴）在某些港口用来拖曳船只下水。[1] 一些技术和装置得到了采用，

---

[1] Ahsan Jan Qaisar, *The Indian Response to Europea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 D. 1498–1707）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3.

但并没有在本地生产。利用手动水泵排干船上积水是17世纪印度船长欣然接受的一项技术。但是没有在本地制造的证据。一些革新只是被看作稀罕物，虽然它们在欧洲已经得到广泛的实际应用。在欧洲，望远镜被正式用作航海的辅助工具和战争中的瞭望工具。[①] 样品曾赠送给各类印度权贵，但没有促成（它们的实际）使用或生产。欧洲的机械钟表在印度的欧洲人中间得到普遍使用，但遭到印度社会的忽视。[②]

288

关于火器的技术转让问题是复杂的。大炮的铸造和火绳枪的制造显然是一项日常事务，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技能和材料是可以通过许多渠道获得的。尽管很重要，但莫卧儿的历史和其他留存下来的文献都极少提及武器的技术方面。那些实际铸造大炮或制造火绳枪的军械士、铁匠和其他技工，都是默默无闻的。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没有什么与莫卧儿印度的火器生产和分配直接相关的资料。

一些革新得到了广泛采用和传播。牲畜拖曳的回旋炮成为莫卧儿人作战的一个普通特征。这是一些其炮身支架（stocks）经常长达2米以上、发射直径约10—12厘米弹丸的大炮。[③] 其他方面的发展则显得滞后，如在17世纪20年代的欧洲已得到广泛运用的燧发枪。在莫卧儿印度，这种装置的采用缓慢得多。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火绳枪或火绳钩枪是主导武器。[④] 使用和制造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17世纪的莫卧儿印度，手枪已为人所知，并被许多人使用，但它的制造在印度并不普遍。[⑤]

莫卧儿精英对改良武器显而易见的冷漠是引人瞩目的。官方对武器的兴趣至多是偶尔出现。照例，阿克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对努力改进火绳枪的质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特别收藏了一些火绳枪，还亲自测试它们的火力。阿克巴之后，人们只是偶尔谈及武器的技术方面。莫卧儿炮兵无疑远远胜过地区统治者、纳贡国或柴明达尔可能部署的任何一支炮兵。在次大陆内，莫卧儿炮兵与训练有素的重装骑兵的联合效应一直是决定性的。不过，

---

① Ibid., p. 35.

② Ibid., p. 66.

③ 幸存下来的样品可以在不同博物馆或城堡（如位于海得拉巴城外的戈尔康达城堡）物品展中看到。

④ Qaisar, *Indian Response*, p. 52.

⑤ Ibid., p. 54.

莫卧儿王朝很可能已经开始落后于17世纪其他同时代的强国。

289 莫卧儿皇帝和他的贵族们雇用操不同语言的欧洲士兵和冒险家作炮手。17世纪后半叶，欧洲炮手——他们经常是东印度公司船舰和要塞中的逃兵——几乎垄断了（莫卧儿军队的）炮手职位。借助这种权宜之计，莫卧儿印度的军事精英基本上放弃了改进大炮技术的一切责任。他们把这些事务留给一小群外国专家，而他们大多只是受过最初级的训练，而且经验十分有限。

到18世纪初年，莫卧儿印度在野战炮方面已经落后于欧洲。例如，在1701年，派往奥朗则布宫廷任英国大使的威廉·诺里斯（William Norris）最终见到了那位皇帝。当时，那位皇帝正忙于围攻戈尔哈布尔（Kolhapur）附近的潘哈拉。莫卧儿的炮兵统领如此看重诺里斯一行携带的12门轻型黄铜野战炮，以致这位英国大使在觐见时被迫将这些大炮献给皇帝。[①] 在这次围攻中，诺里斯还提供了6名炮手操作这些大炮。即使考虑到奥朗则布晚年时莫卧儿帝国的混乱，现代早期欧洲和印度之间在大炮方面的差距也在扩大。在这个世纪稍后的时期，马拉塔、迈索尔和莫卧儿的后继国家在它们同英国人的战争中做出了艰辛但大体成功的努力，以克服这方面的劣势。

或许，最令人困惑的文化差距表现在书写和识字的不同方式上。和现代早期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一样，莫卧儿印度没有采用活字印刷术。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在果阿经营着一家金属活字印刷厂。用各种南印度语言书写的宗教书籍都是用罗马化文字字体印刷的。[②] 阿克巴为他的图书馆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获得了大量印刷版的欧洲书籍。1606年，耶稣会士向贾汗吉尔展示了一本用阿拉伯文字印刷的《福音书》，以证明这是可能的。[③] 然而，尽管做了这种展示，无论是皇帝、知识分子，还是贵族，都

290 没有对印刷术表现出任何兴趣。考虑到帝国行政的运转需要极其大量的书面材料，这让人感到特别惊讶。只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机械印刷术才开始在孟加拉大规模采用。

莫卧儿文明比德川时期的日本外向得多。当然，莫卧儿皇帝和帝国精英

---

① H. H. Das, *The Norris Embassy to Aurangzib* （Calcutta, 1959）, pp. 293–294.

② Qaisar, *Indian Response*, p. 58.

③ Ibid., p. 60.

还是了解邻国和周边地区的。精英和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面的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奥斯曼王朝和萨法维王朝。用财富、胜利和荣耀来衡量其成功的莫卧儿皇帝们，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没有发现什么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倒退和衰落

只是在奥朗则布吞并了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苏丹国后，胜利和集中控制的前进势头才放缓和逆转。从1689年到法鲁克西亚尔统治结束的1719年的30年间，（莫卧儿）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走向衰退，并最终瓦解。一个习惯于永不停息的扩张和胜利的帝国，是无法适应损失和失败的。皇帝、王子和帝国的贵族们不仅不再信心十足和战无不胜，还开始苦于资源的减少、控制的丧失和混乱的加剧。奥朗则布僵硬而短视的政策（特别是在德干），未能对日益增长的危机作出回应。

在奥朗则布时期，帝国的政策恢复到印度穆斯林边疆扩张中的穷兵黩武。在奥朗则布时期，政治忠诚日益被看作宗派忠诚。只有穆斯林才能完全参与帖木儿帝国。在莫卧儿印度，宗教感情确实以复杂而意味深长的方式转化为政治响应。

高层的政策辩论——在这种体系中从未成为强项——是苍白而无效的。和同时代的奥斯曼人的做法不同，我们没有发现有过高等官员向皇帝呈送内容清晰的奏疏，以对奥朗则布德干战争的耗费提出质疑。当这类争论确实在大举围攻比贾布尔、戈尔康达和金吉期间发生时，各位王子在争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不幸的是，王子们作为皇室反对派的角色引起了奥朗则布对他们的忧虑和猜疑。反对（皇帝的政策）或自主与敌人媾和被视为叛逆。

在1707—1720年之间，中央集权的帝国结构土崩瓦解了。在这13年里发生了4次毁灭性的、残酷的继位战争。由娴熟的技术人员操控的官僚大厦失去了其效率和正直。那个官僚机构管理的两大核心体制——扎巴特税收体系和扎吉尔的分配——蜕化为讽刺画。税收体系不知不觉地沦为包税制，而那些很快被分配掉的扎吉尔变成了地方采邑。莫卧儿官吏施展伎俩

291

成功地使扎吉尔分配到他们的家乡所在地，并逾期把持着这些俸地。

这种突如其来的崩溃可能是“扎吉尔危机”不可避免的后果。所谓“扎吉尔危机”，就是曼萨卜达尔的薪俸需求和足以满足这些需求的纳税土地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这意味着农业社会、正规地税制和军事精英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陷入了危机？扎吉尔危机成了国家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和印度社会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不相匹配的症候？伊尔凡·哈比布就持有这种观点。

在他那本著名的1963年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哈比布认为官方的税收政策——在不断扩大的帝国支出的推动下——榨取了农民生产的全部剩余。随着时间的流逝，扎吉尔体系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推高税收需求。这种缺陷不会在名义税额（它大体上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增加）上反映出来，而会体现在个别扎吉尔达尔的行为上。后者占有他的土地不过三四年而已，之后就得转让出去，因而他们对这些土地的丰饶不会保持长期的兴趣。这样，每个扎吉尔达尔对货币的需求就会鼓励他“放纵任何可以给他带来即时利益的压迫行为，即使这毁掉了农民从而也永久摧毁了那个地区的纳税能力”。[①] 随着压迫的加重和农民由于无法生存而背井离乡，耕作就荒废了。作为对这种循环的回应，夹在扎吉尔达尔和农民之间的柴明达尔便率领他们的乡下依附者发动武装反叛。为了支持这个观点，哈比布援引了查特人和锡克人旷日持久的起义。最具毁灭性的柴明达尔起义是在德干的马拉塔人抵抗组织中爆发的。

这个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几乎影响了所有最近关于莫卧儿帝国的大众读物和最严肃的学术观点。近年来，批评之声骤起。对征服戈尔康达后帝国政策的审视表明，政策选择加深了扎吉尔危机。奥朗则布似乎曾经决定把戈尔康达和比贾布尔的许多肥沃土地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如此，在德干服役的扎吉尔达尔就被剥夺了通过征服和吞并获得新资源的途径。[②] 其他批评者指出，要确认压迫性的扎吉尔达尔、农民反抗和帝国衰落之间存在着联系是困难的。这个体系本身就包含了对弊端的制衡措施。一个可能的事实是，农业生产在增长，而不是在萎缩，农民并没有逃离土地，而是扩大了耕作面积。

292

---

① Irfan Habi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3）, p. 320.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讨论，参见：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让人难以接受的观念是，帝国体系本身要么窒息，要么迟滞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可事实恰恰相反。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着富足的集镇乡绅、殷实的农民和富有的商业和贸易社群。

正像萨提什·昌德拉指出的那样，大占有者对扎吉尔的转让可能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频繁，许多贵族占有他们的土地可能长达10年以上。“事实上，并不是频繁的转手，而是18世纪期间扎吉尔定期调换惯例的败坏使得扎吉尔变成了世袭财产，并进一步增强了柴明达尔这个阶级的力量。”[1] 简言之，扎吉尔危机尽管确实严重，却不是帝国衰落的核心因素。

北印度叛乱的发生，部分是因为在奥朗则布专注于德干的那些岁月里，那里的行政漫不经心和软弱无力。至少从一种观点来看，丰饶的扎吉尔土地的短缺可以归因于官方政策以及德干战争造成的毁灭和混乱。此后，由帝位之争引发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又迅速损害了非世袭的俸地制和正规的地税体制。

莫卧儿国家和社会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分裂，从而造成了长期的、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弱点？两条纽带对中央集权的莫卧儿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条纽带分别是连接贵族和皇帝的情感和利益纽带以及受自我利益驱使的、连接农村武士贵族和帝国的契约纽带。对贵族和柴明达尔来说，目标是相似的：从武装的武士贵族转变为可信赖的帝国职员。莫卧儿的扩张和动态成长，是每个集团缓慢却又稳步地社会化和转变的驱动力。但在边疆地区的退却、混乱和信心的丧失终止了这个过程。 293

在1689年和1720年期间，上述两条纽带都开始陷入严重的紧张状态。有时会酿成德里街头苦战的派系冲突，严重考验着贵族们的忠诚。贵族和曼萨卜达尔发现，同皇帝的个人联系随着派系斗争的推进而削弱。皇帝越来越不能为满足帝国的需要而调遣和控制埃米尔。贵族利用他们的家人、税收、军队及其职务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已知的生存需要——而不是为了博得皇宠和圣眷。在行省，赤胆忠肝的总督和迪万对规章和禁忌熟视无睹。为了生存，他们营造了地区性的权力和权威体系，这（在后来）演化为莫卧儿的后继国家。甚至像穆尔希德·库里·汗那样的十足的技术专家，也变成了孟加拉和

①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Delhi: Orient Longmans, 1982）, p. 73.

奥里萨的一个地区统治者，尽管他明显忠于莫卧儿皇帝。

就两个主要的印度教贵族集团而言，这些问题是最严峻的。事实证明，奥朗则布未能修补他与拉杰普特人的关系。拉贾斯坦内的长期趋势，如大拉杰普特贵族世家稳步集中的权威和权力，可能已经需要扭转拉杰普特和帖木儿之间的关系。自1679年拉杰普特战争以来，莫卧儿帝国就一直苦于莫卧儿贵族集团中这个重要部分日益增长的离心力。奥朗则布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未能在统治者和拉杰普特埃米尔之间恢复起一种友爱、信任和依赖的关系。在抚慰和再次招安方面采取的那些做法，事实证明都是些三心二意的尝试，因而都失败了。

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是帖木儿王朝未能招安德干西部的马拉塔统治者和将领，让他们成为帝国治理的完全参与者。赢得马拉塔人效忠的关键机会失掉了。那些接受了帝国曼萨卜的马拉塔人大多被任命为德干地区的军队将领，而没有被派往帝国其他地方任职。在东方，除了一两个不幸的例外，没有什么泰卢固贵族被晋封为贵族和军事将领。这个政权对马拉塔人的专注阻止了任何一种把这个人数众多而且才能出众的武士集团融入帝国精英中去的努力。

294

后期帖木儿政权未能成功地把武装的柴明达尔转化为解除武装后愿意忠实执行帝国政策的准官吏。相反，到18世纪的20年代，由柴明达尔发动的暴力抵抗广泛分布于德干和北印度的各个地区。锡克人、比亚斯的拉杰普特人和查特人的抵抗活动，只是泛滥于乡村地区暴乱的3个实例而已。在扎巴特体系下，那种始于阿克巴时代的对乡村地区密不透风的乡级结构的干预，在德干战争期间已变得摇摇欲坠。在整个北印度，成千上万的柴明达尔发现同莫卧儿皇帝订立的契约（萨纳德）已日益贬值。在乡村地区，这个政权正日益不能保障柴明达尔的权利和强制柴明达尔履行义务。

在南方，莫卧儿王朝未能重组德干西部的农业体系。莫卧儿对艾哈迈德讷格尔、康德什和比贾布尔长达数十年的征讨和外交压力，削弱了德干西部的穆斯林苏丹国的权威结构，使它们不能保持乡村地区马拉塔人德什穆克及其他土地占有者的职守和忠诚。对许多而非全部马拉塔柴明达尔来说，融入正在形成的朋斯拉结构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在戈尔康达苏丹国统治下的德干东部，这个国家在乡村地区维持了对泰卢固贵族素有的权威。在被征服

后，泰卢固纳亚克并没有加入马拉塔人的叛乱，而是在新政权下保持了相对的安定。

由柴明达尔和农民发动的针对帖木儿政权的广泛的暴力抵抗，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种对帝国权力削弱的预期反应。由于受到莫卧儿赋税的沉重压迫，地方柴明达尔和农民一有机会就会加入抵制中央集权政府征敛的运动。这种分析的困难在于，从16世纪80年代阿克巴改革到1700年左右的长期趋势表明，尽管可以确定在一些个别时期存在着野蛮的压迫，但大多数柴明达尔和农民是繁荣富足的。除了遭受战争蹂躏的德干地区那样的例外，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看来是经历了增长，而耕地面积也稳步扩大了。农业增长是对国家税收驱动的市场扩大和新的出口市场带来的需求冲动的直接反应。集镇（卡斯巴）和较大村庄构成的网络变得更加密集。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是日益富有的商人和货币借贷者，如旁遮普的卡特利人。

29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政权合作可以带来实际的红利。国家通过与柴明达尔和精英型农民（常被称为“村柴明达尔”）的契约关系为安全和稳定提供了保证。一个买卖和租赁柴明达尔权利的市场形成了。结果，和平的财富积累开始取代从前致力于微型地方战争的武士/农民世族的入侵、殖民和定居。柴明达尔权利的买卖文契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正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帖木儿政权成功地干预了地方权力的安排和分配。

那么，为什么在莫卧儿王朝晚期会发生这些反叛呢？一个答案是帖木儿农业体系的巨大成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重要变迁。这些变迁需要但没有得到这个政权的承认和调节。在沙・贾汗和奥朗则布时期，许多穆斯林乌里玛及其依附者获得了免税赠地。皇家的庇护提供了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下，赠地的收受人居住在集镇或较大的村庄中。免税土地以及经常参加这些集镇上的贸易活动所带来的收益，让一个初生的穆斯林乡绅阶级繁荣起来。除了免税土地，他们还免交吉齐亚（人头税）。如果穆斯林甚或是印度教徒贸易集团在这些基础上乘机获取柴明达尔的权利，他们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同柴明达尔的利益发生冲突。例如，目前有证据（尽管还不充分）显示，穆斯林乡绅阶层和查特农民中的同一阶层在锡克人起义中就出现了实实在在的罅隙。

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把更多的财富置于柴明达尔和农民的支配之下。许多成功的地方世族，如比亚斯的拉杰普特人，随着人数的增

长，希望扩大他们的地盘。如果莫卧儿的农业体制继续强大和富有活力，这些集团本来能够利用他们的利润购买或租赁对更多毗邻土地的权利。这样的扩张本会成为这些武士世族非军事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像奥朗则布晚期那样松弛下来，富足的柴明达尔就能依靠增多的资源——钱和人——以惯常的暴力方法去兼并新的土地。由于拥有充足的资财，他们还能够从地方军事劳动力市场上招募到非亲属人员为他们效命。对这类武士精英来说，通过购买扩充（财富）面临的限制大概本就令人厌烦，而大人物们的暴力策略则更受青睐。

296

到此为止尚未考察的是在多大程度上，地方柴明达尔已经缓慢获得了对帝国军队的军事优势。改良火绳枪的日益流行及其使用上的日益娴熟，应有利于主要依靠步兵的柴明达尔。装备更良、人数更多和训练更好的火枪手或许已能同帝国重装骑兵一较高下。当然，莫卧儿王朝本身也在日益从东印度斯坦〔伯格萨尔人（Buxaris）地区〕和次大陆其他地区招募职业的专门火枪手连队为其服役。[1] 如果地方精英能够利用他们的财政力量雇佣大量精干的火枪手，他们就能够减少自己与莫卧儿连队的战术差距。

莫卧儿王朝对印度农村社会的干预尽管最初是高效的，但在一个关键时期却变得犹豫不决。如果农业体系能一直保持完整无缺，它的效果本将是促使地方武士贵族的中坚缓慢地非军事化。[2] 否则，其长期效果将是提高柴明达尔的自信和财富，鼓励同更显赫的乡绅和贸易集团的冲突。或许，这个帝国还没有通权达变到能够应付它的新秩序本身催生出来的社会变迁。帖木儿人未能使柴明达尔融入莫卧儿帝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他们也没有强使这些好斗的乡下武士集团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的资源和意志。只有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他们正在建设一个迅速现代化的殖民国家——能够在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军事战斗后达到了那个目标。

当这个帝国开始衰落时，次大陆经济衰落的迹象是明显的。德干地区

---

① Dirk H. A. Kolff, *Naukar, Rajput and Sepo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9–176. 〔在莫卧儿时代，位于恒河岸边的婆罗门教朝圣中心——伯格萨尔(Buxar/Baksar)迅速取代瓜廖尔和奥尔恰等拉杰普特人据点成为东印度斯坦(Eastern Hindustan)地区雇佣兵征募的中心。从这里征募的职业火绳枪兵被称为“伯格萨尔人” (Baksariyas/Buxaris)。直到18世纪末，这个名称几乎就是印度斯坦火绳枪兵的代名词。——译者按〕

②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1956. 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在一项比较性评价中表达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

肆无忌惮的掠夺和抢劫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混乱，的确抑制了经济活动。不过，在许多地区，经济仍在稳步增长。18世纪早期帝国结构的破碎未必能够造成地区间帝国经济的完全解体。相反，那些已经显现的变迁力量对新刺激做出了反应，而增长也还在继续。 297

到穆罕默德·沙统治的第一个10年，金钱、信息、命令和人员不再在皇帝的控制下从首都流动到行省，又从一个行省流动到另一个行省。1720年之后，从前中央集权的帝国继续存在，只不过已变成了一个由地区王国构成的松散聚合体。这些地区王国的统治者尽管自称帝国总督，却仅向德里的莫卧儿皇帝缴纳象征性的贡赋，提供象征性的职役。而总部设在浦那（Poona）的马拉塔王朝则正在组建一个对抗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比莫卧儿帝国更少僵化、更加灵活。帖木儿政权的象征和光环继续让18世纪僵化的印度人和欧洲人政客和将军们着迷。但莫卧儿帝国从前的宏大结构却迅速蜕变到仅剩下一具空壳。

298

术语表

abisheka　阿比舍卡	婆罗门为印度教统治者举行的加冕仪式
ahadis　阿哈迪	归莫卧儿皇帝直接调遣的高等骑兵中的精锐部队，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禁军或御林军
amil　阿米尔	负责收税的吏员
amin　阿明	主管收税的税务官
amir　埃米尔	拥有高等身份和爵位的莫卧儿官员，贵族
anna　安那	货币单位，一卢比的十六分之一
bakhshi　巴克什	部队主计官，兼司监督军队和收集情报
bankatai　班卡塔伊	清除森林后形成的移民区
banjara　班贾拉	利用数千驮牛运输食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巡回商人
bek　比克	一个中亚即突厥语词，指拥有高等身份和爵位的人
bhaibamdh　巴伊巴姆德	声称拥有六代以上共同世系的拉杰普特人父系氏族
bhakti　巴克提	以诗歌圣人及其追随者为中心的大众崇拜型印度教
bhumiya　布米亚	地主武士，拉杰普特族塔库尔（酋长）的势力较小的扈从
bigah　比加	由帝国法令规定的标准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3/5英亩
chabutra　查布特拉	矗立在城市广场上的高台，用于公开处决和惩罚犯人

chaudhuri 乔杜里	北印度的准官吏，帝国政府承认其为某一乡的头人
chauth 乔特	在印度西部，由柴明达尔、后来由马拉塔王朝按惯例征收的田赋的1/4份额
chhatrapati 查特拉帕提	梵语词，指征服世界的统治者
dagh 达格	在符合帝国标准的马匹侧腹上所打的独特烙印
dam 达姆	莫卧儿帝国的铜币，价值1/40卢比
Dar-al Islam 达拉尔-伊斯拉姆	正确施行伊斯兰教规和惯例的居所或地区
Dar-al Jihad 达拉尔-吉哈德	战乱之地或无信仰者居住的地区
darshan 达善	对某位神祇的个人崇拜
deshmukh 德什穆克	德干地区的一种准官吏，帝国政府承认其为某一乡的头人
dharma 达摩	在印度教社会秩序中，对不同种姓规定的不同的权利义务
dhimmis 迪米	那些由伊斯兰统治者作为具有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依附社群对待的非穆斯林民族
din 迪恩	宗教
diwan 迪万	莫卧儿政府内的财政或税务官
diwan-i khalisa 卡里萨迪万	管理所有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土地和纳税单位的官员
diwan-i kul 库尔迪万	也称“瓦兹尔”，即首席帝国财政大臣
diwan-i tan 塔恩迪万	掌管曼萨卜达尔薪俸和津贴的莫卧儿大臣
doab 河间地	位于两条河流之间的土地
durbar 杜尔巴	由一位官员或统治者举行的朝会
farman 法曼	莫卧儿皇帝用他的个人御玺签发的正式的书面命令，相当于中文的“圣旨”
fath nama 法特-纳玛	穆斯林统治者发表的胜利宣示
fatwa 法特瓦	穆斯林法学家（即穆夫提）应请对法律问题发表的公开裁决，本书意译为“法论”
faujdar 法乌吉达尔	在某一特定地区被授予军事和行政职责的莫卧儿武官，本书意译为“督军”

299

gaddi　咖蒂　印地语词，指统治者坐的垫子
ganj　甘吉　谷物市场
gaz　加兹　帝国长度单位，大致相当于1米
ghat　加特　字面意思是“台阶”，用来指河边的沐浴台阶
ghazi　噶兹　为伊斯兰信仰作战的武士，本书意译为“圣战士”
ghurab　古拉巴　在河流港汊中使用的平底炮舰
gulalbar　古拉尔巴尔　莫卧儿皇帝在军营中用帷幕隔开的生活区和后宫
gusulkhana　古苏尔卡纳　莫卧儿皇帝的私人浴室，用来秘密会见高级官员
hammam　哈马姆　公共浴室
haveli　哈维里　环绕贵族府邸的街区或城市区域
hun　胡恩　在德干和南印度流通的一种金币
iqta　伊克塔　由贵族或别的官员以中世纪印度—穆斯林统治者名义统治的行省或其他区域
jagirdar　扎吉尔达尔　作为薪俸配给的纳税土地（即扎吉尔）的占有者
300 jagir　扎吉尔　由莫卧儿皇帝授予的从指定村庄、乡或大区征收田赋的临时财政权利
jama　扎马　总税收或应付税额
jan　贯恩　生命或精神
jauhar　焦哈尔　战败的拉杰普特武士在最后的仪式中杀死女眷和女仆，然后在战斗中自杀
jihad　吉哈德　在同异教徒的冲突中为伊斯兰信仰而战，“圣战”
jirga　基尔加　阿富汗人的部落大会
jiziya　吉齐亚　伊斯兰统治者每年对受保护的非穆斯林社群征收的赋税
karuri　卡鲁里　阿克巴时期的税务官
khalifa　哈里发　“卡利夫”（caliph），先知穆罕默德的世俗继承者，负责领导整个伊斯兰世界
khalisa　卡里萨　直接向皇帝和中央财库纳税的土地或其他单位
khan　可汗　突厥人和中亚人对酋长或贵族的尊称
khanazad　哈纳扎德　“宗室子弟”，自诩世代为莫卧儿皇帝效命的官员

术语	释义
khap 卡帕	扩大的父系查特部族
khud-kasht zamindar 库德-卡什特柴明达尔	仅在村庄内占支配地位的次等柴明达尔
khutba 库特巴	在每周五举行的聚礼上承认王国合法统治者的祈祷仪式
kotwal 科特瓦尔	城市治安官
langarkhana 兰加尔卡纳	锡克人的慈善食堂，所有来人都可在那里就餐
lungi 纶吉	用作男人腰带的棉布
madad-i mash 马什马达德	施舍给宗教界或其他知名人士的免税土地
madrasa 马德拉萨	教授伊斯兰法学、神学、哲学和类似科目的学校或神学院
mahajan 马哈詹	从事谷物和其他商品贸易的商人
mahdi 马赫迪	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将作为伊斯兰教救世主（马赫迪）重返人间的穆斯林信仰
mal 马尔	财产和货物
mal 马尔	表示得自土地税的财政收入的术语
mal-wajib zamindar 马尔-瓦吉布柴明达尔	为莫卧儿王朝征收指定税赋的土地占有者。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有免税土地和提取一定百分比的税收
man 曼恩	帝国重量单位
mansab 曼萨卜	用数值化爵位和头衔表示出来的爵位、身份和官职 301
mansabdari 曼萨卜达利	同曼萨卜达尔有关的
mansabdar 曼萨卜达尔	拥有莫卧儿皇帝赏赐的特定数值化爵位和头衔的官员
maths 马特	收容印度教僧团的中心或馆舍
mir bakhshi 米尔-巴克什	直接向皇帝汇报和掌管军饷、监军、招募兵员和信息情报的高级官员
mir saman 米尔-萨曼	掌管皇室、宫殿、财库、铸币厂和皇家修建工程的官员
mohulla 摩胡拉	城镇街区或邻里
muchalka 姆查尔卡	为保证履行好义务而订立的誓约

mufti 穆夫提	对法律问题发表公开意见的穆斯林法学家
muhr 姆尔	莫卧儿金币
muhtasib 穆塔希布	受命施行伊斯兰教法和管制市场和商业的伊斯兰官吏
mujtahid 穆吉塔希德	伊斯兰教法的解释者
murid 穆里德	宣誓为苏菲派大师或莫卧儿皇帝献身的门徒
namus 纳姆斯	武士的荣誉
nankar 南卡尔	柴明达尔凭借他们的服务获得的那部分税收
nayak 纳亚克	南印度的地方国王或酋长
padshah 帕德沙	波斯语词，意思是皇帝或大王
pahi 帕希	拉贾斯坦的佃农
paibaqi 派巴齐	暂时由卡里萨迪万管理的未分配的扎吉尔土地
paisa 派萨	苏尔王朝的铜币
pargana 帕尔加纳	农村地区具有特定名称和边界的小行政区，包括10—100多个村庄和一个以上较大的镇，文中有时译为“乡里”
pir 毕尔	苏菲派圣人或大师
pishkash 皮什卡什	以货币或物品形式进献给上级的贡品
qanungo 加农戈	在北印度，被帝国政府认定为某一乡或县的税收记录保管员的准官吏
qasba 卡斯巴	镇，经常指农村地区的集镇
qazi 加齐	负责实施伊斯兰神法和负有众多民事职责的法官
rahdar 拉达尔	负责维护道路安全的军官，本书意译为“驿吏”
raiyati 莱雅提	农民占有的，非柴明达尔的
raiyat 莱雅特	莫卧儿人对农民或农村臣民的称呼
302 reale 里亚尔	在新世界铸造的西班牙银币
revenue grants 税俸	用于代替薪俸和津贴的税收
sabat 萨巴特	隐蔽的通道，经常是堑壕，用于接近和进攻围困的城堡
sadr 萨德尔	为莫卧儿皇帝掌管宗教资助事务的穆斯林头人
sakti 萨克提	对印度教中毁灭女神卡莉（Kali）或黛维（Devi）力量的崇拜，通常意译为“性力派”

sanad 萨纳德	赐予官职或特权的书面文件或命令
sarai 萨莱	为方便旅客而设立的公共旅舍
sardeshmukh 萨尔德什穆克	某一行省或地区中德什穆克的首领，可意译为“大德什穆克”
sardeshmukhi 萨尔德什穆克伊	分配给大德什穆克或某一地区的10%税收份额
sarkar 萨卡尔	介于乡和行省之间的特定疆域和行政单位，本书正文中意译为“大县”
sarrafs 萨拉夫	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货币兑换商和提供短期商业信贷的承办商
shaikh（s） 谢赫	苏菲派教团或济贫院的教长或院长
shast-wa shabah 沙斯特瓦–沙巴	帝国印章和小人像
sijdah 斯吉达	苏菲派教徒在他们的教长面前施行的极端的匍匐跪拜仪式，阿克巴修改后把它作为朝觐礼
sikka 锡卡	溢价流通的新铸硬币
suwar 苏瓦尔	数字爵位，其中的数值表示每位莫卧儿军官应召时须带领的武装重骑兵的数量
swaraj 斯瓦拉吉	指最初西瓦吉统治下的马拉塔人故土
taluqdar 塔鲁克达尔	从其柴明达尔同行中收取田赋的柴明达尔，这种柴明达尔可由此从帝国财政部门获得佣金
tariqa 塔里卡	所有苏菲派教徒和其他神秘主义者在探求上帝时遵循的神秘道路
thakur 塔库尔	表示“主人”或“领主”的北印度语词，为拉杰普特人和查特种姓的人普遍使用
thana 塔纳	设防的军事前沿哨卡
thanadar 塔纳达尔	军队边境哨卡的守将
tika 缇卡	涂在拉杰普特统治者前额的朱红色标记
ulema 乌里玛	精通“沙利亚”（Sharia）即伊斯兰教法和较高深的伊斯兰主题的人
urs 乌尔斯	某位受尊敬的圣人的逝世纪念日
vakil 瓦吉尔	阿克巴早期的副首相或助理首相
waqf 瓦克夫	穆斯林为宗教和慈善目的设立的信托财产

303

watan 瓦坦	马拉塔酋长或武士家族占有的世袭土地
watan jagir 世袭扎吉尔	以扎吉尔名义分封给拉杰普特裔莫卧儿官员的世袭占有地
wazir 瓦兹尔	莫卧儿皇帝的首席财政大臣
zabt 扎巴特	莫卧儿王朝时期评估和征收地税的一种成熟体系
zakat 扎卡特	为慈善目的每年向穆斯林财产强制征收的赋税
zamindars 柴明达尔	直接控制农民的地主或土地占有者
zat 扎特	莫卧儿官员领有的个人数字化爵位

文献述评

通史类

《牛津印度史》[1] 对莫卧儿王朝的简要叙述有助于快速浏览印度历史。R. C. 马宗达主编的《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莫卧儿帝国》[2] 尽管详尽，却具有明显的反穆斯林倾向。比较通俗易懂且配有丰富插图的是班伯·盖斯科恩的《大莫卧儿王朝》[3] 。另一本很受欢迎的记述是瓦尔德玛·汉森的《孔雀宝座》[4] 。许多地区或行省的历史涵盖了整个莫卧儿时期。在这类著作中，就包括了贾杜纳特·萨卡尔主编的《孟加拉史：穆斯林时期（1200—1757年）》[5] 和B. C. 雷撰写的《莫卧儿时期的奥里萨》[6] 。

巴布尔、胡马雍和舍尔·沙

巴布尔自己的回忆录可以在A. S. 贝弗里奇翻译的英文本《巴布尔自传》[7] 中看到。斯蒂芬·戴尔在《草原人道主义：扎希尔·阿尔-丁·穆罕

①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3rd edition, 1958).

② R. C. Majumdar e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The Mughul Empire.*

③ Bamber Gascoigne, *The Great Moghuls* (London, 1971).

④ Waldemar Hansen, *The Peacock Throne* (New York, 1972).

⑤ Jadunath Sarkar, ed., *History of Bengal: Muslim Period 1200–1757* (Patna, 1973).

⑥ B. C. Ray, *Orissa Under the Mughals* (Calcutta, 1981).

⑦ Babur, *Babur-Nama,* translated by A. S. Beveridge (New Delhi, reprint edition, 1970).

默德·巴布尔（1483—1530）自传》[①] 一文（载《中东研究国际杂志》）中讨论了这部回忆录的浓烈的个人色彩。最近的一本完整传记是摩西布尔·哈桑的《巴布尔：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②] 。现在依然缺少一本把巴布尔置于中亚和北印度两个世界背景下来考察的一流研究著作。伊什瓦里·普拉萨德的《胡马雍的生平和时代》[③] 一书涵盖了胡马雍的统治时期。古尔巴丹·贝加姆在她的回忆录《胡马雍史记》[④] 中从一个贵妇的视角审视了莫卧儿王朝和印度。托马斯·伦茨和格伦·洛利在《帖木儿和王公视野》[⑤] 一书中认为帖木儿及其后嗣提炼出了一种前后一致的美学，以强化和支持政治统治。

伊克提达尔·阿拉姆·汗为胡马雍的兄弟写的传记《米尔扎·卡姆兰》[⑥] 也是有用的。对苏尔王朝所作的最好描述之一是I. H. 希迪奇的《舍尔·沙·苏尔史记》和同一作者的《阿富汗人在印度的专制主义》。[⑦]

阿克巴

关于这一时期的官方史书是阿布尔·法兹尔所著《阿克巴本纪》[⑧]，由贝弗里奇译为英文。经常引用的是作为其附录的帝国手册《阿克巴政典》[⑨]，由贝弗里奇译为英文。对阿克巴持反感态度的阿卜杜尔·卡迪尔·拜达欧尼所著《印度史》[⑩] 具有明显的非官方色彩。A. 孟瑟拉特著《对他的阿克巴宫廷游历……评论》（由J. S. 霍依兰译为英文）[⑪] 是一部内容丰富

305

① Stephen Dale, "Steppe Humanism: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Zahir al-Din Muhammad Babur, 1483-15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2 (1990), 37-38.

② Mohibbule Hasan, *Babur, Founder of the Mughal Empire in India* (Delhi, 1985).

③ Ishwari Pras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Humayun* (Calcutta, 1955).

④ Gulbadan Begam, *The History of Humayun*, translated by A. Beveridge (London, 1902).

⑤ Thomas W. Lentz and Glenn D. Lowry,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Los Angeles, 1989).

⑥ Iqtidar Alam Khan, *Mirza Kamran* (Bombay, 1964).

⑦ I. H. Siddiqi, *History of Sher Shah Sur* (Aligarh, 1971); *Afghan Despotism in India* (Aligarh, 1969).

⑧ Abul Fazl, *Akbar-Nama, translated by Beveridge* (Delhi, 3 vols., reprint 1977).

⑨ Abul Fazl, *Ain-i Akbari,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Lahore, reprint 1975).

⑩ Abdul Qadir Badauni, *Muntahkhabu-t Tawarikh* (Calcutta, 3 vols., 1864–9).

⑪ A. Monserrate, *Commentary ... on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Akbar*, translated by J. S. Hoyland (London, 1922).

的访客游记。道格拉斯・斯特卢森德在《莫卧儿帝国的形成》[①]一书中通过富有挑战性的综合，对阿克巴时期莫卧儿政治制度的演进提出了新的解释。K. A. 尼扎米的《阿克巴和宗教》[②]有着系统的分析。N. A. 希迪奇《莫卧儿时期的地税管理：1700—1750年》[③]一书分析了北印度税收体系的衰败。

帝国政府、军事和外交

关于行政、政治和经济地理，可参考伊尔凡・哈比布所著《莫卧儿帝国地图集》[④]。作为一部天才的著作，这部地图集包含了各个行省的详尽的政治和经济地图。要广泛地了解税收体系和帝国制度，伊尔凡・哈比布的《莫卧儿印度的农业体系》[⑤]一书是不可或缺的。I. H. 库里希的《莫卧儿帝国的性质》[⑥]一书清晰而简洁。关于莫卧儿贵族的内容最丰富的论述是M. 阿萨尔・阿里的《奥朗则布时期的莫卧儿贵族》[⑦]，还可以参考阿萨尔・阿里著《帝国的机构》[⑧]一书。这本书完整列举了1658年以前的各个贵族。H. 贝弗里奇和B. 普拉萨德共同翻译了沙・纳瓦兹・汗编撰的《将帅传》[⑨]，这是一本关于莫卧儿贵族的大型传记辞典。关于行省行政，参看S. N. 辛哈著《大莫卧儿皇帝治下的安拉阿巴德省》[⑩]和B. C. 雷著《莫卧儿时期的奥里萨》[⑪]。S. P. 古普塔在《拉贾斯坦东部的农业体系（约1650—1750年）》[⑫]中所作的出色研究基于对该地区大量档案资料的分析。还可参看S. A. A. 里兹维著《阿克巴时期穆斯林的宗教和思想史》[⑬]，J. F. 理查兹的《阿克巴和贾汗

---

① Douglas E. Streu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 1989).

② K. A. Nizami, *Akbar and Religion* (Delhi, 1989).

③ N. A. Siddiqi, *Land Revenue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Mughals 1700–1750* (Aligarh, 1970).

④ Irfan Habib, *An Atlas of the Mughal Empire* (Delhi, 1982).

⑤ Irfan Habi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London, 1963).

⑥ I. H. Qureshi,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ughul Empire* (Karachi, 1966).

⑦ M. Athar Ali, *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angzeb* (Aligarh, 1966).

⑧ Athar Ali, *The Apparatus of Empire* (Delhi, 1985).

⑨ Shah Nawaz Khan, *The Maathir - ul - Umara, translated by H. Beveridge and B. Prasad* (New Delhi, 2 vols., reprint edition 1979).

⑩ S. N. Sinha, *Subah of Allahabad Under the Great Mughals* (Delhi, 1974).

⑪ B. C. Ray, *Orissa Under the Mughals* (Calcutta, 1981).

⑫ S. P. Gupta, *The Agrarian System of Eastern Rajasthan* (c. 1650 to c. 1750) (Delhi, 1986).

⑬ S. A. A. Rizvi,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Muslims in Akbar' s Reign* (New Delhi, 1975).

吉尔时期帝国权威的型式》[①] 一文（载J. F. 理查兹主编《南亚的王制和权威》）也有助益。希林·穆斯卫深入分析了《阿克巴政典》[②] 中的数据资料和《1595年左右莫卧儿帝国的经济》[③] 中的辅助资料。艾伦·斯马特在一篇重要文章《阿克巴：文盲天才》[④] 一文（载《艺术巡礼》）中讨论了阿克巴不识字的问题。

贾汗吉尔

对贾汗吉尔新的批评性研究是极其需要的。贝尼·普拉萨德的权威性传记《贾汗吉尔史》[⑤] 已经过时了。贾汗吉尔自己的记述可以在A. 罗杰斯和H. 贝弗里奇译为英文的《贾汗吉尔自传》[⑥] 中看到。印度裔穆斯林“君王宝鉴”文献中的一个典范是萨吉达·阿尔韦的《统治艺术宝鉴》[⑦]，里面有贾汗吉尔时期写就的一篇论文的原文和译文。一部由一位出奇坦荡的莫卧儿贵族所作的自传是米尔扎·内森的《隐者春秋》[⑧]（由M. I. 波拉哈译为英文）。在W. 福斯特主编《托马斯·罗爵士印度出使记：1615—1619年》[⑨] 一书中，托马斯·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敏的外国人对贾汗吉尔及其宫廷的看法。

306

沙·贾汗

这一时期的权威历史是巴纳斯·普拉萨德·萨克瑟纳所著《德里之沙·贾汗史》[⑩]，不过早就过时了。沙·贾汗时期的众多官方编年史还没有

---

① J. F. Richards, “The Formul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in J. F. Richards, ed., *Kingship and Authority in South Asia* (Madison, 1978).

② Shireen Moosvi, *Ain-i Akbari.*

③ *The Economy of the Mughal Empire c. 1595* (Delhi, 1987).

④ Ellen Smart, “Akbar, Illiterate Genius,” *Kaladarshana* (1981), pp. 99–107.

⑤ Beni Prasad, *History of Jahangir* (London, 1922).

⑥ Jahangir, *The Tuzuk - i Jahangiri,* translated by A. Rogers and H. Beveridge (Delhi, 2nd edn., 2 vols. in one, 1968).

⑦ Sajida Alvi, *Advice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 (Albany, 1989).

⑧ Mirza Nathan, *Baharistan-i Ghaybi*, translated by M. I. Borah (Gauhati, 2 vols., 1936).

⑨ Thomas Roe, *The Embassy of Sir Thomas Roe to India 1615–1619*, ed. by W. Foster (London, rev. edn, 1926).

⑩ Banarsi Prasad Saksena, *History of Shah Jahan of Delhi* (Allahabad, reprint of 1932 edition, 1973).

译为英文，不过W. E. 贝格利和Z. A. 德赛主编的《伊纳亚特・汗之沙・贾汗本纪》[①]翻译出版了那些史书的节略本。较好的游记包括塞巴斯蒂安・曼里克的《托钵僧萨巴斯蒂安・曼里克旅行记：1629—1643年》[②]和彼得・芒迪的《游记》的第2卷《亚洲游记：1630—1634年》[③]。

奥朗则布

奥朗则布的权威传记是贾杜纳特・萨卡尔的《奥朗则布史》[④]。这依旧是我们拥有的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政治和军事记述。S. 莫伊努尔・哈克的《卡菲・汗之阿拉姆吉尔史》[⑤]把这部关于奥朗则布时期的最好历史记述译成了英文。贾杜纳特・萨卡尔已经译出了萨奇・穆斯塔伊德・汗的《阿拉姆吉里记》[⑥]。这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比较简要而官方的历史著述。S. C. 杜塔的《东北地区和莫卧儿王朝（1661—1714年）》[⑦]一书对这个被忽视的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历史作了不偏不倚的论述。还可以参看高塔姆・巴德拉的《莫卧儿印度的两次边疆叛乱》[⑧]一文（载拉纳吉特・古哈主编《庶民研究Ⅱ：南亚历史和社会文集》）。行省研究包括安贾里・查特吉的《1658—1707年奥朗则布治下的孟加拉》[⑨]和J. F. 理查兹著《戈尔康达的莫卧儿政府》[⑩]。萨提什・昌德拉的《中世纪印度、社会、扎吉尔达尔危机和村庄》[⑪]一书收集了一组颇有分量的论文，触及到了帝国晚期历史的重大主题和问题。

奥朗则布统治的半个世纪由旅居和定居印度的欧洲人做了大量描述。由当事人撰写的一部关于奥朗则布半个世纪（统治）的引人入胜和一般说来

① W. E. Begley and Z. A. Desai eds., *The Shah Jahan Nama of 'Inayat Khan* (Delhi, 1990).

② Sebastian Manrique, *Travels of Fray Sebastian Manrique 1629–1643* (Cambridge, 1927).

③ Peter Mundy, *Travels*, Vol. 2: *Travels in Asia, 1630–1634*, ed. R. C. Temple (London, 1914).

④ Jadunath Sarkar, *History of Aurangzib* (Calcutta, 5 vols., 1912–24).

⑤ S. Moinul Haq, *Khafi Khan's History of Alamgir* (Karachi, 1975).

⑥ Saqi Mustaid Khan, *Maasir - i Alamgiri*, translated by Jadunath Sarkar (Calcutta, 1947).

⑦ S. C. Dutta, *The Northeast and the Mughals* (1661–1714) (New Delhi, 1984).

⑧ Gautam Bhadra, "Two Frontier Uprisings in Mughal India" in 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I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Delhi, 1983).

⑨ Anjali Chatterjee, *Bengal in the Reign of Aurangzib 1658–1707* (Calcutta, 1967).

⑩ J. F. Richards, *Mughal Administration in Golconda* (Oxford, 1975).

⑪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Society, the Jagirdari Crisis and the Village* (Delhi, 1981).

真实可靠的历史，是N. 马努西的《蒙兀儿或莫卧儿印度实录》[①]，该书由威廉·欧文译为英文。这方面最好的欧洲人记述是弗朗索瓦·伯尼尔的《蒙兀儿帝国旅行记：1656—1668年》[②]，该书由A. 康斯特布尔译为英文。H. H. 达斯的《诺里斯出使奥朗则布记》[③]广泛概述和引用了世纪之交英国驻莫卧儿朝廷大使所作的日志。贾格迪什·萨卡尔的《米尔·朱姆拉生平》[④]详细描述了米尔·朱姆拉惹人注目的仕途。

307

从巴哈杜尔·沙到穆罕默德·沙

最好的记述还是威廉·欧文的《晚期莫卧儿王朝》[⑤]。阿卜杜尔·卡里姆著《穆尔希德·库里·汗和他的时代》[⑥]一书对这一时期的孟加拉做了论述。萨提什·昌德拉的《1707—1740年莫卧儿朝廷中的党派和政治》[⑦]分析了中央的政治。穆扎法尔·阿拉姆在《莫卧儿治下北印度的帝国危机》[⑧]一书中对这一时期帝国的衰落作了一个出色而深刻的讨论。这方面，还可参看穆扎法尔·阿拉姆的《18世纪早期"危机"中的印度东部：来自比哈尔的一些证据》[⑨]一文（载《印度经济和社会史评论》）。

德克·科尔夫的《纳乌卡、拉杰普特和印度兵：1450—1850年间印度斯坦军事劳动力市场的人种史》[⑩]一书是分析莫卧儿军事体系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的一种。关于莫卧儿军事活动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察，参看贾格迪

---

① N. Manucci, *Storia do Mogor or Mogul India*, translated by William Irvine (Calcutta, 4 vols., 1907–8).

② Francois Bernier, *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AD 1656–1668*, translated by A. Constable (Delhi, reprint of rev. 2nd. edn., 1968).

③ H. H. Das, *The Norris Embassy to Aurangzib* (Calcutta, 1959).

④ Jagdish Sarkar, *The Life of Mir Jumla* (New Delhi, 2nd rev. edn., 1979).

⑤ William Irvine, *Later Mughals* (New Delhi, 2 vol. in one, reprint edition, 1971).

⑥ Abdul Karim, *Murshid Quli Khan and His Times* (Dacca, 1963).

⑦ Satish Chandra, *Parties and Politics at the Mughal Court, 1707–1740* (New Delhi, 2nd. Edn., 1972).

⑧ Muzaffar Alam, *The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 (Delhi, 1986).

⑨ Muzaffar Alam, "Eastern India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Crisis': Some Evidence from Bidar" in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8 (1991), 43–72.

⑩ Dirk H. A. Kolff, *Naukar, Rajput and Sepoy: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Military Labour Market in Hindustan, 1450–1850* (Cambridge, 1990).

什·萨卡尔著《一名17世纪印度将军的军事通信集》①。

莫卧儿帝国同其他两个现代早期伊斯兰大国之间的关系颇有趣味。最近，我们有了N. R. 法鲁基在《莫卧儿和奥斯曼的关系》② 一书和利阿祖尔·伊斯拉姆在《印度和波斯的关系：一项关于莫卧儿帝国和伊朗政治和外交关系的研究》③ 一书中所作的卓越研究。

经济和国际贸易

塔潘·赖乔杜里和伊尔凡·哈比布主编的首卷《剑桥印度经济史》④大体上是专门研究莫卧儿时期的印度的。约翰·理查兹主编的《莫卧儿印度的帝国货币体系》⑤ 对货币和铸币问题是一本有用的入门之作。一篇关于莫卧儿商业的开创性文章是B. R. 格罗夫的《17—18世纪北印度农村社会中商业生活的综合模式》⑥（载《印度历史记录委员会年报》）。阿辛·达斯·古普塔著《约1700—1750年间印度商人和苏拉特的衰落》⑦ 对这座重要的莫卧儿港口的衰落做了一个学术性的、文字优美的分析。

关于城市化，可参看上面提到的赖乔杜里和哈比布著作的相关部分。对中世纪和莫卧儿时期的印度来说，系统发掘数量可能很大的城市、集镇和村庄遗址的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深入和合作研究的好处可以在迈克尔·布兰德和格伦·洛利主编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⑧ 论文集中看到。斯蒂芬·布

---

① Jagdish Sarkar, *The Military Despatches of a Seventeenth Century Indian General* (Calcutta, 1969).

② N. R. Farooqi, *Mughal–Ottoman Relations* (Delhi, 1989).

③ Riazul Islam, *Indo–Persian Relation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Mughal Empire and Iran* (Tehran, 1970).

④ 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1982).

⑤ John F. Richards ed., *Th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of Mughal India* (Delhi, 1987).

⑥ B. R. Grover, "An Integrated Pattern of Commercial Life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North India During the 17th–18th Centuries" in *Proceedings, Indian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ssion*, 37 (1966), 121–153.

⑦ Ashin Das Gupta,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rat c. 1700–1750* (Wiesbaden, 1979).

⑧ Michael Brand and Glenn D. Lowry eds., *Fatehpur Sikri* (Bombay, 1987).

莱克的《沙贾汗阿巴德：1639—1739年间莫卧儿印度的首要城市》[1] 对沙·贾汗修建的这座新城及其在一个世纪中的演化做了出色的分析。从主要史书和欧洲人游记中得来的许多描述性资料收集在H. K. 纳克维的《莫卧儿时期的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2] 和同一作者的《大莫卧儿时代的城市化和城市中心》[3] 中。加文·汉布里的《莫卧儿印度的城市：德里、阿格拉和法塔赫布尔西格里》[4] 是一本通俗易懂、配有丰富插图的著作。

308 在对现代早期欧洲所作的大量学术研究中，印度的贸易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领域。许多能干的学者很好地利用了欧洲档案馆中的丰富资料。关于葡萄牙人，近来最好的综合性著作是作为《新编剑桥印度史》第Ⅰ部分第1卷的M. N. 皮尔森著《葡萄牙人在印度》[5]。关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权威著作是K. N. 乔杜里的《1660—1760年欧洲人在亚洲的贸易世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6]。至于一般性的综合著作，可参看同一作者的《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的印度洋经济和文明》[7]。关于从宗主国的角度对荷兰人的评述，参看乔纳森·伊斯瑞尔：《1585—1740年荷兰人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8]。一项非常宝贵的地区研究是奥姆·普拉卡什的《1630—1720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经济》[9]。还可参看苏希尔·乔杜里著《1650—1720年的孟加拉贸易和商业组织》[10]。对莫卧儿时期东南贸易所作的一项出色研究是S. 阿拉萨拉特纳姆所著《1650—1740年科罗曼德尔沿海的商人、公司和商业》[11]。对于更早的时期，参看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著《1500—

① Stephen P. Blake, Shahjahanabad: *The Sovereign City in Mughal India, 1639–1739* (Cambridge, 1990).

② H. K. Naqvi, *Mughal Hindustan: Cities and Industries 1556–1803* (Karachi, 1958).

③ H. K. Naqvi, *Urbanization and Urban Centers Under the Great Mughals* (Simla, 1972).

④ Gavin Hambly, *Cities of Mughal India: Delhi, Agra and Fatehpur Sikri* (New York, 1968).

⑤ M. N. Pearson,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Cambridge, 1987).

⑥ K. N. Chaudhuri, *The European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1978).

⑦ K. 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1990).

⑧ Jonathan I.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1989).

⑨ 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630–1720* (Princeton, 1985).

⑩ Susil Chaudhuri, *Trade and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in Bengal, 1650–1720* (Calcutta, 1975).

⑪ S.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Delhi, 1986).

1650年南印度商业的政治经济学》[1]。爱德华·阿尔珀斯在《古吉拉特和东非贸易：约1500—1800年》[2]一文（载《非洲史研究国际杂志》）中，指出了印度西部同东非海上贸易的重要性。

文化、种族和地方史

S. A. A. 里兹维的《16世纪和17世纪北印度的穆斯林复兴运动》[3]一书仔细研究了印度伊斯兰教的宗教变迁。里兹维的两卷本《印度苏菲派史》[4]全面论述了莫卧儿印度的苏菲教团。优哈南·弗里德曼著《谢赫·阿玛德·希尔辛迪》[5]对希尔辛迪采取了一种修正主义方法。还可参看阿齐兹·艾哈迈德著《印度情境下的伊斯兰文化研究》[6]。阿斯姆·罗易著《孟加拉伊斯兰教的综合传统》[7]一书突显了这一时期从事扩张、种植水稻和定居边疆的孟加拉人的伊斯兰教的独特性。

有关锡克人的文献很丰富。最近对锡克人所作的概述可以在J. S. 格雷瓦尔的《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之一）一书中[8]找到。还可参看同一作者的《历史上的古鲁纳亚克》[9]和W. H. 麦克劳德著《古鲁纳亚克和锡克人宗教》[10]。为最后一位锡克古鲁编撰的优秀传记是J. S. 格雷瓦尔和S. S. 巴尔的《古鲁戈宾德·辛格》[11]。

近来对拉杰普特人开展的生气勃勃的历史研究已开始综合运用详尽的档案资料、拉杰普特人编年史和吟游诗人的诗歌。昆瓦尔·利法卡特·阿 309

① Sanjay Subrahmanya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Southern India, 1500–1650* (Cambridge, 1990).

② Edward Alpers, "Gujarat and the Trade of East Africa, c. 1500–180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9 (1976), 22–44.

③ S. A. A. Rizvi, *Muslim Revivalist Movements in Northern Indi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gra, 1965).

④ Rizvi, *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 (Delhi, 1983).

⑤ Yohanan Friedmann, *Shaykh Ahmad Sirhindi* (Montreal, 1971).

⑥ Aziz Ahmad, *Studies in Islamic Culture in the Indian Environment* (Oxford, 1964).

⑦ Asim Roy, *The Islamic Syncretistic Tradition in Bengal* (Princeton, 1985).

⑧ J. S. Grewal, *The Sikhs in the Punjab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⑨ J. S. Grewal, *Guru Nanak in History* (Chandigarh, 1969).

⑩ W. H. McLeod, *Guru Nanak and the Sikh Religion* (Oxford, 1968).

⑪ J. S. Grewal and S. S. Bal, *Guru Gobind Singh* (Chandigarh, 1967).

里·汗著《阿克巴和贾汗吉尔时代的卡赤瓦哈部族》[1] 已经汇总了与这个斋浦尔家族有关的有用资料。理查德·福克斯的《亲缘、部族、拉贾和统治》[2] 一书勾画了拉杰普特士族在恒河平原上的生活周期。还可参看诺曼·P. 齐格勒所作《对莫卧儿时期拉杰普特人效忠问题的一些说明》[3] 一文（载理查兹主编《王制和权威》）。萨提亚·普拉卡什·古普塔的《拉贾斯坦东部的农业体系（约1650—1750年）》[4] 一书雄辩地说明了保存在拉杰普特人各个都城中的档案资料的价值。还可参看R. P. 拉纳的《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北印度的农民叛乱》[5] 一文（载《印度经济和社会史评论》），这篇文章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罗伯特·C. 哈利西的《拉杰普特人的反奥朗则布起义》[6] 一书重新诠释了拉杰普特人战争。

关于马拉塔人的最吸引人的历史著作是由印度西部的一名英国殖民地官员詹姆斯·格兰特·达夫撰写的《马拉塔人史》[7]，这本书初版于19世纪早期，引用了一些现在已经遗失的资料。对马拉塔人所作的最好的概述是斯图尔特·戈登的《1600—1800年的马拉塔》[8]（即将出版*，《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之一）。要获得更详尽的记述，还可参看G. S. 萨德赛著《新马拉塔人史》[9]。贾杜纳特·萨卡尔的《西瓦吉和他的时代》[10] 也是一本有用的记述性著作。杰出的马拉塔人史学家A. R. 库尔卡尼在《西瓦吉时代的马哈拉施特拉》[11] 一书中评述了马哈拉施特拉的社会、国家和经济结构。对一个被忽略了的时期的详细介绍，可参看A. R. 库尔卡尼著《莫卧儿—马拉塔之关

---

① Kunwar Refaqat Ali Khan, *The Kachhwahas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 (New Delhi, 1976).

② Richard Fox, *Kin, Clan, Raja, and Rule* (Berkeley, 1971).

③ Norman P. Ziegler, "Some Notes on Rajput Loyalties During the Mughal Period" in Richards, ed., *Kingship and Authority*.

④ Satya Prakash Gupta, *The Agrarian System of Eastern Rajasthan* (c. 1650–c. 1750) (Delhi, 1986).

⑤ R. P. Rana, "Agrarian Revolts in Northern India during the Late 17th and Early 18th Century,"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8 (1981) 287–326.

⑥ Robert C. Hallissey, *The Rajput Rebellion Against Aurangzeb* (Columbia, 1977).

⑦ James Grant Duff, *History of the Mahrattas* (New Delhi, 2 vols. in one, reprint edition, 1971).

⑧ Stewart Gordon, T*he Marathas, 1600–1800* (forthcoming)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 该书后于1993年出版。

⑨ G. S. Sardesai, *New History of the Marathas* (Bombay, 3 vols., 1957).

⑩ Jadunath Sarkar, *Shivaji and His Times* (Bombay, reprint edition, 1973).

⑪ A. R. Kulkarni, *Mahrashtra in the Age of Shivaji* (Poona, 1974).

系：决定命运的25年（1682—1707年）》①。还可参看安德烈·温克著《印度的土地和主权：18世纪马拉塔人自治时期的农业社会和政治》②。

M. C. 普拉丹的人类学研究《北印度查特人的政治体系》③表明了系统研究世系、部族和家谱的需要。两本重要的文献汇编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B. N. 戈斯瓦米和J. S. 格雷瓦尔合著《莫卧儿王朝和扎克巴尔的瑜伽师》④以及J. S. 格雷瓦尔著《在历史的僻巷中：来自某旁遮普集镇的一些波斯文文档》⑤。

园林、绘画和建筑

莫卧儿园林、绘画和建筑的秀丽激发了许多鸿篇巨制的创作。这里只能提及其中的少量文献。就园林而言，可以参看西尔维娅·克罗等人的《莫卧儿印度的园林》⑥。对园林不断变化的用途所作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解释是小詹姆斯·维斯科特的《园林与城堡：早期莫卧儿园林的地域背景》⑦一文（载J. D. 亨特主编的《风景和园林史：问题、路径和方法》）。对于贾汗吉尔和沙·贾汗时期的绘画，参看麦洛·比奇著《大莫卧儿帝国：1600—1660年间印度的帝国绘画》⑧，或《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中的《莫卧儿时期的绘画》⑨（即将出版*）一书。韦恩·贝格利的《泰姬陵的传说和一个关于它的象征意义的新理论》⑩（载《艺术简报》）一文对陵墓建筑群 310

① A. R. Kulkarni, *The Mughal–Maratha Relations: Twenty - Five Fateful Years (1682–1707)* (Pune, 1983).

② Andre Wink, *Land and Sovereignty in India: Agrar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ratha Svarajya* (Cambridge, 1986).

③ M. C. Pradha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Jats of Northern India* (Bombay, 1966).

④ B. N. Goswamy and J. S. Grewal, *The Mughals and the Joghis of Jakhbar* (Simla, 1967).

⑤ J. S. Grewal, *In the By-Lanes of History: Some Persian Documents from a Punjab Town* (Simla, 1975).

⑥ Sylvia Crowe, et al., *The Gardens of Mughul India* (New Delhi, 1972).

⑦ James L. Wescoat, Jr., "Gardens Versus Citadels: The Territorial Context of Early Mughal Gardens" in J. D. Hunt, ed., *Landscape and Garden History: Issues, Approaches, Methods* (Washington DC, 1991).

⑧ Milo Beach, *The Grand Mogul: Imperial Painting in India 1600–1660* (Williamstown, 1978).

⑨ Milo C. Beach, *Mughal Painting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 该书后于1992年出版时更名为《莫卧儿和拉杰普特绘画》（*Mughal and Rajput Painting*）。——译者注

⑩ Wayne Begley, "The Myth of the Taj Mahal and a New Theory of Its Symbolic Meaning," *The Art Bulletin* (March, 1979).

提供了一个修正性的解释。还可参看贝格利在阿道尔夫・普拉克瑟科主编的《麦克米伦建筑师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乌斯塔德・艾哈迈德"①。《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中，凯瑟琳・阿舍撰写的《莫卧儿建筑》②（即将出版*）全面论述了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建筑。关于沙・贾汗时期欧洲人对莫卧儿建筑的影响，参看艾巴・科赫著《沙・贾汗和俄耳甫斯神》③一书，该书的分析富有启发性。

① Begley, "Ahmad, Ustad" in Adolf K. Placzek,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Architects* (New York, 1982).

② Catherine B. Asher, *Mughal Architectur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 该书后于1992年出版时更名为《印度莫卧儿时期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Mughal India*）。——译者注

③ Ebba Koch, *Shah Jahan and Orpheus*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88).

索 引

（索引中页码为原著页码）

① 为“阿迪尔·沙·苏尔”（“Adil Shah Sur”）之误。

① 原文有误，当为“Arjun”。Argun则指历史上隶属蒙古帝国的伊儿汗国（1256—1335）的第四任统治者阿鲁浑（约1258—1291）。

② “Qundahar”当为“Qandahar”之误。

[1] “Badakhstan”应为“Badakhshan”之误。

① 原文拼写有误，应为 “Burhan Nizam Shah Ⅱ”。

① 疑拼写错误，正文为“Chand Sultan”。

② 原文拼写错误，应为“Chauragarh”。

③ 原文如此，但正文中的拼写形式为“Chishtis”。

① 正文中拼写形式为“Gulbadan Begam”。

① 原文拼写错误，应为“sakti”。

② 正文为“Khan”。

① 原文拼写有误，正文中为“Jan Sipar Khan”。
② 原文拼写有误，正文中为“Janjira”。
③ 原文如此，正文中拼写为“Jija Bai”。
④ 与正文拼写形式不同，正文中拼写为“Jogi Udant Nath”。

⑤ 原文如此，但正文中为“Khan Khanan”。

① 疑有误，正文为“Muhammad Sultan Mirza”（“穆罕默德·苏丹·米尔扎”）。

[1] 恐有误，正文中为"Rhim-ud-din Khan"。

318

① 疑拼写有误，正文为“Ram Chand”。

② 疑拼写有误，正文为“Ram Singh Hara”

③ “Shah Jahad”当为“Shah Jahan”之误。

① 正文中拼写为“Salima Sultan Begam”。

① 原书正文中拼写为"Shahjahanpur"。

319

① 原书正文中拼写为"Shaikh Abdus Samad"。

译后记

承蒙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我负责翻译了《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中的《莫卧儿帝国》一书。该书由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理查兹（1939—2007年）编撰，初版于1993年。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修正了初版中存在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和表达不够清晰或准确的地方。译者翻译时依据的是该书修订后的最新版本。

尽管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原书仍存在着一些笔误。对这些笔误，译者在正文中以脚注的形式做了说明。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样的问题可能算不上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能够很容易地知道这是作者的“笔误”。实际上，对于这样一本由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学者独自编撰的30余万字的历史著作，里面存在一些瑕疵也是一件可以理解乃至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对于一本目标受众也包括非专业人士在内的“叙事史”著作来说，这样的问题确实也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甚至“苛责”。因为无论我们对历史学的性质和任务抱有怎样的观点，谁都不会否认，准确无误地陈述史实是叙事史最起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虽然未必像利奥波德·兰克所说的那样，“它仅仅寻求呈现真实的历史”[1]。难怪印度历史学家M. 阿萨尔·阿里（M. Athar Ali）在对该书最初版本所写的书评中，做出了如下尖刻的评论：

> 人们通常把剑桥史系列看作事实的丰富宝库，而不管其作者们的历史著述最终会变得怎样过时。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册，

---

① Ranke, Leopold （1915）.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1494–1514*, trans. G.R. Dennis. London:G.Bell, p.vii.

> 我们却不能这样说。人们希望，在另一个版本面世之前，至少要消除那些比较刺眼的纰缪。在此以前，读者使用该书时将不得不在日期、名字和准确数据方面小心翼翼。[1]

不过，我认为，对这类问题，我们虽然应给予足够的留意，但不必过分关注。如果我们过分关注这类问题，我们就可能由此忽略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一本历史著述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是不能以这个方面的表现作为评判的主要依据的。要全面客观地评判一本历史著述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它的实质性的内容，即这本著作通过它的陈述想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它所理解的“真实的历史”？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去评判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同一般的印度通史著述体系相比，《新编剑桥印度史》有一个特别不同寻常的地方。一般的印度通史著作通常都是把“史前时期和印度河文明”作为印度历史的起点来叙述的。例如，由当代德国学者赫尔曼·库尔克和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共同编写的《印度史》一书就是如此，而由印度本国学者R. C. 马宗达、H. C. 赖乔杜里和卡利金卡尔·达塔合著的《高级印度史》更是如此。[2]实际上，这样一种编排似乎已经成为印度通史编撰中的“标准”或权威做法。《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印度历史的叙述方式（第一部分仍旧为“从旧石器时期到印度河文明衰落止的印度”）就证明了这一点。[3] 然而，与这些通行的做法大相径庭，《新编剑桥印度史》的编辑和作者们别出心裁地把莫卧儿帝国时期作为印度史的起点！ M. 阿萨尔·阿里略带愤怒地把这一点归咎于《新编剑桥印度史》的编辑们膨胀起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偏见：

> ……印度的历史被严重阉割了，以至它的开端竟被定在16世纪。这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成了印度历史的中心。这个决定可能反映了编辑们关于殖民地阶段是印度历史的中心而早前许多时期

① Ali, M. Athar （Nov., 1994）. Review of the book *The Mughal Empire*, by John F. Richar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4, No. 3, p. 425.

② 参看：赫尔曼·库尔克和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印度史》，王立新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R. C. 马宗达、H. C. 赖乔杜里和卡利金卡尔·达塔合著，张澍霖等译：《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③ 参看：India.（2011）.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 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与历史无关的真正观点。但是，对从英国统治时期剑桥史编辑们比较开明的东方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倒退，非西方的历史学家只能感到遗憾。[①]

M. 阿里对《新编剑桥印度史》编辑和作者们“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新编剑桥印度史》的总编戈登·约翰逊和两位副编辑C. A. 贝利和约翰·理查兹都是西方学者，而其中的约翰·理查兹还正是《莫卧儿帝国》一书的作者！单单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容易让人给他们贴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标签，用以往西方学者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和态度来解释（和指摘）他们的作为。然而，不管这样一种解释和批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我们却不能满足于这种解释和批评。在我们没有搞清楚M. 阿里所指摘的《新编剑桥印度史》编辑们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具体内容以前，他的解释至少不能认为是充分的。

换言之，我们必须弄清楚《新编剑桥印度史》的编辑们特别是《莫卧儿帝国》一书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看待莫卧儿帝国，怎样定位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新编剑桥印度史》的编辑们为什么要把莫卧儿帝国时期当作他们的印度历史的开端，也才能评判M. 阿里的批评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为此，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约翰·理查兹本人在“现代早期印度和世界历史”一文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

从15世纪晚期到我们当前时代的19世纪早期（为方便起见，1500—1800年），各个人类社会共同经历了一些世界范围的变迁过程，受到它们的影响。这些过程在其范围和强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和许多其他历史学家一起，我把这些世纪称为“现代早期”。我们将其与之前的中世纪和现代的19世纪和20世纪区别开来。至于我们现在是否处于一个后现代时期，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臆说的问题。和许多学者相反，我不认为这种分期法受到了纯属欧洲中心主义考虑的驱使。“现代早期”这一术语只是一种用来捕捉各人群自我组织以及同其他人群和自然世界互动方式的迅速而巨大的变化这一现实的尝试。对于南亚历史，我相信使用“现代早期”这个术语——而不是使用“莫卧儿印度”或“中世纪晚期印度”或“前

① Ali, op.cit., p. 424.

> 殖民晚期印度”这些术语—— 能够表达出16—18世纪（印度历史）的丰富意义。这样做将会缓和那种把印度看做例外的、独特的和奇异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同世界历史脱节的见解。我相信为了更好理解16、17和18世纪印度历史的比较独特的行程，我们必须把南亚文化、文明和社会置于该背景之下。[①]

接下去，约翰·理查兹考察了“规定现代早期世界”的“至少六大独特且互补的过程”[②]：全球性海上通道的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的兴起、巨大而稳定的国家的成长、世界人口的增长、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新技术的扩散。在他看来，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并没有被排除在这些现代早期世界的变迁过程之外。相反，它形成了整个现代早期世界巨变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据此，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现代早期模型对我们的南亚史研究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的问题，约翰·理查兹给出了下面的回答：

> 我们必须对现代早期的南亚（而非莫卧儿印度）做更好的综合和多学科的历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学者们要平滑地在地方和地区史的特殊性和对南亚和世界的更广泛的描述和分析之间转换。南亚是如此重要，容不得我们在将来书写世界历史时把它作为东方的古玩束之高阁。[③]

一言以蔽之，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在约翰·理查兹看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现代早期的南亚”）必须作为“现代早期”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叙述。因而，莫卧儿帝国应该被看作“现代早期帝国”，而非“中世纪”帝国。[④] 约翰·理查兹特别强调，正像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对于莫卧儿帝国这样一个现代早期帝国，其决定性的特征是莫卧儿王朝治下国家权力和政治统一的史无前例的发展。他反对其同事们认为莫卧儿帝国没有或很少对地方社会、地方豪强（柴明达尔）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观点，也反对南印度的历史

① Richards, John F.（Fall, 1997）. “Early Modern India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8, No. 2, pp.197–198.

② Ibid., p.198.

③ Ibid., p.209.

④ 艾森斯塔得（S. N. Eisenstadht）就明确地把莫卧儿帝国当作他所谓的“历史官僚帝国”的实例之一。参看：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学家们强调在这个地区"分裂的国家"体系中政治权力和权威具有分散性的观点。[①] 关于这一点，在《莫卧儿帝国·前言》中，约翰·理查兹给予了足够的强调，他郑重声明："30年的研究使我确信，莫卧儿中央集权的政权是一个现实，它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这究竟是好是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②] 在《莫卧儿帝国·导言》中，他再次着重指出："帝国并非只是一幅悬挂在每个地区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上的无关紧要的帷幕。它是一个把次大陆联合起来的无孔不入的中央集权的体系。由帝国的军事力量维系的公共秩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其边界内的土地上，有组织暴力的规模和层级显著下降了。帝国对税收和贡赋的需要刺激了生产，鼓励了市场的成长。莫卧儿人的统一做法和无所不在，影响了次大陆上所有地方和地区的社会。鲜有个人和社区，如果有的话，未受到这个庞然大物的触动。"[③]

当然，如果约翰·理查兹关于"现代早期帝国"的观念仅止于此，这在西方学术界将是一个很平凡的观点。在《印度史》一书中，赫尔曼·库尔克和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就是根据同样的理由把莫卧儿帝国看作印度现代历史时期的开端的。[④] 除了政治发展的面向，约翰·理查兹还在"现代早期帝国"概念中加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他的现代早期帝国概念容纳了西方学界"现代化"（或"近代化"）概念的全部内涵。大概正是基于这一总的观念，约翰·理查兹在《莫卧儿帝国》一书的结论部分详细批驳了伊尔凡·哈比布（Irfan Habib）在《莫卧儿印度的农业体系：1556—1707年》（1963年）一书中提出的著名的"扎吉尔危机"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莫卧儿帝国的最终衰落和瓦解是由于莫卧儿帝国日益沉重的税收体系破坏了印度的农业生产，以及由此引发的以柴明达尔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标志的社会反抗。因而，哈比布扎吉尔危机理论的本质是莫卧儿时期印度社会经济的"衰落论"。对此，约翰·理查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说：

> ……从16世纪80年代阿克巴改革到1700年左右的长期趋势表

---

① 参看：Richards, op.cit., pp.206–207.

② John F.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 xv.

③ Ibid.,p.1–2.

④ 这两位德国学者对比了专注于对外扩张而非加强帝国内部控制的印度古代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认为后者"幅员可以和古代的印度帝国比肩，但在内部结构上却与它们截然不同。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对田赋和军事机器的广泛控制为基础，从而使其能够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匹敌。"（见赫尔曼·库尔克和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前引书，第10页。）

明，尽管可以确定在一些个别时期存在着野蛮的压迫，但大多数柴明达尔和农民是繁荣富足的。除了遭受战争蹂躏的德干地区那样的例外，一般而言，农业生产看来是经历了增长，而耕地面积也稳步扩大了。农业增长是对国家税收驱动的市场扩大和新的出口市场带来的需求冲动的直接反应。集镇（卡斯巴）和较大村庄构成的网络变得更加密集。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是日益富有的商人和货币借贷者，如旁遮普的卡特利人。[①]

这样，在理查兹看来，莫卧儿时期的印度不仅像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了政治发展（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还像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而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恰恰就是由于“帖木儿农业体系的巨大成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重要变迁”。[②] 因此，整个说来，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和同一时期的西方一起经历了现代化的早期发展：莫卧儿帝国是一个“现代早期帝国”！实际上，这一点正是约翰·理查兹通过《莫卧儿帝国》一书的陈述想告诉我们的，也正是他所理解的“真实的历史”。

就此而言，至少对约翰·理查兹来说，我们不能说他关于莫卧儿帝国以来的印度历史的观念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萨米尔·阿明等人赋予这个术语的历史意涵：欧洲（文化）相对于其他地方（文化）的优越性，欧洲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现代性。相反，在约翰·理查兹关于莫卧儿帝国是一个“现代早期帝国”的观念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颠覆。因为根据这种观念，在前殖民地时期，在欧洲人和欧洲文化真正影响印度以前，印度就已经在本土化的莫卧儿帝国治下开始了现代化过程。换言之，印度的现代化过程被认为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现代化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内生过程，而非舶来品。[③]

大概正是在理查兹上述历史观念的影响下，《新编剑桥印度史》的编辑们才把他们的印度史系列丛书的开端确定在莫卧儿时期。这与其说表明了他们

① Richards （1995）, pp.294–295.

② Richards （1995）, p.295.

③ 与这种“革命性”的观点相比，即便是“后殖民主义的”印度民族主义史学，也是把印度的现代时期同欧洲人的到来联系在一起，把欧洲人的到来和影响当作印度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前引R. C. 马宗达等人编撰的《高级印度史》一书就是这样，A. L. 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实际上也是如此。（参看A. L. 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们才把他们的印度史系列丛书的开端确定在莫卧儿时期。这与其说表明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不如说表明了他们对约翰·理查兹印度史观的认可。[①] 因为这一做法似乎暗示着他们认为现在印度的历史起源应该追溯到莫卧儿帝国时期，而不是英国统治时期，当然也不是莫卧儿帝国以前的时期。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历史事实上构成了印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构成了现在印度（新印度）的历史摇篮！显然，这不仅是对莫卧儿帝国，也是对整个印度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乃至革命性的看法。[②]

这样看来，《莫卧儿帝国》一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大概就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莫卧儿帝国的历史形象，让我们开始接触到关于印度历史的一种全新的观念[③]，而不止像法哈特·哈桑所说的那样，“这或许是

---

① 理查兹认为：“在印度，自孔雀王朝以来，莫卧儿帝国第一次在几乎整个次大陆上施行了中央集权统治。”〔Richards （1995），p. 201〕孔雀帝国虽然在幅员上可以和莫卧儿帝国相提并论，但在内部结构上却不是中央集权的。因此，莫卧儿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国家，莫卧儿时期也由此成为印度历史上的国家形成时期。实际上，这大概就是《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的编辑们把印度历史的开端定在莫卧儿时期的真正理由。单就这一点而言，《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的编辑们可以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为他们在这样做时遵循的就是西方（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主流史学观念：历史的恰当基础是国家。不过，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显然不是M. 阿萨尔·阿里所指斥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

②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这一点的重大意义可能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根据普通的国别史概念，国别史应该记述在某一个国家发生过的、我们迄今已知的所有事变和过程。否则，国别史就变成了关于这个国家的断代史，或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然而，《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的编辑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对印度史的记述从莫卧儿帝国开始，就宣称或承认他们编撰的只是印度的断代史。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他们编撰的是现在印度的历史，而这个“现在印度”的历史只需追溯到莫卧儿帝国时期，而此前的印度历史是“另一个”印度的历史，是另一个不同的历史实体的历史！不消说，关于印度历史结构的这样一种见解，是大多数印度本土历史学家（特别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③ 这种印度史观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作为“剑桥国别简史丛书”之一出版的《印度简史》（Barbara D. Metcalf and Thomas R. Metcalf，*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一书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芭芭拉·梅特卡夫和托马斯·梅特卡夫就肯定和继承了这种新的印度史观。在叙述莫卧儿帝国的历史时，他们写道：“如果那个时期不是像很久以来所做的那样被描述为‘中世纪’印度或‘穆斯林’印度（两个包含着隔绝和怪异意味的术语），而是被描述为现在许多历史学家更喜欢使用的那个术语——‘现代早期’，莫卧儿制度的可塑性和开放性也就同时得到了彰显。”（p.26.）而莫卧儿制度的可塑性和开放性正是他们在对这一时期印度历史的叙述中所强调的。实际上，叙述这样一种“意象”的印度正是《印度简史》一书的主旨。对此，该书作者在《前言》中明确写道：“我们在这本简史中集中于这个印度‘意象’的根本上属于政治的主题，集中于改变和维系着那个‘印度’的制度结构。”（p. xiv.）同样，伯顿·斯坦和彼得·罗布在他们的印度通史著作中也都把莫卧儿帝国的历史看作印度“现代早期”的历史。（参见：Burton Stein, *A History of India*.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8; Peter Robb, *A History of India*.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近年来唯一一本提供了关于南亚最重大的帝国之一——莫卧儿帝国的紧凑、可信和最新历史的书。"[①]

当然，约翰·理查兹教授的《莫卧儿帝国》一书并不是关于莫卧儿帝国的唯一历史记述：既不是最早的，也不会是最后的。在其他历史学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完全另类的莫卧儿帝国的历史。[②] 例如，在亨·迈·埃利奥特爵士和约翰·道森教授编辑的《印度本国历史学家讲述的印度历史》(Elliot, H. M. and John Dowson,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8 volumes, Tr ü bner & Co, London, 1867–77)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位英印政府文官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作为那个时代西方人眼中"残暴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莫卧儿帝国的历史。[③] 而在后来许多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中〔如R. C. 马宗达（R. C. Majumdar）、A. L. 斯里瓦斯塔瓦（A. L. Srivastava）和I. H. 奎雷西（I. H. Qureshi）等人的著作〕，莫卧儿帝国的历史又被描述为两个本质上彼此迥异和相互敌视的社会群体——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不断冲突的历史。

同样，正像约翰·理查兹教授在《莫卧儿帝国》一书中暗示出来的那样，关于莫卧儿国家本身的性质人们也远不是有着统一的看法。一些学者把艾登·索撒尔（Aiden Southall）在《阿鲁尔社会》（*Alur Society*, Cambridge, 1956）一书中提出的"断裂国家模式"（segmentary state model）应用于莫卧儿帝国，认为这个帝国是一个高悬于独立的地方自治体之上的"表层实体"（superficial entity）。[④] 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更进一步，他认为莫卧儿王朝的主权只是同地方权力精英妥协和调和的结果。这样，国家

---

① Hasan, Farhat （May, 1995）. Review of the book *The Mughal Empire*, by John F. Richard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9, No.2, p. 441.

② 关于国际学术界对莫卧儿帝国历史及其国家性质的不同理解，参见前引法哈特·哈桑对《莫卧儿帝国》一书的书评。

③ 理查德·伊顿相信埃利奥特和道森是为了贬低"中世纪"的印度伊斯兰国家而"摘译"了那个时期阿拉伯–波斯史学家们的著作。他说："埃利奥特热切地将他理解的英国统治的公正和效率同之前穆斯林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对照，对印度历史上的'穆罕默德教'时期没有给予丝毫的同情……（他说）英国人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给印度人带来的裨益就远远超过了穆斯林五个世纪的贡献……埃利奥特贬损英国统治前的印度穆斯林统治者合法性的动机就是这样显而易见。" (Eaton, Richard Maxwell: "Temple Desecration and Indo–Muslim States", in Gilmartin, David and Bruce B. Lawrence, *Beyond Turk and Hindu: Rethinking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Islamicate South Asi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Gainesville, pp. 246–247.)

④ 参看：Stein, Burton: *A History of India*.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8.

不仅是无权的，还同整个社会相分离。[1]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斯蒂芬·布莱克（Stephen Blake）的观点，他把莫卧儿帝国看作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家族—官僚制国家”（patrimonial-bureaucratic state）。在这种国家里，所有权威都来自皇帝，皇帝和政府发出的一切命令都是实现帝国这个大家庭利益的工具。因而，这是一种极其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深深地侵入社会肌体，不允许其他权力中心的存在。[2]

这些史学史的事实提醒我们在阅读所谓的“叙事史”（narrative history）时，一定不要惑于它的形式。在形式上，叙事史记述的和要记述的似乎就只是“历史事实”。然而，在本质上，叙事史不止是单纯地叙述过去，同时还是观点或观念的建构和表达。[3] 实际上，叙事史中的“历史事实”首先只是在某种观点或观念下叙述这些历史事实的历史学家自己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就既不能了解他对历史事实的陈述，也不能真正了解他所陈述的历史事实。

王立新

2011年4月30日于河北师范大学

---

① 参看：Wink, André : *Land and Sovereignty in India: Agrar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ratha Svaraj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参看：Blake, Stephen P.: “The Patrimonial-Bureaucratic Empire of the Mughal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9, No. 1 (Nov., 1979), pp. 77–94.

③ 兰克史学显然只是抓住了叙事史的形式方面，而且是过分执拗于这个方面。兰克本人的历史著述也并非只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至少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历史是在彰显上帝的意志。其实，正像谢尔登·波洛克指出的那样，“（兰克史学家们标榜的）客观主义历史一直是后启蒙时代政治自我表达的主要知识形式之一”。〔Pollock, Sheldon （May, 1993）. “Ramayana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Ind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2, No.2, p.292.〕

《新编剑桥印度史》丛书书目

I　莫卧儿人及其同时代族群

M. N. 皮尔森：《葡萄牙人在印度》

伯顿·斯坦：《维查耶那加尔王国》

麦洛·克利夫兰·比奇：《莫卧儿和拉杰普特绘画》

凯瑟琳·B. 阿舍：《印度莫卧儿时期的建筑》

约翰·F. 理查兹：《莫卧儿帝国》

乔治·米歇尔：《南印度的建筑和艺术》

乔治·米歇尔、马克·泽布劳斯基：《德干苏丹国的建筑和艺术》

理查德·M. 伊顿：《德干社会史（1300—1761）——八个印度人的生活》

II　印度邦国和向殖民体制的过渡

C. A. 贝利：《印度社会与英帝国的形成》

P. J. 马歇尔：《孟加拉：英国的桥头堡——1740—1828年的印度东部》

J. S. 格雷瓦尔：《旁遮普的锡克教徒》

斯图尔特·戈登：《1600—1818年的马拉塔》

奥姆·普拉卡什：《欧洲人在前殖民时期印度的商业活动》

III　印度帝国和现代社会的开端

肯尼斯·W. 琼斯：《英属印度社会宗教改革运动》

苏加塔·鲍斯：《农民劳动和殖民地资本：1770年以来的孟加拉农村》

B. R. 汤姆林森：《现代印度经济：1860年至21世纪》

托马斯·R. 梅特卡夫：《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大卫·阿诺德：《印度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和医学》

芭芭拉·N. 拉姆萨克：《印度王公和他们的土邦》

IV　当代南亚的演进

保罗·R. 布拉斯：《独立后的印度政治》

杰拉尔丁·福布斯：《近代印度妇女》

苏珊·贝利：《18世纪至现代的印度种姓、社会和政治》

大卫·卢登：《南亚农业史》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